

**唯利到唯益：“双减”后教育失衡的回归**

**FROM BENEFIT TO BENEFIT: THE RETURN OF EDUCATION  
IMBALANCE AFTER THE "DOUBLE REDUCTION"**

王承丽<sup>1\*</sup>

Chengli Wang<sup>1</sup>

<sup>1</sup> 南宁师范大学

<sup>1</sup>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2238093468@qq.com

**摘要：**“双减”政策是党和国家基于教育公平综合考量的重要举措。唯利教育体现为资本力量在公共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无序扩张并围绕教育行为诱发相关利益冲突，导致教育目的偏离国家教育方针。“双减”政策的出台可有效解决唯利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弥补在教育失衡的裂缝中缺失的公共资源。为实现办好令人民满意的教育目标，“双减”政策的落地实施势在必行。本文将从学生、家庭、教师、学校和社会五个角度出发，分析“双减”政策带来的有益影响，让教育回归本质。

**关键词：**“双减”，唯利教育，教育失衡。

**Abstract:** The policy of “Double reduc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educational equity. Meritocracy is manifested in the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capital power in the public basic education field and the related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duced by educational behavior, which lead to the deviation of educational purpose from 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policy. The policy of “Double reduction”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fit-oriented education, and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public resources in the cracks of education imbalanc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running a satisfactory education for the people.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tudents, families, teachers, schools and society so as to return education to its essence.

**Keywords:** Double Reduction, Profit-Oriented Education, Education Imbalance

## 引言

长期以来，学生课业负担繁重一直是教育领域较为突出的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也是众多专家、学者热议不休的话题。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减轻中、小学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发布，标志着中国第一个基础教育“减负”文件的诞生，随后，国家又相继推出“减负”的多项政策。（邹琪，樊丽，2022）“减负”的出现，使它成为了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21年7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制定了相应的教育行动计划纲要，包括三项措施：减轻过重作业负担、提升课后服务水平、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意见》出台后，各部门、各学校立刻采取行动，极大改变了教育生态。在之前，校外教育生产私有化教育产品，短期内能达到教学目标所要求的教育预期，所以导致教育向校外补习延伸，造成教育失衡。“唯利教育”是以盈利为目的，致力于追求利益最大化。“唯利教育”生产出大量“分数增长剂”，导致“自然成长”与“激素催化”有极大错位。

## 内容

### 1. “唯利教育”的联合反应

教育本应是一种公益性的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特殊认识活动。但资本“加盟”教育以后，教育也变成了一种牟利的工具。（杨东平，2018）“唯利教育”在教育生产中，以利作为生产驱动，围绕教育行为以利形式结成社会关系。当仅以利益为导向从事教育活动时，往往会诱发教育相关产品不自主地失控，引起与教育本身目的相悖的联合反应。

#### 1.1 资本对教育市场的控制

教育机构的兴起满足了家长对孩子成绩高分的需求，这种“技巧与高分”的供求关系成为资本进入市场的经济信号。此时，教育服务有了经济价值，成为逐利的商品，义务教育资本化。（方长春，2018）随着教育服务越来越商品化，一大批教育机构、教育融资企业层出不穷，以谋利为目的的大量资本涌入教育领域，仅统计企业名称为教育培训机构的数量，2019年就有24011家，仅2020年我国在线教育就发生111笔融资，总金额约539.3亿元，数据显示出资本仍看好教育行业，导致教育市场严重失控。

#### 1.2 名利对教师行业的破坏

教师是按照其特定的社会地位承担相应教书的社会角色，但教育机构高回报的吸引使教师职业角色市场化。教师的社会职责被市场控制，其职业信念逐渐偏航，教师的知识技巧成为衡量收益的指标。教育机构以“高分”广告内容制造竞争焦虑，培训出一批“考试机器”，应试指向十分明确。教育红利使大批公立学校教师涌入校外机构，尤其是农村学校，教师空心

化，学生被边缘化。

### 1.3 学区房热度持续升温

教育垄断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一种特殊形式，指从具有独特教育资源环境中所获得的超值知识转化而来的教育。学区房就是教育垄断下的一个独特现象。自国家实行就近入学的政策以来，中国基础教育资源已成为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一些大中城市。如上海市房价与学校分布的月度数据显示，基础教育资源数量与质量的差异已经凸显在房价上，公共服务里的教育资本化现象的确存在。重点中小学使师资队伍集中化、办学条件多样化、经费投入全面化。家长为了让孩子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使学习效率最大化，以重点中学为中心，方圆十里为半径的房源都很受家长青睐。（CHAN J, FANG X, WANG Z, et al, 2020）另外，还存在对学区房没有购买能力的普通家庭，诞生了“陪读父母”新群体，同样拉动学校附近房源租金稳中缓涨。

### 1.4 知识异化为教育机构盈利

教育机构利用“状元”名气作为打广告的噱头，吸引更多生源；校外培训的教师资源主要靠生源来调节，利用生源优势来提高课时费用。学习成果与学习行为相异化，学生之间内卷严重，分数成为学习的主要目标，同质内卷为补习机构资本增值创造有利条件。

## 2. 教育失衡的链式反应

课外培训最早出现在1989年人大附中副校长创办的华罗庚数学学校，（杏杏，2021）它以教育补充的新模式进入教育领域，是以公共属性的方式在运行。随着资本不断涌入教育市场，培训机构层次不齐，其无序扩张导致教育目的偏离国家教育方针，一连串相关事件发生相应的链式反应，导致教育失衡。

### 2.1 功利育人与德育树人目的偏差

从教师的角度分析，部分学校管理层面存在急功近利倾向，教师考核将学生成绩、升学率同教师工资、奖金挂钩，在考核体系中以分数论奖金，以分数量化教师的贡献，加剧教师间竞争。从学生角度分析，考试测验的功能和作用被形式化。现在“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更注重人本身素质的培养，而对高分数的追求被自上而下层层强化。立德树人是社会主义教育最高目标，是整个教育方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规定了教育的长足发展。因此，教育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不能过于关注分数。从人的一生成长目标来看，最后如果未形成健康的人格，那教育是不合格的。（习近平，2021）

### 2.2 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秩序失调

素质教育是国家为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对各级各类人才培养的客观要求。课后作业的

评定环节将老师教学评价功能转移给家长，要求家长承担老师对学生学习效果检验的责任。只关注学生的智力因素是一种狭隘的教育模式，过分传授应试知识和应试技能，把知识局限在考试范围内进行题海训练，学生个性发展不受重视，高分低能的现象屡见不鲜。人为制造的竞争赛道，为数不多的学生遥遥领先，学生差距日趋增大，因此有必要打破应试教育的藩篱，对错误教学行为进行批判并否定，重塑全方位育人的素质教育。

### 2.3 短视化教育与长远化发展的差距

学校教育的规模与布局是教育硬件与软件设施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实质是促进教育的长远发展。教育环境在教育资源配比中具有重要地位，城市的多样配置与农村的单一化是形成短视教育与长远发展差距悬殊的外部原因。城市教育环境在资源配置中的多样性表现为教育队伍体系完善、技术功能完备、环境设施完整。乡村教育环境的单一化凸显在教师缺乏、资源缺失。另一方面，学校对学生能力层次的划分是短视教育与长远发展差距悬殊的内部原因。学校在育人方面应具有公平性，但重点班和普通班的设置为补习市场提供商机，经济实力强的家庭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输给同龄人，校外培训便成为学生能进入重点班的“绿色通道”。优质教育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学习超前化现象破坏教育生态。如何给普通学生更多机会，让他们也成为强者是教育长远发展的迫切任务。

### 2.4 “拔苗助长”与健康成长规律相悖

健康成长要求学生身体和心理发展合乎规律；而“拔苗助长”加速了学生成长的不确定性。大部分家长对儿童未来的教育规划比较迷茫，陷入盲目教育，选择各种培训班，以课后剩余时间的填充来缓解其家庭教育的焦虑。但过度教育违背人的发展规律。人的发展在整体上具有顺序性，身心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家长意志若强加给儿童，使其成长阶段充满竞争，“恐学症”便不请自来。教育机构本是教授技巧，本色是提高分数，本性是资本积累，几乎忽视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和谐发展。

## 3. “双减”背景下教育失衡的回归

教育有机体是囊括全部教育生活及其关系的总体范畴，用以说明教育是以教书育人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关系。“双减”给学生、教师、学校、家庭和社会都带来的不同程度的有益影响。

### 3.1 学生的回归

“双减”政策的出台增强了学生的获得感。减负的宗旨是要解放学生，从而促进学生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双减”减掉了繁琐的作业，减掉了繁重的课外学习任务，学生在抢时间与拼汗水的紧张模式中解脱出来，回归独立思考，学生主观能动性增加。“双减”加强了学生

课后兴趣的培养，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了时间和空间，充实了学生的课余生活。自愿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的比例由春季学期的49.1%提高到秋季学期的 92.2%。学生在人格意义上是独立的，是不以教师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作业压力的减轻让学生对学习、生活更加负责，“双减”之下，学生的主体性更加凸显。

### 3.2 教师的回归

“双减”改革提升教师的幸福感。一是从师生关系看，幸福本身就包含着对周边事物高度信任。“双减”政策下，师生间情感联结，学生亲师、近师，教师给予学生情感信任，满足学生求知需要。二是从教师与教学的关系看，幸福建立在多样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方式上。首先，教师应提高思想认识，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教学的根本要求；其次，教师要深刻领会“双减”的主要内涵，在课堂上要从以知识为中心转向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为中心；最后，教师应乐于探索课后育人渠道，如何有效利用学生课后时间以促进他们更好地发展是教师们研究的主旋律。因此，教师应积极提高自身能力，钻研开发各种课后综合实践课程，如辩论、摄影、球类运动、人工智能等课程。三是从师校关系看，幸福以稳定和谐的校风和公平公正的教育理念为基础，减负的目的是让学生健康快乐成长，温馨的校园环境与和谐的人际关系给教师家的归属感。四是从教师与社会的关系看，“双减”改革为教师提供良好的教育秩序，理性的幸福体现教师对社会的认同。

### 3.3 学校的回归

学校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是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主要场所。课后课程是师、生、校“三赢服务”。截至2021年底，校外教育培训的治理工作已经取得明显进展，校外的线下培训机构已减少91%，校外的线上培训机构已减少 87%。“双减”后，教师教学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不再只追求教学结果，更看重教师丰富的教学过程。学校教学观也更加强调以人为本，学校从“重分数轻教育”向“重分数更重教育”转变；从“关注升学率”向“关注学生发展”转变。学校可通过完善共育架构，增强培训力度，丰富评价机制为师生间的思想和情感交流提供温馨环境，使学校回归育人的中心任务。

#### 3.3.1 完善共育架构

学生的茁壮成长离不开良好的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双减”后，家校共育平台建设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到“双减”政策能否有效落实。因此，创新共育平台至关重要。一是家庭与学校要成立家校共育工作领导小组，确保家校共育平台能有专人负责、管理并及时推进。二是要对“家校平台构建制度”“教师培训制度”和“家长培训制度”等制度进一步明确并完善。三是要以活动育人。丰富多彩的活动与实践是将学生的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层面的重要机制，学生在活动中可以一边受到道德的浸润，一边得到道德能力与品质的培养。习近平总书记



曾指出，应重视实践育人，坚持教育同生产劳动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广泛开展社会实践，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认识国情，了解社会，受教育，长才干。四是在课程中要求教师通过精彩的教学设计将立德树人的目标渗透到各科的教学中，实现五育并举。

### 3.3.2 增强培训力度

校园与家庭是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最重要场所，教师和家长是学生在这两大场所里最熟悉亲近的人。“双减”政策的出台也带来了不少焦虑因素：对于教师而言，作业负担减轻后学生的学业是否受影响；对于家长来说，作业量的减少是否会影响学生成绩等。为了精准消除教师和心理负担，及时扭转家长与教师的育人观是重要渠道。“双减”背景下的家校培训应包含：首先是对“双减”政策解读。即邀请专家解读政策及国家出台政策的初衷；其次是对“双减”后家长与教师切实做法的培训。通过培训解决家长和教师的困惑，为他们指引行动方向；最后是针对教师与家长心理层面的培训。家校平台可邀请心理专家对他们进行有效的心理疏导与干预。

### 3.3.3 丰富评价机制

目前学校在学生评价方式上应凸显“三变”。首先是在评价内容上，从“一元”转为“多元”。学校应彻底扭转仅注重智育评价的局面；其次是在评价方式上，从“结果导向”转为“过程导向”。过程评价是一种更为全面、客观合理的评价方法；最后是评价主体由“单一”转向“多维”。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及社会等都成为评价团体的一员，这能全方位立体式地评价记录学生的日常综合表现。

## 3.4 家庭的回归

家长在浮躁的社会风气中对教育的认识逐渐功利与片面化，把分数视为唯一指标，将课外培训等同于学科补习增优。“双减”后，孩子作业量的减少必然造成部分家长忧虑，这时教师应积极作为、主动沟通，让家长融入家校育人共同体，最大程度发挥家庭教育优势，并鼓励学生参与到社会实践中。

### 3.4.1 发挥家庭教育优势

家庭作为学生成长的第一个教育场地，“双减”政策的有效实施需要家庭教育的支撑。（李刚，2020）从学校和家庭定位看，“双减”厘清学校与家庭的功能属性，家庭教育不是学校教育的附属品，家长批改签字的现象明显改善；明确家庭的主体责任是补充儿童成长的自然、生活、社会知识。从家庭教育隐性优势看，父母是儿童成长中学习的榜样与效仿的对象，儿童道德成长必将是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务，发挥家庭教育的导向性和感染力，为儿童提供温馨的成长环境。从家庭教育显性优势看，在体育锻炼、课外阅读等家庭活动上，家长要发挥带头作用，培养其终身受益的自律意识。更重要的是，家长育儿观应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地更新，终

身学习。

### 3.4.2 鼓励参与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是是学生探寻并认识自我的重要一环，是健全孩子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渠道。学生只有参与了实际调查才有更深刻的体会，实践将学生的学习活动由外在要求转变成学生内在驱动力。另一方面，目前社会公益机构与公益服务平台遍及各领域，如学生可开展社会调研，分析当前社区发展需求；也可投身于环境保护活动中，以实际行动感染周围人并倡导低碳绿色理念。

### 3.5 社会的回归

“双减”还原教育生态，体现教育的公平感。减负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双减”体现了社会全员育人，课后服务的建立是人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有机统一。“双减”体现了社会全程育人，学校和家长不能仅为升学，忽略其他素质培养，导致学生一些生活必要素养的欠缺，家长的非理性教育观逐渐回归理性需求，“双减”要求家、校、社形成育人合力，建立科学教育观，扩大育人格局。“双减”体现了社会全方位育人，各育之间不可分割，不能相互代替。然而，各育之间又相互区别，各自有相应的内涵和任务，要通过不同形式达到育人目的。“双减”体现了社会全面育人，城乡教育、地区教育、民族教育也是“双减”下教育资源分配的重头戏，依据各地特色整合教育资源，利用信息技术加强教育资源的流动性，坚持以教育目的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方向标”，不以盈利为目的，还原教育的公益属性，回归教育的基本属性。“双减”政策将形成长效育人机制。

## 总结

“双减”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政策的实施是否真正地实现了从必然被动到自由主动地转变。使教育从市场的控制中解脱出来是“双减”政策的事实价值，在教育机构成为资本积累的背景下，教育减负治理如一支“清醒剂”。教育减负的热情和教育协同治理共同驱动教育的回归。“双减”旨在促进教育与学生、教师、学校、家庭、社会的合作。今天的教育挑战是基于教育公平的基本价值观，建立一个所有人都能平等享受教育资源的社会。教育关乎未来，面向世界，实现教育的现代化是“双减”政策的应然价值。

## 讨论

“双减”后，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教育质量、合理搭建教育评价体系、坚决维护受教育权人人平等的合法权利，始终坚持教育是社会公共物品的观念不动摇。

### 1. 明确家庭教育主体

在双减政策下，家庭中父母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大部分家长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一些父母将家庭教育的任务交给祖辈、亲戚，或全委托给学校，学校教育虽在教育方面有天然优势，但不能替代家庭教育，因此要明确家庭教育的主体。

## 2. 完善家庭教育指导体系

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应当相互协调，紧密结合，家庭教育不能单独存在，学校可通过办好家长学校，建立起家长委员会，开展“大走访”等家访活动，进行线上、线下家庭教育指导，让学生家长积极参与指导学习、体验活动，并形成较为成熟的指导体系。

## 3. 丰富学校教育内容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学校，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丰富学校教育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教师要根据新时代学生德育工作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线上线下多种形式的学生咨询与辅导服务，根植学生的理想信念，营造浓厚的学习风气，完善课程设置。

## 参考文献

- Chan, J., Fang, X., & Wang, Z., et al. (2020). Valuing primary schools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15(Jan.): 103183.1-103183.16.
- 方长春. (2018). 义务教育“资本化”: 成因及社会影响.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05): 62-67.
- 李刚. (2020). 十年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减轻中小学课业负担的成效与建议.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03): 94-101.
- 莫雷. (2015). *教育心理学*.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 习近平. (2021). “我们来共同关心这些教育问题”(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 *人民日报*, (01).
- 杏杏. (2021). “双减”终将改变潮水方向. *廉政瞭望*, (16): 18-20.
- 杨东平. (2018). 新一轮“教育产业化”的特征与治理.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01): 35-38.
- 邹琪 & 樊丽. (2022). 从“减负”到“双减”: 基于史密斯模型的政策执行偏差分析. *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04): 36-43.
- 朱益明. (2021). “双减”: 认知更新、制度创新与改革行动. *南京社会科学*, (11): 141-148.



**基于《卓越教师教育法案》的菲律宾教师教育改革****TEACHER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PHILIPPINES BASED ON THE EXCELLENT TEACHER EDUCATION ACT**赵婉<sup>1\*</sup>Wan Zhao<sup>1\*</sup><sup>1</sup> 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sup>1</sup> College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1370902545@qq.com

**摘要:** 为应对教育4.0背景下未来人才培养内容与方式的转变、回应突出学习者能力与保证学习连续性的国家战略以及解决师资数量与质量缺乏的现实困境，菲律宾政府于2022年4月颁布R. A. 11713号法案着手教师教育改革。在改革举措方面，首先进行顶层设计以完善教师教育体系建设，继而针对其决策层、管理层以及执行层分别采取具体的措施，包括增权赋能教师教育委员会以统领教师教育全局、完善管理制度来落实菲律宾国家教育学院的监管责任以及发挥教师教育卓越中心的榜样示范作用来提高教师教育执行力等。此次教师教育改革体现出治理体系现代化、专业发展标准化、成长路径可视化、激励机制灵活化等特点，但其实施成效仍需实践检验。

**关键词:** 菲律宾教师教育，卓越教师教育法案，教育4.0。

**Abstract:**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tent and mode of future talent trai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 4.0, respond to the national strategy to highlight the ability of learners and ensure the continuity of learning, and to solve the practical dilemma of the lack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eachers,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promulgated R.A.11713 in April 2022 and began to reform its teacher education. In terms of reform measures,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first conducts top-level design to improve the teacher educ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hen takes specific measures for its decision-making, management and executive layer respectively, including the empower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 Council to lead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to implement the regulatory responsibility of National Educators Academy of the Philippines, and giving full play of the role model of the Center of Excellence in Teacher Education to improve the executive power of teacher education, etc. The reform of teacher education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standardization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visualization of growth path and flexibility of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but the effectiveness of its implementation still needs to be tested in practice.

**Keywords:** Philippine Teacher Education, Excellence in Teacher Education Act, Education 4.0

## 引言

2022年4月，菲律宾政府颁布了《卓越教师教育法案》（Excellence in Teacher Education Act），也称R.A. 11713号法案，这是21世纪以来菲律宾政府首次颁布的教师教育系统改革法案，也是菲律宾自独立以来第二次颁布国家教师教育政策。为了应对21世纪教育面临的挑战，回应国家战略需求和解决现实困境的要求，菲律宾政府在倡导全体公民接受各级优质教育的基础上，对菲律宾教师教育做出详尽的顶层设计，旨在实现其优质教育的目标。菲律宾是同我国隔海相望的重要邻国，同作为二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两国教师教育发展也面临着许多相似的问题，研究菲律宾教师教育的趋势，不仅有助于把握菲律宾教师教育发展的动态，还有助于审视我国教师教育发展现状。R.A. 11713号法案是一项全面的国家教师教育政策，涉及其教师教育体系的重塑。本文基于R.A. 11713号法案分析菲律宾教师教育的动因，梳理菲律宾教师教育的主要举措，厘清其教师教育的特点，以期对教师教育发展规律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 1. 菲律宾教师教育的动因

菲律宾教师教育不仅是出于对教育4.0挑战的回应，也源于其国家战略的需要以及破除教师教育自身发展困境的现实需要。

#### 1.1 应对教育4.0未来人才培养内容及方式的转变

工业4.0对菲律宾和世界各地的教育环境构成了重大挑战。人工智能、3D打印、物联网、云计算、基因编辑等技术创新不断兴起，知识快速迭代使既有工作岗位面临消亡、未来新兴工作面临不可预见性。技术进步已经主导了人们的生活和学习方式。工业4.0要求教育系统支持“自动化、网络化、虚拟化和灵活化”的全球化学习环境和体验。学习世界发生转变，教育4.0背景下学校应该培养学生为未来世界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学生应具备运用新科技工具的能力和品德，成为具有批判性、创造性、自主性、反思性的公民和领导者。

针对教育4.0带来的新挑战，同时考虑到教师作为有效教与学过程的关键，菲律宾政府高度重视教师教育，并积极采取行动颁布了《卓越教师教育法案》，着手开展教师教育改革。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在2018年6月为启动《普及优质高等教育

法》(Universal Access to Quality Tertiary Education Act, 也称R.A.10931号法案)的会议上发表誓言:“让每个人尤其是穷人都能负担得起和获得优质教育。”他表明“教育是我们可以赋予年轻人的最重要的遗产,它为无数机会打开大门。”

教育部部长布里安斯(Leonor Briones)在2019年12月苏龙教育计划(Sulong EduKalidad)启动演讲中指出:“21世纪教育领域面临的挑战,最关键是我们的教师。随着教育质量标准的快速变化,我们的教师必须能够与时俱进。优质基础教育之战将在课堂上由我们的教师打赢。”随后,在2022年2月教育科技2022(EDUtech 2022)主题演讲中她又指出每个学习者都必须有扎实的科学技术基础才能生存,每个学习者都必须为不断发展的未来做好准备。菲律宾自21世纪以来不断对教育进行全面改革,继基础教育改革、高等教育改革之后的《卓越教师教育法》仍以保护和促进每个菲律宾人享有优质、平等教育的权利为任务来弥合当前学习成果与未来社会需求之间的差距,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并号召教师终身学习来培养具有责任心、有能力、有生产力的个体、菲律宾公民及全球公民。

## 1.2 服务于突出学习者能力及保证学习连续性的国家战略

菲律宾长期发展规划《2040年愿景》(AmBisyon Natin 2040)指出,到2040年,菲律宾将成为一个繁荣的中产阶级社会,没有贫穷。人民健康长寿、聪明且具有创新精神。菲律宾将成为高度信任的社会,家庭在充满活力、文化多样性和有弹性的社区中成长。其中,人民“聪明且具有创新精神”的愿景对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政府必须积极主动地制定教育议程。除了确保菲律宾学生获得基本素养包括读写素养、科学素养、信息技术素养、经济素养、文化素养和公民素养等,正规教育系统还必须确保学生获得批判性思维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创造力、沟通能力、协作能力并发展性格品质,比如好奇心、主动性、持久性和毅力、适应性、领导力、社会和文化意识等。因此需要修改课程内容但更重要的是修改教师授课方式,与此同时需确保教师享有终身学习的机会以便能力的不断升级与更新。

2017年,菲律宾政府颁布了《菲律宾发展计划2017-2022》(Philippine Development Plan 2017-2022)作为实现《2040年愿景》的第一个5年短期发展规划。但考虑到疫情防控新常态,菲政府又于2020年推出《更新版菲律宾2017-2022发展规划》(Updated Philippine Development Plan 2017-2022)。更新后的菲律宾发展规划旨在构建疫情防控新常态下个人、家庭、企业、政府和社会的复原力,主要包括卫生系统改进、粮食安全、学习连续性、数字转型和地区开发等五个主要发展项目。[8]其中,确保学习连续性作为一项重要指标,要求学校有能力提供远程教育和相关教学服务,教师有能力适应不同的教育模式,即线上教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线下教学。

为回应教育体系适应数字学习环境,《卓越教师教育法案》提出必须创建一批高质量

教师队伍为基础教育学生传授前沿知识，通过教师专业发展来提高教师能力，针对性地解决由于疫情防控导致的教育服务中断以及教育质量下降等国家紧要问题。可见，菲律宾教师教育改革即是回应时代浪潮也是服务本国发展战略。

### 1.3 破解师资数量与质量缺乏的现实困境

无论是从高等教育普及程度还是高等教育机构数量来看，菲律宾拥有东南亚较发达的教育体系。但是菲律宾基础教育仍然面临着师资短缺、教师教学任务与专业领域不匹配、教育回报率不高、教师科研短缺、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不匹配等现实困境。具体而言，菲律宾教育的现实困境主要集中在师资数量与质量缺乏方面。

菲律宾奉行非强制性人口政策，尊重家庭道德信仰、宗教信仰、文化习俗和规范并拒绝将堕胎作为控制生育能力的手段。此外任何经历或实施堕胎的人都可能面临最高六年的监禁。长期以来奉行非强制性人口政策、禁止堕胎以及宗教信仰的影响导致菲律宾人口增长率较高。截至2020年，菲律宾人口结构中0—14岁人口占30.04%，15—64岁人口占64.45%，65岁以上人口占比5.51%。可见，菲律宾人口结构以青壮年为主。虽然巨大年轻劳动力储备为菲律宾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大助力，但也对义务教育阶段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师资缺口难以弥合。

2013年R. A. 10533法案全面推行的K-12教育周期，使基础教育亟需壮大公、私立学校教师队伍。根据教育部报告，2015—2016学年菲律宾公共教育系统共有674,6134个教学职位，截至2016年3月，已有超过36,000个职位空缺。中小学教师需求持续增长远超其供应的速度。

新教师的供应不仅无法满足公立学校系统的需求，而且师资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也突出。截至2018年，菲律宾教师教育卓越中心（Teacher Education Center of Excellence，以下简称TE-coe）仅有34所。<sup>[11]</sup>从教师教育卓越中心分布的空间来看，教师教育卓越中心多集中于在经济发达地区，而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民马罗巴区（Mimaropa）、西米沙鄢区（Western Visayas）、卡拉加（Caraga）以及三宝颜半岛区（Zamboanga Peninsula）仅有一所教师教育卓越中心，东米沙鄢区（Eastern Visayas）和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Autonomous Region of Muslim Mindanao）则未设有。师资缺乏和师资分布不均对整个菲律宾基础教育系统的质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国家基础教育体系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教育机构（Teac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简称TEIs）每年培养足够合格教师的能力，但TEIs学生在菲律宾教师资格考试（the Licensure Exam for Teachers, 简称LET）中持续的低通过率无法满足基础教育教师队伍的需要。据统计，2017年有263,679人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但仅有85,361人通过，总通过率为32.37%；然而，即使2017年所有通过教师资格考试的学生都进入教师队伍，2018年仍存在超过1万名教师缺口。

世界银行开展的菲律宾公共教育支出跟踪和定量服务提供研究 (Philippines 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 Tracking and Quantitative Service Delivery Study, 即PETS-QSDS) 结果显示, 中小学教师无能力教授相当一部分K-12课程, 除英语教师外, 其他中小学教师在学科内容测试中能正确回答不到一半的问题。

2018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结果显示, 在79个国家中, 菲律宾的阅读理解能力排名最低, 在科学和数学方面排名倒数第二。菲律宾的阅读成绩为 340 分, 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和伙伴国 487 分的平均分; 数学素养为 353 分, 低于 489 分的平均分; 科学为 357 分, 低于 489 分的平均分。PISA结果表明解决菲律宾基础教育问题的紧迫性, 刺激了菲律宾政府对教育质量问题进行改革。教育部表示将重点关注四个关键领域——K-12项目的审查与更新、学习设施的改进、教师和校长的技能提升和再培训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师范毕业生在教师资格证考试中表现不佳以及在职教师教学能力不足, 使菲律宾提供优质教育的愿景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 内容

从在上述背景下, 菲律宾政府对教师教育体系进行改革、更新以应对挑战, 解决困境, 首先进行顶层设计, 进而分别针对决策层、管理层以及执行层采取具体的举措。

### 1. 顶层设计: 完善教师教育体系建设

1994年R. A. 7784号法案所规定的菲律宾教师教育体系已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与要求, 因此R. A. 11713号法案对教师教育体系进行顶层设计, 体现在更新教师教育体系的理念与目的、拓展教师教育体系的外延以及廓清治理主体的责任边界。

#### 1.1 更新教师教育体系的理念与目的

1994年, R. A. 7784号法案提出要建立全国优质教师教育体系, 加强对全国教师的教育和培训, 从而确保优质教育。而2022年R. A. 11713号法案要求在教师教育委员会 (Teacher Education Council, 以下简称TEC) 全方位的领导下建立动态、现代、公平的教师教育体系来保证优质教育。

在教师教育体系理念方面, 1994年R. A. 7784号法案与2022年R. A. 11713号法案都强调, 教师教育事业是以保护和促进全体公民接受各级优质教育的权利为导向, 以确保高质量教育为核心; 教师作为开展有效教学的关键一环, 促使学习者成为更好的个体和社会成员。教师教育理念更新则体现在, R. A. 11713号法案提出校长在教师教育事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该法案表明, 校长通过培养教学文化和学校文化来支持教师并促进学习者追求终身学习。因此, 本次教师教育改革要求加强校长的专业能力, 将校长的教育与培训纳入教师教育全局之中。



在教师教育体系目的方面，R. A. 7784号法案指出教师教育体系的目标是培养正直、有能力、且致力于持续专业成长的菲律宾教师，进而为培养具有责任心的个体、菲律宾公民及全球公民而服务。R. A. 11713号法案在强调培养正直、有能力、且致力于持续专业成长的菲律宾教师和校长之外，对于学习者的要求更高，指出教师应为培养“具有责任心、能力及生产力的个体、菲律宾公民及全球公民”的教育目的而服务。由此，教师教育事业的任务不仅包括培养合格教师，还包括培养合格的校长；教师与校长的教育义务不仅在于培养学习者具有“责任心”，还在于培养学习者具备“能力”以及“生产力”。

### 1.2 拓展教师教育体系的外延

R. A. 11713号法案要求增强教师职业的包容性，将教师的外延从仅从事基础教育教学实践的主体扩展到幼儿园阶段。1994年R. A. 7784号法案，将教师界定为在小学和中学阶段从事任何学科（包括实用/职业艺术）课堂教学的所有人员，包括在所有私立或公立教育机构进行指导和咨询、教学监督的人员，但不包括学校护士、学校医生、学校牙医、学校行政人员和其他学校行政支持人员，通过政府举办的教师资格考试但未实际聘用的教育毕业生也包括其中。<sup>[17]</sup>随着2013年菲律宾幼儿园教育被纳入基础教育阶段，基础教育阶段包含公、私立学校的幼儿园教师是应有之义。另外，R. A. 11713号法案对教师及教师教育进行了重新界定，其中教师指在基础教育阶段所有公、私立基础教育机构依法具有从事教学资格的人，包括参与各科教学实践、职业-技术教育以及未被实际录用的教师。<sup>[18]</sup>教师教育则重新定义为职前、在职教师所接受的正规教育和培训，包括研究生教育、各专业领域的教育。<sup>[19]</sup>教师及教师教育的重新界定突出菲律宾对于教师教育标准化、正规化的要求。

### 1.3 廓清治理主体的责任边界

作为1992年，总统发布第282号行政命令（Administrative Order No. 282）要求，教育部分支部门——菲律宾国家教育学院（National Educators Academy of the Philippines，以下简称NEAP）负责在职教师教育的决策与管理。1994年R. A. 7784号法案设立TEC管理教师教育，其首要任务为确立及指定TE-COE。TE-COE则作为提供优质的职前教师教育、在职教师教育以及教师继续教育的实施主体。由于NEAP以及TEC于在职教师教育方面存在职能重叠、责任边界不明且在教师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不定，进而导致在职教师教育治理混乱、教师教育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问题。

2022年R. A. 11713号法案，要求更新教师教育体系，整合教师教育资源以形成完备的三角结构，如图1所示。在现行改革的菲律宾教师教育体系中，包含决策层、管理层以及执行层。其中TEC作为决策层，主要负责绘制国家教师教育发展蓝图，指定和审查TE-COE。NEAP作为主要的管理层，负责审核执行层所提供的专业发展项目以及管理和认定教师、校长和教学相关

工作人员的专业发展及职业发展阶段。最后，执行层包括教育部分支部门，各服务部门或单位，公、私立大学或学院以及其他培训机构，主要开展具体的职前与在职教师培训。其中TE-coe作为卓越的教师教育机构是执行层的中坚力量，也是各区域教师教育的中心节点，负责提供优质的职前以及在职教师的教育培训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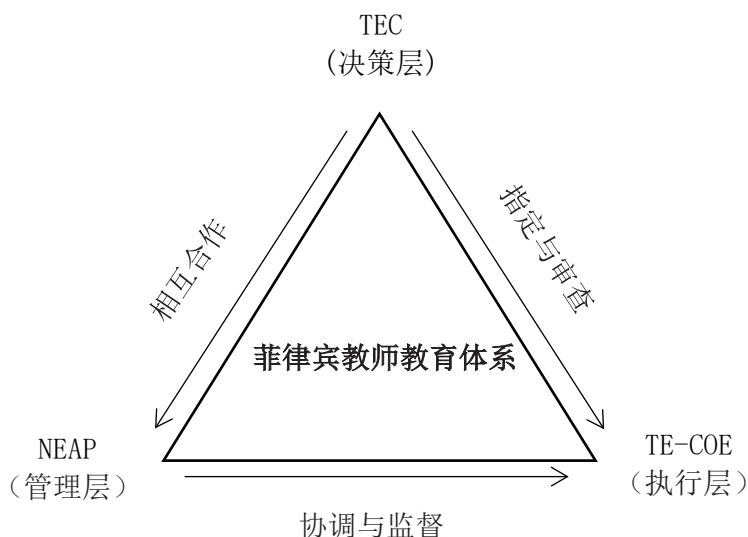


图1：菲律宾教师教育体系

来源：作者根据《卓越教师教育法案》整理而来

## 2. 增权赋能：发挥TEC统领全局的作用

针对教师教育领域存在教师培养未满足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职前教育与在职教育脱节以及教师教育生态脆弱等问题，R. A. 11713号法案要求强化TEC的权力和职能来统领教师教育全局，具体表现为明确TEC职能定位、优化TEC组织架构、促进各部门协作等方面。

### 2.1 明确规划教师教育的职能定位

R. A. 11713号法案提出，TEC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教师教育路线图，指导具有相关性、创新性及协作性的教师教育项目。教师教育路线图是适合菲律宾国情的具有可操作性、前瞻性的教师教育发展流程及蓝图。该路线图需提交至高等教育委员会（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并列入国家发展人力资源开发计划的国家高等教育路线图中。其次，TEC应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和标准加强并改进教师培训体系以及教师和校长的职业认可体系，包括规定全国教师考试、教师资格预审以及制定并实施基于专业标准的教师及校长职业认定政策。再次，TEC需审查现有政策以提出新立法、新政策，不断提高和加强教师教育，促进教师和校长福祉。最后，TEC可寻求任何政府部门和其他有关机构在其任务范围内提供协助。因此，菲律宾教师教育发展由TEC全权负责与监管。<sup>[20]</sup>

## 2.2 优化多方利益主体参与的组织架构

作为决策层，TEC由9名成员组成，其中教育部部长为当然主席（Chairperson）、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作为当然委员会副主席（Vice-chairperson）、技术教育和技能发展局局长作为主任（Director）、国家文化艺术委员会和专业监管委员会主席作为执行主任（Executive Director）。其余4名常任委员会成员均由菲律宾共和国总统指定。<sup>[21]</sup>另外，TEC设秘书处（The Secretariat）协助TEC执行其政策及标准并提供必要的行政及技术支持。

R. A. 11713号法案要求秘书处增设以下办事处：优质职前教师教育办事处（Quality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Office）、质量教学办事处（Quality Teacher Office）以及财务行政办事处（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Office）。其中优质职前教师教育办事处具有如下职能：与各教师教育机构合作，开展资源共享、实践路径研究等其他改善各机构教师教育的项目；为TEC对教师资格考试内容进行评估与研究等。<sup>[22]</sup>质量教学办事处则应确保教师和校长的专业标准在全国各地公平、一致地实施，并应履行以下职能：为建立和持续加强针对于教师和校长的《国家职业评估计划》（National Career Assessment Program），而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并提出相关建议；协助TEC评估教师能力并提供认定教师与校长所处的职业阶段的依据；研发关于提高教师和校长能力的材料等。<sup>[23]</sup>因此，TEC通过优化内部组织架构保障各方利益。

## 2.3 促进各部门信息共享、相互配合

教师教育事业点多面广，管理复杂。首先，师范生作为未来的师资力量，是教师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委员会对TEC提供服务。再者，教师作为一种职业，需要劳动者达到职业准入标准，因此TEC对于教师教育的管理必然离不开专业监管委员会（Professional Regulation Commission）的支持。最后，在职教师作为基础教育的主力军，TEC发挥统筹作用需要满足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的需求。因此，R. A. 11713号法案要求在TEC的统领下多部门协同合作，通过信息共享、相互配合提高教师教育治理主体的行政效率共同推进教师教育发展。

第一，教育部应向TEC提供教师教育相关领域的年度报告，如基础教育学习者的发展与需求、需予关注的能力与学习领域、学习者在国际评估中的表现、教师招聘情况及表现、教师培训和职业发展以及教师专业学习课程质量的评价等。<sup>[24]</sup>高等教育委员会也应向TEC提供年度报告，包括所有教师教育机构在教师教育项目中的状态和表现，包括教师教育课程的开设、学生的录取和成绩、教师表现、已发表或正进行的研究、申请认可的院校以及表现不佳的教师教育机构及其他教师教育相关事项。<sup>[25]</sup>而TEC应向教育部和高等教育委员会推荐有关师范专业吸引力及从高校到教学就业相衔接的战略和政策。第二，专业监管委员会应当向TEC提供年度报

告，分析教师专业化的程度，包括教师资格考试的内容与结果、考试成绩、教师考试的通过率以及其他与教师教育有关的TEC提请之事项。<sup>[26]</sup>第三，作为国家教师教育中心的菲律宾师范大学(Philippine Normal University)应当作为TEC的顾问，提供基于教师教育研究、战略与创新的建议及支持。<sup>[27]</sup>第四，TEC应与NEAP在內的相关政府机构以及利益攸关方合作，加强职前和在职教师教育项目之间的联系。<sup>[28]</sup>

### 3. 完善制度：落实NEAP监管责任

针对在职教师教育治理混乱、教师教育数据管理平台缺失以及师资质量低下等问题，R. A. 11713号法案特此提出，通过完善教师教育管理制度来落实NEAP的监管责任。完善教师教育管理制度体现在明确NEAP的监管目标以及监管标准、强化其监管职能并建立监管平台等方面，此举有利于加强教师权利、促进教师的专业晋升，进而保障全体公民享有优质教育。

#### 3.1 明确监管目标与监管标准

NEAP以保证在职教师、校长及相关教学人员的培训标准和培训质量为核心目的，以“能力、创新、奉献及共情”作为核心价值。NEAP的发展愿景是，到2025年，成为菲律宾教师和教育领导人专业发展项目的顶级供应平台；到2030年，成为东南亚地区为教师和教育领导人提供专业发展项目的领先者和创新者。

R. A. 11713号法案规定，NEAP为所有公立和私立基础教育机构的在职教师、校长和其他与教学相关的人员提供优质的教师教育专业发展计划。NEAP作为教师教育体系中的一环，服务于教师教育发展的共同的总目标，即“培养培养正直、有能力、且致力于持续专业成长的菲律宾教师和校长”。此外，作为管理层，NEAP是教师教育决策的管理者与监督者，其具体目标如下。一方面，NEAP致力于根据既有标准审核专业发展项目。另一方面，NEAP旨在设立一个信息系统来存储、跟踪、监控和分析教师和校长在专业发展项目中的参与情况，并将参与情况用于验证教师、校长、其他相关教学人员的职业发展阶段。

在监管标准方面，NEAP主要根据《菲律宾教师专业标准》(Philippine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Teachers)以及《菲律宾校长专业标准》(Philippine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School Heads)筛选出合格的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包括符合菲律宾教师入职计划、职业发展计划以及特殊计划的课程、研讨会、讲习班和其他专业发展项目。

#### 3.2 强化统筹监管职能并建立专业发展信息系统

R. A. 11713号法案规定，NEAP的首要任务是与TEC合作，促进职前与在职教育培训之间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其次，NEAP需根据专业标准设计和实施专业发展计划，为教师和校长提高教学专业知识和领导力，并确保教师和校长能够公平地获得专业发展。除此之外，NEAP作为管理层，其主要监管职能具体表现在监管内容、监管模式和监管协调等三个层面。



在监管内容层面，首先，NEAP需认证执行层所进行的教师教育项目。其次，NEAP还需协调、监督、研究并评估由执行层所提供的课程、研讨会、讲习班和其他专业发展项目的实施。再者，NEAP应根据在职教师和校长以及其他教学相关人员的专业发展学分，认定其专业发展阶段并验证其职业发展阶段。

在监管模式层面，NEAP需采用基于循证研究的世界级专业发展方式，通过统一监管标准、统一教师入口、统一的专业发展信息系统来确保教师、校长和其他教学相关人员的专业发展、职业发展、以及二者之间的有效联系。其中，专业发展信息系统包含NEAP认可的专业发展项目、项目提供者、在职教师和校长以及其他教学相关人员信息及他们相应的获得的专业发展学分名单等。<sup>[29]</sup>

在监管协调层面，R. A. 11713号法案要求NEAP与TEC合作，促进职前和在职教育之间的一致性；与专业监管委员会合作，进行协调、认定与审核专业发展项目以符合持续性专业发展需要；与教师教育机构合作，为教师、校长和其他教学相关人员提供专业发展项目。此外，NEAP还需加强与学习服务提供商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提供广泛的专业发展项目。

#### **4. 榜样示范：提高教师教育执行力**

针对菲律宾师资配置不均、职前教师合格率低等问题，R. A. 11713号法案要求发挥TE-COE榜样示范的作用以提高教师教育整体的执行力，具体体现在扩容TE-COE的数量及类型以激发执行意愿、增强TE-COE的职能来提高执行效率以及建立教师教育奖学金以保障执行程度等三个方面。

##### **4.1 扩容TE-COE的数量与类型，激发执行意愿**

R. A. 11713号法案要求，TEC应根据既定标准评估现有的公、私立教师教育机构，以识别和指定TE-COE，并由高等教育委员会负责监督、监管和制定战略规划，积极在各地区、各省份积极发展TE-COE，为广大职前、在职教师提供优质的学习与发展资源，包括实验校培训、学习资源以及教育教学研究等。R. A. 11713号法案还规定，所有的TE-COE应每3年进行一次审查和评估以确保其继续具备法律规定的标准。

R. A. 11713号法案鼓励为特殊教育教师提供专门的教师教育基地，要求在全国三大岛组吕宋岛（Luzon）、米沙鄢岛（Visayan）和棉兰老岛（Mindanao）以及位于吕宋岛的马尼拉市（Manilla）、位于米沙鄢岛的宿务市（Cebu）和位于棉兰老岛的达沃市（Davao）设至少一所教师教育机构作为特殊教育的卓越中心。

扩容TE-COE的数量与类型，有助于改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优化师资力量、促进教育公平，更有助于激发现有公、私立教师教育机构实现优化升级的动力，提高竞争意识、增强其执行意愿。



#### 4.2 加强TE-COE职能，提高执行效率

为提高TE-COE的执行效率，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R. A. 11713号法案规定TE-COE的职能具体包括：(1)开展创新性、相关性的职前与在职教师教育和培训，包括替代性学习系统（Alternative Delivery Programs），以确保教育连续性；(2)组织和协调教师教育领域的合作研究，并使其成为改进教师教育项目、政策标准、指导方针的基础；(3)作为编制课程或教学材料或两者兼备的教师资源中心；(4)作为本区域教师教育具体学科网络的中心节点；(5)在教师教育研究领域制定高标准及相关行为准则，鼓励在本地或国际期刊上发表教师教育相关的论文并促进学术传播；(6)在在职教师继续教育、地区发展目标及国际研究等教师教育研究方面，参与制定和实施国家议程。除此之外，TE-COE还应鼓励本地区教师教育机构升级、改进以及相互合作，并根据其他公、私立教师教育机构的需要，提供专业援助包括指导教师教育机构的认证工作。

TE-COE职能的完善与加强，有益于TE-COE明确其责任，既能精准对标执行任务，促进执行效率，又能起到对各执行主体的示范和激励作用，促使各公、私立教师教育机构向TE-COE看齐，努力实现自身升级。

#### 4.3 建立教师教育奖学金制度，保障执行程度

针对合格师资短缺的问题，R. A. 11713号法案要求设立教师教育奖学金项目（Teacher Education Scholarship Program, 简称TESP）以激励更多的优秀毕业生加入教师队伍。从范围上，教师教育奖学金面向公、私立基础教育学校所需援助的高中毕业生以及于TE-COE攻读本科教师教育学位课程的大学生。教师教育奖学金项目由高等教育统一学生资助系统（Unified Student Financial Assistance System for Tertiary Education, 简称 UniFAST）负责实施。从内容上，教师教育奖学金提供的经济援助包括免除学费，供应教材，提供学习、研究材料保障津贴，论文、学位论文、项目等学术津贴，报销研究出版费，教师资格考试审查等费用。该奖学金还提供服装或制服津贴，住宿津贴，运输津贴以及其他与教育有关的生活津贴等。从实施保障上，TEC另设学生激励支持办事处，制定并实施吸引优秀学生从事教育的项目、教师教育奖学金计划、为定向生建立并实施奖学金计划等。TEC还与教育部协调制定年度奖学金实施计划，与公、私立基础教育学校合作，进行每年一次的职业宣讲来提高教师职业吸引力。

## 结论

随着知识的快速更迭，人工智能、3D打印、基因编辑等技术创新不断兴起，技术进步与变革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技术正在重塑教育，而教师作为教育过程的关键，需要与时俱进。菲律宾政府于2022年4月颁布《卓越教师教育法案》着手进行教师教育改革。菲律宾

教师教育改革折射出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进行教师教育治理的特色，教师教育的决策层、管理层以及执行层由政府把控，形成了权责明确、相互合作，相互制衡的三角结构，也为认识教师教育改革的具体实践方式提供了视角和行动参照。菲律宾教师教育改革顺应了学习世界的转变对人才培养的需要以及应对国家战略的要求，并有效应对菲律宾教师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而教师教育是教育事业的最为关键的一环。菲律宾教师教育改革不仅强调菲律宾教师教育体系的重塑，同时也蕴含对强化教师教育队伍中职前教师、入职教师、在职教师及学校领导者专业发展以及终身学习的愿景和要求。

## 建议

在具体的改革举措层面，菲律宾通过完善教师教育体系、增权赋能教师教育委员会以统领教师教育全局、完善管理制度来落实菲律宾国家教育学院的监管责任以及发挥教师教育卓越中心的榜样示范作用来提高教师教育执行力等举措，推动教师教育的全面发展。此次菲律宾教师教育改革体现出治理体系现代化、专业发展标准化、成长路径可视化、激励机制灵活化等特点，但其实施成效仍需实践检验。

## 参考文献

- Aaron, O.N. (2022). *Philippines age structure 2020*. Retrieved from June 13, 2022,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578779/age-structure-in-philippines/>.
- Alda, R., Boholano, H., & Dayagbil, F. (2020). Teac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Philippines towards education 4.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rning, Teaching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19(8), 137-154.
- Al-Samarrai, S. (2016). *Assessing basic education service delivery in the Philippines: 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 tracking and quantitative service delivery study (Englis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oup, 2016, 18-19.
- British Council. (2019). *Philippine government signs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Law*. Retrieved from December 16, 2020, <https://www.britishcouncil.org/about/press/philippinegovernment-signs-transnational-higher-education-law>.
- Congress of the Philippines. (2019). *REPUBLIC ACT No.11448: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ct*. Retrieved from December 14,2020, <https://www.officialgazette.gov.ph/downloads/2019/08aug/20190828-RA-11448-RRD>.
- Edna Luz R, A., Antriman V, O. et al. (2014). Exploring wastage in teacher preparation investments in the Philippines. *The Normal Lights*, 8(2), 8-30.
- 刘常庆. (2012). 菲律宾能力本位的教师标准述评. *外国教育研究*, 39(1), 51-58.

- 李娅玲. (2011). 菲律宾语言教育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启示. *外语教学与研究*, 43(5), 756-762+801.
- 金应熙等. (1990). *菲律宾史*.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 National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2016). *A long-term vision for the Philippines*. Retrieved from June 13, 2022, <https://2040.neda.gov.ph/wp-content/uploads/2016/04/A-Long-Term-Vision-for-the-Philippines.pdf>.
- National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2021). *Updated Philippine Development Plan 2017-2022*. Retrieved from June 13, 2022, <https://pdp.neda.gov.ph/updated-pdp-2017-2022/>.
- OECD. (2019).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Results from PISA 2018*. Retrieved from June 13, 2022, [https://www.oecd.org/pisa/publications/PISA2018\\_CN\\_PHL.pdf](https://www.oecd.org/pisa/publications/PISA2018_CN_PHL.pdf).
- Official Gazette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2022). *Republic Act No. 11713*. Retrieved from June 13, 2022, <https://www.officialgazette.gov.ph/downloads/2022/04apr/20220427-RA-11713-RRD.pdf>.
- Presidential Communications Operations Office.(2018) .*President Duterte commits to provide quality and affordable education to all*. Retrieved from June 13, 2022, [https://pcoo.gov.ph/news\\_releases/president-duterte-commits-to-provide-quality-and-affordable-education-to-all/](https://pcoo.gov.ph/news_releases/president-duterte-commits-to-provide-quality-and-affordable-education-to-all/).
-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9). *Secretary Briones' speech on the launch of Sulong Edukalidad*. Retrieved from June 13,2022,<https://www.deped.gov.ph/2019/12/04/>.
-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21). *Briones highlights need to bolster science, technology education in K to12*. Retrieved from June 13, 2022, <https://www.deped.gov.ph/2022/03/09/>.
-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hilippines in Congress. (1994). *REPUBLIC ACT NO. 7784, August 04, 1994*. Retrieved from June 13, 2022, <https://lawyerly.ph/laws/view/19a6>.

**话语重置：马克思异化理论视域下的高校“学生中心”教学实践****DISCOURSE RES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UNIVERSITY "STUDENT CENTER" TEACHING PRACTICE**刘璐<sup>1\*</sup>Lu Liu<sup>1\*</sup><sup>1</sup> 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sup>1</sup>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pchyjennifer@outlook.com

**摘要：**“学生中心”的实践在给学生带来丰富体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本文采用马克思异化理论来审视这一系列问题，即实践异化所带来的主体性上升、实际环境的困境凸显、教学形式和内容以及师生关系等一系列的矛盾。在这一异化视角下我们可以看到师生被工具化、物化，而主体性的论争则成为主宰课堂的力量。异化是“学生中心”实践教学所必须超越的现实问题，是课堂中教育所必然要面对的哲学问题，有必要进行话语重置，重新审视当下关于“学生中心”及“教师中心”的话语体系，构建真正对师生有意义的互动课堂。

**关键词：**学生中心，马克思异化理论，主体间性，话语重置，高等教育。

**Abstract:** The practice of "student center" not only brings students rich experience, but also brings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is paper, Marx's alienation theory is adopted to examine a series of problems, that is, the rise of subjectivity brought by practice alienation, the dilemma of the actual environment, the teaching form and content, and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From this perspective of alienation, we can see that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instrumentalized and materialized, and the subjectivity debate becomes the dominant force in the classroom. Alienation is a practical problem that "student-centered" practice teaching must transcend, and a philosophical problem that classroom education must face. It is necessary to reset the discourse, re-examine the current discourse system about "student-centered" and "teacher-centered", and build a truly meaningful interactive classroom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Keywords:** Student-Centered,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Intersubjectivity, Discourse Resets, Higher Education

## 引言

全球化现象不断推进人类教育理念及实践持续更迭，使得教学领域无论是教师知识传授方式还是学生学习方法都出现“革故鼎新”的大好局面。从积极角度来看，该现象一方面促进教育培训市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相对地缓解了广大受众的教育焦虑。“学生中心”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在今天有着不言自明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因而，无论是教师、学生和家这一家校合作链来看，还是从政府、社会和大众这一国家人民链来看，大家似乎都对“学生中心”观抱有乐观心态并赞许其发展，期望“学生中心”产生新的教育生产力以推动教育变革。但从消极角度来看，随着教学实践的不断推进，“学生中心”产生了不少“主观主义”和“化约主义”的走向问题，作为中心的学生也频频反映自己学无所获的担心等。笔者认为在中华文化大背景下，“学生中心”和“教师中心”背后所反映的二元对立思想在根本上无利于真正促进教育本质的实现，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马克思异化理论透视“学生中心”实践中主体间关系及主体与教学劳动的关系，会发现其中的“真问题”。

## 内容

### 1.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四重维度及其適切性

异化（Alien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字的 *Alientio*和*Alienare* 有脱离、转让、出卖、受异己力量统治、让别人支配等意。中文翻译成异化，以便和同化相对立，包含有异己化、对立化的意思。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成熟，异化概念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延伸向异化劳动概念。

本文所论述的异化理论，多使用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对于异化的界定。其中，马克思对异化劳动从四个维度作了说明：第一层维度是劳动成果与劳动者相异化，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失去的也就越多，因而越贫穷。”劳动产品本来是由工人创造，却作为某种异己的存在与工人相对抗而存在。“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却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使工人愚蠢。”第二层维度是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在自由的前提下是使人幸福的，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不能支配自己和自己的劳动，强制性的劳动使得劳动者感到不幸。马克思说：“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第三层维度是劳动者与他的本质或族类存在相异化。族类存在是费尔巴哈的用语，用以表现人类所共有的本质特征。人类的族类存在体现在劳动上自觉的创造性的实践，而这种实践既为了满足物质上的需求，也是为了精神上的需求。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



的劳动实践多是为了满足精神需要。因此，只有脱离直接的物质需要时仍然进行生产活动，才真正地体现了人的本质。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的劳动单纯的变成了谋生手段，变成了满足肉身需要的动物式的生产，人与人的本质相分离，人越来越成为不具有人本质的人。第四层维度是人和人异化。人既然与人的本质相异化，那人与他人的关系也会异化。马克思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不仅生产出了相对立的商品，而且也生产出了不生产者对生产者的支配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对立的加深就正体现出这一异化关系。

教学作为教师的一种劳动，所选取的理念指导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学成果的质量。“学生中心”作为一种由西方引进的成熟理念已经被许多国家反复验证确定为优质教学的保障，并且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其本身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自明。“学生中心”理念一经传入中国，就成了广大高校教师不断实践的一项教学理念，被看作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重要战略转变”。然而，已有研究发现，对于香港的中小学生来说，“教师中心”反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并且也能很好的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对于大学生或研究生来说，原本旨在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学生中心”，演变为“被中心”；原本打算让大学生通过探究、讨论和分享“建构”出知识结论，在实践中反而让大学生觉得没有学到东西。因此，笔者认为，“学生中心”理念在高校教师教学劳动的过程中存在异化现象。马克思异化理论探讨的是劳动异化，“学生中心”教学实践作为教师的一种劳动，与该理论具有一定的适切性。

## 2. 作为“教师中心”对立面的“学生中心”

在关于课堂环境的大讨论下，一直存在着“教师中心”和“学生中心”两种  
争锋相对的论述。简而言之，“学生中心”强调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为达致自己的学习目标而采取的行为主张，让学生有机会从自己关于学习过程的经验和体悟中获取知识，获得自主学习的能力；“教师中心”关注教师在知识传递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应由教师掌握展开教学和控制学习过程的主动权。将谁作为课堂的中心一直是教育学界热议的话题，演变到今天，“学生中心”更加符合社会各界“以人为本”的追求，而“教师中心”则被污名化，被塑造成一种和“学生中心”相对立的、对教学造成危害的“坏的教育理念”。学术界普遍认为，“教师中心”的课堂教学存在着挥之不去的凯洛夫教育思想的魅影，有研究表明，即使是在强调教师参与和支持教学的“教师中心”课堂环境中，香港中小学生的自主学习仍然能够获得发展，而且其中正是教师的参与和支持在发挥着主要的促进作用。究其根本，将谁作为课堂的中心属于主体性的思考，主体性问题从认识论的维度来看，主体是认识者，客体是被认识者，在这种主体-客体的认识论结构中，主体活动的目的是力求获得关于对象即关于客体的“知识”。“学生中心”意味着学生是主体，学生的活动即为知识的活动，活动的成果就是“科学”体

系和在这个体系中具有理论逻辑自洽性的判断和结论——真理。实际上，我们所熟知的好的课堂是一个交往的环境，既有教师的输出、学生的输入，也有教师学生间通过交流彼此反馈的过程，一味地追求谁作为课堂的主体，而忽视教师与学生间交流的关键性作用，无益于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这一根本目的达成。因此，无论是“学生中心”还是“教师中心”，都存在着一一定的片面性，即忽视另一方重要性的问题。

其实，主体性的上升是人发现自己的启蒙运动的缘起和产物，人们从盲目的神学崇拜转向对自我的探寻，和当时的时代特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纵观教育发展历程，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漫长的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建立了高水平工业化社会，两次世界大战虽然惨绝人寰，但是在计算机诞生以及信息技术大发展等方面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教育领域所倡导的理念和实践是与其科技、文化、社会以及经济发展紧密契合的，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本主义的复兴促使整个西方社会再一次把教育放到了极高的地位，整个20世纪中后期，对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学术研究都有着巨大的进步和体系化的构建。

反观中国，由于战乱纷争和政权颠覆，中华民族没有经历漫长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建国以来一度遭受文化大革命等惨痛经历，社会研究、文化发展和教育事业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没有能够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缓慢本土生长的契合度很高的教育系统，西方的理念不断地冲击着我们，但都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根本原因是西方的理论无法适应中华文化的土壤，无法生根发芽。“学生中心”理念也是舶来品，甚至可以说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舶来品了，只不过是中国的教育者在混乱的来自西方的纷乱的学术声音中截取的一块碎片。“学生中心”最大的环境依赖于小班教学，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实现这一进程，因此该思想能在发达国家一贯制落实。而中国普遍都是大班制，一个老师对着四十多位学生，无论是教具使用还是课堂设施都难以做到关注每一位学生。这当然和我们的经济水平以及人口体量有关。因此，主体性问题是目前课堂中的一个次要问题，不能将“学生中心”作为口号占据话语权，并且要尽量避免“学生中心”的使用以防止非教育学学科教师在教学中的片面性理解及使用。首要的关注点要放在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交往环节，即主体间性的建构。

在前述马克思异化理论中，后两个维度一个是劳动者与他的本质或族类存在相异化，另一个是人与人异化。人类的族类存在体现为劳动上自觉的创造性的实践，而这种实践既为了满足物质上的需求，也是为了精神上的需求。教师教学本身作为一种劳动，既要满足教师的物质生活需要，也要满足教师价值层面的精神需要，如果教师简单的出让自己的劳动时间给学生，无论是分组讨论还是多媒体演示教学，由于学生的学术素养水平和整合知识能力有限，整个过程大都趋于知识层面的表浅和逻辑思维的混乱。因此，不仅学生收获甚少，教师也无法获得劳动所带来的精神上满足。既然劳动者与他的本质或族类存在相异化，自然而然人与人也会存

在异化。由于考试和升学压力，学生更多的在乎自身知识的获取，对于课堂有一种预设预期，如果实际的课堂学习没有达到其预期，学生难免会对教师有所怨言，逐渐站在了教师的对立面，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即教师越多的采用学生中心的教学实践，学生学习到的知识越少，越多的不想去上课。

## 结论

### 1. “学生中心”实践中被异化的“人”

人是自然存在物，一方面他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但一方面却又作为肉体的、感性的存在物，是被动的，时常受到物质和欲望的限制，使其不能自由地体现自己的本质力量。人在实践中不断地超越来自肉体的、感性的和欲望的束缚，使自己真正进入自由的境界。这就是实践的全部意义。所以在实践中人总是要超越生物本能，让自己的自由生命在对象性的产品中展现出生机。但是欲望却又在另一方向上牵制着人的自由生命展现，让人陷入来自肉体 and 欲望的泥淖之中，这时的人就被异化了。人是一切实践的唯一目的，人在实践中成就自己、塑造自己，使人向人生成，而非向物生成。但是异化劳动却把人异化成了手段，人在实践活动中成了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或手段，其劳动产品不再是对他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反而是对他的反叛，是他的敌对力量。一些教师的教学劳动不是为了实现其传授知识的价值、确证学生的内在规定性，而是成为了谋生、外快的手段，有时甚至是负面能量的呈现。

#### 1.1 被异化的“学生中心”实践中的教师

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失去的越多，因而越贫穷。”劳动产品本来是由工人创造而来，却作为某种异己的存在与工人相对抗而存在。在教学活动中，“学生中心”实践也存在教学成果由教师创造，但是其却作为某种异己的存在与教师相对抗而存在。人与对象——即主客体之间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关系，在非异化的条件下是一致的。一方面当对象的性质与人的本质力量的性质相一致时，对象就能成为人的对象，也就成为人自身；而另一方面从主体来看，也只有当主体具有与对象的本质力量相一致的特性时，主体才能成为对象的主体。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由于未能符合知识内在逻辑及满足学生需求的“学生中心”课堂已经被异化了，所以教师无法再完整地体现其类本质，他们不再按照知识自身尺度来进行授课，他们只按照“将自己劳动时间出让给学生以体现学生中心”的尺度来进行授课，因此其所产生的课堂自然也会发生异化，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在异化条件下，教师是被错误观念驱使着进行活动，而不是自由地进行教学设计。

## 1.2 被异化的“学生中心”实践中学生

教育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人自我全面发展的需要，理论作为人实践的产物对人的实践活动起着推动作用，随着人的实践能力不断提高，理论也变得更加人性化、简洁化。人、理论和实践之间应该形成一个良性的闭环，三方在这个闭环中不断循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价值。但是在异化的劳动实践中，人与理论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并非如原初构想的那般美好。“学生中心”教学把学生的能力和水平夸大了，学生从知识的学习者超速进入知识的产出者角色，也就是被异化。学生之间的知识体系有很大的差别，教师如果在一开始没有全面的了解就实施“学生中心”课堂，很大程度可能造成学生知识建构的碎片化局面，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会随着课堂的推进愈渐削弱，尤其是对于自学能力较差的学生而言。看似学生走向了课堂的中心，殊不知更是一种疏离。教育中最大的难点在于其的复杂性和灵活性，单纯的一种话语无法涵盖所有可能的情况，一方面要考虑知识本身的多样性和其特性，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和学习途径，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学生个体能力参差、个体学习意趣多样化以及自身知识体系的架构差异。

## 建议

### 1. 异化的超越

#### 1.1 站在理性的立场看待“学生中心”实践发展和异化

“学生中心”实践带给师生的影响需要批判地看待，如“学生中心”理念可以呼吁社会重新思考学校的办学价值和意义，同时也可以误导一部分课堂走向异化。课堂教学的创新是教师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体现，理念的指导是学校教育区别于社会化教育的主要表现。人类的发展史离不开教育，人类创设学校、发展教育是为了更好地摆脱自然的束缚，只是实践过程中的片面理解因素和反规律因素造就了实践的异化。但是教育的科学性使得理念的效力可控更具操作性，所以当教学实践产生异化时，我们不应该单一地、形而上地看待问题，相反我们应该借用理论，运用可行的手段去超越异化带来的问题。

#### 1.2 话语重置：构建“共生”课堂

真正健康的课堂绝不仅仅是利于学生成长的教学，更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良性循环的生态平衡。海德格尔曾提出“MITSEIN”这个德文词，一般把它翻译为“共在”（being-with）。海德格尔使用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在自己的理论系统内，为他设定的“此在”（DASEIN，或译为“缘在”）找到一个较为感性化的、具体化的普通表述；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从哲学史上消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个体理性主义，并结束胡塞尔现象学的绝对主体意识理论及由其推断出来的“主体间性”设定所导致的逻辑难题。海德格尔认为，个人在此



世界中存在，就是与他人一起在此世界中存在，所以世界是一个“MITWELT”，即“共在世界”。海德格尔的这个思想，在内容上达到了中国思想的关于以“群体”而非个体存在的意识。教育的场域是一个“学习世界”，一切活动都是依靠学习，通过学习，为了学习。教师和学生处于一个“共在”的状态，任何的主体性取向，都难免造成异化现象的出现。与其偏重任何一方，不如将重点放在场域的共建上，营造一种交互的环境，让师生都能体会到更多的思想碰撞和意义建构，真正凸显“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核心。

教师和学生课堂中必须共生发展，才能建构起师生学习共同体，从而使教师和学生都能够在课堂中成长和发展，使课堂成为师生共同完善和成就自我的舞台。教师和学生紧密的共生共发展关系形成，关键在于两者的相互依赖，共生视域下课堂教与学的关系建构应通过各种途径促成双方的相互依赖。

创新课堂观念，培育共生共长意识，奠定师生相互激活的关系基础课堂中，师生之间的共生关系建构取决于教师关于课堂的价值理念。教师必须创新观念，聚焦师生共生共长，才能在课堂教学中尽力与学生建构相互激活、相互发展的关系。其一，教师要正确理解课堂中教与学的紧密关系。课堂中的教与学是一体的，教的过程也是学的过程，教的情况决定了学的效果，学的需求决定了教的动力，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教师只有正确理解教学和学习的内涵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本质，才能在思想上把教与学认为同等重要。其二，教师要全面把握并肯定课堂对师生双方的促进作用。教师要认识到，课堂不仅能够促进学生的进步，同时也能够促进自身的发展，只有这样，其才能够认可课堂中与学生共生共长的可能性。其三，教师要把课堂定义为自我发展的重要路径。教师可以通过课堂反思形成特定问题的改善策略，也能够通过总结课堂经验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还可以积累更多的教学实践技巧方法等。教师要在课堂中与学生共生发展，意味着其必须要肯定课堂促进自身成长的作用，并把课堂作为自身成长的重要路径选择。其四，教师要坚定在课堂中完善和发展自我的决心。课堂是学生发展的舞台，也是教师发展的舞台，师生在课堂中共生发展的理念以教师的发展决心为前提。虽然有的教师能够肯定课堂的发展路径作用，但是往往在实践中难以付诸行动，缺乏相应的发展决心，如此，教师和学生课堂中的共生发展就只能停留在思想层面。要使师生共生发展的理念最终成型，教师必须坚定课堂发展的决心并付诸实施。

转变教师主导课堂为师生协商合作，搭建师生共生发展的关系格局共生关系中的主体相互依赖，通过相互配合实现共生目标。师生共生的课堂教学也必须使师生在课堂中协同发展，才能形成共生的客观事实。共生关系中的双方都需要从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并使自身的行为能够为对方服务，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双方的共生互利关系。因此，教师还要在课堂中采用教与学协商合作的教学方式，搭建师生共生发展的关系格局。其一，教师要突破课堂教学的习



惯性认知，培育课堂对话意识。教与学的协商合作意味着学生要参与到教学准备过程中，并需要通过与合作完成知识意义的探究。因此，教师要突破原有的教学观念，形成与学生课堂对话的意识，在课堂中采用教与学协商合作的教学方式。其二，教师要深刻认识与学生合作的重要性，增加师生协商合作的可能性。教与学的协商合作意味着学生需要在课堂中发挥更多作用，能够更多地参与到课堂教学的准备和推进过程中。学生对课堂的深度参与取决于教师的课堂权力让渡，而这种让渡取决于教师对于和学生合作的重要性认识，在教师认为其与学生合作是必要的且有着重要价值意义时，就会更多地让学生深度参与到课堂教学中，从而在课堂中有更多师生合作的可能性。其三，厘清师生各自的职责，明确教与学需要协商合作的内容。这是协商合作方式选择的前提基础。其四，明确师生合作的特征，选择教与学协商合作的方式。课堂中，师生合作的方式有多种，或者是全程分工合作，或者是前后互补等。在确定了师生合作方向之后，还需要根据各种合作方式的特征与教学内容需要，选择合适的协商合作方式。在协商合作成为课堂中师生基本的存在方式时，共生就成为两者关系的基本格局。

### 参考文献

- 陈飞. (2012). 异化与自由——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自由思想探析. *求实*(02), 4-7.
- 李培根. (2011).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 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变. *中国高等教育*(Z2), 8-9.
- 李鹏程. (2017).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再到“MITSEIN”.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6), 45-52.
- 李子建 & 尹弘飏. (2010). 课堂环境对香港学生自主学习的影响——兼论“教师中心”与“学生中心”之辨.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01), 70-82+190.
- 柳友荣. (2020). 本科生如何才能忙起来——对现行教学文化的反思. *重庆高教研究*(05), 119-128.
- 田夏彪. (2017). 大学积极型师生关系的内涵、结构及实现策略. *教育探索*(01), 37-42.
- 郗强炆 & 朱成科. (2017). 平等师生关系的泛化后果、根源及再确证. *教学与管理*(13), 25-27.
- 张奎良. (1980). 论异化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中的历史地位. *学习与探索*(01), 4-16.
- 周序, 张春莉 & 王玉梅. (2021). “学生中心”: 一种被给予的观念——基于高校师生的诉说. *现代大学教育*(04), 32-39+111.

师范类专业认证下教育学公共课教学困境及路向改革探索——基于OBE教育理念

**EXPLORATION ON THE TEACHING DILEMMA AND DIRECTION  
REFORM OF PEDAGOGY PUBLIC COURSES UNDER THE  
CERTIFICATION OF NORMAL MAJORS: BASED ON THE OBE  
EDUCATION CONCEPT**

张立志<sup>1\*</sup>, 徐延宇<sup>2</sup>

Lizhi Zhang<sup>1\*</sup>, Yanyu Xu<sup>2</sup>

<sup>1 2</sup> 南宁师范大学

<sup>1 2</sup>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1586083391@qq.com

**摘要:** 教育学公共课为师范生进入教育事业提供基础知识、方法、态度和价值观,是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极为重要的课程设置。从师范类专业认证过程中看,教育学公共课教学在教学理念上存在学生中心游离、在教学过程中存在产出导向偏离、在评价反馈上存在改进机制不足等现实困境。从OBE教育理念出发,解决上述问题亟需从理念上聚焦以生为本、施教中统筹资源优势、评价上构建测评体系,通过集“理念—施教—评价”三位一体的路向改革探索,以期推动专业认证理念内化于教师本体,外显于教师教学行为范式,从而提质师范生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 师范类专业认证, 教育学公共课, OBE教育理念, 师范院校。

**Abstract:** The public course of pedagogy provides basic knowledge, methods, attitudes and values for normal students to enter the education cause. It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curriculum setting in the training system of normal professional tal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ertification process of normal majors, there are som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pedagogy public courses, such as student-centered dissociation, output-oriented deviation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insufficient improvement mechanism in evaluation feedback.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of OBE education,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it is urgent to focus on the concept of student-oriented, coordinate resource advantages in teaching, and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system in evaluation. Through the reform and exploration of the trinity of 'concept-teaching-evaluation', it is expected to promote the internalization of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into the teacher's ontology and the externalization of the

teacher's teaching behavior paradigm,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for normal students.

**Keywords:** Public Course of Pedagogy, OBE Education Philosophy, Normal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Normal University

## 引言

为构建完善的师资保障体系，规范师范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于2017年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下称“认证办法”），明确提出以“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为师范类专业基本认证理念。认证办法是基于学生、产出和改进三个维度，为教育学公共课的课程培养目标设定提供了方向指引。教育学公共课是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本科生必修的基础课程，在师范类专业认证和人才培养中位居十分关键的位置，既为师范类专业学生的其它专业课程学习奠定理论基础，亦为师范生进入教育事业的理论和实践领域提供基本的视角、态度、价值取向与原则方法。毋庸讳言，教育学公共课的教学质量不仅关系师范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亦是师范类专业认证中极为重要的专家考查评价要点。为明晰研究范畴，本研究所探讨的教育学公共课特指师范院校为师范类专业学生所开设的有关教育学、心理学、现代教育技术等教师教育课程的统称，这些课程是师范生人才培养的重要构成部分。

##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和理论研究法，主要从OBE教育理念的理论视角去深入探讨师范类专业认证下教育学公共课的教学困境，具体探讨了教育学公共课在教学理念中、教学过程和评价反馈上的现实问题，再基于文献研究法和理论研究法探寻教育学公共课的改革路径，以此促使教育学公共课能够在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达成育人的真正目的。具体研究目的如下：

（1）深入探究OBE教育理念的理论内涵及其与师范类专业认证下教育学公共课理论的适切性和实践价值性；

（2）通过文献研究法和理论研究法来了解师范类专业认证中教育学公共课在教学理念、教学过程和评价反馈上的现实问题；

（3）基于文献研究法和理论研究法的学理性积累，具体提出在教学理念、教学过程和评价反馈上的优化路径，同时建构起相应的优化体系。

## 文献综述

截止当前，国内学者对教育学公共课的探讨已形成一定的研究基础。胡万山（2018）从认证背景下来探讨教师教育改革，左瑞红等人（2021）从认证背景下来探讨学前教育专业，

贺晋秀（2021）从认证背景下来探讨地方师范院校师范专业，向福（2021）从认证背景下来探讨课程目标达成度，李孝更（2022）从认证背景下来探讨职业师范院校教育专业建设，王勇（2019）从认证背景下来探讨师范院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周志艳（2021）从认证背景下来探讨高职院校师范类专业发展，董翠香等人（2022）从认证背景下来探讨体育教育专业等等。有前已述及，现有文献对于结合OBE教育理念来深度聚焦教育学公共课推进理路优化的相关研究较单薄，尚有探讨空间。故而，诸如“如何将OBE教育理念与教育学公共课培养要求创新性地融于一体？”“如何深度探索教育学公共课的现状问题？”“如何基于现状问题而进行教育学公共课的理论视角探索？”等问题已然成为教育学公共课推进理路优化所迫切探讨的重要课题。

### 1. 学理阐述：OBE教育理念及其适切性解析

从内核上看，OBE教育理念是一种强调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的学习成果为最终培养导向的教育理论。即OBE教育理念讲求基于学校毕业要求的人才培养规格来反向组织教学活动、教学策略实施和教学评价内容，从而实现学生在理论知识、专业能力及综合素养上的全方位发展。

#### 1.1 OBE教育理念的学理内涵

OBE的英文全称为Outcome-based Education（又称成果导向教育、能力导向教育、目标导向教育），既重视以成果为导向的教育理念，也是重视以学生为主体中心的教育理论导航。从理论溯源上看，钱沉等人（2021）指出OBE教育理念最初提法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的学者斯巴迪（William G·Spady），其强调能力本位，提出教育应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生活的才能，是在实践中提炼出的一套完整教学策略，包括预设学习成果、构建教学体系、明晰教学策略、自我参照评价、持续改进达到顶峰五个要素，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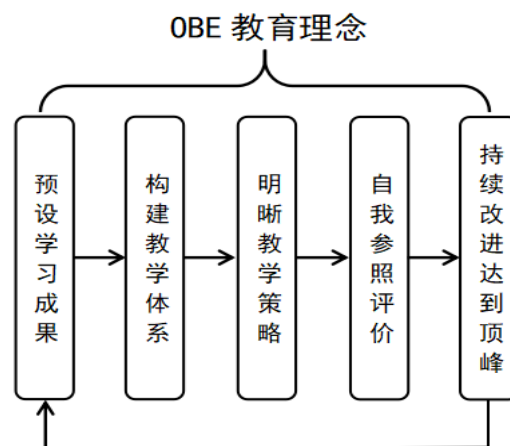


图1：OBE教育理念的五个要素

由图1, OBE教育理念共划分为五个要素, 每个要素间环环相扣, 层层递进, 构成一个循环体系。从维度划分上看, OBE教育理念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更注重课程内容、学习时长、知识传授等方面, 即更倾向于从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学习成果考查和学习评估改进三个维度来优化学生培养体系。OBE教育理念要求教育组织者能够清楚定位教育学公共课在师范生人才培养方案中的价值定位, 并在整个人才培养中始终以师范院校人才培养总目标为教学导向, 再逐步将总目标分解为具体可执行的子目标, 以层层递进, 步步达成。李志义(2016)研究发现, 自斯巴迪学者提出该理论至今, OBE教育理念已形成较为健全的理论体系, 其在世界各国的教育实践中已发展出许多较为成功和规范的实践模式, 被公认为追求卓越教育的正确方向, 同时也广泛影响着国内数十年的工程教育问题。至此, 运用OBE教育理念来探讨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教育学公共课教学路向改革探索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价值。

### 1.2 OBE教育理念与教育学公共课的适切性诠释

当前, OBE教育理念早已在北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得到广泛运用, 具备较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施晓秋(2018)认为在某种意义上, OBE教育理念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产出导向”“学生中心”“持续改进”12个字, 与师范类专业认证的理念如出一辙。张男星等人(2020)一致认为, 在学生中心方面, OBE教育理念强调需要将教学的目标定位在师范生毕业后所应具备的能力规格上, 为此所开展的课程内容需紧紧以最终结果为指向, 并在过程中为该能力画像提供相应教学支持; 在产出导向方面, OBE教育理念主张学校应该依据高质量的顶峰教学成果来反向设计课程项目, 同时在教学活动中分阶段分环节地对教学成果进行阶段性评价; 在持续改进方面, OBE教育理念则强调对教学评价结果的充分运用, 持续通过内外的“评价-反馈-改进”闭环回路来对教学活动进行持续优化与改进。

在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 教育学公共课的课程培养目标需要按照认证理念来设计师范生的人才培养目标, 再逐步分解到教学策略及其评估指标。首先, 在学生中心层级上, 师范类专业认证要求教育学公共课以师范生为中心来配置师资力量, 构建符合师范生成长规律的课程体系, 采取符合以学生为中心的施教方法, 这与OBE教育理念中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互为一一致。其次, 在产出导向层级上, 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要求学校所开展的各项教学活动均要有清晰的培养目标, 也即需要以总的人才培养规格为指引再解构至各阶段的课程子目标, 从而达到整体目标。再者, 在持续改进层级上, 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要求学校依据评估结果中的现实差距来不断优化课程培养目标、施教手段及其评价体系, 从逻辑脉络上与OBE教育理念一脉相承。由前已所述, 师范类专业认证理念与OBE教育理念高度契合, 借鉴OBE教育理念来探究教育学公共课, 有助于丰富师范类专业认证理念, 提升教育学公共课的教学质量。



### 1.3 OBE教育理念在教育学公共课实践运用的价值意蕴

其一，运用OBE教育理念有利于健全教育学公共课评价机制。OBE教育理念尤为重视学生主体地位，通过借鉴OBE教育理念来优化教育学公共课推进路径，有助于进一步在公共课评价机制上彰显“学生中心”，进而推动评价指标体系顺应认证要求，对标认证标准，譬如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增加师范院校教学经费、师资力量、教学活动等组织资源在培养师范生上的倾斜力度的指标等。故而，运用OBE教育理念来探索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教育学公共课的推进路径优化，必然有利于完善教育学公共课评价机制，推动师范院校建立起集“目标设定与评估-全方位动态监测-持续反思与改进”三位一体的测评体系。

其二，运用OBE教育理念有利于提升师范人才培养质量。李培根（2014）认为把学生看成教育活动中第一性的存在，是OBE教育理念及师范类专业认证均强调的共同点。OBE教育理念在课程教学领域运用中极为重视学生的学习产出，它要求课程教学的每一项设置都必须以最终培养结果为导向，由此反向设计符合课程培养目标的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评价指标。因此，李森等人（2019）指出为保证学生获得在未来生活中实质性成功的经验而准确地聚焦和组织教育系统，也即师范院校要以师范生第一性为指引，推动构建符合师范类专业认证要求的教育学公共课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评价指标，精准聚焦师范人才培养目标，不断以OBE教育理念为指引，持续优化创新课程教学与设计，推动师范人才培养迈向新台阶。

其三，运用OBE教育理念有利于建立规范的师范教育管理体系。从宏观意义上看，规范的师范教育管理体系是教育学公共课教学的体系保障，可以为教育学公共课教学提供系统支持；从微观意义上看，教育学公共课教学实践是师范教育管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可以从侧面映射出教育管理体系是否健全。是故，建立规范的师范教育管理体系尤为重要，而OBE教育理念在内涵界定中就明确重视学习成果、构建教学体系、明确教学策略、自我参照评价与持续改进达到顶峰五个要素，这为师范教育管理体系提供了理论框架。至此，从作用机理层面看，OBE教育理念的五个要素可以指引师范院校在课程教学中参照该理念来检视现行教育管理体系中的各项缺漏，由此推动院校建构符合师范类专业认证理念的师范教育管理体系。

##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通过文献研究法和理论研究法来深入探析师范类专业认证下教育学公共课教学的现实困境，具体而言：其一，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是指通过检索国内外研究文献、专著书籍、网络资源和课题研究等资料，来形成对本研究的现况了解，从而形成对师范类专业认证下教育学公共课教学困境的深度理解，以此为提出优化对策奠定坚实的现实研究基础。其二，理论研究法是指以相关理论为研究基础，推动对具体选题的理论性研究。本研究是指基

于OBE教育理念的学理性视角，以此融合本研究主题，进而为分析师范类专业认证下教育学公共课的现实状况构建起较为完善的理论分析框架。

## 研究结果

本章主要是通过文献研究法和理论研究法的协同运用，以此探索出师范类专业认证下教育学公共课在教学理念、教学过程和评价反馈等方面的具体现状问题。

### 1. 多维困境：专业认证中教育学公共课教学的现实问题

钟秉林（2003）研究认为专业认证即专门职业性专业认证（professional programmatic accreditation），是由专业性（professional）认证机构针对高等教育机构开设的职业性专业教育（programmatic）实施的专门性（specialized）认证，它是基于专业外部审查和院校内部自检来持续优化与健全人才培养体系，从而保证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当前，教育学公共课在认证过程中，仍存在教学理念、教学过程和评价反馈等现实问题亟待探讨。

#### 1.1 教学理念：学生中心游离

路书红等人（2017）认为在师范类专业认证中，教师对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目标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到位，目标达成度理解不清晰、解构不到位，导致公共课教学过程中目标相对游离。事实上，师范类专业认证尤其重视师范生的学习体验，强调师范课程设置要与人才培养目标保持一致，也即科学地认识教育学公共课培养目标是认证背景下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关键前提，是有效促进学生学科素养养成和教学能力研学的重要逻辑起点。在实践中，教师教学目标可以为教育学公共课教案设计、教学策略和活动组织提供方向指引。故而，清楚定位教学目标有助于教师有针对性地形塑学生学科素养、教学能力、合作交流及其育人的本领，从而真正在教育公共课实践教学中贯彻师范类专业认证理念。

丁钢等人（2014）认为从实际情况看，课程设置是培养目标的具体体现，也是教育质量的体现，然而张永祥（2012）研究发现在师范类教育学公共课的课程教学中亦存在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间课程设置比例不合理的现实状况，程鑫等人（2017）更是指出更有部分教育学公共课教师认为教学工作仅为其所有，无论在主题安排、内容设计、模块搭配亦或是案例设置都仅为教师个人教学工作范畴，与学生无关，因此也就难以通过教育学公共课来推动师范生人才培养要求的达成。据马晓春等人（2021）调研，在对于“你是否了解国家师范专业认证标准对师范类课程的结构、学时学分的要求”的问题调研中，高达66%的被访者“略知一些”，还有5%的人不知晓该要求，这组数据充分说明了师范院校仍有不少教师对师范类专业认证的理念认识不够深入的现实问题。综合前述，目前教育学公共课所呈现出的教学目标认识不到位，并不符合师范类专业认证中以学生为中心的认证理念。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教育学公共课任课教

师对师范生的教学培养定位不清晰，在课程教学中没有理清人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认证理念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也没有充分依据OBE教育理念来将教育学认证要求具体细化于教育学公共课教学目标的设定中，导致所设定的教学目标与师范类专业认证要求相脱节。另一方面，是由于教师对认证理念的內化力不足。在师范院校中，教师将“学生中心”的认证理念融于教学，不仅需要教育部政策支持，更重要的是要调动学校资源，激发教师内心深处的“教书育人”情怀，逐步增加组织层级资源支持，以此推动教师将师范类专业认证理念与教学目标深度融合。

### 1.2 教学过程：产出导向偏离

在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师范院校教师在教学中将目标达成度体现到具体教学、体现到教育学公共课每一章节教学过程的操作方法尚不科学，导致公共课教育无法满足认证中目标达成度的要求。程鑫等人（2017）认为具体而言，在教育学公共课施教过程中，教师表现为独霸课堂，学生在课堂中并非作为主体，仅表现为教学课堂中的观众，只有在小组交流或问题作答时才有参与课堂的机会，且所授课的内容缺乏生动、鲜活的案例支持，无法给予学生有效的启发与课堂教学技能培养，同时石利（2010）教育学公共课也存在教学方法陈旧的困境。在吴艳等人（2015）的一项课堂调研中，有高达81.6%的学生一致认为教师所采用的课堂教学方式较单一，常常以教师为中心，而仅有18.4%的学生觉得教师在课堂上所采用的教学方式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具有灵活性；也有占比78.6%的学生均认为教师在讲课过程中未突出内容重点及难点，只有21.4%的学生认为教师有阐述重点及难点内容。事实上，王策三（1985）认为教师教学过程理应是学生在教师引导下而主动地去理解、掌握既有知识、技能和规范的学习过程，而这一过程更需要发挥教师的主观引导性。

从专业课程教学看，当前大部分师范院校均是基于课程与课程学分的直接对应，即只要获得课程学分就可以达到毕业要求的具体细目。追溯本质，这其中的个中原因正是由于教育学公共课教师在教学目标达成与教学落实方法上存在兼容性不足，缺乏教学策略方法与教学机智的有效融合，致使教师在目标达成度与公共课章节学习的融合上缺乏统一的标准，便更难构建起师范类专业培养要求与教育学公共课每一章节间的一一联动，又怎能够做到OBE教育理念中的“产出导向”？从教学方法的功效性看，科学、合理的施教方法是达成教育学公共课培养目标的关键途径，亦是达成专业认证建设要求的重要之举，相反如若教师本身在教学方法改进与探寻的进程中仍延续着不科学、不系统的教学方法，那么自然无法推动学生在践行师德、学会教学、学会育人和学会发展四个维度的协同发展，更不利于师范院校师范类专业的学科建设及其人才培养。综合前述，现阶段教育学公共课课程施教方法科学性不足，尚不符合师范类专业认证中的产出导向理念，不利于师范院校落实落细产出导向理念下的毕业要求，更不利于师

范生在课堂上习得各种教学方法。

### 1.3 评价反馈：改进机制不足

曾造等人（2022）指出在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公共课的教学环节理应有明确的质量监测要求，需要构建“内部监控、外部评价、持续改进”的教学质量持续优化体系，持续强化教师对课程教学反思及教案设计的优化进程，拔高人才培养质量。但放眼放下，部分师范院校仍将教学反思与持续改进的逻辑落脚点放在传统教务管理中的学生评教、领导评教、同行评教等方面，与师范类专业认证的要求相脱节，未能达成师范类专业认证中的持续改进理念，也即反映出学校在教育学公共课的教学改进机制尚不完备。在马晓春等人（2021）的一项关于“您的学校师范专业教学质量评估工作存在哪些问题”的半开放式问题调研回答中，有高达56%的被访者一致认为目前学校对于教学工作仍存在“重视评教、轻评学”“重视课堂评价，忽视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评价”等问题，可见师范院校在评价改进机制的指标设置中仍存在评估指标设计权重不均衡、不科学的现象。同时，翟亚军等人（2014）指出现有评估结果亦存在“异化”使用，人们对评估结果的关注度远远高于评估本身，缺少对评估本身的元评估和问责制度，致使评估功能被打折扣甚至扭曲，出现制度缺失和文化失迷，以至于评估的作用在使用过程中被打折扣。此外，据马晓春（2016）研究发现，高校中有占比34%的被访教师一致认为学校管理部门较为重视评价环节，而相对轻反馈使用；较为重视对质量评估过程的信息收集，而分析环节薄弱；甚至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更倾向于外界的质量问责，却往往忽视自身内部质量的优化，呈现以评代建、过度评估等实际问题；而路书红等人（2017）也指出在师范院校亦存在无论是合格评估还是审核评估，均普遍呈现一种重专家进校检查，轻视评估后的持续整改的现象。不言而喻，教学评估报告运用过程的追踪反馈环节缺失、评估资料的分析缺失及评估过程的问责缺失，都突显出现阶段教育学公共课教学改进机制在这些方面的不足。实际上，完善的教学改进机制可以有效监测教育学公共课在践行师德、学会教学、学会育人和学会发展四个维度上的落实程度与效度，从而持续优化，推动学生在全面发展上得到教学支持。由前已所述，教学改进机制的不健全也从侧面映射出当前师范院校尚未建立起一个系统、科学、完善的教育学公共课评价改进及其质量评估机制，而这种现实局面自然也导致教师无法在具体教学中秉持OBE教育理念来持续反省自身在师范生公共课教学目标达成度、施教方法策略及教学效果方面的不足。

## 总结与谈论

本章主要是基于上述研究结果的现实问题来具体探讨师范类专业认证下教育学公共课的路径改革探索，以期为教育学公共课提供可供优化的建议思路，详实如下。



### 1. 纾困之举：OBE教育理念下教育学公共课教学路向探索

综合性人才是师范院校培养的第一要义，更是构建国家教育事业师资梯队的关键人力资源支撑。故而，为保障师范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依据OBE教育理念旨在从聚焦以生为本、统筹资源优势、强化反思改进三个维度进行教育学公共课教学改进路向探索。

#### 1.1 理念升级：聚焦以生为本

以生为本是OBE教育理念所十分强调的内容范畴，通过聚焦该范畴可以帮助教师深刻把握在教学目标达成度与目标解构间学生中心应当如何体现，由此推动教师教育学公共课教学目标从原有的游离状态走向目标集中。首先，在教育理念与资源联动层面。师范院校亟需搭建起OBE教育理念下课程设计的教师培训，充分发挥院校优质培训资源的整合力，积极组织教育学公共课教师进行集体定期或不定期研学师范类专业认证的最新要求，推动教师深刻理解并运用专业认证理念，以达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从而增强认证理念与教学实践间的连贯性。在该过程中，师范院校应充分调动其资源统筹优势，牵头做好公共课教师培训工作，主动基于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积极举办多层次、结构化的教学培训，不断更新教师原有的教学策略，提升教师对专业认证的理念认识。同时，教育学公共课任课教师应当充分结合学校内部审查、外部专家审查及社会发展对专业的实际要求来适时拓宽自身的教学实践能力。其次，在理念模型构建层面。通过结合OBE教育理念，构建起符合师范生专业认证标准下的教育学公共课课程设计思路模型，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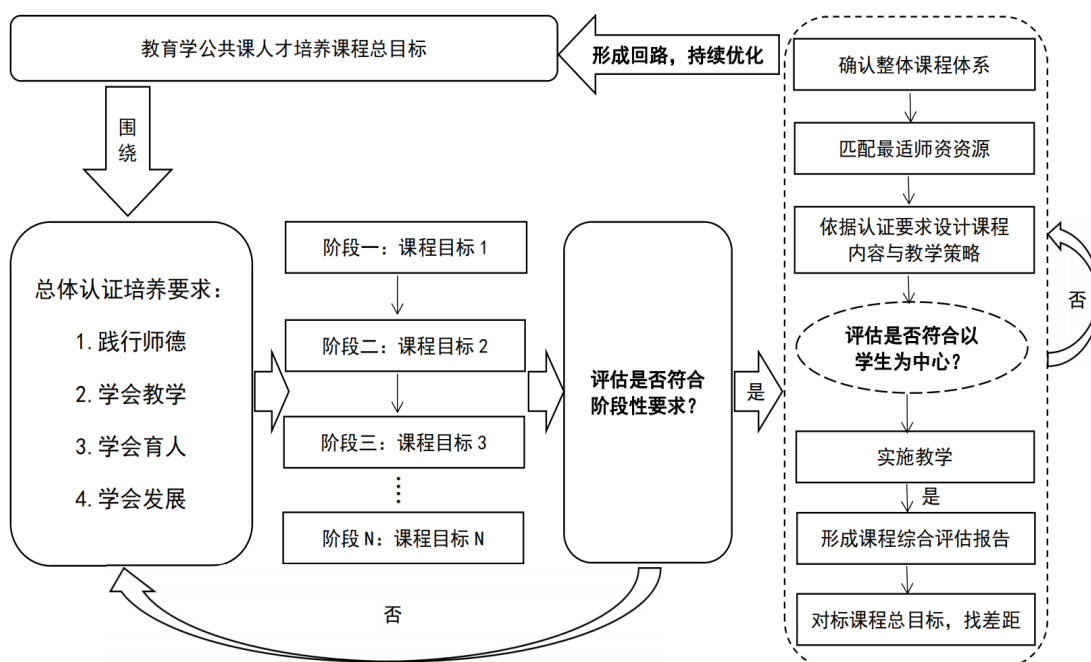


图2：基于OBE教育理念的教育学公共课课程设计思路模型



由图2可知，第一，明确教育学公共课人才培养的课程总目标。教育学公共课人才培养课程总目标是教育学公共课课程目标设计的逻辑起点，其主要作用是要求教育学公共课的课程应遵循教育部在小学教育专业、中学教育专业和学前教育专业认证中所提出的四个培养要求，即要求课程目标设置须紧扣“践行师德、学会教学、学会育人、学会发展”四级学生培养的维度，由此教师再依据课程的时间进度来设计、分解各阶段的子课程，以形成整体的目标递进表。第二，落实课程目标达成度的评估。依据OBE教育理念，在课程设置上要体现出各阶段教育学公共课知识间的逐级递进性，即所设置的公共课教学目标需基于教育学公共课人才培养的课程总目标来层层解构，如若判定其与学生培养要求不相契合则需重新优化课程目标设定。第三，强化课程内容与教学策略的设计。待整体课程体系确认完毕，则匹配最适教育学公共课任课教师，并由教师设计符合认证要求的课程内容与教学策略，同时依据OBE教育理念来评估是否符合以学生为中心的主思想，如若不符合则重新设计内容与施教方法，待再次评估符合后即可实施教学。第四，打造闭环优化改进体系。这是实现持续提升教育学公共课建设质量的关键环节，即教育学公共课在课程结束时应及时评估，形成综合性的评估报告，再依据评估报告来对标教育学公共课人才培养总目标，形成闭合回路，持续推进教育学公共课的课程体系改进与目标达成。综合前述，通过基于OBE教育理念的教育学公共课课程设计总体思路模型可以为教育学公共课教学提供操作指南，推动课程教学目标更合理、更科学地定位于学生层面。

### 1.2 施教优化：统筹资源优势

资源优势的统筹是师范院校将OBE教育理念中的“产出导向”理念最大限度的嵌入到教育学公共课教师施教过程中的重要组织支撑，一套健全的课程实施制度可以有效保障师范生教育学公共课课程教学质量，同时有效避免教师教学过程中的产出导向偏离。其一，构建师范院校常态化教研制度。在常态化教研制度下，学校通过组织教育学公共课教研团队开展集体备课研讨，在研讨会中共同完成基于师范类专业认证所需要的教育学公共课教学大纲和教学设计，即学校要善于利用校内教师教研团队的集体力量，譬如可以通过安排其他公共课教师旁听对应任课教师的课堂教学，适时对标师范类专业认证要求来给该教师提供优化建议，助力其专业化发展等。其二，建立专家智囊团。学校可以充分借助同行专家的力量，推动公共课任课教师依据认证培养要求来接纳同行专家的改进建议，不断打磨其教学活动模式和教案，持续深化OBE教育理念在课程施教中的具体践行，打破传统教学过程的一言堂局面，充分利用专家智囊团的建议来丰富自身的教学方式，不断提升学生的课堂体验感和获得感。其三，搭建教学经验交流平台。师范院校可以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形式来召开教育学公共课教学经验分享会，主要就阶段性的教学经验进行总结、回顾与探讨，推动公共课教师在内部交流会中汲取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取长补短，丰富教学方法。同时，学校要牢牢遵循“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

理路来优化教师课程实施和制度改进，积极利用集体经验分享的渠道来对各教育学公共课教师的课程目标达成度情况进行系统评价、客观建议与优化策略探寻。简言之，师范院校唯有持续依据OBE教育理念中的“产出导向”理念来探索相应的教育学公共课保障措施，充分统筹学校资源优势，才能真正确保在教学过程的产出导向不偏离原定目标。

### 1.3 评价改进：构建测评体系

推动师范院校建立起教育学公共课的测评体系是保证OBE教育理念中“持续改进”理念在师范类认证背景下与教育学公共课教学的有效弥合。实际上，教师课程教学测评是以优化教学方法、教学目标和教案持续改进为逻辑起点，学校组织教师定期或不定期进行课程教学测评与改进可以促使公共课教学体系愈发完善，从而提高教育学公共课质量建设，促进课程改进机制从不健全到健全。首先，以OBE教育理念为评价指南。2017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文件，具体指出通过参照OBE教育理念，师范院校可以积极组建相关管理部门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对师范类专业课程体系设置的规范性和课程目标达成度进行综合考察，同时依据课程评价的综合评估报告来及时改进原有课程教学培养方案，持续推动课程建设和教育教学改革，进而依据认证要求与实际间差距来优化教学大纲。事实上，OBE教育理念除了重视知识目标的达成度外，亦十分重视各种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的培养，它强调学生的全方位发展，为此教师在教学内容、施教策略和每节课教学目标解构上的反思显得尤为重要。其次，构建闭环的测评体系。持续改进是师范类专业认证中一般标准体系下的核心构成要素，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其评估状态的保持亦或是师范类专业认证的回访均是师范类专业认证程序中尤为关键的一环，这要求师范院校完善传统的评价机制，牢牢把握以OBE教育理念为指导，构建集“目标设定与评估-全方位动态监测-持续反思与改进”三位一体的测评体系，如图3所示。

由图3，第一，内容解构与评估。师范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是学校总体育人工程的顶层设计，指引着下设各院级学科专业的具体培养。因此，教育学公共课课程培养要求要依托师范院校人才培养方案为导向来设置，同时将具体的课程培养要求解构到教学过程的课时内容设定，并基于OBE教育理念对各课时内容进行评估，衡量其是否契合培养要求，评估的重点可以涵盖有“各课时的公共课教学具体达成了哪些培养要求的要素？”“所有课时的培养要求整合起来是否衔接上课程的培养要求”等，如若不符合则再持续优化，直至符合要求后再开展课程教学。第二，全方位动态监测。评估环节是保障施教过程能有效落实原定课程目标的重要环节。故而，师范院校可以从实践教学、理论教学、课程考核和教学成果四个维度来综合评价任课教师的教学综合表现。同时，为确保评价信息的全面性，参与测评的主体应涵盖用人单位、毕业生、在校学生、在校教师和同行专家四级主体，以此形成全面的综合性评估报告。第三，持

持续反思与改进。持续改进是课程教学培养精益化发展的重要内涵。为此，本环节的关键要义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将评估的问题及修改建议反馈于教育学公共课任课教师，推动其不断改进；另一方面，积极将评估所获得的反馈信息迁移至师范院校人才培养方案，推动人才培养方案融入新元素，以弥补好师范院校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的素质衔接，同时再依托新的人才培养方案来指导教育学公共课课程培养要求设定，以形成良性的循环体系。由前已所述，基于教育学公共课评价与持续改进系统，通过推动教育学公共课课程培养要求适应社会需求，并在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中测评公共课任课教师的教学目标达成程度，以此改进教师的教学不足与人才培养的要素失缺，真正做到以评促教、以评促学、以评促培的改进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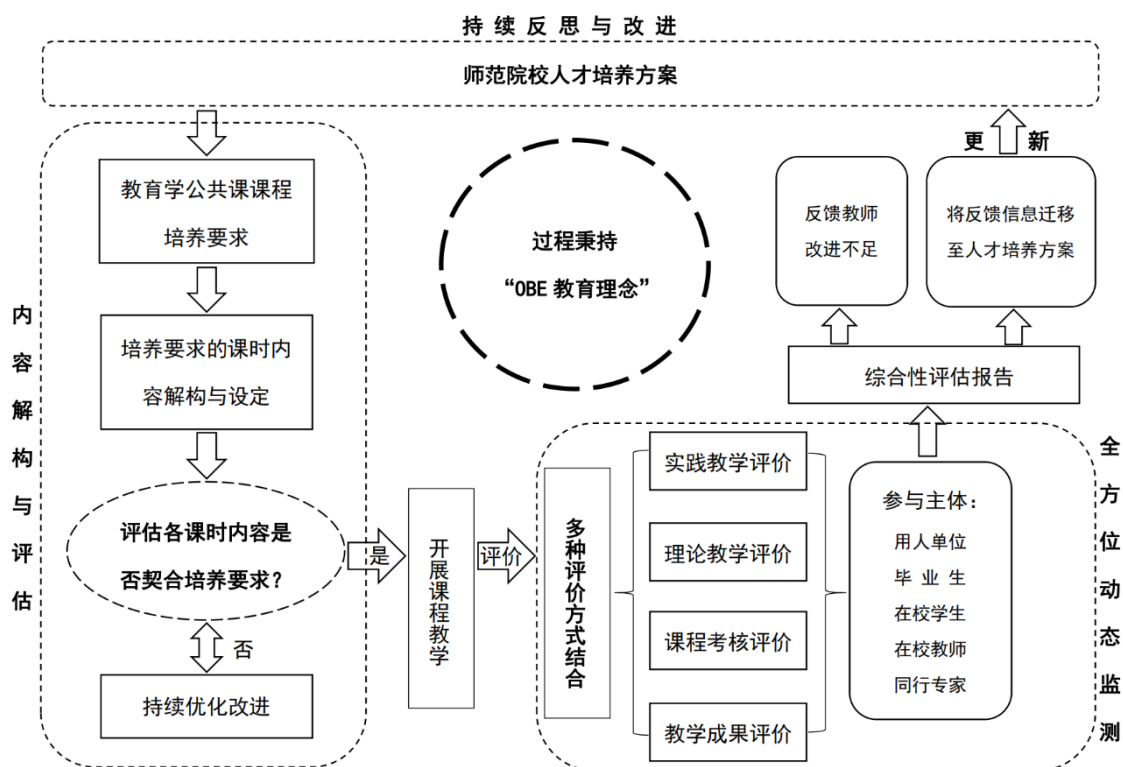


图3：教育学公共课评价与持续改进系统

###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的不足有两个方面：第一，本研究仅运用文献研究法和理论研究法两种，并未直接采用量化的实证研究法来分析师范院校的教育学公共课究竟在现实中还存在何种问题，所以在研究结果中的问题探讨可能仍不够全面，这是后续研究中亟待解决和完善的重要问题。第二，本研究所构建的改革路径仅基于前述研究所得到的问题来提出，暂未经受住具体实践的检验，所以优化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仍有加强和提升的空间，为此，之后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所探索的改革路径在实践中是否真正达到原定目标，其原先的问题是否在该措施下得到解决等。

## 参考文献

- 曾造, 李金海 & 曾兵芳. (2022). 师范类专业认证下地方高校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化学教育(中英文)*, (6): 14-20.
- 程鑫, 许海深 & 张子玉. (2017). 基于师范生实践能力培养的教育学公共课“五结合”策略实施研究. *黑龙江高教研究*, (12): 172-176.
- 翟亚军 & 王战军. (2014). 制度-伦理-文化: 高等教育评估软环境的三个基本向度. *高等教育研究*, (5): 36-40.
- 丁钢 & 李梅. (2014). 中国高等师范院校师范生培养状况调查与政策分析报告. *教育研究*, (11): 95-106.
- 董翠香, 韩改玲 & 朱春山等. (2022). 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探索.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1): 32-37.
- 贺晋秀. (2021). 专业认证背景下地方师范院校师范专业的挑战与应对: 以包头师范学院为例. *教育理论与实践*, (6): 18-20.
- 胡万山. (2018). 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教师教育的意义与路径. *黑龙江高教研究*, (7): 25-28.
- 李培根. (2014-08-08). 教育应该真正以学生为中心. *中国青年报*, (2).
- 李森, 刘梅珍 & 崔友兴. (2019). 专业认证背景下高校师范类专业建设理路. *重庆高教研究*, 7(06): 12-24.
- 李孝更, 王哲 & 王伟等. (2022). 专业认证背景下职业师范学院教育专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以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为例. *职业技术教育*, (5): 29-35.
- 李志义. (2016). 对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十年的回顾与反思之一: 我们应该坚持和强化什么. *中国大学教学*, (11): 10-16.
- 路书红 & 黎芳媛. (2017). 专业认证视角下的师范专业发展探析. *教育发展研究*, (22): 65-69.
- 马晓春 & 周海瑛. (2021). 认证标准视阈: 师范专业质量保障体系构建新方向. *现代教育管理*, (1): 76-84.
- 马晓春. (2016). 教师教育专业质量评估路向探究. *教师教育研究*, (1): 32-36.
- 钱沉 & 王瑞敏. (2021). 基于OBE教育理念的高职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 *职业技术教育*, (23): 45-48.
- 施晓秋. (2018). 遵循专业认证OBE理念的课程教学设计与实施.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5): 154-160.
- 石利. (2010). 提高高师“教育学”课堂教学实效性的策略. *教育探索*, (3): 75-76.
- 王策三. (1985). *教学论稿*.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王勇. (2019). 专业认证背景下师范院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构建研究. *中国高等教育*, (7): 39-40.
- 吴艳 & 陈永明. (2015). 大学课堂教学的现状分析及思考: 基于全国十所高校的实证调查. *高教探*

- 索, (11): 88-93.
- 向福, 王锋 & 项俊. (2021). 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及持续改进策略. *中国大学教学*, (7): 74-79.
- 张男星, 张炼 & 王新风等. (2020). 理解OBE:起源、核心与实践边界: 兼议专业教育的范式转变.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3): 109-115.
- 张永祥. (2012). 新建本科院校公共教育学教学的现状及对策. *教育理论与实践*, (6): 50-51.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7). 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 2023-02-21. [http://www.gov.cn/xinwen/2017-11/08/content\\_5238018.htm](http://www.gov.cn/xinwen/2017-11/08/content_5238018.htm).
- 钟秉林. (2003). 教师教育的发展与师范院校的转型. *教育研究*, (6): 22-27.
- 周志艳 & 陈新文. (2021). 专业认证视域下高职院校师范类专业发展思考. *黑龙江高教研究*, (1): 115-119.
- 左瑞红, 闫祯 & 蒋庆丰. (2021). 专业认证背景下学前教育专业实践课程的问题与对策. *黑龙江高教研究*, (4): 142-147.



**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大中小学一体化建设及启示****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SINGAPORE AND ENLIGHTENMENT**袁帅<sup>1\*</sup>Shuai Yuan<sup>1</sup><sup>1</sup> 南宁师范大学<sup>1</sup>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1971697534@qq.com

**摘要：**新加坡政府历来重视公民与价值观教育，以培养“新加坡人”。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对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变革和课程的一体化建设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发现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的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具体体现在：以核心价值观和目标感为理念指引；注重学科联系和学校环境的课程实施背景；体现可教时刻的课程结构；关注学生现实生活的课程内容；突出学生自我反思的课程教学方法与评估。本研究力图从对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大中小学一体化建设的方法与特色中，为中国思政课程一体化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课程一体化建设是中国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各层次学校努力的方向，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课程目标的整体建构；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融入课程设计之中；结合中国国情实现课程结构与内容的有机整合。

**关键词：**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思政课程一体化。

**Abstract:**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ducation of citizens and values to cultivate "Singaporeans". This study uses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specifically analyze the curriculum reform and integration of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Singapor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Singapore is increasing, which is embodied in: taking the core values and sense of goal as the concept of guidance, focusing on the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background of discipline connection and school environment,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of the teaching moment, the curriculum content of students 'real life, and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method and evaluation of highlight students' self-reflection.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from the metho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

and civic education courses in Singapore.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is the direction of educ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and schools at all levels in China, which should lead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objectives with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egrate the student-centered concept into the curriculum design; and realiz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structure and content i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Keywords:** Singapore,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Curriculum,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 引言

新加坡国家面积小、人口少、资源不充足的基本国情使新加坡人具有很强的危机意识。自独立以来，新加坡一直强调“生存”，强烈的生存观促使新加坡政府把任何国内或国际的变化都紧紧地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赵毅，2022）。因此，新加坡非常重视国家的公民与价值观教育，以求培养理想的新加坡公民。新加坡于2021年颁布最新版本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预科的品格与公民教育（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简称CCE）课程标准。较2014年版本，2021年版本在核心理念中增加了目标感来指引整个品格与公民课程改革，特别重视学生所处的学校环境和学科之间的联系，在课程设置方面统一了大中小学的课程类型，更加强调学生的自主性。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越来越一体化，对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的课程理念、课程实施背景、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的教学方法与评估进行具体分析，从而为中国思想政治课程一体化建设提供一些参考和经验。

## 内容

通过对新加坡小学、中学、大学预科这三阶段的CCE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分析，并结合新加坡小学、中学CCE课程标准（2014年版）和新加坡大学预科CCE课程标准（2016年版），得到新加坡CCE课程一体化建设的方法与内容。根据新加坡CCE课程标准，从课程理念、课程实施背景、课程结构、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与评估这五个方面全面分析新加坡CCE课程。

### 1. 以核心价值观和目标感为核心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理念

新加坡CCE课程内容以“身份”、“关系”和“选择”三大理念为基础，包括核心价值观和社会情感能力的教与学，重点是培养学生的目标感。CCE通过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对三大理念进行思考，从而形成个人的价值观。其一，“身份”是学生对于自己是谁的主观体验，也是关于学生如何看待自己属于一个具有不同特征的社会群体，如种族、宗教、职业、国籍等。“身份”为学生提供了在多个领域探索自我的机会，直到发展出一种稳定连贯的身份。身份一致性将成为年轻人在成年后经历转变和承担多重角色的稳定支柱。其二，课堂内外关系的性质和质量不仅影响学生的

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还影响学生的公民认同和国家认同。在发展个人的性格优势和潜力时，必须考虑到个人生活和发展的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国家和全球环境。此外，学生对自己作为公民角色的理解是通过文化传播以及社会协作的意义创造过程内化的。其三，“选择”强调的是在内部和外部决策过程中所作选择的能动性或自我导向和个人责任。在内部领域，抉择是在学生的价值体系、道德、个人卓越、教育和职业目标等方面做出的。在外部领域，抉择是在学生所处的各种环境中发生的，例如：家庭、学校、网络空间、社区、公共空间、国家和世界；与家人、朋友、同胞和其他人以及环境的关系；涉及道德困境、多重视角和争议性问题的情境。（MOE，2021）三大理念是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的概念核心，旨在有目标的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品格。

价值观是一个人性格的核心。学生的个人价值观是指导学生在私人 and 公共领域行为的原则和信念。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它们是持久的共同信念，是关于“什么是值得的，是人们为之奋斗的理想，以及判断特定行为是好的、正确的、可取的或值得尊重的广泛标准”。核心价值观包括尊重、责任、坚韧、正直、关怀和和谐，这是新加坡人共同的社会和国家价值观的基础。社会情感能力使学生能够审视和理解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培养责任感和对他人的关心，并为自己、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而行动。当学生运用这些能力时，学生就活出了自己的价值观，成长了自己的品格。（MOE，2021）而将目标感整合到一个人的身份中是性格发展和使转变的价值观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强烈的目标感会促进学生未来身份、积极情感和心理发展的形成，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驾驭成年后的过渡时期。（MOE，2021）有了目标感，学生更有可能实践构成自己性格基础的核心价值观，并有意义地应用学到的社会情感能力。（MOE，2021）CCE针对小学到大学预科的所有学生提出了统一的培养目标（详见表2），旨在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品格、坚韧的意志和健康的社会情感、为未来做好准备、积极的公民意识，凸显了核心价值观和目标感（MOE，2021）。

**表1：新加坡品格与公民课程目标**

目标	要求
良好的品格	具有良好的道德准则和强烈的是非意识，具有批判性和道德思维，具有辨别力，对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关心他人，追求卓越
坚韧的意志和健康的社会情感	包括一种平衡的自我意识，形成健康的人际关系，面对挑战时有韧性，找到生活的意义，有感恩和欣赏的意识
为未来做好准备	对生活有目标感，培养适应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以便能够有目的地导航教育和职业道路，并接受未来来自工作和生活的挑战
积极的公民意识	包括对国家的归属感、对自身和未来的希望感、对新加坡脆弱性和局限性的现实认识，以及采取行动改善他人生活和建设我们国家未来的意愿，培养强烈的国家认同感

来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yllabus Primary. Singapore:

Student Development Curriculum Division, 2021: 8.

## 2. 注重学科联系和学校环境的品格与公民课程的实施背景

CCE在国民教育、性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与职业指导、网络健康、家庭教育这六个相关学科背景下被教授和应用。在大学预科阶段，还增加了对学生金融素养的培养。表2详细介绍了在学科联系背景下对各阶段学生的培养目标。（MOE，2021）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学科背景下，CCE对学生有不同的要求。此外，要使CCE对学生产生持续的影响，学校环境必须支持学生的性格发展。作为人类，我们有与他人联系、感受情感和身体上的安全、有归属感、行使自主权和体验能力的基本心理需求。当这些需求得到满足时，学生们会感到与学校有更大的联系，并对自己的学习有更大的主动性和对学校有更强的归属感。学校环境为学生创造学习机会，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个人性格优势，培养他们共同的社会和国家价值观，并使他们具备公民价值观，例如能够欣赏多样性、尊重他人的观点、对共同利益做出承诺。这些价值观对社会的运作至关重要。一个关怀有利的学校环境，其特点是有关怀和负责任的领导、普遍向上的成长心态、情感和身体安全，以及关注学生、教师和学校社区所有其他成员的学习和发展。在这样一个丰富的学习环境中，学生可以养成性格和培养公民气质，以及促进社会情感健康，并感到有能力成为最好的自己。（MOE，2021）关怀有利的学校环境的必要特征包括一致和连贯的信息传递、积极的师生关系、成人角色榜样、良好的同伴支持和关系、学生的声音和权力被尊重。

**表2：**不同学科中的有关品格与公民教育的培养目标

学科	小学	中学	大学预科
国民教育	赋予权力和抱负，允许个人做出明智的选择，以培养积极参与的公民——具有社会意识，善于进行批判性思考，并了解当地、区域和全球问题		
性教育	能够理解他们在成熟过程中经历的生理、社会和情感变化，发展健康有益的关系，包括与异性的关系，并在性问题上做出明智、知情和负责任的决定		
心理健康	增强适应力和幸福感，区分压力和痛苦，知道如何寻求帮助，以及对他人表示关心和同情	增强适应力和幸福感，区分压力、痛苦和疾病，提高求助效果，以及去污名化精神疾病	
教育和职业指导	提高对不同类型教育和职业道路的认识，使自己具备终身学习的价值观、技能和性格，从而对自己的中学教育做出明智的选择	探索自己的优势和能力，审视自己的人生目标，培养积极主动、适应性和坚韧的品质，为21世纪做好准备和接受终身学习	
网络健康	关注学生在网络空间中的福祉，为其提供知识和技能，以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的力量实现积极的目的，在网络空间中保持积极的存在，并成为安全和负责任的信息通信技术用户		
家庭教育	鼓励去爱和欣赏自己自己可能不够完美的家庭，并反思家庭关系的价值，以及拓宽他们对包括高质量的家庭生活的成功的定义的重要性		
金融素养	赋予大学预科学生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以管理需要财务头脑的新兴成人责任，例如设定财务目标，养成健康的理财习惯		

来源: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4).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yllabus Primary*.

Singapore: Student Development Curriculum Division.



### 3. 体现可教时刻的品格与公民课程结构

品格与公民教育有不同的实施平台，具体通过品格与公民教育课这一课堂内以及主要的学生发展体验、校本课程、其他科目、个人应用中的可教时刻来实施被有意义的实施。具体的课程设置见表3。相对应的，为了达到品格与公民教育的预期学习效果，课程时间被分配给显性教学、强化和应用学习。显性教学包括系统地规划和利用课程时间，让学生学习和内化价值观和特定的社交和情感技能，并了解如何应用它们。教师使用适当的教学原则、方法和策略，使学生参与讨论、理解和反思。显性教学主要在品格与公民教育课中进行，包括教师指导、母语、主动学习计划（小一和小二）。此外，显性教学还通过学校集会、述职和反思活动进行，这些活动在主要的学生发展体验中安排的，如共同课程活动、队列营地和其他户外活动以及队列学习之旅。（MOE，2021）学习、强化和应用价值观、社会情感能力和公民素质的机会贯穿整个学校的各种活动和项目，以及教学时刻。至关重要的是，学生们要有时间来反思自己的经历，思考自身能够从积极和消极的生活经历中学到了什么，以及这些经历是如何改变自己的。

**表3：**品格与公民课程设置

品格与公民课程类别	品格与公民课程意义	品格与公民课程开展形式
品格与公民教育课	为教师提供了时间，通过讨论和有效的课堂策略与学生建立关系	明确的价值观、社会和情感技能的教学，例如理解情绪和如何调节情绪，学习如何管理人际关系 为学生提供知识和技能，例如了解心理健康问题，负责任地使用网络空间 通过“行动价值观”项目为家庭、学校和社区提供贡献的机会
主要的学生发展经验	促进学生在身体、审美、智力、道德和社会领域全面发展	共同课程活动、共同学习之旅、教育和职业指导经验、国家教育纪念日、户外探险学习队列营地、学生领导力发展计划、包括日常活动的行动价值观
校本课程	确保学生的学习经验在整个学校范围内有意义的融入品格与公民教育	学校学生的需求、兴趣和能力，也参考了品格与公民课程的学习成果，并应用以学生为中心、意向性和连贯性的指导原则来设计和实施品格与公民课程和活动
其他科目	是对学生发展的其他学习获得和科目的补充	将品格与公民学习成果与其他学科领域的内容知识联系起来，价值观和社会情感能力的学习也可以通过可教时刻发生
个人应用	为了让品格与公民教育对学生有意义	教导反思自己的性格成长是一个终身的过程，通过练习回想积极和消极的生活经历等日常事件

来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4).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yllabus Primary*.

Singapore: Student Development Curriculum Division.



#### 4. 关注学生现实生活的品格与公民课程内容

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内容以“身份”、“关系”和“选择”为核心概念，以培养学生良好品格、韧性和社会情感福祉、未来准备和积极的公民意识。下表展示了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在中小学阶段，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明显的以“身份”、“关系”和“选择”这三个维度、以品格与公民教育课和各种学生参与的活动与计划来开展。在小学阶段，对小学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提出明确的、内容逐渐深化的要求。比如在“身份”这一层面，小学低年级的课程和活动旨在鼓励学生对自身所处的环境充满好奇，并在学习和所做的事情中找到乐趣；小学中年级的课程旨在学习希望和感恩，能够勇敢地面对变化，并练习重新构建自己的观点；小学高年级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更全面的看待自己，抓住每一个学习机会，反思自己的愿望和梦想。（MOE, 2021）

中学阶段被分为中学低年级和中学高年级两阶段，并增加了对当代问题的讨论。比如在“关系”这一层面，中学低年级阶段的课程帮助学生学习技能发展自身社会认识，承认、接受和拥抱多样性，表现出同理心和保持公民意识；还学习有效管理人际关系的技能，为个人幸福和社会和谐做出贡献。中学高年级阶段旨在使学生们继续发展他们的社会意识和关系管理的技能，为建立一个包容性的社会做出贡献；还在考虑到其所生活的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国家和全球背景下，加深了学生对其作用 and 责任的反思。给出了“在多元化社会中与邻居和睦相处”、“在公共空间中的实践与责任”等问题供学生探讨。（MOE, 2021）

在每个内容后都有详细的个人或群体性活动或计划。中小学阶段更多的是强调学生的认识和理解。在大学预科阶段，学生将发展出更强的个人能力和资源来管理复杂性和应对变化，随着教师在提供指导和支持的同时赋予学生更大的学习自主权，将会有更多以学生为主导的举措。这一阶段更多的是强调学生面对社会甚至是更广阔的世界该如何做。

**表4：**品格与公民课程内容

年级	小学	中学	大学预科
课程的核心内容	身份：理解和照顾自己（了解自己的长处、需要改进的地方、情感以及各种成长和学习的机会）	成为最好的自己 （“我是谁？我想成为谁？我最好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培养幸福感和人际关系（关照自身的心理健康、在数字世界中茁壮成长、发展健康的关系）
	关系：关心和尊重他人 （加深对自己与他人关系的欣赏，学会给予和接受并建立自己的支持网络）	建立联系 （“我如何与自己、他人和周围的世界建立联系”）	让新加坡参与周围的世界 （推动新加坡前进、改变现状）
	选择：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并付诸行动 （引导学生学习在行动之前思考，清楚自己行动和决定的后果，会征求他人的意见）	做出选择 （“我如何选择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该如何选择行动？我想要什么样的未来？”）	自信拥抱未来 （为生活而学习、管理自身的财务）

来源: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21).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yllabus Primary & Secondary & Pre-university. Singapore: Student Development Curriculum Division.

### 5. 突出学生自我反思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教学方法与评估

在品格与公民教育中，学习是一个持续的终身过程，并通过学生的各种经历发生。教师根据学生需求和兴趣精心创造和支撑这些经历，并通过与现实世界的真实和有意义的联系来最大化品格与公民课程的效果。叙事法是学生通过故事或故事的构建来理解世界和他们的经历的方法，能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困境。显性技能指导方法对社会和情感能力的教学很重要，通过一系列的内容来引导学生掌握技能。体验式学习法让学生经历包括体验、思考、反思和行动的循环，将学生的经历转化为学习内容。道德认知发展法通过道德两难困境场景，让学生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进步到道德发展的更高阶段。价值澄清法包括帮助学生通过理性思考和情感意识检查他们的个人感受和行为习惯来阐明他们的价值观。（MOE，2021）表5为新加坡品格与公民课程的教育方法与策略。

表5: 品格与公民课程的教育方法与策略

方法	策略	效果
叙事法	讲故事或反思	认识和澄清自己的价值观
显性技能指导方法	角色扮演	接受他人观点，在不同场景中表现出适当反应
体验式学习法	学生发展经验（如队列学习之旅、队列营地）	学习者从自身经历中识别、理解和内化学习内容
道德认知发展法	道德推理	关注社会和普遍的观点
考虑法	Hot Seat（游戏）	培养同理心，关心他人
价值澄清法	澄清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	建立道德和合理的立场，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坚持经得起审查和比考验的正确价值观

来源: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4).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yllabus Primary. Singapore: Student Development Curriculum Division.

品格与公民课程的评估是学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教学法的一部分。教学和评估过程和策略在品格与公民教育学习经验中交织。教师可以深入了解他们的学生在品格与公民教育中是如何学习和发展的，以及他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加强这一过程。评估信息的收集和使用是教师解决学生学习差距的持续学习过程的一部分。在确定有效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必须考虑关键教学原则和方法的相互作用，并为课堂或课堂外的学习经验选择适当的策略。有效教学实践的一些关键性原则为积极的学习关系、有意义的、元认知和深度学习。（MOE，2021）品格与公民教育的评估过程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包括集体目标与个人目标的共建、通过对话和反思来深入学

习、为学生提供自我评估和同伴评估的机会。(MOE, 2021) 要建立学习的责任感和自主权, 学生必须集体的和单独的与老师一起构建自己的学习目标。教师使用来自诸如社会情感能力评定工具(RTSEC)的评估信息, 确定学生的优势领域和需要改进的领域, 引导学生自我评估、自我调节和设定个人目标。学生在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时间理解和反思自身的进步。教师互动时间和同伴对话也可以用来指导学生识别和解释他们学习的依据, 并为下一步做准备。通过为学生提供自我评估和同行评估的机会, 使他们学习终身性格成长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 成为最好的自己。

## 总结

新加坡CCE课程以核心价值观和目标感为课程变革的理念指引, 形成了包括课程目标、课程实施背景、课程结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与评估的健全体系。新加坡CCE课程注重学校的大环境以及CCE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背景, 要求教师关注学生现实生活并利用一切可教时刻来引导学生进行自我反思, 从而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与品格。通过对新加坡CCE课程标准2021的研究, 发现其是对2014年版本的补充和调整。相对而言, 新加坡CCE课程标准2021在价值引领中增加了对目标感的培养, 更加注重学校环境, 强调学生的自主性, 并在课程结构设置和内容方面的一体化程度加深。(MOE, 2014)

## 讨论

### 1.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课程目标的整体建构

人的价值观对人的成长、成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只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人们才能够朝着积极进取的方向前进, 从而获得进步与成功。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以尊重、责任、坚韧、正直、关怀和和谐为核心价值观, 是新加坡人共同的社会和国家价值观的基础。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目标直接或间接体现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凸显了核心价值观, 强调对其的内化和应用。中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指的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这24字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力弘扬中国梦的时代契机下是最直接的助推力和精神动力, 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国思想政治课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围绕核心素养来设计课程。中小学阶段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核心素养包括政治认同、道德修养、法治观念、健全人格、责任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2); 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程的核心素养包括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公共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0)。处于不同阶段的学生所要培养的核心素养在总体上具有一致性, 都包括政治认同、法制意识、健全人格, 但还有各自的侧重不同方面的核心素养。要实现思想政治课程一体化建设, 首先要对课程的核心素养进行一致的规定, 使课程的总目标具有一致性, 然后根据学生的年龄结合课程内容设置具体的目标。仔细分析核心素养,

发现责任意识属于道德修养的范畴；公共参与体现责任意识，可以与政治认同结合起来；人通过工作和奉献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职业精神对学生的一生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建议将大中小学思想政治课程的核心素养统一为政治认同与参与、道德修养、健全人格、法治意识、职业精神。思想政治课程目标与核心素养一一对应，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任务。

## 2. 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融入课程设计之中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一体化建设过程中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知识教授的过程中，主动学习优于被动接受。学生是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主体，以学生为中心设计课程使学生更好的融入思想政治课程之中，主动学习和参与各种活动。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始终把学生放在重要位置，例如：学生中心是品格与公民课程设计的理念之一，注重学生的个体本身，让学生参与到课程设置之中；课程内容强调学生的生活经历、个人体验及反思；课程评价方面让学生的自我评价作为重要一点。中国思想政治课程内容在中小学阶段让学生更多地参与其中，比如第一学段（一、二年级）入学教育主题中的“上学了，感觉自己身份的变化，初步了解学校的环境”，建议教师通过让学生自我介绍和参观校园等活动来尽快适应自己的新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高等教育阶段的课程内容多为理论课程，学生参与感不强，教学效果有待提升。让学生参与到课程设计之中，可以使学生的声音被听到，思想政治课程更多的满足学生的兴趣和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之中应注意引发学生的自我反思，从而促使学生思考自己所学的东西和有待学习的东西，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内化为自己思想和表现行为的一部分。学生的自我评价过程也是学生对自己进行反思的过程。通过过自我评价，学生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自己，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以学生为中心应体现在思想政治课程的方方面面，促使思想政治课程一体化的实施。

## 3. 结合中国国情实现课程结构与内容的有机整合

课程结构与课程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且课程结构体现课程内容的实施方式。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包含品格与公民教育课、学生的主要发展经验、校本课程、其他科目、个人应用这五个方面，全面的考虑了品格与公民教育其本身的理论和实践内容、与其他科目的关系、在学校这一实施背景下。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为主题教育，通过理论课和活动的形式具体开展。中小学的学习主题为入学教育、道德教育、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法治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传统教育，根据学生的切实需求和课程核心素养设计主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高等教育将思想政治课程分为基础模块（必修课）和拓展模块（选修课），拓展模块是对基础模块的拓展和补充。选修课程除对学生进行时事政策教育外，还应根据国家形势发展、区域经济和行业发展状况，结合学校德育工作，学生社会实践、专业学习、



顶岗实习，进行法律与职业教育，国家安全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1）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中国历经数千年沉淀下来的精华，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坚实思想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之中，从而推进思政政治教育创新与发展。大中小学都关注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这一主题，应将思想政治课程内容切实与学生日常生活的背景联系起来，使思想政治教育真真正正的落入学生的言谈举止之中。

只有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才能够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效果。中国中小学的主题教育多为通过活动使学生认识和体会教育内容；而高等教育大多为显性的理论知识教授课，实践活动较少。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结构并不够明确，明确的课程结构让各层次学校更好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其中，特别应注意思想政治教育并不仅仅是一门单独的学科课程，它与其他课程都能产生联系，育人是所有课程的目标。近年来，“思政课程”正在向“课程思政”转变。理想状态是形成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核心圈，系列课程、综合素养课程、其他学科课程多层次互补的育人圈层效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堂的方方面面。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需要专家和教师的共同努力，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应结合时代背景，不断补充更新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内容，使之具有时代性并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其次应重视课程结构的设置，全面体现课程内容，充分利用任何可教的时刻。

## 参考文献

-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4).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yllabus Primary*. Singapore: Student Development Curriculum Division.
-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21).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yllabus Primary*. Singapore: Student Development Curriculum Division.
-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21).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yllabus Pre-university*. Singapore: Student Development Curriculum Division.
-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21).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yllabus Secondary*. Singapore: Student Development Curriculum Division.
- 赵毅. (2022). 差异性与多样性: 东南亚国家对国家安全的认知. *国际政治研究* (05): 90- 103+7.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0). *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1).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2).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数字时代高校教师数字胜任力对于其职业领导力的影响研究****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COMPETENCE OF COLLEGE TEACHERS ON THEIR PROFESSIONAL LEADERSHIP IN THE DIGITAL AGE**董菁葳<sup>1\*</sup>Jingwei Dong<sup>1\*</sup><sup>1</sup> 南宁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sup>1</sup>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761288700@qq.com

**摘要：**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爆发，以及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以智能化为特征的数字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并正在对各国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等多个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其中，教育进步和人才培养对于一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综合实力的提升具有毋庸置疑的关键性作用，因而各国政府与教育部门在近年来充分结合数字化时代特征，将数字教育的前沿思想渗透进相关政策文件与学校发展改革措施中，而教师作为在教育场所直接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其职业领导力的高低将对学生培养、自身发展与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效用。本研究在综合分析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对高校教师的数字胜任力的具体内涵做出介绍与辨析，将数字胜任力的概念核心定位于“充分且恰当地运用数字思维、数字知识、数字技能、数字品德解决教育教学活动中自身发展和学生发展的问题的动态过程水平”。此外，文中重点探讨了数字胜任力在高校教师教学效果、学生管理和个人魅力构建方面对于教师领导力的切实影响，并以此给出数字时代通过提升高校教师数字胜任力，从而促进其职业领导力提升的对策建议，认为优化教师的数字意识与观念、确保领导的数字思维及配合、个性化教师奖惩制度的建立与应用三个方面是数字时代有效提升高校教师职业领导力的关键。

**关键词：**数字时代，高校教师，数字素养，数字胜任力，教师领导力。

**Abstract:**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n a global scale, the digital age characterized by intelligence has quietly arrived, and i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various aspects of economy, culture, education, ecology and so on. Among them, educational progress and personnel

training have undoubtedly played a key role in a country'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t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Therefore, in recent years, governments and education departments of various countries have fully comb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gital era and infiltrated the cutting-edge ideas of digital education into relevant policy documents and schoo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measures. As a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 directly engaged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in educational places, the level of professional leadership of teachers will have a great effect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their ow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previous studies, this study introduces and distinguishes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 of digital competence of college teacher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research methods. The core of the concept of digital competency is "the dynamic process level of fully and appropriately applying digital thinking, digital knowledge, digital skills and digital morality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self-development and student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impact of digital competency on teacher leadership in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student management and personal charm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teachers,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professional leadership by improving digital competency of college teachers in the digital era. It is believed that optimizing teachers' digital consciousness and concept, ensuring leaders' digital thinking and cooperation, and establishing and applying personalized teachers' reward and punishment system are the key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dership in the digital age.

**Keywords:** Digital Age, College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Digital Competency, Teacher Leadership

## 引言

在席卷全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影响下，各国正在开展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化、智能化、技术驱动正在成为新时代的代名词，对于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公民生活各个方面发挥着势不可挡的影响作用。我国的高校教育承担着人才培养与输送的重大责任，并具有开放性、创造性与前沿性等特征，其中，高校教师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直接实践者，其职业领导力对于教学效果、学生管理和个人魅力构建等方面能够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身处数字时代的我们，就教育领域教师群体的数字胜任力及教师领导力开展更加深入、细化的研究既是对时代号召的响应，也是对现实难题的回应。

### 1. 数字时代以技术驱动带动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国之大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来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创新技术越来越多地推动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转型，并将会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成为社会变革的主旋律，换言之，生活在当代的我们已置身于数字时代的洪流之中。对此，近年来我国从

政策角度更加关切推进教育数字化的进程。2021年3月，我国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要求。2021年7月发布的《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要通过教育新基建、发挥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作用，推动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同年11月，《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发布，提出应当提高学校数字化水平，开展教师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培训，提高教师运用数字技术改进教育教学的意识和能力。此外，《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也明确提出推进教师队伍建设信息化，挖掘和发挥教师在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中的作用。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学习型社会和教育强国。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统筹安排、一体部署，并首次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写入报告，赋予了教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新的使命任务，明确了教育数字化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意义。由此可见，我国国家与政府对于数字时代深入推进数字化教育的必要性与措施方案极为关注，在政策高度首先明确了提升师生数字素养及数字胜任力，并以此推进整个教育领域的长足进步是无可辩驳的国之大势。

## 2. 教学场域内大量数字胜任力低下教师的存在制约着教育发展

教师作为教育发展的坚实力量，其教育理念与能力直接关系到是否能够培养具有生存能力和竞争力的数字公民。我国高校教育一直力图在人才培养的方案与标准上加强创新进步并与国际充分接轨。故而，数字时代高校教师能否具备充分的数字思维、数字知识、数字技能、数字品德，并将其恰当地运用于教育教学活动中的问题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高校的人才素质和教育发展。然而经过实践观察与交流分析，发现大量高校教师仍存在数字胜任力低下的现象，集中表现为部分教师增强自身数字胜任力的意识不强、专任教师较之于行政教师的数字胜任力不足、青年教师长期保持着优于中老年教师的数字优势。

## 内容

### 1. 高校教师数字胜任力的现状水平及存在问题

#### 1.1 部分高校教师对于增强自身数字胜任力的紧迫性意识不强

由于高校环境对于培育师生自主性和创新力的要求高于基础教育学段，在教师管理和考评规则方面相对更加个性、灵活，这一方面有利于高校教师教学与科研成果的充分产出，另一方面也滋生出不愿脱离“舒适圈”，抗拒接受数字时代新兴技术熏陶的部分教师。这部分教师认为，传统教学与科研方式只要能够保证自身的教育教学工作按期完成且无重要疏漏即可，学习新的数字技术、建立相应的数字理念并以此解决工作难题需要耗费更多“不必要”的时间与精力，于是在所在单位给予其较大选择空间的情况下，该类教师便失去了在新时代增强自身数字

胜任力的主动性和紧迫性。

1.2 高校行政教师的数字能力相对优于专任教师，但综合性数字胜任力呈现出整体性不足。高校教师的配置从工作性质和主要工作内容上可以分为行政教师和专任教师两大类。行政教师主要负责为教学提供组织、服务保障，在日常工作中需要与相关院校师生保持充分联系，并承担着大量的资料文书工作。专任教师主要承担教学与科研工作，是一个高校教师队伍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所在院校的竞争实力和人才水平。由于工作内容的不同，专任教师相对缺少必须使用更多数字技术的场景，在教学中有教师常年采用基础的教材+PPT讲解模式，科研时也习惯保持一些经典但古早的研究范式，缺乏突破和创新。

1.3 青年教师的数字胜任力普遍优于中老年教师，且长期保持着这样的群体特征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的相关界定，本研究中所指青年教师即实际年龄在15-34周岁的教师。这部分教师由于在其学习和生活中自幼接触过更多、更新的电子技术和电子设备，并拥有大量具有同样特征的玩伴群体，加之年轻学习者在接受新鲜事物上所天然具备的好奇心和接受力优势，因而普遍具有比中老年教师更强的数字思维、数字知识和数字技能，只要将必需的数字品德和问题解决操作过程更充分地融于对这样的青年教师的培养中，其数字胜任力将显著提升。但由于缺乏“新带老”的合理措施，以及青年教师群体和中老年教师群体在个性特征和交流方式上的差异等因素，使得多数院校长期保持着教师数字胜任力的代际差异。

## 2. 影响教师数字胜任力的主要因素

如前述，本研究认为教师的数字胜任力指的是教师充分且恰当地运用数字思维、数字知识、数字技能、数字品德解决教育教学活动中自身发展和学生发展的问题的动态过程水平。因此，影响教师数字胜任力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教师的数字思维。这指的是教师具有对数字时代到来的感知能力和新时代职业特性发生改变的敏感认识，并能由此主动认识到提升自身数字水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工作中与生活中自觉地接受数字时代新兴技术的来袭，学习数字教育相关的理论与技巧。

其二，数字知识。教师数字知识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活动之前和之中所必须具备的数字化设备使用及产品操作的理论基础，它往往通过专业培训、同事互助和多渠道自主学习习得。

其三，数字技能。即教师在课堂教学、学生管理和工作交流中实际操作数字化智能设备的基础能力和创新能力，不同类型的课堂对于教师数字技能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但任何类型的组织教学中都可以融入教师数字技能的运用。

其四，数字品德。在数字时代，技术驱动化的教育领域需要教育工作者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与客观的态度，不滥用数字资源，不在数字教育过程中危害他人隐私等问题不容忽视。



其五，实践锻炼。这指的是教师有机会在实际的工作中综合运用以上四个要件来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困难与问题，这是讲静态、平面的数字素养升级为动态、立体的数字胜任力的必须阶段。

### 3. 数字胜任力对于教师职业领导力的关键影响

关于一个好的领导者所要具备的重要品质，不同学者给出了相应的测算和答案。斯托格第（R. M. Stogdill）认为，与领导才能有关的品质很多，包括五种身体特征（如精力、外貌、身高）、四种智力特征、十六种个性特征（如适应性、进取性、决断力等）、六种与工作有关的特征（如职业成就、创造性等）、九种社会特征（如合作性、人际关系等）。吉沙利（E. E. Ghiselli）也提出了自己的品质理论，认为作为领导者的个人需要具备以下品质：监督能力、职业成就、智力、自立、自信、决断力、冒险、人际关系、创造性、不慕财富、对权力的追求、成熟、男性化或女性化。

而在数字时代，作为高校教师这一群体需要具备三方面的综合实力：专业能力，即完成所任教学科或所在岗位基本任务的专业知识与管理技能；品德能力，即关心学生、学高身正、以身作则等优良品质；沟通应变能力，即能够利用恰当手段与同事、学生等主体进行充分沟通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而教师数字胜任力的提升一方面可以协助教师运用更为科学、高效的技术手段减少沟通和管理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为学生展示和介绍更多更前沿性的知识理论，从而提升高校教师在学生心中的个人魅力，进一步有利于学生的主动学习和教师的专业进步。

## 结论

鉴于以提升教师的数字胜任力助推其职业领导力有着来自理论和实践的迫切诉求，笔者认为高校教师数字胜任力的优化关键在于从根源上提高教师的数字意识与观念、确保所在单位上级领导的数字思维与配合、合理化奖惩制度的运用。

首先，教师的自我进步和专业发展应该是一种内发性需求，预想增强其数字胜任力水平，首先要使得教师充分认识到数字胜任力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性和优势性。这又分为两个方面，关于重要性的方面，国家和政府已经从政策文件的角度明确了技术驱动时代教育教学人员具备更高的数字胜任力是时势所需。然而还应当为那些暂时拥有较低数字意识和数字能力的教师更加直观、具体地展示数字技术是如何广泛地应用于教育教学工作中、如何对于改善自身工作质量和效果起到了重大作用的，倘若每位教师都能认识到数字时代他们的工作可以借此获得何种利好，其主动学习的意识自然会有所提高。

其次，教师所在单位的上级领导是否具有先进的数字理念将对教师的数字胜任力培养起到关键作用。能够充分认识到数字时代对于人才的新需求并愿意为此提供专业培训和宣传的领导，将为那些数字胜任力不足的高校教师提供进步的更大可能。他们可以通过加强校内数字



文化宣传、开展教师数字技能比拼、提供专业数字教育培训、成立教师互助小组等方式有效地提升教师的数字胜任力，进而促进其教师领导力。

最后，教师数字胜任力的提升需要“内外兼施”，制定并运用合理的奖惩制度可以成为增加高校教师数字胜任力的坚实保障。如前文所述，高校教师的管理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整体较为个性自主，但制定赏罚分明的教师激励措施，使得不同年龄、职称、岗位的教师有机会因为具备更高的数字胜任力而得到肯定与优待，便会大大提高教师心中增强自身数字胜任力的重视程度与必要性，同时也激励那些乐于学习、勇于创新的教师。

## 建议

针对上文中关于通过提升高校教师的数字胜任力，从而促进其教师领导力的论证，我们还应当注意一点：当我们普遍认为青年教师的数字化操作能力更强，将提升中老年教师数字胜任力的任务笼统地交予这些年轻教师时，很可能存在以下四个问题：第一，并非所有青年教师都有着充分的数字意识与技能；第二，基础的数字软件与设备操作不等于数字胜任力；第三，年轻教师往往由于更大的职业压力，迫使他们将精力主要放在其他事务上；第四，缺乏时间合理、方式恰当的，成体系的“新带老”，导致每位教师的成长情况不同，人际关系成了主要影响因素，造成了整体结果的不可控。

此外，由于篇幅限制与研究个人因素，仍有部分专业问题有待广大教师及科研人员进一步探讨。例如：如何对不同年龄、特征的教师进行针对性帮助与个性化考核？

如何把握“数字”和“人工”在教育领域的使用界限？如何更多地将提升教师数字胜任力的优秀经验传递至不同学段教师？关于以上研究方向与问题，期待前辈与同仁们更多的关注与论证。

## 参考文献

郑旭东 & 范小雨. (2020). 欧盟公民数字胜任力研究——基于三版欧盟公民数字胜任力框架的比較分析. *比较教育研究*, 42(6), 26-3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20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2023年07月02日. 中国政府网 ([www.gov.cn](http://www.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1). *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 2023年07月02日. 中国政府网 ([www.gov.cn](http://www.gov.cn)).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2).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 2023年07月08日. [cac.gov.cn](http://cac.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2021). *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印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

*的通知*. 2023年07月08日. 中国政府网 ([www.gov.cn](http://www.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2021).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3年07月02日. 中国政府网 ([www.gov.cn](http://www.gov.cn)).

周三多, 陈传明, 刘子馨, & 贾良定. (2018).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个人移动终端对中国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的影响研究****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PERSONAL MOBILE TERMINAL ON THE CREDIT SYSTEM MANAGEMENT OF STUDENTS IN CHINES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刘佩<sup>1\*</sup>Pei Liu<sup>1\*</sup><sup>1</sup> 南宁师范大学<sup>1</sup>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2397185996@qq.com

**摘要：**本研究基于学分制管理理论探讨个人移动终端和中国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的现状和关系，进一步探究个人移动终端对中国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的影响。研究综合参考了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调查问卷作为测量工具，以广西四所高职院校的学生、教师和领导为样本进行数据采集，采用SPSS26.0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 中国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能力与个人移动终端具有双向显著正相关；2. 个人移动终端参与程度的高低影响中国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能力；3. 个人移动终端对中国高职院校的管理和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建议中国高职院校要进一步增强学生学分制管理能力，开展多样化课程模式以促进学生的积极管理能力发展，充分发挥个人移动终端的积极作用，助力中国高职院校学生进一步提升自我管理能力。

**关键词：**个人移动终端，中国高职院校，学分制管理。

**Abstract:** In the stud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mobile terminals and student credit system management based on credit system management theory,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 mobile terminals on the management of student credit system in Chines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study comprehensively referred to the questionnaire with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s a measurement tool, took students, teachers and leaders from fou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Guangxi as samples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used SPSS26.0 for description statistic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ollowing factors are: 1. The management ability of students in Chines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personal mobile terminals; 2. The participation degree of personal mobile terminals affects the management ability of

students in Chines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3. Personal mobile terminals have some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management and students' self-management ability of Chines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Chines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further enhance students' credit system management ability, carry out diversified course mod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ctive management ability,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personal mobile terminals, and help Chines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to further improve their self-management ability.

**Keywords:** Personal Mobile Terminal, China'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redit System Management

## 引言

当今改革开放的中国，科学技术与经济快速发展，迫切需要高素质技术性人才，而职业教育作为此类人才开发、培养的主要阵地，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为此，“十一五”规划期间，国务院发布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在“十二五”开始的一年，各省也相继出台关于职业教育的“十二五规划”，以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建设为引领，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抢抓机遇、应对挑战。2017年，国务院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十三五”规划》提出：“改革创新驱动教育发展。推行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模式。引导行业企业深度参与专业教学、顶岗实习、岗位资格认证等方面的标准制定和教学评价（教育部，2017）。”《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完善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健全国家职业教育制度框架。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完善评价机制，规范人才培养全过程（国务院，2019）。”切实推动教育评价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需要不断更新评价理念，促进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标准多元化、评价方式方法多元化，探索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模式。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个人移动终端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日益显著，职业学校实施学分制就是职业教育教学领域进行的一项重要改革。

## 研究目的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就个人移动终端对高职院校学分制管理的影响进行探究，通过实证研究个人移动终端对高职院校学分制管理的影响，对高职院校学分制管理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寻找中国高职院校学分制管理不足问题出现的原因，并以此为据寻求有效提升高职院校学分制管理的策略和建议。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1) 了解中国高职院校学分制管理的现状，剖析高职院校学分制管理问题的产生原因，进一步探究提升高职院校管理能力的有效策略和创新人才培养，以此提升中国高职院校的培养能力。

(2) 了解个人移动终端使用和高职院校学生个人学分制管理现状，剖析个人移动终端对中国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能力现状问题的影响作用，探究如何充分发挥个人移动终端在中国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能力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3) 了解个人移动终端、学生自主管理能力、学分制管理之间的影响关系和现状问题，研究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构建个人移动终端下的中国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和个人管理能力培养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 文献综述

本章通过阅读文献对个人移动终端和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的相关研究成果和主要理论进行归纳和呈现，共分为三小节，第一节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人本主义理论、人力资源理论、学分制管理理论等相关的理论基础，第二节为文献梳理，包含移动终端、学分制等研究主题，第三节为研究述评，这将为下一步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支撑。

### 1. 理论基础

#### 1.1 人本主义理论

作为一种哲学理论，人本主义“宣称对个体、人类内在尊严、人性权利和价值、具有自主性自我的自我导向发展等的神圣的不可侵犯性”（Lucas, 1994），强调人类本质的善性、自由与自主性、个体与潜在性、自我概念与自我、自我实现、领悟、责任与仁爱等的基本原则（Elias, 2005）。对于这种抽象的理念体系，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切尼（Edward P. Cheyney）教授给予了形象的描绘。他认为，人本主义“可以是古希腊时期早期人本主义学者所发现的和谐的生活状态；可以是博雅的文学或人文学科的研究；可以是摆脱宗教束缚的自由以及伊丽莎白女王或本杰明弗兰克林之生活的多方面兴趣；可以是莎士比亚或歌德对人类热情的讴歌；或者是以人为中心的哲学”（Cheyney, 1937）。总之，人本主义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哲学，它强调人类自身权利、尊严和价值的不可侵犯性，它维护人类对自我发展、自由与善的追求，它尊重人类的自主性与能动性。

人本主义理论体系存在三个基本维度，即人之本体的维护、完整性个体发展的追寻和民主与和谐关系的构建。一是人本主义的维护主体：人之本体。人本主义（humanism）首先在语义学上就表明它是关于人（man）与人类（human）的主义（-ism）。而事实上，在整个人本主义发展的历程中，最突出的特点亦是这一点。人本主义在历史上一直致力于对人类尊严与自主性主体的维护，这也正是建立在反对压制人类尊严与自主性的外在力量的基础上进行的。纵观历史，对具有主体性之本体的“人”产生压制的外在之物主要体现为“神”和“物”，具体表现为宗教与科学。二是人本主义的实体状态：完整的个体。人本主义关注和维护的主体与对



象是“人”之本体，而这种人本主义意义上的人的实体状态又是怎样的呢？在人本主义学者里斯（Reese）看来，从伦理学意义上，人本主义是基于对人类需求满足（健康、物质、安全、新的经历、认知、审美等）的程度来判断相关的社会行为实践的（Reese, 1945）。这种对生理、经济、求知乃至审美意义上的需求正是“人”之个体之所以成为“人”的多维度成长需求，只有多维度的需求得到满足，一个真正的“完整”意义上的个体才得以形成。这种“完整”的个体被马斯洛和罗杰斯分别称为“自我实现的人”和“功能健全的人”。虽然这种人在现实中只是那么“一小撮”，但每个时代的人本主义学者却在努力地追寻着。三是人本主义的践行场域：民主与和谐的关系体。无论是人本主义所维护的“人”之本体的实现，还是其所追寻的人的“完整性”发展状态的兑现，都脱离不了社会实践。而人本主义所要求的社会践行场域是一个充满民主理念和人本关怀的和谐关系体，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世界。正如里斯（Reese）认为的，在社会学方面，人本主义的目的旨在维持一些潜藏在一切社会秩序中的特定要素，诸如养成与其他个体相一致的个人自由的最大化、基本人权的获得、人们及其有效需求与目标的相互依赖性等；同时还包括对理性与合理控制社会的可能性的实现与期望。在这一社会秩序中，人类通过自身的智力以及与他人的自由合作可以在地球上建构一个永恒的和平与美好状态，而只要这样，人们才能走向一种真正的生活形式，以实现创造性工作和幸福生活的最大化（Lamont, 1990）。作为一种宏观哲学，人本主义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它首先关注人，而不是神和自然，以实现个体存在与权利的维护；它的目标指向于个体的完整发展以及自由价值的实现；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建立充满人本关照与民主交流的社会关系体中。人本主义三维度以它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品质对教育实践包括职业教育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它将人本主义理论渗透到教育的四个范畴领域，要求教育实践通过公平的教育供给、完整的培养目标、整合的课程结构和民主的教学实践来实现对学习者的教育权利的捍卫、个体充分发展目标的终极追求以及独立性主体的尊重。

以上关于人本主义理论的具体阐述，进一步深化了本研究对于基于个人移动终端学生学分制管理的认识，也为本研究开展中国高职院校个人移动终端对学分制管理的影响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借鉴。

公共安全管理包含的内涵丰富，但是不管是哪国的学者都将公共安全的管理主体定义为国家，而公共安全所面对的群体是公众。大学生安全管理则不同于公共安全管理，大学生安全管理的主体可以是学校也可以即是学校又是学生，大学生安全管理的群体主要是学生。学生也是公众的一部分，因此公共安全管理理论对于本研究有着指导意义。

## 1.2 人力资本理论

所谓人力资本，是人们在教育、职业培训、健康、迁移等方面的投资所形成的资本；

是体现于人自身的生产知识、技能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是人们作为经济主体创造财富和收入的生产能力（曾建权、郑丕谔，2001）。

人力资本具有以下特征：

（1）时效性。一个人的生命周期是有限的，一般劳动者的劳动年龄只有从16-60岁的44年左右，因此人力资本的形成与使用有时间方面的限制。另外，人力资本如果不被适时适当地利用，就会随时间的流逝而降低或丧失其价值。

（2）不可分性。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形式形成的价值在劳动者自己身上的凝固。人的知识、技能、健康等不能与其载体分离，只能依附于活生生的人而存在。

（3）收益递增性。人力资本是一种资本，具有递增性，在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会越来越高。可以这样说，人力资本是高增值的资本。

（4）能动性。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人力资本是最能动的因素。劳动者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情况下，能够创造出超过自身价值数倍的经济效益。在一个企业中，人力资本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企业的产出水平与效益，决定企业的兴衰。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从长期对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发现，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促进美国农业生产量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已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1960年，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的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报告中指出，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物质资本和劳动数量的增加，而他认为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的增长的贡献，要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舒尔茨认为，现代化生产条件下当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人力资本大幅度增长的结果。但人力的取得不是无代价的，需要消耗资本投资，只有通过一定方式的投资，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才是一切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资源。对人的投资带来的收益率超过了对其他形态的资本的投资收益率。他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计算方法，所谓人力投资收益率，就是人力投资收益在国民收入增长额中所占的比重。他应用收益率法测算了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资，对美国1929~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其比例高达33%，证明了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贝克尔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以研究微观经济理论而著称。他的著作《人力资本》（1964）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经济思想中人力资本投资革命”的起点，集中反映了他的人力资本的观点。

他的主要观点为：

第一，所有用于增加人的资源并影响其未来货币收入和消费的投资为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人力的投资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教育支出、保健支出、劳动力国内流动的支出或用于

移民入境的支出等形成的人力资本。

第二，人力资本投资有较长的时效性。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即要考虑当前的经济利益，又要考虑未来的经济收益。只有当预期收入的现值大于支出的现值时，人们才会决定做出这项支出。

第三，在职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内容。贝克尔把在职培训分为两种：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所谓一般培训指的是企业提供的培训，使得接受培训的员工所获得的知识、技能，不但对本企业有用，而且对其他企业也是有用的。例如，由军队培养的机械师，其技能不仅在钢铁企业，而且对飞机制造企业都是有用的。这种培训应该由职工自己支付培训费，企业一般不支付这种开支，企业向受过一般培训的雇员支付和其他企业愿意向这些员工支付的相同的工资。特殊培训，又称为专门培训，是指能更大地提高提供培训的企业本身的生产率的培训。接受培训者的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增进之后，对于提供培训的企业之外的其他企业的生产率则很少或没有影响。这种培训为提供培训的企业所专训并为该企业所专用。例如对宇航员的培训，就是典型的特殊培训。特殊培训要求员工自己支付一部分培训费，企业也支付一部分培养费。企业对那些受过特殊培训的雇员支付高于其他企业的工资。受过特殊培训的雇员之所以会得到企业支付培训费用和较高的工资，是因为企业为了减少受过特殊培训雇员的流动性和害怕该雇员离去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损失。由于受过特殊培训的员工能给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和更高的效用，因而使整个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以企业愿意支付较高的工资和部分特殊培训费用。同时，企业也要求员工承担部分培训费用，并受相关契约的约束，以防止员工外流给企业造成损失。

第四，收集信息、情报资料也是人力资本投资内容之一，同样具有经济价值。

第五，唯一决定人力资本投资量的最重要因素是投资收益率，贝克尔把投资限于一个时期，而把收益扩展到其他时期，来计算投资收益率。

第六，提出了“年龄—收入”曲线。他设计的以收入为纵坐标，以年龄为横坐标的区间中，各人从不同的教育程度和年龄作为起始点，当其他因素相同时，一个人的收入水平因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在同年龄组的人口中，一个人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水平也就越高。

第七，用数学计算和实证研究说明教育收益率，同时也比较了不同教育等级之间的收益率差别。贝克尔认为，受较高教育的孩子，未来的收益较多，给父母带来的效用或满足也较大。

人力资本理论对本研究的支撑作用：研究学者肯定了人力资本理论对学生学分制管理问题的积极意义，高职院校学分制管理问题突出，要解决高职院校的老大难问题，还要从根源上来寻找问题的所在。因此，人力资本理论为本研究思考如何选择合适的高职院校学生个

人移动终端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也为下一步如何针对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的改进提供了有效的实践借鉴。

## 2. 文献梳理

### 2.1 关于移动终端的相关研究

移动终端的形式有诸多种，本研究所探讨的移动终端主要是指作为教学工具运用的移动终端。张书波（2022）在其研究中指出，移动终端，又称移动通信终端，是指可以在移动中运用的计算机设备，一般包括便携电脑、多功能终端，甚至车载电脑。邢伟（2017）在其研究中指出，随着网络技术朝着提升宽带容量的方向发展，移动通信行业将进入真实信息时代。而且，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兼容的发展，移动终端的处理能力愈来愈强大，移动终端正在从简单的通信工具向综合信息处理平台转变。这为移动终端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郭昕（2017）在其研究中指出，移动终端的通信方式尤为丰富，可以通过GSM、CDMA、edge、3G等无线网络进行通信，也可以通过WLAN、蓝牙、红外等方式进行通信。冯欣悦，李志聪，姜春茂，丁云鸿 & 刘明宇（2022）在其研究中指出，现代移动终端类似于我们平时运用的个人电脑，其拥有稳定的小型化操作系统，拥有极其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内存以及记忆棒，可以执行复杂的处理任务。王曦（2016）在其研究中指出，目前的移动终端是一种通讯、娱乐、办公一体化的工具，可以包括功能定位、信息处理、指纹扫描、身份证扫描、条码扫描、RFID扫描、IC卡扫描、酒精浓度检测等移动执法。目前，移动终端已成为我们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中密切接触的工具之一，为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生产管理效率、提升执法效率、促进环保节能以及危机应对能力增加了新的途径。近年来，移动终端在中国移动执法以及移动商务中的应用愈来愈多。任捷怡（2012）在其研究中指出，电脑已经成为大众消费品，在数字疯狂的时代，科技已经深度融入人类社会生活。新形势下，科技改变生活，教育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将改变教育。赵慧玲（2009）在其研究中指出，到2025年，全球近90%的用户将运用移动设备连接互联网。事实上，摩根士丹利的研究人员表示，智能移动终端以及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以及通信工具的销量已经超过了传统个人电脑的销量。而几乎50%的初中生以及高中生拥有某种智能移动终端。此外，计算机硬件正在变得更轻、更便携。从研究以及预测的结果中得出了令人惊讶的结论：在未来，教育发展的趋势为，学生运用移动设备访问互联网，将整个世界视为他们的教室。实践表明，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运用移动设备进行学习，提升学习效果。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守护者，学校不再需要关闭手机或平板电脑，而是运用设备创造一个学习环境，让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而不是知识的灌输者。

Zhang（2022）在其研究中指出，基于教学所采用的移动终端，通常被称为教学工具，简称教具，是教师在课堂上运用的教育道具的统称，其主要作用是直观地呈现学生难以理解的



教学内容。Tan (2022) 在其研究中指出, 在教学领域, 移动终端是课堂上极好的教具, 合理运用教具可以将抽象知识转化为具体形象知识, 大大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减轻教师的工作量, 大大提升课堂教学质量。Liu (2021) 在其研究中指出, 除了白板、橡皮擦、粉笔、活动挂图以及模型等基本工具外, 当今教室中流行的教学工具还包括运用新技术制造的计算机、投影仪以及白板。当然, 除了上述有形的硬件设备可以作为教学工具外, 一系列计算机软件也可以作为教学工具, 在教学中发挥关键作用。例如, 在各种教室中广泛运用的幻灯片, 以其灵活性以及便利性迅速赢得了大多数教师的青睐。此外, 教师以及研究人员也在不断研究各种新的教学工具, 现在一系列教师在中学教育计算机科学课程的准备、教学以及评估中运用概念图作为教学工具。Liang (2022) 在其研究中指出, 课堂实践中以教学工具的形式运用概念图, 清楚地展示了概念图的诸多优势: 概念图可以帮助学生优化信息的内部结构、信息在大脑中的存储以及呈现形式, 使知识更清晰, 提升学生的记忆力以及知识加工效率, 通过生动地向教师展示学生的认知过程以及思想发展趋势, 帮助教师成为他们的得力助手, 提升学习效果。Zhao (2018) 在其研究中指出, 基于合作教学活动的移动终端包括PDA、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笔记本等, 可灵活运用或支持教学活动的设计以及实施, 或直接作为随时随地的学习工具, 带给移动学习的便利。

综上所述, 中国外研究人员对运用移动终端作为教育工具支持教育实践进行了大量研究, 并得出结论: 移动终端凭借其移动性以及高效的数据存储以及计算性能, 服务于我们的日常学习以及生活, 能够给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一种更人性化的工具。

## 2.2 关于欧美国家学分制现状的研究

随着人类社会的蓬勃发展, 教育逐渐成为了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学习管理制度, 学分制是19世纪末艾略特在美国哈佛大学首次提出的。他主张“最强者的智力生存”, 学校要充分照顾以及发展每个学生的爱好以及特长, 他的思想为学分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国外, 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 学分制的形态也不同。

(1) 基于美国学分制的相关研究。Fang (2022) 在其研究中指出, 目前, 美国大部分高职院校采用学分制的模式, 然而各学校实施学分制的具体做法存在较大差异, 但其有共同之处, 具有以下特征: ① 采用“集中分布”课程选课形式, 即要求学生从高职院校的职业科目以及普通基础教育领域的必修科目中选择一定的分数。学生在各种选修课上选修按照有关规定开设科目, 使科目可以选择主从, 既保证了课程, 又拓宽了知识的视野。② 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科目不分院系, 均为必修科目, 约占总科目的60%学分, 这是美国通识教育的优秀成果, 有利于跨学科以及横向联系。

(2) 日本学分制研究。基于学分制, 日本高职教育最初完全照搬美国模式, 然而在上世



纪中叶开始有自身的特色。学分制研究主要关注如何将学年制与学分制相结合，扩大课程范围，通过设置课程提升学生的初等教育水平。同时，日本也尤为重视中国教育的交换。Chi（2022）在其研究中指出，日本的学分制克服了美国学分制的一系列弊端，对课时以及讲课次数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无论通过什么科目，都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获得学分。可以看到，日本的学分制比较系统严谨，管理比较严格，然而也存在不够灵活的弊端。Wang（2018）在其研究中指出，就未来发展而言，学分制主要呈现以下趋势：① 强调基础广泛，通识教育专业趋于增加。学分制应当体现高职院校基础知识的重要性，增加通识教育科目有助于解决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是保证学分制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② 添加选择的项目以增加灵活性。学分制是在选修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新学科的不断涌现，不同国家的高职院校开设了大量的选修课，选修课的范围也愈来愈广，更宽的。事实上，学分制以及学年各有利弊。虽然全学分制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是学习自由的综合体现，然而教育工作者发现，全学分制也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通过解决某些因素来解决。

此外，世界各地的教育理论家已经充分认识到，假设学分制给予学生很大的学习自由，如果没有支持性的本科导师制度，那将是基于学生自身的知识以及判断，从而可以引导针对知识结构混乱、碎片化、分散等问题，不少学者认为有必要实行学分制以及导师制的有机结合，以提升教育教学的有效性，强化校际合作，实施学分交换制度。校内外不同高职院校的学科选择，已成为学分制的重要特征。同时，也存在不同教育阶段合理组合的问题。这就需要迫切的互认点，这不仅是保证学分制的有效实施，也是提升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充分发挥教育资源潜力的一项重要活动。

### 2.3 有关中国高职院校学分制改革制约因素的研究

基于高职院校实施学分制改革的制约因素已有诸多探讨，多数学者认为，高职院校实施学分制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对学分制在意识形态上的认识不清；实施学分制改革的积极性不高，甚至持否定态度等等。基于比较学分制与学年制的区别，张虹（2023）对学分制的实施进行了深入分析，将制约因素归纳为受传统教育观念以及教育观念的束缚，学年制违背教育传统运用教师教育意识形态，校长不愿面对诸多客观复杂的问题，打破传统思想观念，采取观望态度：高职院校不完全根据社会需要自主创校招生，学分制改革与高职院校实施学分制的经费以及教学条件仍然不足。徐先武（2023）通过对武汉高职院校学分制改革的详细实地考察，确定了学分制改革对中国高职院校的各种影响，并从环境、组织以及个人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中国高职院校学分制改革的因素。调查结果表明，其中一系列阻力因素在短期内可能难以克服，然而这不应当成为我们拒绝改革的借口，我们要正确认识改革的重要性，在研究分析改革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持续参与理性驱动改革，逐步消除阻力因素，不断完善中国高职院校学分制。薛涛（

2023)认为, 制约中国高职院校学分制实施的主要因素如下: 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思想观念滞后; 高职院校收费政策、学籍管理制度、就业政策等相关政策改革缓慢; 课程设置不灵活、课程设置不合理、择业要求严格、教师难以满足需要; 学生自主性不足等, 是学分制实施的障碍。

#### 2.4 研究述评

综上, 各国学者对移动终端和学分制管理这两个因素进行了研究, 同时也进行了移动终端、学分制管理相关的研究, 较好完善了研究的理论知识, 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但是基于个人移动终端下中国高职院校学分制管理的可供参考的文献较少, 实证研究更少, 需要开展更多的实证研究。此外, 探讨高职院校个人移动终端对学分制管理的影响中, 将学生移动终端作为中介的研究非常匮乏, 将中国高职院校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然而高职院校学生作为中国大学生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不能被忽视的, 他们的学分管能力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所以本研究是基于中国高职院校学生为研究对象, 讨论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个人移动终端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 探究个人移动终端的作用和影响, 希望能在该课题领域中提出建设性的对策, 以提高中国高职院校学生的自我管理综合能力, 进一步提升就业水平和质量。

### 研究方法

本研究立足探究个人移动终端下中国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剖析, 结合存在问题所产生原因的讨论分析, 提出优化提升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能力的有效策略。在本章中主要阐述研究方法与设计。本章节共分为三小节, 第一节为研究假设, 第二节为研究思路, 第三节为研究方法。各小节分述如下。

#### 1. 研究假设

学生自我学分制管理能力的形成绝非偶然。社会心理学认为, 人的行为不是单纯由人的本能、人的需要和动机等决定的, 也不是单纯由外界环境力量机械决定, 而是由个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决定, 并且随着人的心理意识与环境这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LEWIN, 1947)。根据当前关于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能力、个人移动终端的理论模型和相关研究, 个人移动终端作为调节变量是否能够调节中国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能力, 中国高职院校的学分制管理主要涉及课程管理、部门管理和更新管理。综上, 特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 中国高职院校学生个人移动终端对学分课程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2: 中国高职院校学分制管理对学校课程管理和部门管理具有显著正向相关影响。

假设3: 中国高职院校学生个人移动终端对学分制管理能力具有正向、显著的影响。

#### 2. 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

研究对象的选取在调查中发现南宁市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省会城市，所拥有的高职院校都比较齐全，学科特色较为突出，拥有全国首批百所高职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以及多所产教融合发展工程项目单位，能够充分代表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水平。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为了更好的满足本次研究的目的和要求，在对上述高校进行实际情况了解和特点分析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到时间和空间原因，对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选取了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四所高等职业院校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四所学校的学分制统计情况如下表1。以定性的角度分析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的特点以及分析个人移动终端下学生学分制管理的实际情况。

**表1:** 四所高职院校学生课内教育总学分及其构成

专业类别	公共课	学科基础课	学科专业课	必修环节		毕业最低总学分
理工类	7学分	≥11学分	≥9 学分	学科活动 1学分	实践环节 1学分	28
经、管、哲、法、艺 类	7学分	≥11学分	≥15学分	1学分	1学分	34

资料来源：四所高职院校《学生培养方案总则》

针对调查对象的特殊性，将采取问卷调查法进行调研，参考不同文献，自编《广西壮族自治区四所高职院校管理者学分制管理调查问卷》，根据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以此提高个人移动终端下中国高职院校的学分制管理，为今后高职院校的发展提供帮助。

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广西壮族自治区四所高职院校管理者学分制管理调查问卷》共有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级、专业和高职院校管理者学分制管理量表。所编制的调查问卷参考禹常胜编制的《云南省四所高校硕士研究生学分制管理调查问卷》进行编制。本问卷将参考其维度，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为课程管理、部门管理和更新管理，二级指标分别对应教师、学生、管理者、管理部门四个维度的指标。该表采用李克特五级评分法，“1”、“2”、“3”、“4”、“5”分别对应的是“非常不符”、“比较不符”、“一般”、“比较符合”、“非常符合”。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笔者通过对上述四所高职院校学分制相关学生、管理人员或部门的调查所获得的，主要采用网络邮箱，网络问卷填写的形式采集而成，样本基本覆盖在研究范围内的四所高职院校的学生和学分制管理工作相关单位和人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四所高职院校管理者学分制管理调查问卷》计划在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四所高等职业院校随机发放问卷500份。

###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统计分析法三种方式结合来开展实证研究，通过参考国内外目前对于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个人移动终端以及两个因素的相关研究，根据实际情况和研究目的，制定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问卷，在力求调查结果的客观性，挖掘分析综合的深入性。

#### 3.3.1 文献法

本文中的文献研究主要围绕“基于个人移动终端中国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实证研究”这一主题，查阅并收集整理各国论文、期刊、专著等的相关文献资料，从而及时、准确地把握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为保证文献资料收集的科学与连贯性，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了文献研究：

一是资料收集方面。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作为文献资料收集的主要来源，在研究初期针对本研究相关主题内容进行资料的搜寻与整理。在中文文献收集的过程中，对“个人移动终端”、“学分制管理”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进行基础资料的收集，外文文献主要从文献资料中学习借鉴和引用。

二是文献资料鉴别方面。对前一阶段收集的文献资料进行大量阅读，对收集到的资料按研究的相关度进行分类，对研究内容不完整、研究观点不明确、研究内容不相符的资料进行剔除，将与本研究结合度较高的文献进行分类存储，有助于下个阶段的文献借鉴引用。

三是观点加工和文献补充方面。在这一阶段，主要对已分类的文献资料进行二次研读，对各学者的研究观点进行交叉比对和分析引用。同时，结合当下研究继续补充完善文献资料。

本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法，理清了主要变量的定义、结构和相关的影响因素，加深了对研究主题的认识，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 3.3.2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探究中国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能力的现状，了解中国高职院校学生个人移动终端对学生学分制管理能力的影响，以便进一步提出解决目前中国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能力存在问题的对策。

在实际调研中，主要采用问卷星的形式进行网络调查和数据收集，从而获得第一手数据，据此分析中国高职院校学生的移动终端和学分制管理的真实状态和存在问题，为接下来探究个人移动终端与学分制管理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提出中国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能力提升的建议对策提供更为客观和可操作的数据支持。

问卷由两个部分构成，《广西壮族自治区四所高职院校管理者学分制管理调查问卷》是在对个人移动终端构架进行分析基础之上构建的学生学分制管理的问题调查。本次调查问卷



内容详实，调查对象针对性较强，受调查者普遍具备代表性，调查及可信度较好。

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Cronbach's  $\alpha$  法来检验问卷的信度，当Cronbach's  $\alpha$  大于0.9时，则说明问卷的信度能够充分接受；当0.7大于Cronbach's  $\alpha$  小于0.9，表示量表的信度等级为中；当0.6大于Cronbach's  $\alpha$  小于0.7，表示量表的信度在可信范围内，如果量表的信度系数在小于0.6，则说明量表的信任度处于低水平。本研究的信度系数分析结果如下：

**表2：信度分析检验结果**

潜变量	测量项数	Cronbach's $\alpha$	总体 Cronbach's $\alpha$
结果	3	0.859	0.939
课程管理	3	0.925	
部门管理	3	0.913	
更新管理	2	0.868	

从上表可以发现，各个潜变量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均在0.7以上，总体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39，说明问卷的各个变量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表明了本研究测量量表的信度是符合实证要求的，为本文后续研究结果的有效性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进行效度检验，检验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因子的贡献率越大，说明问卷设计的问题对该潜在变量的重要性越大，一般认为大于 50%比较好。

**表3：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

潜变量	方差贡献率
结果	78.290
课程管理	87.256
部门管理	85.216
更新管理	88.371

从上表可以发现，各个测量变量对潜变量的贡献均在50%以上，认为本研究的各变量的结构效度较好，符合实证分析的要求。

### 3.2.3 数据分析方法

根据研究目的，调查对象主要选取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四所高等职业院校。为了避免调查对象的局限性，在4所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中随机进行调查问卷的发放，回收问卷500份，问卷回收效率为100%，保证了调查样本的多样性和调查数据的科学性。

本研究将回收的问卷的所有数据通过 Excel软件进行整理，通过SPSS26.0 软件进行数据的整理和分析，首先对样本数据的信效度进行检验分析，然后对调查对象的背景变量进行描



述性统计和差异检验，对两个主要变量进行差异性分析；接下来进行相关性分析；在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对两个主要变量进行两两间的回归分析来检验“因果关系”；最后探究中国高职院校学生是否通过个人移动终端对学分制管理能力产生影响，即对个人移动终端的影响作用进行检验。

本研究将以客观、准确、公正、科学为基本原则对研究数据进行处理，严格保证整个研究过程的缜密性和科学性，从而使得本研究的成果符合实际情况并具有创新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保证本研究的成功。

## 研究结果

本章主要对基于个人移动终端下中国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问卷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首先对研究数据进行描述分析，接着对各个背景变量进行差异分析、各变量间两两相关分析等，以此对基于个人移动终端下中国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实证检验。

### 1 研究数据描述分析

#### 1.1 基于个人移动终端下中国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现状分析

##### 基本信息

在学校基本信息方面，主要对学校学生个人信息的性别、年级、专业等三方面进行调查。学生性别方面，40.4%为男生，59.6%为女生，男女比例适当，这与当前本校男女比例大体一致。学生所在年级方面，高职学制一般为3年，其中，一年级学生所占比例为33%，二年级学生所占比例为28%，三年级学生所占比例为39%。学生所学专业方面，本次调查涵6个专业，被调查的各专业学生所占比例，如下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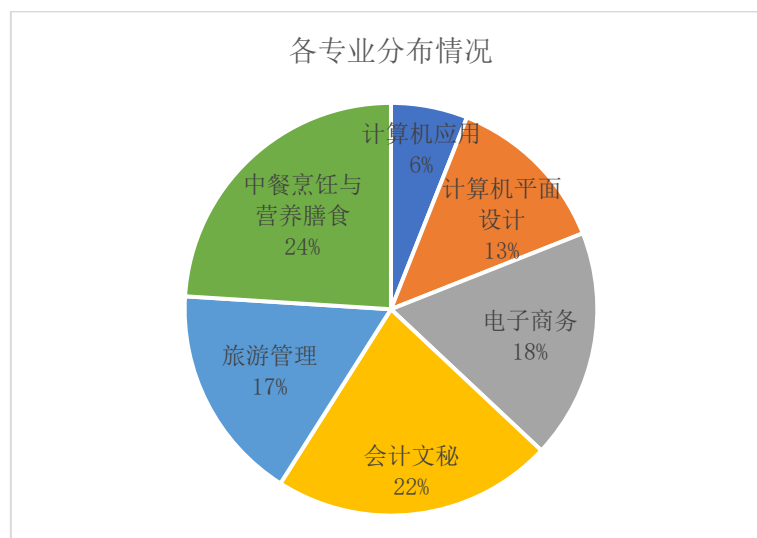


图1：各专业分布情况

管理工作难度增大

由于教学管理软件不是很理想，以及高职院校学生移动终端参与学分制管理，就导致了教学工作难度增加，在对广西壮族自治区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调查问卷进行分析时，发现目前学生管理工作和教学管理工作难度都有所增加，表4、表5所示：

**表4：学生管理工作难度分析**

实施学分制后，学生的管理工作难度	百分比
增加很大	16%
有所增加	55.7%
和原来一样	28.3%

**表5：教学管理工作难度**

实施学分制后，教学管理工作难度	百分比
增加很大	19.6%
有所增加	46%
和原来一样	34.4%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所提高

实施学分制，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都有所提高。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高职院校个人移动终端学生学分制管理调查问卷的11、12题结果显示，59.4%的教师认为在实施学分制的过程中开设的一系列的选修课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通过调查问卷分析，如表6，发现个人移动终端学生学分制管理的实施不同程度的提高了学生课堂互动学习的积极性，约95.7%的学生认为学分制的实施充分发挥了自己学习的主动性，帮助自己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63.8%的学生也赞同学分制调动了自己学习的积极性，激发了自身的潜能。

**表6：实行个人移动终端学分制管理后，学生课堂学习积极性调查**

实施个人移动终端学分制管理对学生课堂互动积极性的影响	百分比
有很大程度提高	10%
有一些提高	70%
没有提高	20%

管理部门实施较健全

根据问卷的描述性数据，8个内因变量的均值在2.99-3.41之间，其中Y5（高职院校学分制管理部门能够与教师、学生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并与学生就业市场优秀企业保持合作）的均值最低为2.99，Y3（有专门的高职院校学分制管理部门对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相关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处理并及时做出反应）最高为3.41。各个潜变量的均值详见表7：

**表7：潜变量均值**

潜变量	编号	测量变量	平均值	均值
课程管理	Y1	课程管理1	3.31	3.37
	Y2	课程管理2	3.40	
	Y3	课程管理3	3.41	
部门管理	Y4	部门管理 1	2.99	3.04
	Y5	部门管理 2	3.05	
	Y6	部门管理 3	3.10	
更新管理	Y7	更新管理 1	3.07	3.18
	Y8	更新管理 2	3.28	

### 1.2 年级对个人移动终端参与学分制管理的差异分析

单向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三个年级“在个人移动终端学分制管理中对课程选择的设置”有显著的差异，其差异表现为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差异 $P=0.025$ ， $P \leq 0.05$ （见表8），其他年级没有差异。结果说明高职院校开展选修课程，二年级以上学生拓宽了知识面。

**表8：个人移动终端学分制与年级差异的相关分析 ( $P \leq 0.05$ )**

问题	显著性	两两年级的差异性		
对于学生学分制管理，对个人移动终端设置，你的态度是	0.025	一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三年级
		0.681	0.138	0.025

### 1.3 性别对个人移动终端参与学分制管理的差异分析

独立样本T检验统计结果显示（见表9）性别对个人移动终端参与学分制管理有显著差异 ( $P \leq 0.018$ ,  $P \leq 0.05$ )。男生对个人移动终端参与学分制管理不接受程度明显高于女生，学习积极性不高；而女生的接受能力较强、注意力集中。

**表9：性别对个人移动终端参与学生学分制管理的差异分析结果 ( $P \leq 0.05$ )**

问题	t-值	显著性	男		女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对于学生学分制管理，对个人移动终端设置，你的态度是	0.025	0.018	3.38	1.135	2.78	1.143

## 2. 研究数据相关分析

相关性分析显示，个人移动终端与学分课程管理关系呈正相关 ( $r=0.437$ ,  $p < 0.05$ )、个人移动终端与部门管理关系呈正相关 ( $r=0.289$ ,  $p < 0.05$ )、个人移动终端与更新管理关

系呈正相关 ( $r=0.310, p<0.05$ )。

**表10:** 个人移动终端与学分制管理相关性分析

项目	持续在做并及时更进	落实频率较高	有落实但在初期	刚开始做	暂未开始
课程管理1	0.437*	0.289*	0.310*	-0.067	-0.281*
课程管理2	0.391*	0.213**	0.318*	-0.026	-0.287*
课程管理3	0.297*	0.249*	0.268*	-0.031	-0.298*
部门管理 1	0.357*	0.218**	0.259*	-0.018	-0.261*
部门管理 2	0.563*	0.312*	0.298*	-0.089	-0.361*
部门管理 3	0.518*	0.273*	0.261*	-0.124	-0.237*
更新管理 1	0.318*	0.265*	0.329*	-0.069	-0.274*
更新管理 2	0.451*	0.248*	0.295*	-0.073	-0.241*

备注: \* $p < 0.05$ , \*\* $p < 0.01$

## 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探究个人移动终端下中国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剖析，结合存在问题所产生原因的讨论分析，提出优化提升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能力的有效策略。本章列出研究结果，并与相关文献进行讨论后提出相应的研究建议。本章共分为三节，第一节研究结论和讨论；第二节研究建议；第三节研究局限与展望。

### 1. 研究结论

我们的研究探讨了个人移动终端对中国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实证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获得四点稳健的结论。一是个人移动终端参与到中国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中国高职院校学生个人移动终端对学分课程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中国高职院校男女性别中对待个人移动终端参与学生学分制管理有较大差异，女性更具有包容性和专注力；三是中国高职院校学分制管理对学校课程管理和部门管理具有显著正向相关影响；四是中国高职院校学生学分制管理能力与个人移动终端具有双向显著正相关。

### 2. 建议

#### 2.1 行政领导为核心加强对个人移动终端学分制的宣传宣贯工作

学分制从推行到管理和实施阶段，高校行政领导和行政管理人员需要在自身充分学习和了解学分制的基础上，通过会议、讲座、培训等形式向学生、专业任课老师、高校后勤人员宣贯学分制的目标以及优势，明确具体的事项和操作要求。同时要让大家知道一个体制的转变时间是漫长的，所以在个人移动终端学分制的推行阶段要耐住性子，不能够急于求成。同时高校行政领导还应带领大家善于发现在学分制日常管理过程中所遇见的问题和弊端，以便能够及

时完善高职院校学分制。有条件的高职院校还可以制作个人移动终端学分制相关的手册以及选课指南加以宣传，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个人移动终端学分制管理的内涵，在后期选课的过程当中对选修课程以及任课教师的基本信息能够及时掌握，避免盲目选择的情况。

## 2.2 学术领导为核心进一步革新教育及学术观念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是不断变化的过程，想要顺利推行学分制管理，做到与时俱进，这不但要求高职院校党政领导，完成对于高职院校学分制管理的基本宣贯工作，同时还需要学术领导和学术带头人以及各个教研室共同努力，对教育思想的转变和教育观念的革新。个人移动终端下学生学分制管理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也是全方位深化教育的系统工程，需要学术部门狠下决心，把学分制管理工作当做高职院校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来抓，有计划有节奏的来对学生学分制管理工作重新认识。因此学术领导为核心带领各个教研室的学术人员，加强对学分制的认识、观念的转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切入：（1）教学目标观的转变：如今的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更偏向于对创新能力、人文素养能力的考察，因此对于以往传统式的追求高分和单一技能的培养目标模式需要转变；（2）教师与学生主体的转变：传统的教学过程，往往都是教师做为课堂的主体来对学生进行知识的灌输，在高职院校学分制管理当中应该将主体转变到学生身上，以学生为中心；（3）课程观的转变：高职院校学分制下的课程是以选修课作为支撑的，因此要将以往固定的上课内容和模式进行转变；（4）素质观的转变：学分制教学管理模式下要求对教师的专业素质有所提高，不但能够开出必修的专业课，同时也能够开出知识面更广的选修课，另一方面引导学生培养自我学习能力，从传统的“被动式”“推动式”学习转变为自主学习。

## 2.3 高职院校坚持学分制管理的战略部署的导向作用

高职院校学分制管理作为一种教学管理方式，需要努力以国家相关战略作为导向，不断改革与完善。在党中央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对高校发展的的新理念，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一国家战略的提出便要求对我国目前的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方式有了更进一步的要求。随后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深化教学改革，推进和完善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促进文理交融，因此高校在实施研究生学分制管理时建议在对当地高职院校学生教学管理研究的基础上积极设置创新创业学分，侧重创新创业教育在职业教育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为国家战略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促进我国由目前的人才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一项优秀而卓越的高职院校学分制管理是必须能够满足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人才需求。例如“一带一路”战略作为我国重大战略决策，无论从最开始的战略蓝图构想的理论问题，还是在实施中所推进的实践问题都离不开人才的支撑。特别是像广西壮族自治区这样位于我国的边疆地区省市作为参与“一带一路”的重要省



份，当地高校的人才培养方式和管理方式是否合理都对战略的实施和推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学分制管理作为高职院校学生管理主要方式之一，应该主动以国家战略作为导向，将高职院校学分制管理的实施过程中积极与战略相关政策相呼应，以培养国际性人才为目标不断更新观念、完善研究生学分制管理制度，充分保障高职院校教育质量以及人才的时效性与适应性，承担人才输出的重要职责。

#### 2.4 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首先，做好新生入学教育工作，培养良好学习习惯。新生往往在入学时需要一定时间的适应期，那么高校可以把握好这一关键时期，在这段时间对新生展开相关的教育工作，例如：座谈会、主题班会、谈心谈话等。引导学生制定生活计划书，合理安排好学习时间，帮助在校大学生了解学分制相关选课和考试制度，放眼于未来，不断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其次，重视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学习氛围。学分制的管理过程中离不开良好校园文化的保障，因此高职院校应该努力营造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鼓励学生参与和创建有意义的社团活动，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另一方面，学风的建设好坏是直接影响到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的重要因素，高职院校应当定期制定学风建设相关活动，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结果进行相应考察。最后，设置学分奖励制度，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能够帮助学生弘扬个性，发挥自身特点，提高综合素质，促进全面发展是实行学分制管理的主要优势。我国高职院校应该在符合自身校情的基础上，设置学分奖励机制，鼓励学生参与有意义的课外活动（论文、发明、著作等）并将所获奖项转化为一定的学分。上述在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内四所高职院校学生的调查中，大多数同学还是支持将有含金量的课外活动成果转化为学分，以此来体现学分制的优势。同时也能够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因此设置学分制奖励制度，是一项促进学分制管理顺利进行的重要措施。

### 3. 研究局限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随机抽样，有可能所抽样的样本无法代表所研究的母体，这时研究则会产生与统计或选择性偏差相关的问题。其次，问卷问题的设计不够严谨，有些问题未涉及到，而有的问题存在重复折叠的情况。未来对于该研究，需增加调查对象的类型和数量，对更多种类和数量的人进行问卷调查，使调研结果更准确更全面。问卷的设计应该考虑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因素，尽量对问卷进行多次实验调查，不断完善和修改，使每一个问题都有价值。

### 参考文献

- Badri, M. A., & Abdulla, M. H. (2004). Awards of excellence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n AHP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18(4), 224-242.

- Belogianni, I., Anagnostou, G., Papadogeorgaki, E., & Belogiannis, K. (2019). Point of care test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quality control system. *Clinica Chimica Acta*, 493, S643-S644.
- Brown, A., Sreenan, S., & McGarvey, A. (2019). Closing the gap: a transatlantic collaboration to foster quality improvement training in graduate entry medical students using applications of Qi methodologies to medical education. *BMJ Open Quality*, 8(3), e000610.
- Brubacher, J. (2017). 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History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outledge.
- Cheyney, M. (1937). Humanism. in E. R. Seligman (Ed.).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V). New York, NY: Macmillan, 541.
- Chi, C., Liu, G.P., & Hu, W. (2022).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mobile terminal cloud supervisory control platform for networked control system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44(5), 1070-1080.
- Elias, J.L., & Merriam, S.B. (2005).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adult education*. Malabar, FL.
- Fang, N., Qiu, L., Zhang, S., Wang, Z., Gu, Y., & Hu, K. (2022). The rapid construction method of human body model for virtual try-on on mobile terminal based on MDD-Net. *Soft Computing*, 26(22), 12023-12039.
- Good, C.V., & Merkel, W.R. (1973). *Dictionary of education*. McGraw-Hill.
- Kumar, R., Khandelwal, S., Upadhyay, P., & Pulipaka, S. (2019). Global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using variable sampling time and pv curve region shifting technique along with incremental conductance for partially shaded photovoltaic systems. *Solar Energy*, 189, 151-178.
- Lamont, C. (1990). *The Philosophy of Humanism*. New York, NY: Continuum, 12.
- Levine, A. (1978). *Handbook on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Jossey Bass, P16 -167, P251.
- Liang, T., Shi, S., Tao, Y., & Zhang, B. (2022, July). Research on deep learning model design technology of mobile terminal. In *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 (Vol. 2303, No. 1, p. 012031). IOP Publishing.
- Liu, J. (2021). Research on Nonline-of-Sight Positioning Method of Intelligent Mobile Terminal Based on Intelligent Monitoring Architecture of Multimedia Sensor Network. *Advances in Multimedia*, 2021, 1-9.
- Lucas, C. (1994). Humanism. in J. Chambliss (Ed.).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n Encyclopedia*. Oxford, UK, Elsevier Science Ltd. 285.
- Mitra Debnath, R., & Shankar, R. (2012). Improving service quality in technical education: use of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Quality Assurance in Education*, 20(4), 387-407.
- Palani Natha Raja, M., Deshmukh, S.G., & Wadhwa, S. (2007). Quality award dimensions: a strategic instrument for measuring health service qu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Care Quality Assurance*, 20(5), 363-378.

- Reese, C.W. (1945). *The meaning of humanism*.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1.
- Rowntree, D. (1982). *A Dictionary of Education*. Noble books, New jersey.
- Smith, D.L. (1992). Validity of faculty judgments of student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des and credits earned and external criterion measures.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63(3), 329-340.
- Tammaru, T. (2012). Excellence models and national quality promotion in Estonia. *Proceedings of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Tan, Y. (2022). Application Research on Face Image Evaluation Algorithm of Deep Learning Mobile Terminal for Student Check-In Management.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Neuroscience*, 2022.
- 鲍德里奇. (2005). *国家质量奖案例研究*.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国质量协会卓越国际质量研究中心编译, 2005.
- 曹十芙. (2006). *学分制下本科生导师制的研究*. 湖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长沙: 湖南农业大学.
- 陈起行. (2000). 资讯隐私权法理探讨——以美国法为中心. *政大法律评论*, (64): 297-341.
- 陈珍国. (2008). *学校安全管理*.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戴克林. (2009). 新建本科院校学分制教学管理机制的构建.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9, 26(03): 357-360.
- 范江真微. (2010). 政府信息公开与个人隐私之保护. *法令月刊*, 52: 12-45.
- 付静. (2023). 大数据时代构建高职院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探析.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05), 173-175.
- 高富平译. (2013). *统一数据保护条例(GDPR)*.
- 郭昕. (2017). “互联网+”时代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6), 18-22.
- 国务院. (2012). 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制订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的意见. *教职成厅*(2012) 5号, 2012(2): 12-17.
- 国务院. (2017).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十三五”规划的通知. *国发*[2017] 4号, 2017: 1-19.
- 赫尔曼·哈肯. (2005). *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胡静 & 杜朝仙. (2023). 高职院校“三师素质”教师队伍建设的内涵及策略. *西部素质教育* (06), 113-116.
- 黄艳雁. (2023). “5G时代”高职院校思创融合实践探索. *数字技术与应用* (02), 146-149.
- 李海胜, 王英杰 & 张明真. (2023). 智能时代高职学生人工智能素养框架研究. *西部素质教育* (06), 89-92+181.

- 李剑萍. (2023). 高等职业教育“三融”改革的实践难题与发展逻辑. *教育研究*. 2023年03期.
- 李卫红. (2011). 基于卓越绩效评价准则的制造业质量竞争力评价. *科技管理研究* 31(22): 44-47.
- 李志聪, 姜春茂, 丁云鸿 & 刘明宇. (2022). 基于OBE的“移动终端软件开发技术”课程改革. *科技与创新* (19), 107-110.
- 宋娅菲, 常玲霞 & 石秀君. (2022). 移动互联网络安全技术之分析与展望. *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 (05), 85-86.
- 俞文钊. (2004). *管理心理学*.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 邹文弢. (2004). *中小学安全管理研究初探*. 教育硕士学位论文, 江西师范大学.

**广西高校学生安全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LLEGE STUDENTS'  
SAFETY MANAGEMENT IN GUANGXI****曾维云<sup>1\*</sup>****Weiyun Zeng<sup>1\*</sup>**<sup>1</sup> 南宁师范大学<sup>1</sup>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zengweiyun2021@163.com

**摘要:** 本研究基于公共安全管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以及马斯洛需求理论探讨高校安全教育与学生安全意识之间的关系。以中国广西8所高校共72名学生为样本进行数据采集,采用SPSS26.0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1.高校安全教育的理念对学生安全意识的情感层面、意志层面有正向、显著、较大的相关关系;2.高校安全的内容和平台对学生安全意识的知识层面有正向、显著、较大的相关关系;3.高校安全教育的阵地对学生安全意识的行为层面有正向、显著、较大的相关关系。由此,建议广西高校进一步加强高校安全教育的开展,创新安全教育的理念优化安全教育内容,拓展安全教育平台,拓宽安全教育阵地。

**关键词:** 广西高校学生, 安全管理, 大学生安全意识, 高校安全教育。

**Abstract:** Based on public safety management theor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ory and Maslow's demand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afety education and students' safety awareness. A total of 72 students from 8 universities in Guangxi, China were selected as samples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SPSS26.0 was used for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oncept of safety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positive, significant and great correlation with the emotional and volitional levels of students' safety awareness; 2. The content and platform of college safety have positive, significant and great correlation to the knowledge level of students' safety awareness; 3. The position of college safety education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t and great correlation with the behavioral level of students' safety awareness.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Guangxi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afety education and innovate the concept of safety education. Optimize the content of safety education, expand the safety education platform, and broaden the safety education position.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xi, Safety Management, Safety Conscious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College Safety Education

## 引言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人才是国家发展的第一资源，因此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国家发展提供更多高质量的人才就成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在各级教育系统中，高等教育能为国家发展直接提供人才，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输送大量高质量人才。然而，高等学校近年来安全事故频频发生，各大新闻媒体多次报道高校食物中毒、校园暴力、偷盗诈骗、等安全事故。为学生、高校以及家庭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削弱了国家现代化发展需要的高质量人才培养。安全是整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基础，近年来，在国家范围的安全问题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安全在哪个领域都是需要的，尤其对于培养高质量人才和发展科学知识的高等学校，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国家政策的背景下，加强高校安全管理也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一部分，同时高校安全管理问题也关系着高质量人才的培养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

## 研究目的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就广西高校安全教育对学生安全意识的影响进行探究，通过实证研究高校安全教育对学生安全意识的影响，对广西高校安全教育的理念、内容、平台、阵地以及学生的安全意识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寻找广西高校安全教育出现的问题，并以此位居寻求有效提升广西高校安全教育和学生安全意识的策略和建议：

(1) 了解广西高校安全教育的现状，剖析广西高校安全教育的理念、内容、平台和阵地，进一步探究提升广西高校安全教育的有效策略。

(2) 了解广西高校学生的安全意识现状，剖析表现学生安全意识的知识、情感、意志和行为，探究如何提高学生安全意识。

(3) 了解高校安全教育与学生安全意识的现状，分析高校安全教育与学生安全意识的关系，进而有针对性提出高校安全教育改进的措施和提高学生安全意识的方法。

## 文献综述

通过阅读文献，将高校安全管理的相关研究成果和主要理论进行归纳和呈现，共分为三小节，第一节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公共安全管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和马斯洛需求理论第二节为文献梳理，包含高校安全管理和高校安全教育和学生安全意识等研究主题，第

三节为研究述评，兹分述如下。

## 1. 理论基础

### 1.1 公共安全管理理论

公共安全理论在西方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历了200年的发展，该理论的内涵不断的丰富。美国学者Smith（2002）认为美国的公共安全管理机制主要有四个层面，分别是国家层面、社会层面、经济层面、道德层面，即国家对于公共安全的总体规划、社会安全管理的配套机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安全管理、公民个人的道德约束。到21世纪之后，公共安全管理理论被引入吴超（2021）教授指出公共安全管理可归纳为国家安全管理组织或部门在有关法规范围内，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工作及设施采取的安全管理活动。公共安全管理理论要求管理主体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依靠科技提升安全水平的科学观、发展先进安全文化战略的教育观、实施各种防灾减灾事业的实践观，以及主动积极寻求安全科学的指导。公共安全管理的原则是科学决策、科学管理、科学防范、科学处置以及科学教育。

公共安全管理包含的内涵丰富，但是不管是哪国的学者都将公共安全的管理主体定义为国家，而公共安全所面对的群体是公众。大学生安全管理则不同于公共安全管理，大学生安全管理的主体可以是学校也可以即是学校又是学生，大学生安全管理的群体主要是学生。学生也是公众的一部分，因此公共安全管理理论对于本研究有着指导意义。

### 1.2 马斯洛需求理论

1943年，亚伯拉罕·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中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从低到高依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可以从以下三个阶段来阐释：  
初级阶段：首先，生理需求能够保证人们正常生活，是人们活下去的基本保障；其次，安全需求能保证人们免受疾苦和胁迫，能够保证人们身体和心理上的安全。人们需要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以便消除恐惧和焦虑。  
中级阶段：首先，社交需求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人们渴望爱与被爱，希望同他人之间保持持久亲密的情感；二是个人更够从群体中找到归属感，能够参与到组织的工作中；其次，尊重需求是指自身能够获得人们的认可，从而对生活充满信心，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社会，感受到生命的乐趣和意义。  
高级阶段：自我实现需求是指人们想要冲破目前的安逸状态，不再忽视自我的创造力，不断积极工作以期能够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意义，并从中获得快乐和满足感。这类需求包括道德、创造力、公正度等品质，贯穿于人们生存的各个方面，并鼓励人们探索新的需求。（李辉,2021）现代社会能够给人们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当大学生对第一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时，就会产生对第二层次的需要。近几年高校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对校园内的大学生的安全产生了威胁。马斯洛强调，只有通过和谐友善的交流氛围才能帮助对方唤起内心深处的需要，比如管理人员对于学生的态度，可以使学生直观感。

在对大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时，要了解学生的基本需求，管理者要采用先进的管理经验，合理设置管理手段，帮助学生认识情绪上的变化。高校要尊重学生的心理需求增强管理者的服务意识，强调细节的重要性，帮助学生逐步满足第二层次的需求，以期让学生体会到安全的重要性。

## 2. 文献梳理

国内外的研究者对于高校管理的研究非常丰富，主要从高校安全管理、安全教育和学生的安全意识等方面来进行研究。

### 2.1 高校安全管理相关研究

关于安全管理的研究，研究者们从制度、组织、规章制度、高校安全预警模式、问题及对策、安全体系建构、安全管理技术等方面来研究。

Booker Jr (2014) 从安全管理的计划视角来探讨，认为机构和部门制定灵活的危机计划，管理者应该了解他们在危机期间的角色，部门应该努力不断学习为危机事件做准备。陈蓉 (2015) 分析高校安全管理制度产生路径依赖的原因可以从技术变迁、制度变迁以及前两者综合的原因来考虑，提出建构安全管理制度的路劲发展方向：加大高校突发事件信息的透明度；加强高校与社区写作/信息共享；高校调研中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互相补充；加强演习培训课程。赵丽丽 (2020) 提出高校组织结构调整的路径：以信息安全为中心的安全网络防控型组织构建；基于帕累托改进的组织优势：一是组织结构的调整，二是专业化组织力量建设，三是构建防控组织优化的长效机制。吴琦 (2015) 提出高校学生人身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改进的策略有确保规章制度的三个原则合法性、法律保留原则、公平合理原则；完善申诉制度、借鉴“无诉讼校区”模式。周立新 (2006) 探讨了高校校园安全存在的问题有大学生心理问题带来的安全问题、大学生犯罪方面的问题、一些罪犯蓄意在高校犯罪恶化校园安全、学生的饮食住宿交通安全问题，解决高校校园安全问题的对策有提高全民族的安全素质，树立“安全第一”观念，规范安全行为；推进校园安全立法，校园安全应依法整治；加强高校校园安全文化建设。

孙波等 (2017) 认为在日常的安全管理中，高校一般通过法律规章来约束学生的行为及活动范围，但是由于信息化的发展，与学生安全相关的法律规章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宿舍管理和门禁管理是最普遍的管理方式，但是这两种管理方式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局限性，并不能被学生普遍接受。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部分高校会改造老化的基础设施，将宿舍开放式阳台改装成封闭式阳台，为避免宿舍环境的拥挤，居住人数由原来的八人间改为六人间或者四人间，以此做好学生公寓的安全管理工作。近几年不少高校为避免人流拥挤，一般采取错峰期上下课，以此来避免踩踏事件的发生。

刘建杰 (2020) 表示高校安全管理忽视学生的感受，过度追求管理效果和社会效益；

由于制度缺失，导致管理主体职责定位不够明确，管理效率低<sup>[5]</sup>。杨国志学者表示安保人员专业性不足，压力过大，是导致安全管理效果低下的重要原因；安保人员工资较低，难以激发其工作热情；安保工作枯燥无味，安保人员极易对安全管理工作产生厌烦心理。仲昭慧（2020）表示，融合管理理念和服务理念是提高安全管理效率的关键一步，目前，高校过多重视管理理念，导致管理与服务脱节，没有融合服务的观念来加强学生安全管理，没有将学生视为管理主体，不能充分发挥大学生在安全管理中的关键性作用。

Li (2008) 等提出了一个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校园安全框架，将现有的安全设施和人为因素组织在一个地理模型中，为了实现校园空间化，建议采用易懂测绘系统作为获取校园三维数据库的测量工具。Jin(2014)考察了社交媒体在有效危机管理中的作用，研究表明危机来源在影响公众偏好的信息形式和信息来源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影响了公众对组织应对危机的预期以及他们在接触危机信息时可能感受到的危机情绪。Knox(2005)等讨论了学校危机干预与危机教育的模式。Pinggui (2017) 基于网络建构了一个校园安全系统，能够有效的阻止校园安全事故的发生。

## 2.2 高校安全教育相关研究

我国非常重视大学生的安全教育，2020年8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提出要推进高校思政课程的建设，加强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不断优化育人环境。为保证此项规定的落实，高校要加强安全教育课程的普及，丰富安全教育的方式，扩充安全教育的内容，引导大学生学习相关课程，从理论层面提升高校安全管理的工作效率（李勤华，2015）。林慧（2015）从被害者的视角下提出高校的安全教育要重视通过课堂教学进行被害预防教育；充分发挥情景的实践功效；多种方式进行安全防卫的犯罪被害预防宣传；建立大学生被害人救助机构。安春元（2016）提出新时期增强高校安全教育实效性的几个关键点在于创新教育理念，树立教育管理并行、预防整治齐抓的教育理念；优化教育内容，确保校园安全教育实效化；拓展教育平台，借助新兴媒体，搭建多元安全教育综合平台；拓宽教育阵地，依托教育资源，建筑安全教育长效阵地。石贵丹（2014）从知识管理视野下提出高校生态安全教育要加强高校生态环境建设、深化高校生态教育改革、加强高校生态安全实践教学、建立高校生态安全知识库、建立高校生态安全知识链。这些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为我国高校的安全教育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改善措施，有力的促进了高校安全教育的开展

## 2.3 学生安全意识相关研究

从安全教育的角度对大学生安全意识的研究。当下对大学生安全意识形成的因素分析还存在着薄弱性，基本上都是以教育为出发点去研究大学生的安全意识，比如吴玥、荆珊珊（2012）指出，对大学生安全意识形成的因素较多，但最为主要的是学生所在的学校、家庭、社



会和学生本人四个方面。朱忠祥、童政权（2010）指出，由于大学生安全教育方面的缺乏，导致学生的个人安全防范意识不高。赵晔（2011）从大学生的自然特质教育背景认知水平和社会特质三个方面去分析影响大学生安全意识的主要因素。高校多是通过讲座、班会以及海报等方式来宣传安全知识，提醒大学生注意个人信息、不要使用违禁电器、遵守校内交通规则等。不过近年来，部分高校会通过举办活动日的方式来提醒大学生注意个人安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例如举办“艾滋病日”、“环境日”。另外，一些高校会通过应急演练的方式来提高大学生的安全防范技能，尤其是在新生开学军训时，借助教官和消防官兵的指导对新生进行必要的消防和地震逃生演练，给大学生灌输基本的逃生知识和技能，以便大学生在危险来临时有充足的应急准备。丁凯（2014）认为高校安全教育工作没有落实到位，基础安全教育课程没有普及，进而导致部分学生没有较高的安全意识，从而引发各种安全事件

## 2.4 研究述评

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了解高校安全管理的现状，结合多种研究方法找出高校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对于安全教育的研究也从多个视角进行探讨并提出建议。通过国内外文献资料的整理可以发现，我国学者不断创新高校安全管理的研究方法，构建出了先进的研究模型，提出了新的观点来改善高校安全管理，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

但是我国学者对于高校安全教育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对于安全教育的研究多数是从理论上探讨，很少结合现实的情况和学生安全意识的现状进行针对性的研究。一些学者多集中与意识形态和理论性的研究，没有进行实地考察，单凭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对比分析就提出问题和建议，相对来说缺乏实证研究，需要进一步探析其对策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 研究方法

本研究立足探究高校安全教育与学生安全意识的关系问题，在本章中主要阐述研究方法与设计。本章节共分为三小节，第一节为研究假设，第二节为研究思路，第三节为研究架构。各小节分述如下。

### 1. 研究假设

根据安春元（2016）对安全教育提出的几个要点：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平台、教育阵地。张千（2022）提出新时代大学生生态安全意识培育的目标有知识层面、情感层面、意志层面和行为层面。

首先，教育理念是高校开展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的精神支撑，高校安全教育必须要在理念的指导下开展。理念是一种看法、思想、思维活动的结果，情感是人在现实生活中对某事物所表现出的一种爱憎好恶的态度，而一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收到一个人的看法和思想影响，意志是情感的升华，因此安全理念对于安全意识情感层面和意志层面的影响较大。其次，学校



的教育内容是是实现教育目标，经选择而纳入教育活动过程的知识、技能、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世界观等文化总体，学生知识的掌握情况很大程度上收到学校教育内容的影响。而学校进行安全教育的平台也影响着学生获取安全知识的情况。最后，高校安全教育的阵地要拓宽，若是仅仅局限于课堂上、班会上，学生的也许在知是方面掌握良好，但是难以付诸行为，若是模拟各类事故现场情境，开展应急逃生演练，学生有了实际的经验，将知识落实到行为的概率就会更高。因此，高校安全阵地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安全行为。

由此可以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高校安全教育的理念对学生安全意识的情感层面、意志层面有正向、显著、较大的相关关系。

假设二：高校安全教育的内容和平台对学生安全意识的知识层面有正向、显著、较大的相关关系。

假设三：高校安全教育的阵地对学生安全意识的行为层面有正向、显著、较大的相关关系。

## 2. 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

### 2.1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是以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共八所高校的学生为样本，线上发放问卷收集数据。共有以下学校：广西大学、广西医科大学、南宁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财经学院、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演艺职业学院。计划对这八所高校的学生进行随机抽样的样本调查，线上线下共发放问卷 72份，线上以发问卷二维码到各个高校的微信群的形式进行数据收集。具体发放情况如表 4 所示。

### 2.2 选择研究对象的理由

以上八所学校都坐落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这八所学校地理位置也比较近，学生所处的环境也相似，并且这几所学校能够很的协同合作一起治理周围的安全。且这八所学校都是公立学校，这几所学校进行安全管理和教育的措施有相似性，因此，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

### 2.3 样本分析

本研究共选取72个样本，是一个小样本，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代表八所学校的学生。

### 2.4 抽样方法

本研究采用概率抽样的方法，具体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分层抽样市将总体依照一种或几种特征划分成若干子总体（类、群），并从各子总体种按照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选取样本的抽样方法。被划分成的子总体成为层。

在本研究中，笔者将八所学校的学生按每个学校进行分类，一所学校为一个层在每一

个层里根据各学校的学生总数来确定各个学校抽取的人数，八所学校中抽取出来的学生就是本研究的样本。

### 2.5 抽样偏斜性的估计

本研究采用抽样分层，有一定的抽样误差，首先，层与层之间有一定的差异，因为学校的层次不同，这八所学校中，有211学校，有普通本科，也有专科学校。学生的素质有差异可能会造成抽样误差。其次，样本量不够多，八所学校的总体人数较大，这样也会造成一定的抽样误差。最后，分层的变量只有学校这一个变量，没有再继续按其他变量进行更精细的划分，这也会影响抽样误差。

## 3. 研究方法

### 3.1 文献法

本文基于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大量国内外有关校园学生安全管理的文献和安全教育的文献，明确大学生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的核心概念，梳理理论，构建起本文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框架，并收集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资料，为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 3.2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探究广西高校安全教育和学生安全意识的现状，了解广西高校安全教育对学生安全意识的影响，以便进一步提出在高校安全教育方面提升学生安全意识的措施。在实际调研中，主要采用问卷星的形式进行网络调查和数据收集，从而获得第一手数据，据此分析广西高校安全教育与学生安全意识存在的问题，为接下来探究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和提出广西高校安全管理的建议提供更为客观和可操作的数据支持。

在发放问卷前，先设计一个合理的问卷，然后将问卷通过问卷星软件发放。数据的收回依靠问卷星软件进行收回。

### 3.3 数据分析方法

关于数据的统计分析，本文采用SPSS26.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对数据进行信效度分析，对量表的可靠性进行考察，保证测量所得的结果内部一致程度较高。对量表的有效性进行考察，保证量表能够准确测出所需的真实的研究结果。

其次对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线性关系的检验，检验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线性关系；然后进行回归系数的检验，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否显著。

## 研究结果

本章主要对广西高校安全教育和学生安全意识的现状问卷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首先对研究数据进行描述分析，接着对各个背景变量进行差异分析、各变量间两两相关分析、中介效应验证等，以此对广西高校安全教育和学生安全意识的现状和广西高校安全管理存在问题进

行实证检验。

### 1. 研究数据描述分析

通过对广西高校大学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的方式。从学生的角度了解广西高校的校园安全情况，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并找出广西高校学生安全教育于安全意识的问题与不足，为改善学生的安全教育和安全管理问题，提供必要的实证依据和客观资料。

作者对广西高校八所高校在校学生进行随机调查，通过问卷星随机发放问卷75份，回收72份，回收率96%。其中有效问卷72份，有效率100%。样本分布较均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收回问卷后，将数据录入SPSS分析软件，分项进行统计，从不同角度对广西高校安全教育与学生的安全意识进行分析。

#### 1.1 信度检验

信度，顾名思义就是调查量表的可靠度和稳定性的程度，在研究中一般认为，Cronbach's Alpha值大于0.8，说明数据信度高；Cronbach's Alpha值在0.7-0.8之

间，说明信度较好，Cronbach's Alpha值在0.6-0.7之间，说明信度可接受。本研究问卷的信度系数值为0.949，远大于0.7，本问卷的信度高。

表1：问卷的信度检验

Cronbach 信度分析		
项数	样本量	Cronbach 系数
42	72	0.949

来源：本研究整理

#### 1.2 效度检验

效度，就是该量表所能正确的去测量问卷数据特质的程度。在KMO 和Bartlett的检验中，KMO值为0.832，KOM=0.832>0.7，比较适合提取信息。Bartlett球形度检验显著性=0.000<0.001，说明该问卷效度良好，数据适合提取信息。

表2：问卷的效度检验

KMO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取样適切性量数	0.832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493.284
	自由度	406
	显著性	0.000

来源：本研究整理

## 2. 研究数据差异分析

**表3:** 安全教育各维度在性别上的差异性检验表

维度	男 (M±SD)	女 (M±SD)	t值	P值
安全教育理念	0.96±0.17	1.01±0.20	-1.150	0.254
安全教育内容和平台	0.57±0.10	0.56±0.12	0.659	0.512
安全教育阵地	1.35±0.36	1.27±0.30	1.119	0.267
安全教育情感	1.69±0.51	1.82±0.49	-1.171	0.246
安全教育知识	2.22±0.71	2.16±0.70	0.397	0.692
安全教育行为	0.90±0.15	0.86±0.18	0.980	0.330

来源: 本研究整理

分析结果显示, 安全教育理念、安全教育内容和平台、安全教育阵地、安全教育情感、安全教育知识以及安全教育行为这六个维度的P值都大于0.05, 说明安全教育各个维度在性别上并没有差异, 男生和女生对于在安全教育各个维度上的表现都区域一致。

**表4:** 安全教育各维度在专业上的差异性检验表

维度	文科 (M±SD)	理科 (M±SD)	t值	P值
安全教育理念	0.98±0.19	0.99±0.20	-0.16	0.874
安全教育内容和平台	0.57±0.11	0.56±0.09	0.603	0.549
安全教育阵地	1.27±0.32	1.39±0.33	-1.399	0.166
安全教育情感	1.71±0.49	1.85±0.53	-1.050	0.297
安全教育知识	2.00±0.63	2.60±0.67	-3.711	0.000
安全教育行为	0.87±0.16	0.89±0.19	-0.529	0.599

来源: 本研究整理

分析结果显示, 安全教育理念、安全教育内容和平台、安全教育阵地、安全教育情感以及安全教育行为这五个维度的P值均大于0.05, 说明这五个维度在专业上都没有显著的差异。而安全教育知识的P值为0.000, 小于0.05, 说明安全知识在专业上有显著的差异。文科的安全教育知识的均值为2.00, 理科安全教育知识的均值为2.60, 理科安全教育知识的均值大于文科, 说明理科学生的安全教育知识要比文科学生丰富。

## 3. 研究数据相关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 安全教育理念与安全教育情感的P值为0.000, 小于0.05。因此, 安全教育理念与安全教育情感之间有相关关系, 且相关性为正向的。学生的安全教育情感与学校的安全教育理念有着正向的相关关系。安全教育内容和平台与安全教育知识的P值为0.020, 小于0.05。因此, 安全教育内容和平台与安全教育知识之间有相关关系, 且相关性为正向的。学生

的安全教育知识与学校的安全教育内容和平台有着正向的相关关系。最后，安全教育阵地与安全教育行为的P值为0.010，小于0.05。因此，安全教育阵地与安全教育行为之间有相关关系，且相关性为正向的。学生的安全行为与学校的安全教育阵地有着正向的相关关系。

**表5：安全教育理念与安全教育情感相关性研究表**

		安全教育理念	安全教育情感
安全教育理念	皮尔逊相关性	1	0.096
	Sig.(双尾)		0.000*
	个案数		72
安全教育情感	皮尔逊相关性	0.096	1
	Sig.(双尾)	0.000*	
	个案数	72	

来源：本研究整理

**表6：安全教育内容和平台与安全教育知识相关性研究表**

		安全教育内容和平台	安全教育知识
安全教育内容和平台	皮尔逊相关性	1	0.41
	Sig.(双尾)		0.020*
	个案数		72
安全教育知识	皮尔逊相关性	0.41	1
	Sig.(双尾)	0.020*	
	个案数	72	

来源：本研究整理

**表7：安全教育阵地与安全教育行为相关性研究表**

		安全教育阵地	安全教育行为
安全教育阵地	皮尔逊相关性	1	0.050
	Sig.(双尾)		0,010*
	个案数		72
安全教育行为	皮尔逊相关性	0.050	1
	Sig.(双尾)	0.010*	
	个案数	72	

来源：本研究整理

## 总结与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第一：高校安全教育的理念对学生安全意识的情感层面、意志层面有正向、显著、较大的相关关系；第二 高校安全的内容和平台对学生安全意识的知识层面有正向、显著、较大的相关关系；第三高校安全教育的阵地对学生安全意识的行为层面有正向、显



著、较大的相关关系。

因此,广西高校应该重视安全教育对学生安全意识的影响,并且着手改善自身安全教育的理念、内容、平台和阵地,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安全教育氛围。

## 研究建议

目前高校安全教育的现状不尽如人意,对此,本文尝试提出高校安全教育的几个对策:

### 1. 进一步完善基于新媒体的高校安全教育体系

管理体系,安全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如何保持正常的运营状态还需要优质的管理方案发挥作用和效果。对于高校而言,要逐步建立围绕安全教育的管理体系,加快制度性内容的推进,明确组织结构,建立管理框架,让学院和二级院校的管理体系逐步完善,形成自上而下一体性较强的安全教育管理体系,使得安全教育全覆盖。

队伍体系,高校安全教育工作的推进,需要安全教育队伍完善、丰富。一方面高校要发挥自身的主导优势,积极推进校内安全教育队伍的培训工作,以专项培训让这一群体掌握新媒体教学技能,能够借助新媒体带来的教育便捷性,探索全新的安全教育工作方案;另一方面高校要积极引进高素质安全管理人才,完善和补充安全教育队伍。高校应结合自身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现状,制订人才引进方案,补充安全教育人才不足的问题,确定准入门槛,保证安全管理工作效率。安全教育队伍体系的日益完善,为新媒体时代下安全教育工作创新提供必要支持。

保障体系,作为高校教育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安全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为了充分展现安全教育的有效性,尝试搭建保障体系。保障体系指的是围绕安全教育工作创新的保障性内容,如制度性的保障,则需要高校针对本校安全教育的实际情况建立各项制度,以制度约束让学校安全教育可以发挥作用和效果。

### 2. 加快推进新媒体的安全教育内容和形式优化

了解学情,在安全教育的实践中要充分了解学生的特点,可以尝试借助调查问卷的方式来真实地了解大学生对安全教育的感知情况,充分了解大学生对于安全教育形式和安全教育内容的喜好情况,并结合调查的结果进行安全教育形式的优化和升级,让安全教育内容更生动。

优化内容,安全教育之所以在高校受重视程度不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安全教育的内容缺乏吸引力。为解决这一问题,尝试在安全教育形式上做出优化。第一,安全教育在线上展开。由于手机的普及,学生接触信息的方式发生转变,从传统的固定信息接收模式向多元方向转变,学生接触信息的渠道被拓宽。第二,开展多元的安全教育活动。如在防火安全的教育实践中,尝试与校园附近的消防队开展合作,让学生通过参观消防队的设施、消防人员的生活方式等途径,了解防火责任的重要性,增强安全自觉意识。

扩大宣传,虽然近年来随着安全教育的推进和学生安全意识的逐步增强,学校的安全事件发生概率已经明显下降,但依旧需要对安全教育提高重视程度,扩大宣传成为一个新渠道。高校要充分利用目前学校的新媒体宣传空间,如微博、微信公众平台、校园网站等,加大对安全教育的宣传力度,让学生可以定期接触到有关安全教育的相关内容,辅以案例信息,加深学生的印象与理解,且随着当前短视频平台的火爆,学校也可以积极推进短视频平台的建设和开发,使其成为宣传安全教育的主要渠道之一。

### 3. 线上安全教育与线下安全教育相结合

发挥线下传统安全教育优势在高校的安全教育实践中,传统的安全教育模式要得到延续,在坚持已有基础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新媒体推进安全教育的创新。如尝试借助新媒体的线上资源获取方式,采取线上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充分了解大学生对安全教育的认知情况,并围绕调查结果落实安全教育的具体内容,优化安全教育的环境。线下安全教育的展开,让传统的安全教育优势展现出来。线上学生情况的调查结果可以直接作用到线下的安全教育实践,指引线下安全教育的有序推进和开展。

强化安全技能训练 对于高校大学生群体而言,安全教育既要围绕理论知识展开,又要强化学生的安全技能,即在发生安全事件和安全风险之后学生的快速响应能力,以此来维护自身安全。如在面临电话诈骗时,要时刻关注自身的信息安全,及时报警处理。在面临防火安全时,要时刻关注身边的风险,遵守学校规矩,避免在宿舍中使用大功率的电器。一旦发生火灾,要具备基本的逃生能力。

举办线下安全技能操作大赛为了强化大学生的安全技能,尝试开展线下的安全技能操作大赛。如充分利用线上的信息传播渠道,发布有关安全操作大赛的相关信息,并采取线上报名的方式展开,让学生充分意识到和了解安全技能操作大赛的重要性。而后通过线下的真实体验和真实实践,强化自身的安全技能。相较于单纯线上或者是线下的教学模式,显然安全技能操作大赛的引导效果更理想,更有利于达成安全教育目标。

###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的局限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研究只分析了高校安全教育的理念、内容、平台和阵地。并没有涉及到安全教育的全部内容,因此,之后的研究可以继续探讨安全教育的其他方面。其次,本研究只分析了学生安全教育知识、情感、意志、行为等方面,并没有涉及学生安全意识的全部方面,因此之后的研究可以继续探讨学生安全意识的其他方面。最后,本研究仅仅将高校安全教育作为应变量,将学生安全意识作为自变量,这两个变量之间并没有中介变量,对于学生是如何将学校安全教育的理念、内容等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并没有更加深层次的研究,因此,之后的研究可以探讨高校安全教育对学生安全意识影响的中介因素。

## 参考文献

- Booker Jr, L. (2014). Crisis Management: Changing Times for Colleges. *Journal of College Admission*, (222).
- Hu, P.G., & Chen, X.Q. (2017, October).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ampus security system based on Internet of Things. In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bots & Intelligent System (ICRIS)*, 23(01), 86-89.
- Jin, Y., Liu, B.F., & Austin, L.L. (2014). Examining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effective crisis management: The effects of crisis origin, information form, and source on publics' crisis respons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1(1), 74-94.
- Knox, K.S., & Roberts, A.R. (2005).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crisis team models in schools. *Children & Schools*, 27(2), 93-100.
- Li, X., Shen, T., Zhang, J., & Shi, C. (2008). A spatial technology approach to campus security. In *2008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tworking. Sensing and Control*, 8(1), 221-225.
- 安春元. (2016). 新时期增强高校安全教育实效性的几个关键点.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04), 44-46.
- 陈蓉 & 刘旺霞. (2015). 高校安全管理制度变迁分析. *教育评论* (04), 6-8.
- 陈珍国. (2008). *学校安全管理*.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丁凯. (2014). 高校校园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上旬) (11), 121-122.
- 赫尔曼·哈肯. (2005). *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李辉. (2021). *协同治理视角下高校学生安全管理研究—以云南省四所高校为例*. 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 云南大学.
- 李勤华 & 邓吉平. (2015). 高校安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中国成人教育* (09), 76-77.
- 林慧. (2015). 被害预防视域下的高校安全教育探析. *现代教育管理* (06), 125-128.
- 刘建杰. (2020). 高校校园安全管理影响因素及对策探讨.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 (12), 151-153.
- 石贵舟. (2014). 知识管理视野下的高校生态安全教育. *教育与职业* (27), 40-42.
- 孙波 & 王粲. (2017). 论高校安全危机现状及应对. *中国成人教育* (21), 72-74.
- 孙联社. (2017). 大学生安全意识与法律意识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纳税* (26), 191.
- 魏宗雷. (2002). 美国的危机管理机制. *国际资料信息* (11), 1-4+12.
- 吴超. (2021). 公共安全管理的若干基础理论. *安全* (04), 1-7+89.
- 吴琦 & 池骋. (2015). 高校学生人身安全管理规章制度评析. *教育评论* (10), 58-61.
- 吴玥 & 荆珊珊. (2012). 大学生安全意识的教育对策研究. *中国电力教育* (32), 137-138
- 徐向东. (2003). 关于安全意识的哲学研究.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07), 4-6.
- 俞文钊. (2004). *管理心理学*.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 张千. (2022). *新时代大学生生态安全意识培育研究*, 法学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理工大学.

- 张玉堂. (2008). 学校安全工作的三个基本概念. *教育科学论坛* (01), 65-67.
- 赵丽丽 & 申怡添. (2020). 北京高校安全防控组织结构转型研究.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02), 71-79.
- 赵晔. (2011). 提高大学生安全意识的途径和对策研究. *辽宁科技学院学报* (02), 82-84.
- 仲昭慧. (2020). 基于大数据的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治理.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02), 55-57.
- 周立新 & 王丽芳. (2006). 论高校校园安全问题及对策.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03), 65-70+147.
- 邹文弢. (2004). *中小学安全管理研究初探*. 教育硕士学位论文, 江西师范大学.
- 朱忠祥 & 童政权. (2010). 大学生安全意识的现状调查与思考——以南京工业大学学生为例. *衡水学院学报* (03), 100-102.

## 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研究

#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CORE COMPETENCIES OF FIVE-YEAR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杨希哲<sup>1\*</sup>

Xizhe Yang<sup>1\*</sup>

<sup>1</sup> 南宁师范大学

<sup>1</sup>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244232183@qq.com

**摘要：**本研究基于职业成长规律理论、CBE理论和人职匹配理论探讨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现状。职业核心素养是职业人在就业过程中必须具备的素养，分为职业角色、工作胜任和生涯发展素养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又可细分三级指标。职业角色素养包括工作价值、岗位职责、职业道德、人际关系、质量意识、成本效率与风险、创新创业七个三级指标；工作胜任素养包括行业状态与工作系统、任务执行、问题解决、资源统筹、安全意识五个三级指标；生涯发展素养包括生涯规划、岗位迁移、自我管理、终身学习四个三级指标（陈宏艳，徐国庆，2018）。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和问卷调查法对广西壮族自治区G职业技术学院物流专业学生的职业核心素养的现状进行了调查。以该校共858名学生为样本进行数据采集，采用SPSS 21.0进行描述统计、信效度分析、差异性分析、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1.部分五年一贯制高职生对“职业核心素养”概念不熟悉，在职业核心素养内容的重要程度认识上，大多数高职生认为“安全意识”、“职业道德”、“自我管理”、“问题解决”素养是极其重要的；2.被调查学生的职业核心素养现状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五点计分的均值普遍高于三分。大部分高职生认为“安全意识”等职业核心素养是非常重要的；3.男生的职业核心素养普遍比女生的好；4.四年级学生的职业核心素养比三年级学生的，三年级学生的职业核心素养比二年级学生好。由此，为提升当前五年一贯制高职院校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水平，本研究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G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现状，提出完善顶层设计，构建职业核心素养培养体系；根据人才需求，合理设置专业与创新评价体系；改革教学内容，核心素养与课程设置相匹配；变革教学方式，多方位协同培养策略。

**关键词：**五年一贯制高职，职业核心素养，培养路径。



**Abstract:** This research,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vocational growth,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CBE), and Person-Job Fit, explor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professional core competency cultivation among five-year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Professional core competencies are essential for professionals during their employment process.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professional roles, work competence, and career development, each of which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of indicators. Professional role competence includes seven tertiary indicators: work value, job responsibilities, professional ethic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quality consciousness, cost efficiency and risk,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Work competence includes five tertiary indicators: industry status and work system, task execution, problem-solving, resource coordination, and safety awareness. Career development competence includes four tertiary indicators: career planning, job migration, self-management, and lifelong learning (Chen & Xu, 2018). This study uses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ofessional core competence of logistics students in Guangxi G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A total of 858 students from this school were sampled for data collection, using SPSS 21.0 fo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difference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Some five-year vocational students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al core competence." In terms of the importance of professional core competence content, most vocational students believe that "safety awareness," "professional ethics," "self-management," and "problem-solving"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2.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surveyed students' professional core competence is above average, with the mean scores of the five-point scoring system generally higher than three. Most vocational students believe that "safety awareness" and other professional core competencies are very important. 3. Male students generally have better professional core competencies than female students. 4. Fourth-year students have better professional core competencies than third-year students, and third-year students have better professional core competencies than second-year students. Therefo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urrent level of professional core competency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 five-yea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study,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ofessional core competency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 Guangxi G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proposes to improve top-level design, construct a professional core competency cultivation system; according to talent demand, rationally set up specialties and innovate the evaluation system; reform teaching content, match core competencies with curriculum setting; change teaching methods, and employ multi-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training strategies.

**Keywords:** Five-Year Consist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ore Literacy, Training Path

## 引言

本章主要是对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及其培养的研究背景、动机、目的、问题和意义进行阐述和说明，共分为六节，分别是研究背景、研究动机、研究目的、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流程、概念界定。

### 1. 研究背景

知识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进入了信息化时代。这种变化既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也改变了社会的形态，伴随着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的更替。在这一过程中，技术进步产业转型、生产变革导致产业价值链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了应对信息化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挑战，教育领域需要培养新的人才目标和任务。全球各个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都深入思考了21世纪的学生应当具备哪些素养，才能更好地适应信息化时代职业变化的挑战等问题。高职教育作为培养高等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阵地，面临着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的提升和创新的紧迫任务。如何培养适应社会需求、具有良好职业素养和核心竞争力的高职人才，是高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课题。

#### 1.1 基于政策背景的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4）发布了《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其中提出要从国家层面明确组织研究并提出我国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同时，教育部（2019）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通知中要求贯彻职教改革方案，深化专业、课程、教材改革，提高实习实训水平，实现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培养相融合。在国家大力倡导工匠精神的背景下，培养高职学生的职业核心素养，赋予学生具有终身可持续发展素养的能力，是职业教育的必然选择。为此，需要构建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职业核心素养框架，并全面开展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工作。

#### 1.2 基于现实难题的需求

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什么样的人，这就要求关注学生的核心素养。职业教育也是为了让人的职业生命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不仅仅是提供人的职业技能。但是社会的需求和标准有时会使职业教育偏离育人的方向，变成制造工具的手段，导致高职教育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就业难、离职率高等。这反映了高职教育与教育的功能和价值的不一致，也反映了高职院校对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不清晰。因此，“培养什么样的人”是高职教育面临的一个新的时代课题，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核心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和实践共同探索的问题。

#### 1.3 基于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特点的需求

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是从初中毕业后直接进入高职院校的，他们的入学年龄比普通高职学生低一到两岁，一般在15-16岁之间。这个年龄段是人生的重要阶段，是他们形成自己的

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关键时期。同时，这个年龄段也是他们学习语言、掌握技能的黄金时期，他们的大脑和身体都处于发育和成长的状态，对新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们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可塑性和创新性，能够快速适应高职教育的环境和要求，能够灵活地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和策略，能够积极地探索和尝试新的知识和技能。此外，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的学习时间比普通高职学校学习时间更长，学生们可以接受更多更丰富的培养。这些特点有利于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培养职业意识、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也更有利于帮助他们进行职业核心素养的培养。

## 2. 研究动机

贾厚林（2016）认为高等职业教育五年一贯制要发挥长学制贯通培养的特色，系统创新培养模式，增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竞争力。采用“专业群延伸”、“课程按块组合”、“招生按类进行”、“培养按需分流”等要素，创新实施“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培养模式，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动力，拓宽专业面向，在提高培养质量，培养综合能力等方面效果显著。但其忽视了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素养培养的重要性，只注重对学生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而还缺少对高职学生职业道德、职业意识、职业行为等方面培养的重视。

高思茵（2022）对高职院校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现状以及培养中出现的问题、问题出现的原因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初步探索出新时代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优化路径，但其过于笼统，且研究对象主要为普通高职学生。而五年一贯制高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等职业学校在学习年限、课程设置和毕业证书等方面都不同，由于五年一贯制高等职业学校学习年限更长，对于职业核心素养的培养就比普通高职院校更充分、完善。本研究通过对N市某五年一贯制高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现状进行分析，剖析其培养现状中出现的问题，并对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体系优化与保障提供一些建议。

贺一凡（2022）论述了五年一贯制高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发展现状与问题，分别从学生因素、学校因素和企业因素三个方面剖析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问题，并从学生层面、高职院校层面和企业与国家层面对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提供了路径选择。但其并没有深刻分析职业核心素养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关系，也没有探讨职业与教育互动中的职业核心素养及其价值。当前的研究中，学者们对于五年一贯制高职学校的研究还较少，都偏向于普通高职学校而忽略已发展30多年的五年一贯制高职学校的研究。此外，对于职业核心素养的价值和职业核心素养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关系的研究也较少，没有从根本上探讨为何要培养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因此，本研究不仅注重对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现状与问题进行解析，还注重探讨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体系的优化与机制的改革。

### 3. 研究问题

高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核心素养的培养一直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但目前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还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陈丽如（2019）在研究中指出：由于社会和市场的快速变化，职业核心素养的内涵和要求也在不断更新，而高职院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却没有及时跟上，导致高职院校学生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与社会实际需求存在较大的差距，影响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职业发展潜力。同时，高职院校学生对职业核心素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主动提升自身职业核心素养的动力和意愿，更多地关注学历证书和专业技能，而忽视了职业态度、职业道德、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培养。在学者的研究中，高职人才培养与职业核心素养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特别是对于五年一贯制高等职业学校学生的研究更是少之极少。

在这一背景下，本研究拟解决的问题如下：

（1）中国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现状如何？存在什么问题？五年一贯制高职教育人才培养与职业核心素养两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2）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中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性？

（3）如何进一步优化五年一贯制高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核心素养的培养路径？如何构建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体系？

### 4. 研究意义

从众多研究学者的研究结论中得知：目前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存在职业核心素养与社会实际需求不相匹配；高职院校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教育日渐式微；高职院校学生自身忽视职业核心素养的提升等。因此，对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和分析，结合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的特点和职业核心素养的价值进行探讨。对完善顶层设计，探索五年一贯制高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优化路径，构建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体系的理论架构、总体思路和现实对策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4.1 理论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6）发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其体现了我国核心素养研究的本土化、阶段性特征和概括能力。研究表明，核心素养是连接国家层面的教育理念、教育目标；也是连接院校层面的教育目标、学科专业的教育内容以及是连接教学方式手段的桥梁。核心素养是对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国家总体教育目标的解读框架。因此，在职业教育的背景下研究学生职业核心素养，首先要明确这一理念在职业教育中的定位，澄清职业核心素养与人才培养目标、学科专业教学等方面的关系。

通过了解高职人才培养与职业核心素养的关系，可以进一步探索适合五年一贯制高职

学生的核心素养培养模式和路径，为核心素养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可以进一步阐述职业核心素养在高职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探索如何将职业核心素养融入到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内容、方法和评价中，为高职人才培养理论的完善和优化提供新的依据和支撑；还可以进一步分析职业核心素养对教育教学的影响和要求，探索如何运用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和策略来培养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的职业核心素养，为教育教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总之，能够为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路径的优化提供理论基础。

#### 4.2 现实意义

本研究通过对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现状进行分析，探究其培养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探索出五年一贯制高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优化路径，构建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体系。这不仅可以为中国五年一贯制高等职业学校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和建议，帮助其优化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体系，提高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效果和质量；还可以帮助社会市场输送更多具备优秀职业核心素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满足社会和市场的多元化需求，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 5. 概念界定

围绕“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这一课题，对“五年一贯制”“核心素养”“职业核心素养”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

#### 5.1 五年一贯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2）发布了《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办好五年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几点意见》。其中明确指出“五年一贯制”是指招收初中毕业生，实行五年制的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形式。

岳蒙蒙（2020）认为五年一贯制是一种新兴的教育方式，它让初中毕业生直接进入高职院校，接受五年连续的专科教育。毕业后，他们可以拿到国家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校毕业生证。这个证书和三年制专科的证书一样，都是国家认可的大专学历，只是上面写着五年一贯制专科的字样。如果想继续深造，他们还可以参加专升本考试，攻读本科学位。五年一贯制的学籍管理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年按照中职学校的规定办理，后两年按照高校的规定办理。

刘朝林（2020）同样认为一贯制是指一以贯之的教育制度。一贯制的教育是对传统分阶段教育的一种突破，它展现出了连续性、开放性、复杂性和系统性的特征。根据学生的身心成长规律，通过连接不同学习阶段的课程而达成的一种持续性的教育。高职五年一贯制学制：又称“初中起点大专教育”，招收参加中考的初中结业生，达到录取分数后，进入职业院校学习，进行五年制的培训，学业结束颁发国家教育部统一印制的大专学历证书。



## 5.2 核心素养

刘帅（2021）在研究者指出，核心素养这个概念起源于西方，英文叫：Key Competences。二十一世纪初左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先说了“核心素养”，分成“用工具、跟不同的人交流和自己做事”，这三个方面互相联系，是核心素养的基础。2016年9月13日上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出来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有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3个方面。

魏锐（2020）等人认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和美国21世纪学习联盟一起，用21世纪核心素养4C模型（审辨思维、创新、沟通、合作），加上文化理解与传承素养，变成5C模型，这是中美学术对核心素养教育的一个方案。总的来说，核心素养是学生在学习中，得到的适应个人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品格和能力，是说“培养什么”的，是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说法。

辛涛（2016）等人在研究中指出，不同的国际组织和国家对“核心素养”有不同的解释，它们都与终身学习有关。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核心素养包括五个方面：认知、做事、生活、生存和改变。欧盟则认为核心素养是个体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中，适应社会、发展职业、实现自我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和态度的结合。德国把核心素养看作是在复杂情境下，除了专业知识和技能之外，行为主体还应具备的知识、能力、态度等的综合。英国则把核心素养视为未来的生活、学习、工作所需要的综合素质，是一种通用的、可转移的，对从业者未来至关重要的关键能力。

## 5.3 职业核心素养

职业核心素养是职业人在就业中不可或缺的素养，它能让学生具备终身发展的能力，这是学者们的共识。陈宏艳，徐国庆（2018）根据《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要求和职业教育的特点，邀请了15名专家进行头脑风暴，探讨了21世纪职业教育学生应该具备哪些核心素养。他们先列出了52个核心素养指标，经过讨论后删减为36个指标；然后根据指标的具体内容，将职业教育学生的核心素养分为两个部分：通用核心素养和职业核心素养。

桑磊（2020）认为职业核心素养是职业人才在职业发展变化中所需的素养，是个体适应社会、竞争岗位、发展职业所必须具备的品格和能力，涵盖了个体从事岗位工作、应对社会发展和个人职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职业核心素养的核心特点是它是一般职业素养的精华和灵魂，能够赋予其它素养以意义和活力。

本研究根据陈宏艳，徐国庆教授的划分，将职业核心素养分为三个方面和若干三级指标。这三个方面是职业角色、工作胜任和生涯发展。职业角色方面的指标有七个，分别是工作价值、岗位职责、职业道德、人际关系、质量意识、成本效率与风险、创新创业；工作胜任方

面的指标有五个，分别是行业状态与工作系统、任务执行、问题解决、资源统筹、安全意识；生涯发展方面的指标有四个，分别是生涯规划、岗位迁移、自我管理、终身学习。

## 研究目的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和统计分析法就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的培养进行探究，通过实证研究高职教育人才培养与核心素养的关系，对五年一贯制高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寻找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问题出现的原因，并以此为据寻求有效具体研究目的如下：

(1) 了解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现状，剖析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问题产生的原因，进一步探究改善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策略和建议，以此促进五年一贯制高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核心素养的形成。

(2) 了解职业与教育互动中的职业核心素养及其价值，探讨职业核心素养在个体、企业与社会中的价值所在。以此有助于提升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培养适应社会 and 市场需求的高素质技术专业人才。

(3) 了解五年一贯制高职教育人才培养与职业核心素养两者之间的关系，完善顶层设计，探索五年一贯制高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优化路径，构建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体系。

## 文献综述

不同的学者对职业核心素养有不同的理解和划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职业核心素养进行了界定和构建。方健华（2014）将其分为四个方面：职业理想，即对自己未来职业发展的期望和追求；职业人格，即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风度；职业意识，即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有清晰的认识和主动的态度；职业关键能力，即掌握并运用所需的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有的学者则认为职业核心素养是一般职业素养的核心和灵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职业信念、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行为习惯（朱安莉，2016）。

另外，有部分学者按一定维度将职业核心素养划分为不同的层次或要素。有学者认为职业核心素养是社会所需的核心素养，是课程开发和人才培养的基础，是从业者胜任工作、适应社会和个人发展的必要素养（徐健，2016）。也有学者将其划分为五个要素：统筹素养、人际素养、科技素养、系统素养和媒介素养（罗桂城，2017）。张志军，郭莹（2017）认为职业核心素养是学习者必须具备的品格和能力，与职业环境和岗位能力紧密相关，涉及个体的社会适应性、岗位竞争力和职业发展性等方面。他们将其分为三个维度：品格维度，即包括责任感、自信心、自律性等；能力维度，即包括专业技能、沟通协作、创新创造等；发展维度，即包

括学习意愿、生涯规划、反思评价等。桑雷，马蕾（2020）则认为职业核心素养涵盖了四个层面：职业品格与修养、生活与生涯素养、学习与创新素养和信息与技术素养。

国外学者对于职业核心素养的定义更为丰富。有的学者认为职业核心素养应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基本能力（比如逻辑思维等高于专业技能的能力）；第二，水平能力（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第三，可迁移知识原理（在不同职业领域之间可以转换的能力）；第四，传统的永恒的能力（生涯规划能力）（Dieter Mertens, 1974）。而有的学者认为职业核心素养必须始终考虑实践的背景。他承认现代生活可能需要一些非常普遍的素养，但他强调在跨越文化、社会环境和个体的层面上，以及在为制定测量方法提供有用指导的层面上，指定关键能力是很难做到的。他还警告不要将制定核心素养的工作局限于发达国家，因为这样做势必会在更大的范围内使用，并产生消极的同质化效应（Jack Goody, 1999）。

Dominique Simone Rychen和Laura Hersh Salganik（2001）认为职业核心素养是指个体为了实现美好的生活和建设和谐的社会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它体现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要求个体能够跨学科、综合性地掌握各种学科知识。在21世纪，核心素养不仅涉及个人自身的成长，也涉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良好互动。还有学者认为职业核心素养是一种不受具体职业限制的、可以广泛应用的、对人的一生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能力，它在人的能力结构中居于中心位置，是从各种职业活动中提炼出来的非专业性能力（Peter Kearns, 2001）。

一些国内学者指出，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例如，高职教育过分追求规模扩张，而忽略了学校的教育使命和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导致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下降（于永刚，2016）。李璇（2018）在研究中反映了高职生跳槽现象的严重性，以及企业对高职生的职业价值观、职业道德、职业品质等方面的不满。在针对财经商贸类专业的中职生的研究方面，有研究发现这些中职生普遍缺乏职业规划、职业精神和职业关键能力（陆玉梅等，2019）。针对目前高职学生职业素养培育的现状和问题，有研究认为是高职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并且高职学生对自身职业素养的提升缺乏重视（陈丽如，2019）。甚至有学者在研究中批评了高职院校的惯性办学和“学术漂移”现象，认为高职教育缺乏根本问题价值取向的研究和实践，还没有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新生态，也没有实现现有生态的开放性和有效性（王兴，2020）。

也有一部分国外学者针对职业素养培养现状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看法。迄今为止，人们很少关注可持续发展核心素养培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也没有考虑正式和非正式学习的可能性及其与高等教育中能力发展的关系（Matthias Barth, 2007）。Arnim Wiek, Lauren Withycombe 以及Charles L. Redman（2011）在研究中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新兴学术领域一直在进行一场丰富而趋于一致的辩论，以确定哪些核心素养被认为是毕业生必须具备的。十多年来

，高等教育中已经开发和教授了可持续发展课程，但是在本科和研究生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学术项目，直到最近几年才出现。考虑到这种最近的发展动力，现在似乎是讨论可持续发展中的核心素养最好的的时机，以便支持这些相对新颖的学术项目塑造自己的特色和实现自己的宏伟使命。

高职学生的核心素养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策、课程、教学、评价等多个方面的因素，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建议。要培养高职学生的核心素养，需要政府、学校、学生三大主体通力协作，从人才培养目标、学业质量评价标准、教学、教师、学风、个人意识等方面综合入手，形成一个有利于核心素养培养的教育生态（王艳辉，2017）。楼飞燕等学者（2018）关注职业核心素养的内涵和构成，以及职业资格认证标准和法律体系的完善。要培育职业教育学生的职业核心素养，需构建完整体系，建立相应的学业质量评价标准。他们强调，要以问题解决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以实践为基础，以合作为方式，以反思为支撑，以评价为保障，实现核心素养与专业技能的有机融合（李光等，2019）。此外，还要着眼于“互联网+”时代的要求，提出培养学生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批判精神、自我管理能力和综合素养，并构建具有高职特色的培养体系（郭金龙等，2019）。

国外关于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职业核心素养搭建起了传统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桥梁。职业核心素养不仅体现了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关注，还体现了职业教育所特有的专业性、实用性和针对性。因此，职业核心素养是传统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有效衔接，为两种教育的融合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所以，在高职学校发展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是非常有必要的（Cherry Collins，1993）。也有学者在对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以及工作场所中的职业核心素养研究报告中指出，利益相关者对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重视和支持，以及职业核心素养是如何被纳入课程标准、课堂和材料的（Paul Hager等，1997）。此外，核心素养被视为进一步教育和培训的必要基础，也为其他期望的课程和资格改革提供了催化剂——例如学术和职业学习的整合。然而，它们并没有实现它们的承诺。本文认为，核心技能是职业课程中通识教育和文化的无效替代品（Andy Green，1998）。

## 研究方法

### 1. 文献研究法

本文的文献研究以“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为研究主题，搜集并整理了国内外论文、期刊、专著等相关文献资料，目的是及时、准确地掌握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为了保证文献资料收集的科学与连贯性，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文献研究：

第一，资料收集方面。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文献资料收集的主要渠道，在研究初



期对本研究相关主题内容进行资料的搜索与整理。在中文文献收集的过程中，对“五年一贯制”、“职业核心素养”及“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三者进行基础资料的收集，外文文献主要从Google学术数据库中进行文献资料的查找与收集，对“Key Competencies”、“Vocational Education”等关键词进行查找，收集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学习借鉴和引用。

第二，文献资料鉴别方面。对前一阶段收集的文献资料进行大量阅读，对收集到的资料按照与本研究的相关程度进行分类，对研究内容不完整、研究观点不明确、研究内容不相符的资料进行淘汰，将与本研究结合度较高的文献进行分类存储，有助于下个阶段的文献借鉴引用。

第三，观点加工和文献补充方面。在这一阶段，主要对已分类的文献资料进行二次阅读，对各学者的研究观点进行交叉比较和分析引用。同时，结合当下研究继续补充完善文献资料。

本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法，梳理了相关研究核心概念的定义和相关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对研究主题的理解，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 2.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中国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现状，分析中国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现状的问题，以便进一步提出改善目前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问题的优化路径。

在实际调研中，主要采用问卷星的方式进行网络调查和数据收集，从而获取第一手数据，基于此分析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接下来提出改善目前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问题的优化路径提供更为客观和可操作的数据支持。

本研究主要参考由湖南农业大学刘帅（2021）编制的《高职院校学生职业核心素养现状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自行设计；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G职业技术学院《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高等职业学校物流管理专业教学标准》，制定了问卷，共15道题，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生基本信息（第1-3题），包括学生的性别、年级与干部任职情况。第二部分（第4-15题）是高职院校学生对职业核心素养的认识与现状调查，分别从三个维度对学生职业核心素养的现状进行调查，分别是“职业角色”、“工作胜任”与“生涯发展”三个维度。“职业角色”维度对应的题号为第4-8题；“工作胜任”维度对应的题号为第9-12题；“生涯发展”维度对应的题号为第13-15题。在量表中，所有题目计分都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本研究的调查范围是广西壮族自治区G职业技术学院的物流管理专业学生。由于一年级学生与毕业班学生对于职业核心素养的认识与培养的差异性，本研究主要研究对象为广西G职业技术学院物流管理专业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学生。该专业是省级示范性特色专业、国家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



和国家级骨干专业之一，是省级一流特色专业的现代物流管理专业。在201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高职院校同类专业评估中名列前茅。该专业开设了企业物流、商贸物流、国际物流、电子商务物流、供应链等5个方向。共发放160份问卷，去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为156份，问卷回收率约为97.5%。其中男性约占总人数的57.7%，女性约占总人数的42.3%，该职业技术学院男女比例约为6:4，因此本研究样本中男性人数多于女性人数。本研究样本中担任干部与否的人数比例约为5:5，该校学生组织众多且每个班级有10个班干部岗位。

本研究选择广西G职业技术学院物流管理专业作为调查对象，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该专业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高职院校中较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物流管理专业，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创新性；二是该专业涵盖了物流管理领域的多个方向，能够反映出不同方向的物流管理学生的特点和需求；三是该专业的学生规模较大，能够提供足够数量和质量的调查样本。

## 研究结果

### 1. 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对问卷《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现状调查》共12项进行信度分析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系数为.896，说明该问卷具有相当好的信度，见表1。

**表1：**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问卷信度检验

Cronbach's alpha系数	项数
.896	12

本问卷对“职业角色”、“工作胜任”和“生涯发展”三个职业核心素养维度分别进行信度检验，如表2所示。

**表2：**问卷三维度信度检验

变量	Cronbach's alpha系数	项数
总变量	0.896	12
职业角色	0.936	5
工作胜任	0.587	4
生涯发展	0.687	3

各维度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在.587-.936之间，从测量数据来看，符合信度系数的标准，具有较理想的信度系数和指标。

本研究使用两种方法同时检验效度。分别对总变量以及“职业角色”、“工作胜任”和“生涯发展”三个职业核心素养维度的变量进行效度检验。

**表3:** 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问卷效度检验

KMO值与Bartlett球形检验		
KMO值		.908
Bartlett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061.841
	自由度	66
	显著性	.000

如表3所示，对问卷《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现状调查》共12项进行效度分析，KMO值为0.908>0.8，一般认为KMO值大于0.8，因而综合说明研究数据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水平。本研究还对问卷《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现状调查》中“职业角色”、“工作胜任”和“生涯发展”三个职业核心素养维度进行效度的检验分析，见表4。

**表4:** 问卷三维度效度检验

变量	KMO值	项数
总变量	0.908	12
职业角色	0.887	5
工作胜任	0.628	4
生涯发展	0.598	3

各维度的KMO值在.598-.887之间，从测量数据来看，符合效度系数的标准，具有较理想的效度系数和指标。

## 2. 差异分析

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分析不同性别下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职业角色”、“工作胜任”和“生涯发展”三个维度的差异，差异结果见表5。

**表5:** 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在性别上的差异性检验

维度	男 (M±SD)	女 (M±SD)	t值	P值
职业核心素养	4.00±0.62	3.66±0.50	3.633	0.002**
职业角色	3.72±0.92	3.37±0.70	2.568	0.001**
工作胜任	4.30±0.46	4.02±0.52	3.459	0.602
生涯发展	4.06±0.71	3.66±0.56	3.818	0.005**

注：\*P<0.05, \*\*P<0.01, \*\*\*P<0.001.

从表5可知，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在性别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其显著性水

平P值为0.002，小于非常显著值0.01。从“职业角色”、“工作胜任”和“生涯发展”三个职业核心素养维度来看，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在“职业角色”与“生涯发展”职业核心素养维度上存在着显著的男女性别差异，显著性水平P值分别为0.001与0.005，均小于非常显著值0.01；而五年一贯制高职男学生和女学生在“工作胜任”职业核心素养维度上无显著性差异，其显著性水平P值为0.602，大于显著值0.05。

此外，从表5中可以看出，男、女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在总体职业核心素养上、“职业角色”与“生涯发展”维度上存在着差异，并且其中男生均值每项均高于女生，表明男生对职业核心素养的认识与能力、对其职业角色的认识和生涯发展的规划上比女生好，并且有着明显的差距；而在“工作胜任”上，虽然男生均值比女生略高，但没有明显的差异，表明五年一贯制高职男学生跟女学生在工作胜任上表现差距不大，且表现较好。

本研究以年级为自变量对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以及对“职业角色”、“工作胜任”和“生涯发展”三个职业核心素养维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差异结果见表6。

**表6:** 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在年级上的差异性检验

维度	年级	M±SD	F值	P值
职业核心素养	二年级	3.67±0.60	8.261	0.000***
	三年级	3.79±0.45		
	四年级	4.10±0.64		
职业角色	二年级	3.28±0.89	7.555	0.001**
	三年级	3.53±0.69		
	四年级	3.89±0.86		
工作胜任	二年级	4.08±0.52	7.311	0.001**
	三年级	4.08±0.40		
	四年级	4.39±0.53		
生涯发展	二年级	3.76±0.68	2.857	0.061
	三年级	3.84±0.57		
	四年级	4.06±0.75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从表6可以看出，不同年级的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在职业核心素养上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显著性P值为0.000，小于0.001，具有极其显著的差异。从三个职业核心素养维度来看，不同年级的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在“职业角色”和“工作胜任”职业核心素养维度上都存在着显著差异，两个维度的显著性P值都为0.001，小于0.01，说明不同年级的高职学生在这两个职业核心素养维度上具有相当明显的差异；而在“生涯发展”职业核心素养维度上，不同年级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不存在显著差异，其显著性P值为0.061，大于0.05，说明每一个年级的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对其生涯发展的认识比较稳定。

此外，“职业角色”与“工作胜任”这两个有显著差异性的职业核心素养维度的均值都反映出二年级的均值比三年级低，三年级的均值比四年级低。五年一贯制二年级高职学生的专业课程学习、参加见习、实践机会相对比三年级、四年级学生较少。许多二年级学生刚刚适应好高职院校的生活和学习，在学习上还未处于最佳状态。随着入学年级的上升，对学习和生活的进一步适应，专业课学习与实习的机会增多，让学生对物流管理专业的认识加强，对今后所从事岗位的职责也更加清楚，也意识到职业角色和工作胜任的重要性。

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分析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对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职业角色”、“工作胜任”和“生涯发展”三个维度的差异，差异结果见表7。

**表7:** 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在担任学生干部上的差异性检验

维度	是 (M±SD)	否 (M±SD)	t值	P值
职业核心素养	4.25±0.45	3.44±0.42	11.645	0.028*
职业角色	4.07±0.72	3.05±0.65	9.283	0.008**
工作胜任	4.50±0.35	3.86±0.43	10.041	0.297
生涯发展	4.24±0.63	3.53±0.53	7.557	0.080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从表7可知，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在高职学生是否担任学生干部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其显著性水平P值为0.028，小于显著值0.05。从“职业角色”、“工作胜任”和“生涯发展”三个职业核心素养维度来看，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在“职业角色”职业核心素养维度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显著性水平P值为0.008，小于非常显著值0.01；而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在“工作胜任”与“生涯发展”职业核心素养维度上无显著性差异，其显著性水平P值分别为0.297与0.080，均大于显著值0.05。

上述信息说明担任学生干部的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在职业核心素养上表现相比非干部学生更好一些，其得分均值在所有三个维度中都比非干部学生高。从职业核心素养三个维度来看，担任学生干部的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在“职业角色”比非干部学生表现更好；而在“工作胜任”与“生涯发展”两个维度上，虽然担任学生干部的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得分均值比非干部学生高，但两者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这反映出担任学生干部的学生对职业角色的认同感更强，对职业道德、职业了解程度等方面表现更出色，能够体现出学生干部在班级职位的责任感下，对职业产生了强烈的自豪感与认同感。

### 3. 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对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以及“职业角色”、“工作胜任”和“生涯发展”三个职业核心素养维度进行相关性研究。相关性结果见表8。

**表8:** 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相关性研究

维度	职业核心素养	职业角色	工作胜任	生涯发展
职业核心素养	1			
职业角色	.922**	1		
工作胜任	.797**	.585**	1	
生涯发展	.782**	.558**	.578**	1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

从表8可知, 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量表与其中所有维度(“职业角色”、“工作胜任”与“生涯发展”)均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分别为.922、.797和.782, 说明该量表内三个维度的一致性较好, 且与职业核心素养密切相关, 三个维度的均分越高, 职业核心素养水平越高。

从“职业角色”、“工作胜任”与“生涯发展”三个职业核心素养维度来看, “职业角色”维度与“工作胜任”、“生涯发展”维度呈显著的正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585和.558, 说明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的职业角色认同水平越高, 他们的工作胜任程度与生涯发展水平也就越好。此外, “工作胜任”维度在与“职业角色”维度呈显著的正相关的同时, 也与“生涯发展”维度呈显著的正相关, 其相关系数为.578, 说明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的工作胜任程度越好, 则他们的职业角色认同水平与生涯发展水平也就越好。同理, 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的生涯发展水平越高, 他们的职业角色认同水平与工作胜任程度也就越好。

#### 4. 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采用线性回归, 以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中“职业角色”维度为自变量; 以“生涯发展”维度为因变量, 对“工作胜任”维度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以验证“职业角色”维度对“生涯发展”维度的影响中是否存在“工作胜任”维度上的中介效应。相关结果见表9。

**表9:** 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表

	生涯发展		工作胜任		生涯发展	
	$\beta$	T	$\beta$	T	$\beta$	T
职业角色	0.558	8.350***	0.585	8.954***	0.335	4.363***
工作胜任					0.382	4.978***
R2	0.312		0.342		0.408	
Adjusted R2	0.307		0.338		0.400	
F	69.722		80.177		52.635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

从表9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可知, 首先对自变量“职业角色”维度对因变量“生涯发展”维度的影响进行检验, 其T值为8.350, 显著性P值为0.000小于0.001, 说明自变量“职业角色”对因变



量“生涯发展”有显著性的正态影响；其次对自变量“职业角色”维度对中介变量“工作胜任”维度的影响进行检验，其T值为8.954，显著性P值小于0.001，说明自变量“职业角色”对中介变量“工作胜任”呈显著的正态影响；最后，在中介变量“工作胜任”影响下，对自变量“职业角色”维度对因变量“生涯发展”维度的影响进行检验，T值分别为4.363与4.978，显著性P值均小于0.001，说明在中介变量“工作胜任”影响下，自变量“职业角色”对因变量“生涯发展”仍然呈显著的正态影响，但T值均降低，说明“工作胜任”维度在自变量“职业角色”和因变量“生涯发展”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 总结

从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角色”、“工作胜任”和“生涯发展”三个职业核心素养维度表现现状情况来看。从“职业角色”职业核心素养维度来看，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对自己的职业角色认同感还不够强。在职场中，一个人的职业角色是非要的，它需要一个人对自己的职业有清晰的认知和定位。因此，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的职业角色，明确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才能更好地适职场；从“工作胜任”职业核心素养维度来看，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表现较为良好。这一点得益于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在职业教育培训中注重实践和技能培养，他们在职场中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专业技能，能够胜任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从“生涯发展”职业核心素养维度来看，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的表现还不够。生涯发展需要一个人具备全面的职业素养，并且需要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职业能力需要更加注重自我管理和职业规划，了解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制定职业规划和发展目标，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能力和竞争力。

根据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的研究发现，男生与女生在职业核心素养上存在着显著差异，特别是在“职业角色”与“生涯发展”维度上，男生的均值每项均高于女生，表明男生对职业核心素养的认识与能力、对其职业角色的认识和生涯发展的规划上比女生好，并且有着明显的差距；而在“工作胜任”上，五年一贯制高职男学生跟女学生表现差距不大，表现均为较好。此外，高年级学生在职业核心素养的表现上比低年级学生更好。这可能是因为在五年一贯制二年级高职学生的专业课程学习、参加见习、实践机会相对比三年级、四年级学生较少。许多二年级学生刚刚适应好高职院校的生活和学习，在学习上还未处于最佳状态。随着入学年级的上升，对学习和生活的进一步适应，专业课学习与实习的机会增多，让学生对物流管理专业的认识加强，对今后所从事岗位的职责也更加清楚，也意识到职业角色和工作胜任的重要性。另外，担任学生干部的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在职业核心素养上表现相比非干部学生更好一些。从职业核心素养三个维度来看，担任学生干部的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在“职业角色”比非干部学生表现更好；而在“工作胜任”与“生涯发展”两个维度上，虽然担任学生干部的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得分均值比非干部学生高，但两者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这反映出担任学生干部的学生

对职业角色的认同感更强，对职业道德、职业了解程度等方面表现更出色，能够体现出学生干部在班级职位的责任感下，对职业产生了强烈的自豪感与认同感。

## 讨论

### **第一，加强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角色认同感的培养。**

职业角色认同感对于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至关重要。在职业发展的过程中，职业角色认同感是指个人对于自己所从事职业角色的认同程度。它是个人职业成长和发展的支撑，也是职业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学校和老师应该重视职业角色认同感的培养，为学生的职业成长提供更有效的帮助。

首先，学校可以通过课程设置，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的职业角色。例如，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职业技能课程等。课程内容可涵盖职业发展趋势、职业道德、职业技能等方面，以提高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认同度。通过课程教学，学生可以了解各行业的发展趋势，掌握所需的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要求，提高自身的职业认同感和职业发展能力。其次，学校可以组织丰富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真实工作环境中体验职业角色，增强对职业的认同感。例如，实习、实训、校企合作项目等。通过实践活动，学生可以深入了解职业的本质和工作需求，掌握实际操作技能，增加职业经验，提高职业认同感。学校还可以与企业合作，让学生更直接地了解职业需求，提高自身的竞争力。通过实践活动的开展，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 and 发现，从而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职业角色和职业发展方向。最后，学校还可以开展心理辅导，关注学生的心理需求，及时发现和解决学生在职业角色认同过程中的困扰和问题。

总之，学校和老师应该通过课程设置、实践活动和心理辅导等手段，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的职业角色，增强对职业的认同感。只有这样，才能为学生的职业成长和发展提供更有效的帮助，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职业人才。

### **第二，促进学生生涯发展职业素养培养，注重实践教学。**

生涯发展能力是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职业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和教师应关注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的生涯发展能力，教育学生重视自我管理和职业规划，了解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制定职业规划和发展目标，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能力和竞争力。首先，学校可以开设生涯规划课程，帮助学生掌握生涯规划的方法和技巧。课程中可以涉及自我评估、职业目标设定、职业技能提升、职业道路选择等方面的内容，使学生能够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规划。其次，学校可以邀请行业专家进行讲座，分享职场经验和行业趋势，使学生更好地了解职业发展的现状和未来。此外，学校还可组织实践活动，如参观企业、参加行业大赛等，让学生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生涯发展能力。

实践教学对于提高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的工作胜任力具有重要意义。学校应继续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确保学生在校期间有足够的实践机会，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此外，鼓励企业参与教学过程，与企业合作，共同培养学生，使学生更好地了解职场需求，提高自身竞争力。首先，学校可以加强校企合作，与企业共同开发实训项目，使学生能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学习和实践。同时，学校还可以邀请企业专家作为兼职教师，指导学生进行实践操作，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工作技能。其次，学校可以组织实习和实训活动，让学生在企实际工作环境中体验职业角色，了解企业文化和职业要求。实习和实训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能力等职业素养。

### 第三，关注不同年级学生差异，充分发挥学生干部作用。

高年级学生在职业核心素养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优势，他们有更多的实践经验和职业意识，能够更好地适应高职生活和未来的职业发展。而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往往需要更多的指导和帮助，以便更快地适应高职生活和提高学习效果。

为了帮助低年级学生适应高职生活，学校可以采取多种措施。首先，可以通过设立导师制度，让高年级学生指导低年级学生，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物流管理专业。高年级学生可以为低年级学生提供学习和生活上的建议，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帮互助。其次，学校可以提供更多的实习和实践机会，让低年级学生尽早了解物流管理专业及其未来职责。通过实践活动，学生可以深入了解所学专业的实际应用，掌握实际操作技能，提高职业认同感和职业发展能力。此外，学校和教师应该重视学生干部在培养职业核心素养方面的作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班级管理和团队协作，提升学生的领导力、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学生干部作为班级的核心力量，他们在实践活动中积累的经验 and 能力，对其他同学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最后，学校还应加强对学生干部的培训和指导，提升他们的组织管理能力，以更好地发挥其在培养同学职业核心素养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学校可以加强对低年级学生的指导，提供更多实习和实践机会，鼓励学生参与班级管理和团队协作，并重视学生干部在培养职业核心素养方面的作用。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帮助低年级学生更好地适应高职生活，提高学习效果，同时培养他们的职业核心素养，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 参考文献

- Barth, M., Godemann, J., Rieckmann, M., & Stoltenberg, U. (2007). Developing key competenc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 Bernikova, O. (2017).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In Proceeding of the 8th

- International Multi-conference on Complexity, Informatics and Cybernetics (IMCIC)* , 316-319.
- Collins, C. (1993). *Competencies: the competencies debate in Australia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ustralian College of Education, PO Box 323, Curtin,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2605, Australia.
- Goody, J. (1999). Education and Competences,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DeSeCo Expert Report*. Swiss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Neuchâtel.
- Green, A. (1998). Core skills, key skills and general culture: in search of the common found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Evaluation & Research in Education*, 12(1), 23-43.
- Hager, P., Moy, J., & Gonczi, A. (1997). *Piloting the Key Competencies in the Australia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ector and Workplaces: a synthesis report*. NSW Department of Training and Education Co-ordination, Sydney.
- Kearns, P. (2001). Generic skills for the new economy: A review of research relating to generic skills. *National Center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Adelaide.
- Kegan, R. (2001). Competencies as working epistemologies: Ways we want adults to know. In Rychen, S., & Salganik, L.H. *Defining and selecting key competencies*. Gottingen, Germany: hogrefe & huber.
- Mertens, D. (1974). Schlüsselqualifikationen. Thesen zur Schulung für eine moderne Gesellschaft. *Mitteilungen aus der Arbeitsmarkt-und Berufsforschung*, 7(1), 36-43.
- Parsons, F. (1909). *Choosing a vocation*. Boston: Houghton-Mifflin.
- Rychen, D.S.E., & Salganik, L.H.E. (2001). *Defining and selecting key competencies*. hogrefe & huber publishers.
- Wiek, A., Withycombe, L., & Redman, C.L. (2011). Key competencies in sustainability: a reference framework for academic program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science*, 6, 203-218.
- 陈宏艳, 徐国庆. (2018). 基于核心素养的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变革探析. *职教论坛*, (03), 57-61.
- 陈丽如. (2019). 高职院校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育探析. *教育与职业*, (06), 56-58.
- 方健华. (2014). *中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评价及其标准体系建构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知网.
- 高思茵. (2022). *产教融合视域下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策略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中国知网.
- 郭金龙, 龚绍波 & 李银春. (2019). “互联网+”时代高职院校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育. *河北职业教育*, 3(03), 20-24.
- 贺一凡. (2022). *基于制造业需求的高职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路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安徽建筑大学). 中国知网.



- 贾厚林. (2016). 五年一贯制高职教育“大类招生、专业分流”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17), 88-91.
- 姜大源. (2017). *职业教育要义*.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光 & 秦可越. (2019). 职业教育核心素养培育研究. *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1(02), 70-74.
- 李璇. (2018). 职业核心素养: 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新定位.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17(03), 19-22.
- 刘朝林. (2020). *五年一贯制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课程体系优化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广西师范大学). 中国知网.
- 刘帅. (2021). *高职院校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湖南农业大学). 中国知网.
- 楼飞燕, 王曼 & 杜学文. (2018). 德国职业教育核心素养的探究及启示. *黑龙江高教研究*, (01), 55-58.
- 陆玉梅, 马建富 & 郑晓梅. (2019). 财经商贸类中职生职业核心素养的培育路径. *职教论坛*, (12), 161-165.
- 罗桂城. (2017). 高职学生发展职场核心素养: 动因、内涵及培养—基于美国职场核心素养教育的审视. *职业技术教育*, 38(07), 20-24.
- 潘亚儿. (2004). 借鉴CBE理论发展我国高职教育. *教育与职业*, (05), 18-19.
- 桑雷. (2020).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及其培养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知网.
- 王兴. (2020).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目标定位与路径突破. *职业技术教育*, 41(34), 6-11.
- 王艳辉. (2017). 高职学生核心素养框架建构及培养路径. *职业技术教育*, 38(19), 35-40.
- 魏锐, 刘坚, 白新文, 马晓英, 刘妍, 马利红, 甘秋玲, 康翠萍 & 徐冠兴. (2020). “21世纪核心素养5C模型”研究设计.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38(02), 20-28.
- 谢鑫. (2022).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与专业技能一体化培育的新模式探索.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01), 80-85.
- 辛涛, 姜宇 & 林崇德. (2016). 论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内涵特征与框架定位. *中国教育学刊*, (6), 5.
- 徐健. (2016). 核心素养并非基础教育专有名词. *中国教育报*, (09).
- 于永刚. (2016). *以职业素养为核心的高职院校德育模式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中国知网.
- 岳蒙蒙. (2020). *五年一贯制中高职贯通的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中国知网.
- 张志军 & 郭莹. (2017).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育路径探究.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04), 52-56+65.
- 张志新. (2016). *基于测评的职业教育教师职业能力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
- 赵志群. (2009). *职业教育工学结合一体化课程开发指南*.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2).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办好五年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几点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4). *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6).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9).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朱安莉. (2016).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思考. *江苏教育研究*, (30), 74-76.

**家庭环境与小学生学习品质关系的研究—以L小学为例****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ME ENVIRONMENT  
AND LEARNING QUALITY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  
CASE STUDY OF L PRIMARY SCHOOL**符彩玲<sup>1\*</sup>Cailing Fu<sup>1\*</sup><sup>1</sup> 南宁师范大学<sup>1</sup>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406260416@qq.com

**摘要：**本研究基于家庭系统理论探讨家庭环境对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影响情形与关系，利用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亲子关系、教养方式等因素揭示家庭环境对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影响机制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从而提出优化家庭教育培养小学生学习品质提供更有价值和参考的有效策略。本研究以N所100名小学生为样本进行数据采集，采用SPSS26.0进行描述统计、差异分析、相关分析。研究发现：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影响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发展；2.家庭亲子关系与小学生学习品质具有双向显著正相关；3.家庭教养方式与小学生学习品质存在显著正相关。基于此，建议进一步优化家庭环境增强培养小学生学习品质的意识，通过加强亲子关系的联结、改善家庭教养方式及提升培养小学生学习品质的能力等方式，充分发挥家庭环境对小学生学习品质的积极作用，助力家庭更科学更有效培养小学生学习品质。

**关键词：**家庭环境，小学生学习品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home environment and learning quality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based on the family systems theory. It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s and pressing issues associated with factors such as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parenting styles, aiming to propose effective strategies that optimize family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the learning quality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providing valuable insights and references. The study collected data from a sample of 100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using SPSS 26.0 fo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difference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the family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quality.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quality in both directions.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ing styles and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qualit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it is recommended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home environment and enhance awareness of cultivating the learning quality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is can be achieved by strengthening the bond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mproving parenting styles, and enhancing the ability to foster the learning quality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t is crucial to fully leverage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home environment in shaping the learning quality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ereby assisting families in cultivating their learning quality in a mor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manner.

**Keywords:** Home Environment, Learning Quality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omo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 引言

随着家庭经济状况和教育水平不断提高，重视家庭教育对学生的发展与影响已成为一个趋势。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10月23日正式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家庭教育由此在国家高度上步入了法治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自2022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意味着在国家法律层面定义了家庭教育的独立功能和独特价值，规定了新时代家庭对儿童成长的责任，明确了对父母或监护人的责任要求，同时还在政府推进、社会协同、学校指导等方面作出要求，具有目标定位的准确性、内涵界定的科学性和实施评价的权威性等特点。这标志着中国家庭“依法”教育孩子的时代已经正式到来，也说明了家庭教育对学生成长扮演着重要作用，这对于规范家庭教育与未来教育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小学生时期是儿童终身学习和正式教育的开始，家庭是学生成长的重要场所，良好的家庭环境对学生良好品质的养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丧偶式育儿”等现象并不罕见，这说明有部分家长并未完全地真正承担起对儿童成长的责任，以及考试成绩也常常成为亲子语言互动的主要内容，他们并未充分认识到儿童的发展是多元全面的，特别是养成良好的学习品质等方面依然处于严重缺位的状态。为了家庭教育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依据，探究家庭环境与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关系则显得十分必要。基于此，鉴于家庭环境对于小学生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在教育系统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的现实，我们亟需在理论层面探究家庭环境对小学生良好学习品质的影响，通过揭示家庭环境对学生学习品质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来规范和引导父母，促使所有父母有效履行家庭教育的职责，以助力小学生家长提高小学生学习品质水平的提供教育建议。

## 研究目的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与问卷调查法就家庭环境与小学生学习品质关系进行探究，通过实证研究了解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亲子关系、家庭教养方式对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影响情形，对家庭环境影响小学生学习品质的现状与问题进行分析，寻找家庭环境影响小学生学习品质发展的原因，并以此为据探讨有效提升家庭环境促进小学生学习品质发展的策略和建议。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1. 了解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影响情形。
2. 了解家庭亲子关系对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影响情形。
3. 了解家庭教养方式对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影响情形。
4. 了解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亲子关系、教养方式与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关系。

## 文献综述

### 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关系研究

家庭是小学生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1988年，Coleman提出的家庭社会资本理论中，将家庭资划分为本社会、人力与经济资本，SES能够对一个家庭的综合资本情况进行全面反映。不同的SES为学生个体进行着不同资本的传递，从而造成了个体发展之间存在的差异性。SES较高，则父母能够让个体接触到更多的具备一定价值的资源，从而让其学习、态度、观念与日后的生活与成就受到重要影响（Gallo & Matthews,2010），以此推动儿童的积极发展。

中国学者对SES与儿童的学习品质影响相关研究相对较少，但相关研究已经反映出后者对前者及其主要构成成分的影响。当然，这种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学业成绩、父母参与以及态度等作为中介进行的。如任春荣和辛涛(2013)的研究表明，家庭拥有物的多少也与小学生的学习成绩和阅读水平呈正相关。以家庭拥有物为衡量家庭经济地位的具体指标，基于此展开的研究表明，SES和小学生成绩之间有着显著相关性，呈同向增长关系，且相关度并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王宝华和冯晓霞（2010）等人在研究中指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儿童在“主动性”“想像与创造”“目标意识”“专注程度”“抗挫折能力”等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儿童，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学习品质各方面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肖磊峰和刘坚（2017）则通过对中国中部某市的共7089名学生展开的实证调研显示，父母参与在SES和学业效能之间有着一定中介效应，并以此通过链式中介形式来对孩子的学业成就产生影响。学习品质与儿童的学业成就有很大程度的相关。

综上所述，通过梳理已有研究表明，小学生的学习品质与学习成绩有很高度的相关，以及小学生学习品质与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高度相关。并且在教育实践中人们也发现，在社会整体对学习品质的培养认识不足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往往更重视学

业知识（如基本读写算）的学习，同时更忽视学习品质的培养。

## 2. 家庭亲子关系与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关系研究

亲子关系以血缘和现实生活为基础，是父母与子女互动的过程，它是一种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统一的人际关系（张晓,陈会昌,张桂芳,周博芳,吴巍,2008）。作为个体生命中持续时间最长的第一种人际关系，亲子关系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最为深远。

关于亲子关系与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关系，已有研究表明，亲子关系对儿童活动的引导和父母亲切、鼓励、积极反馈等教养行为有助于子女独立性思维能力、认知能力的发展(Gauvain,Perez,& Beebe,2013)。此外，亲子关系良好的儿童比不好的儿童，具有更高的社会能力和学业成绩(Nokali.et al.,2010)。良好的亲子关系也可以预测更高的社会创造力(Zhang et al.,2018)，更高的幸福感(K Ef&Dekovi,2004)，更高的自我效能感(Rubin&K,2004)。Nelson（2005）在进行研究时得出结论：如果在儿童活动过程中，父母能够提供给儿童积极的关注与陪伴，这一良好的氛围能够有利地促进儿童学习品质的形成。父母在与子女交往的过程中会慢慢地在方方面面帮助孩子，使孩子拥有积极的学习品质,这也有助于孩子在学习过程中增加对学习的内在动力。虽然中国关于亲子关系与小学生学习品质有直接影响关系的研究相对缺乏，但已有研究表明儿童的学习品质与其学业成绩具有高度的相关，因此，通过了解亲子关系与儿童学业成绩相关等研究，也能窥探亲子关系与小学生学习品质的相关性。杨志伟（2000）在研究中指出父母受教育水平与职业和亲子关系，儿童的学业成绩等呈显著正相关。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的发展来自于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一方面环境可以直接作用于个体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影响个体自身的因素间接作用于人的发展(刘杰,孟会敏,2009)，根据这一理论，家庭环境在直接影响小学生学业成绩的同时，小学生学习品质也同样会受到家庭这一微系统的作用。这些实证研究说明亲子关系这一家庭因素既直接作用小学生的学业成绩，也通过影响小学生个体因素间接作用于学习品质。纵观以往研究，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于亲子关系影响儿童学业问题以及社会心理发展问题，对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影响则缺乏关注和研究。

## 3. 家庭教养方式与小学生学习品质的相关研究

通过对于前人在关于家庭教育中家长的教养方式与小学生学习品质的相关分析得出：家长在家庭教育中采用何种方式教育儿童，对于最终学生的成长和发展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将是终身制的。家长的教育不同于学校教育，它可能不是一种系统的传统教育，但可能通过家长采取的教养方式影响儿童良好学习品质的养成，形成另一种非系统化的教育。已有研究发现，家庭教养方式在儿童的学习习惯、学习动机、学习兴趣等方面显著相关，而这些方面恰是小学生学习品质构成的重要因素。在学习习惯方面，孔平（2017）认为，如果家长采取溺爱型的教育方式，那么小学生在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就会出现明显的拖延现象。而如果家



长在教育儿童时采用的是民主的教育方式，那么小学生在进行学习过程中出现拖延现象的可能性就会相对减少。李丽丽（2016）在研究中指出，小学生在学业上的拖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与家庭教养方式中的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拒绝型教养方式等显著相关。在学习动机方面，张珊（2019）指出，父母不同教养方式的选择带给孩子们不同的感受，这些来自心理，情感等各方面的感受会对孩子在学习方面的动机产生影响。候利兵（2019）认为，父母为孩子创造积极的家庭环境很重要，舒适的家庭氛围能让孩子体会到快乐，身心愉悦的状态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在兴趣方面，李晖（2005）在儿童兴趣发展与家庭教育方式关系的研究结果说明，温暖宽容型的教育方式与积极兴趣和直接兴趣、稳定兴趣分别有显著与有极其显著的正相关，惩罚羞辱型的教育方式与消极兴趣有显著的正相关，忽视放任型的教育方式与消极兴趣和广泛兴趣都有显著的负相关，说明温暖宽容型的教育方式有利于儿童兴趣发展。家庭教养方式除了在儿童的学习习惯、学习动机、学习兴趣等方面影响对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养成有着直接相关，并且家庭教养方式在学习成绩、智力、自我概念上的影响也与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养成有着间接的联系。在学习成绩上，赵静波(1999)研究了智力、父母教养方式与孩子学习成绩的关系，发现优等生与差等生的父母在教养方式上有明显的差异，前者偏爱温暖与理解，后者偏爱惩罚与干涉，而这种差异引起的结果是优等生有信任与安全感，并形成良好的个性与学习习惯，而差等生有逆反与自卑感他们厌学缺乏信心。综上所述，通过分析前人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家长在进行教育过程中，家长采取的教养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学习习惯以及学习成绩都产生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可以是积极的影响，也可以是消极的影响。但总体而言，对于家庭教养方式直接影响小学生学习品质的系统性研究相对较少，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这为本研究留下了很大的探索空间。

#### 4. 研究述评

查阅有关家庭环境与小学生学习品质的相关文献不难发现，当前学术界对家庭环境与小学生学习品质的研究和相关理论都较为丰富。学者们分别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亲子关系、教养方式与小学生学习品质这几个因素进行了研究，同时也进行了两两相关的研究调查，从不同视角与不同研究对象的关系研究成果，较好完善了家庭环境与小学生学习品质研究的理论知识，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为本次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与方向。根据对该领域的文献进行分析可知，关于家庭环境与小学生学习品质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两点不足：第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亲子关系、教养方式与小学生学习品质有直接的关系研究相对缺乏。家庭环境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亲子关系、教养方式等因素与小学生学习品质关系的相关研究当中，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亲子关系、教养方式与学习品质呈直接关系研究可供参考的文献还是相对较缺乏，均以小学生学业成绩呈正相关文献研究占大多数，从而只能通过小学生学业成绩与学习品

质的直接关系从侧面反映和推断家庭环境与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关系及影响，从而反映了家庭环境中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亲子关系、教养方式等因素是否与小学生学习品质有直接的关系与影响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第二，关于小学生学习品质发展的研究视角相对片面。以往研究发现，对小学生学习品质发展影响的研究视角均以学校或教学这一视角居多，而家庭环境对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父母的教育是个体成长中家庭影响的核心体现，是影响小学生学业成绩与学习品质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基于此，本研究从家庭环境对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影响作用出发，考察家庭环境对小学生学习品质发展的影响因素，以期揭示家庭环境对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影响机制，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有益的理论与实践支持，从而更科学、更有效的为家庭教育培养小学生学习品质提供更有价值和参考的建议。

## 研究方法

从N市L小学入手，采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统计分析法三种方式结合来开展实证研究，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通过参考学术界目前家庭环境与小学生学习品质关系的相关研究，根据实际情况和研究目的，选取了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四个量表，分别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量表》、《家庭亲子关系量表》、《家庭教养方式量表》、《小学生学习品质测量》。在力求调查结果的客观性，挖掘分析综合的深入性。本研究中，问卷由学生本人作答，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0，其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2，家庭亲子关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4，家庭教养方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9，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5，表明总问卷和各维度信度良好。

### 1. 文献研究法

通过知网数据库和各高校电子图书查阅，研读诸多国家论文及专著，掌握和学习本选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通过广西统计网、广西教育厅网站和系统等渠道获取相关研究文献和实际数据，开拓思路、细心研究，为开展论文研究提供了理论保障。

### 2. 问卷调查法

在实际调研中，主要采用问卷星的形式进行网络调查和数据收集，从而获得第一手数据，据此分析家庭环境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亲子关系、教养方式等因素对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影响情形，为接下来探究家庭环境与小学生学习品质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提出优化家庭教育培养小学生学习品质提供更为客观和可操作的数据支持。关于数据的统计分析，本文采用SPSS26.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首先，对N市某小学的学生家长发放家庭环境问卷和小学生学习品质问卷，通过SPSS26统计软件做出描述性分析、差异性分析、相关分析等。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亲子关系、教养方式与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为小学生家长提出提高小学生学习品质水平的教育建议。

## 研究结果

本章主要对家庭环境与小学生学习品质的问卷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首先对研究数据进行描述分析，接着对各个背景变量进行差异分析与各变量间两两相关分析等，以此对家庭环境与小学生学习品质的现状和家庭环境存在问题进行实证检验。

### 1. 研究数据描述统计分析

#### 1.1 小学生家庭环境特点描述统计

采用家庭经济地位、家庭亲子关系、家庭教养方式等量表，对小学家庭环境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家庭经济地位、家庭亲子关系、家庭教养方式的描述统计结果 (N=96)

维度	因子	M	SD
家庭经济地位	父亲受教育程度	2.65	1.11
	母亲受教育程度	2.60	1.20
	父亲的工作	2.47	1.17
	母亲的工作	2.50	1.24
	家庭财产	2.12	0.40
家庭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 (父亲)	3.25	0.40
	亲子关系 (母亲)	3.32	0.38
家庭教养方式	情感温暖 (父亲)	3.53	0.70
	情感温暖 (母亲)	3.84	0.68
	焦虑性教养 (父亲)	3.44	0.86
	焦虑性教养 (母亲)	3.75	0.87
	拒绝 (父亲)	2.65	0.92
	拒绝 (母亲)	2.90	1.12
	过度保护 (父亲)	3.05	0.79
	过度保护 (母亲)	3.21	0.95

来源：本研究整理

#### 1.2 小学生学习品质描述统计分析

采用学业自主调节量表，对小学生学习品质各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小学生学习品质的描述统计结果 (N=96)

维度	M	SD
学习态度	3.4479	0.75547
学业效能	3.4708	0.72256
坚持性	3.4813	0.68338
自主性	3.6146	0.68379

来源：本研究整理

## 2. 研究数据差异分析

### 2.1 小学生学习品质的性别差异显著性检验

以性别为分组对学习品质及维度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小学生学习品质关于性别的独立样本t检验表

维度	男(n=48)	女(n=48)	t	p
学习态度	3.30±0.76	3.56±0.73	-1.946	0.055
学业效能	3.41±0.77	3.53±0.65	-0.733	0.466
坚持性	3.41±0.65	3.55±0.72	-0.986	0.327
自主性	3.56±0.69	3.66±0.69	-0.625	0.534

来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3可知，学习态度、学业效能、坚持性、自主性等维度（ $t=-1.946$ ,  $p>0.05$ ； $t=-0.733$ ,  $p>0.05$ ； $t=-0.986$ ,  $p>0.05$ ； $t=-0.625$ ,  $p>0.05$ ）均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女生在学习品质各维度上均值都大于男生。

### 2.2 小学生学习品质的是否独生子女差异显著性检验

以是否独生子女为分组对学习品质及维度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4。

**表4:** 小学生学习品质关于是否独生子女独立性t检验表

维度	是(n=36)	否(n=60)	t	p
学习态度	3.30±0.57	3.54±0.84	-1.496	0.138
学业效能	3.22±0.65	3.62±0.73	-2.761	0.007
坚持性	3.42±0.49	3.52±0.78	-0.715	0.476
自主性	3.42±0.50	3.73±0.75	-2.243	0.027

来源：本研究整理

以上表4结果显示：在小学生学习态度和坚持性上，非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的不存在显著差异，但非独生女得分高于独生子女得分。在小学生学业效能和自主性上，非独生子女得分均显著高于独生子女得分（ $p<0.05$ ）。

### 2.3 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年级差异显著性检验

为了检验小学生学习品质在不同年级上是否存在差异性，采取了单因素方差检验，其差异性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在学生学习态度、学业效能、坚持性和自主性这四个维度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从不同年级小学生在学习品质四个维度的均值和标准差来看，四年级的小学生在学习品质各维度与三年级、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小学生有明显的差异，说明了四

年级的小学生比其他三个年级的小学生在学习品质各维度上相对较好。

**表5:** 小学生学习品质不同年级的差异表

维度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F	Sig
	M±SD	M±SD	M±SD	M±SD		
学习态度	3.33±0.68	3.66±0.88	3.41±0.70	3.40±0.75	0.867	0.461
学业效能	3.36±0.72	3.60±0.89	3.33±0.67	3.58±0.59	0.914	0.438
坚持性	3.35±0.58	3.64±0.88	3.42±0.62	3.52±0.62	0.824	0.484
自主性	3.53±0.71	3.70±0.88	3.60±0.49	3.63±0.63	0.219	0.883

来源: 本研究整理

### 3. 研究数据相关分析

#### 3.1 家庭经济社会环境、家庭亲子关系、家庭教养方式与小学生学习品质的相关分析

想要更为深入地了解家庭经济社会环境、家庭亲子关系、家庭教养方式不同维度和班级氛围不同维度将存在的关联, 对其进行了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见下表6。

**表6:** 家庭经济社会环境、家庭亲子关系、家庭教养方式与小学生学习品质的相关分析

维度	学习态度	学业效能	坚持性	自主性
父亲的文化层次	0.225*	-0.047	0.229*	0.112
母亲的文化层次	0.509**	0.387**	0.448**	0.461**
父亲职业	0.232*	0.162	0.300**	0.297**
母亲职业	0.233*	0.176	0.304**	0.287**
家庭财产	-0.305**	-0.118	-0.179	-0.277**
亲子关系(父亲)	0.374**	0.18	0.352**	0.306**
亲子关系(母亲)	0.393**	0.078	0.279**	0.139
情感温暖(父亲)	0.549**	0.421**	0.558**	0.357**
情感温暖(母亲)	0.688**	0.403**	0.581**	0.401**
焦虑性教养(父亲)	0.208*	0.159	0.264**	0.063
焦虑性教养(母亲)	0.217*	0.065	0.205*	0.099
拒绝(父亲)	0.419**	0.526**	0.447**	0.540**
拒绝(母亲)	0.397**	0.424**	0.417**	0.492**
过度保护(父亲)	0.503**	0.561**	0.581**	0.569**
过度保护(母亲)	0.528**	0.484**	0.544**	0.567**

\*\* 在 0.01 级别(双尾), 相关性显著。

\* 在 0.05 级别(双尾), 相关性显著。

来源: 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采用斯皮尔曼相关分析, 由表6可知家庭经济地位与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关系, 父亲的文化层次维度与学习态度维度和坚持性维度呈显著正相关; 父亲的文化层次维度与学习态



度维度、学业效能维度、坚持性维度、自主性维度呈显著正相关；母亲职业维度和母亲职业与学习态度维度、坚持性维度、自主性维度呈显著正相关；母亲职业维度和母亲职业与学习态度维度、坚持性维度、自主性维度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家庭财产维度与学习态度维度和自主性维度呈负相关；家庭财产维度与学业效能维度和坚持性维度呈不存在相关关系。

## 总结与讨论

由上述分析可知家庭教养方式与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关系，父亲亲子关系维度与学习态度维度、坚持性维度、自主性维度呈显著正相关；父亲亲子关系维度与学业效能维度不存在相关关系；母亲亲子关系维度与学习态度维度与坚持性维度呈显著正相关；母亲亲子关系维度与学业效能维度和自主性维度不存在相关关系；父母情感温暖维度、拒绝维度、过度保护维度与学习态度维度、学业效能维度、坚持性维度、自主性维度呈显著正相关，父母焦虑性教养维度与学习态度维度和坚持性维度呈显著正相关，父母焦虑性教养维度与学业效能维度和自主性维度不存在相关关系。

## 研究建议

### 1. 增进亲子关系

良好的亲子关系对孩子的学习品质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为增进亲子关系，家长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尊重孩子的想法和意见，与孩子平等对话、平等交流，以关爱和肯定为基础，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品质，避免过度批评和谩骂。其次，家长应适时鼓励和欣赏孩子，不仅仅关注考试成绩，而是发现并欣赏孩子的优点，给予他们肯定和认可的成就感。最后，加强沟通也是亲子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家长应倾听孩子的困难和需求，积极理解孩子的心理情况，建立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桥梁。通过这些措施，家长可以改善亲子关系，帮助孩子培养正确的社会观和学习观，以及良好的学习品质，从而促进他们全面发展。

### 2. 完善家庭教养方式

家庭教育对孩子学习生活的引导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改善家庭教养方式，可以有效地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孩子的优良学习品质。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完善家庭教养方式：第一，运用赏识教育，正面引导孩子。赏识教育可以帮助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中感受到被认同、被尊重、被理解，同时也能够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品质。在实施赏识教育的过程中，要积极发现儿童的优势，发自内心地表扬儿童的行为，及时给予积极的引导和鼓励，同时，要注意区分赏识、过度赏识、批评、溺爱几种行为，注意把握赏识教育的尺度，要真正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欣赏、理解、爱护、信任、激励的情感。通过赏识教育来满足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以及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心理诉求，让孩子有正确的自我价值认识，能够清晰的认识

自我，避免受到自卑等负面情绪的影响，遇到困难能够鼓励自己，坚韧不拔的摆脱困境，帮助孩子构建强大的内心，培养良好的学习品质。第二，运用强化理论，耐心指导孩子。家长培养小学生学习品质时，不能只教导孩子要好好学习，成为国家栋梁，为社会做贡献，应注重培养孩子的学习过程体现的学习习惯与学习品质。家长也要注意对孩子的指导，不能因为孩子的不理解而丧失耐心，要始终保持耐心，细心地对孩子进行指导，可以通过自身的示范作用，以及通过不断地强化训练，最终能够帮助孩子理解良好习惯与品质的内涵，并自觉发展自身的学习品质。最后，家长要在孩子产生好的行为时及时进行鼓励和奖励，让孩子有满足感，在孩子产生不当的行为时要及时进行制止，通过不断地强化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品质。

### 3. 完善家校合作方式

加强家校合作，积极与老师沟通。学校作为集中学习的场所，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和受教育情况，家长应当积极进行了解，加强与教师之间的沟通。当前的家校沟通仍然存在一定问题，许多老师通过建立家长微信群来及时告知家长孩子的动态和作业等校内情况，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许多微信群反而变成了家长的负担。学校应当谋求一种能够加强老师和家长沟通的最优方式，比如建立学校网站，一些公开内容可以在网站上进行公布；建立学校网络平台，能够让教师和家长及时进行沟通；积极组织讲座，邀请专家对于家庭教育、家长教养方式等内容进行讲解，帮助家长提升教育素养。家长应当认识到，教育孩子不仅仅是学校的工作，家长更应当担负起教育孩子的重任，与学校、教师形成合力，通过为孩子的学习谋发展。教师应当认识到加强与家长沟通的重要性，用新式有效的沟通代替以前孩子惹祸才叫家长的错误教育方式。培养小学生良好学习习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只有家长和教师共同努力才能够帮助小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品质。

综上所述，家庭环境对小学生学习品质的提高至关重要。建立健康、良好的家庭环境，营造愉悦配合的家庭氛围，培养延缓满足感和自主学习能力，以及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都是促进小学生学习品质提高的可行对策和建议。

### 参考文献

- Gauvain, M., Perez, S.M., & Beebe, H. (2013).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and parental support for children's cognitiv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US: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Kef, S., & Deković, M. (2004). The role of parental and peer support in adolescent's well-being: a comparison of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a visual impairment.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7(4), 453-466.
- Nokali, N.E.E., J. Bachman, H., & Votruba-Drzal, E. (2010). Parent Involvement and Children's Acade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 Development*, 81(3), 988-

1005.

- 候利兵. (2019). *家庭教育对小学生学习习惯的影响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温州大学.
- 李晖. (2005). *3—6岁儿童兴趣发展与家庭教育方式关系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西北师范大学.
- 李丽丽. (2016). *农村小学高年级学生家庭教养方式与学业拖延的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河北大学.
- 刘杰 & 孟会敏. (2009). 关于布朗芬布伦纳发展心理学生态系统理论.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7(2), 124-126.
- 任春荣. (2010). 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的测量技术. *教育学报*, 6(5), 77-82.
- 王宝华, 冯晓霞, 肖树娟 & 苍翠. (2010).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学习品质及入学认知准备之间的关系. *学前教育研究*, 4(04), 3-9.
- 肖磊峰 & 刘坚. (2017).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父母参与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教育科学研究*, (12), 61-66.
- 杨志伟, 刘少文 & 李雪荣. (2000). 儿童行为问题、学业成绩与家庭环境的相关模型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04), 263-266.
- 张璐斐, 张琦光 & 施小菊. (2002). 青春期父母教育方式的调整与亲子关系. *教育理论与实践*, 22(10), 61—64.
- 张珊. (2019). *小学高年级学生学业拖延、家庭教养方式及其关系的调查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曲阜师范大学.
- 张晓, 陈会昌 & 吴巍. (2008). 亲子关系与问题行为的动态相互作用模型: 对儿童早期的追踪研究. *心理学报*, 40(5), 571—582.
- 赵静波. (1999). 初中生智力、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习成绩探讨.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3(4), 234.

## 小学生运用数形结合思想解题实践研究

# A STUDY ON THE USE OF NUMBER AND SHAPE COMBINATION IDEAS TO SOLVE PROBLEMS BY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梁茜雅<sup>1\*</sup>

Xiya Liang<sup>1\*</sup>

<sup>1</sup> 南宁师范大学

<sup>1</sup>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2502774373@qq.com

**摘要:** 本研究通过调查小学生运用数形结合思想解题现状, 基于SPSS20.0对小学三年级学生运用数形结合思想进行解题情况进行录入与统计, 探索存在的问题和分析导致问题的原因。针对分析的结果给出针对性的建议措施找出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原因分析, 在此基础上给出合理教学策略建议, 为在小学数学中渗透数形结合思想提供帮助, 给小学数学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多一份参考, 为学生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养成这一长期工程打好基础。

**关键词:** 小学生, 数形结合思想, 解题实践。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use of number and shape combining ideas to solve problems, enters and counts the number and shape combining idea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third grade based on SPSS20.0, explor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analyses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we give targeted suggestions to identify the problems and analyse the causes, and on this basis, we give reasonable teaching strategy suggestions to help penetrate the idea of combining numbers and shapes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o give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an additional reference in teaching, and to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long-term project of the cultivation of the core literacy of the students in the discipline of the discipline of mathematics.

**Keywords:** Primary School Student, Number and Shape Combined Ideas, Practice Solving Problems

## 引言

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数学课程标准 2022》)的前言中提到:“数学是研究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教育部2022), 尤其强调要重视对学生数学思

想方法的培养，随着大数据时代的降临，数学的优势日益凸显。针对对小学生的数学教学而言，平时要加强培养和训练学生在数学应用上的能力，使得学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活学活用在学校所掌握的思想方法及数学知识。在此基础上，使小学生数学实际应用能力不断提高，并帮助小学生提升解答数学题目的能力。

由此可见，数学思想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数形结合思想是数学思想中较为重要的一种。教师在深度研读剖析课程标准的前提下，要充分意识到数学思想的重要性，才可以在教学中更好地落实课程标准的具体要求，培育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因此，对数形结合思想的研究是落实数学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

## 研究目的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就广西高校安全教育对学生安全意识的影响进行探究，通过实证研究高校安全教育对学生安全意识的影响，对广西高校安全教育的理念、内容、平台、阵地以及学生的安全意识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寻找广西高校安全教育出现的问题，并以此位居寻求有效提升广西高校安全教育和学生安全意识的策略和建议：

(1) 了解广西高校安全教育的现状，剖析广西高校安全教育的理念、内容、平台和阵地，进一步探究提升广西高校安全教育的有效策略。

(2) 了解广西高校学生的安全意识现状，剖析表现学生安全意识的知识、情感、意志和行为，探究如何提高学生安全意识。

(3) 了解高校安全教育与学生安全意识的现状，分析高校安全教育与学生安全意识的关系，进而有针对性提出高校安全教育改进的措施和提高学生安全意识的方法。

## 文献综述

本文以“小学生数形结合思想”、“解题能力”等关键词，通过知网、将小学生运用数形结合思想解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和主要理论进行归纳和呈现，共分为三小节，第一节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认知表征理论、建构主义理论、认知发展阶段理论，第二节为文献梳理，包含关于“小学生数形结合思想”、“解题能力”等研究主题，第三节为研究述评，兹分述如下。

### 1. 理论基础

#### 1.1 认知表征理论

认知表征理论认为，表征是新的知识与头脑中旧知识的碰撞和验证，主要有内外两种形式（金虎男2019）。因此对于小学生而言，数学表征就是数学新知识与已有认知结构之间的对应，其中，数学内部表征是指学生的图式或认知结构，而外部表征则是数学知识的具体体现形式，例如图像、表格、文字等（肖真真2020）。由于内部表征具有隐性的特点，难以具体量



化。因此本研究将对数学的有关外部特征进行重点的研究。即“数”与“形”的表征，每项表征所蕴含的信息有所不同。其中“形”表征比较形象化，但是“数”的表征就相对抽象化一点，但是“数”中所蕴含的数学信息会更加的精准和严谨。“形”表征所传递的信息更加具体和直观，这样学生认知起来比较容易理解。基于此，学生将“数”与“形”表征相结合时能够更好的解决数学问题，两者的结合运用，也能获取更好的有限信息和线索；在学生发现题目中的表征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时，能够通过表征转化寻找更适合的新表征，使得问题能够更好更快的解决，从而使得解题的能力得到提升（朱强2014）。

### 1.2 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constructivism）最早的提出者是皮亚杰（J. Piaget）。他的主要观点是：儿童对于外部世界的相关认知是通过和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慢慢建立起来的，并不是快速形成的。这其中包含了图式的重要概念，图式是一种理解和思考的方式，它是个体内心的一种心理活动的框架或者组织结构，也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个体的认知发展促进了图式的形成和变化，以下三个过程“同化、顺应和平衡”又影响着个体的认知发展。其中，同化是指儿童和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时，会不断的吸收外部的信息来补充自身空白的认知结构。顺应则是指儿童原有的认知结构不能同化外部环境的变化带来的信息，所以要改变自身的认知结构。平衡是指在同化和顺应的演变过程中达到的认知均衡。因此同化的结果是儿童的认知结构数量的不断增加，而顺应的结果是针对儿童已有的认知结构进行了调整 and 改变。儿童就是通过同化、顺应使得自身的认知结构得到了更好的平衡，并使得认知结构也更好的提高、丰富和发展（周起焯、汤广全2020）。

### 1.3 认知发展阶段理论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主要依据是主体建构所形成的认知结构性质，他把 0-15 岁的儿童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中小学年段学生正好处于这一阶段中，所以可以参考皮亚杰提出的对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的观点，构建出小学生认知发展水平的分析框架，为本研究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皮亚杰认为儿童的认知结构会不断的更新和调整，并将儿童的思维发展划分为四阶段（马玉花2020）。根据他的划分，小学高年段的儿童大多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从发展过程来看，是具体运算阶段向形式运算阶段的过渡时期。依据皮亚杰研究可知，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学生的思维具有可逆性，此时儿童进行的运算需要具体实物的支持，不能利用语言、文字陈述的事物和过程为基础来运算。当学生进入形式运算阶段时，思维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思维过程可以不依靠具体的事物而进行，儿童能够利用语言文字的阐述在头脑中想象和思考，进而通过在头脑中重建事物和过程来解决问题。

## 2. 文献梳理

### 2.1 关于数形结合思想内涵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数形结合”的解释众说纷纭，金钟植（2021）认为数学思想是对数学事实与理论经过概括后产生的本质认识，就是掌握数学的精髓而数学思想正是数形结合思想展开的前提。徐斌艳（2003）从以思维理论的角度将数形结合理解为抽象思维对应的数量关系与形象思维下的直观图形相互作用下实现数量关系与图形的转化，进而进行数学问题的研究。罗增儒（1997）从信息加工的目的性角度表述数形结合是具有数学特点的信息转换。

王永春（2017）、马玉花（2020）等研究者认为数形结合思想有“以形助数”、“以数解形”两种形式。学者于珊珊（2020）认为在小学数学中，会使用到实物、线段图、各种图形、数轴等图形解释数量关系，经过“形”，学生对数有更深入的理解；经过“数”，学生对图形有更加准确的认识。“数”具有抽象性，“形”更加的直观具体。

纵观世界数学教育的发展，在毕达哥拉斯时代，数形结合思想就萌芽了（莫里斯，2002）此后便快速向前发展（王永春，2017）。恩格斯认为：“‘数’与‘形’是数学的基本研究对象，他们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Septriwanto（2021）认为在数学学习实践中“数”与“形”的配合运用为解决数学问题提供了方向，有利于将抽象的数学符号同直观形象的图形结合起来，实现由抽象到具体的转化。美国数学家斯蒂恩也指出了“数”和“形”之间相互配合发展的重要性，他谈到：“若一个特定问题，可以被转为一个图形，则思想就整体地把握了问题，而且是创造性地思索了问题的解法。”拉格朗日也认为：代数和几何的发展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缺少任何一方，都会出现发展缓慢，应用范围缩小等现象，为数形结合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依据（孔令伟，2012）。

当今，国外有关数形结合思想的研究还在继续，杨彦（2008）在英国初中的代数课程中要求对某些特定内容（如：函数、不等式解集等）了解它的几何形式。”“英国的数学教育重视实用性，‘用数学’的意识和能力的培养贯穿课程始终。”教材大量的选取了来自学生生活经验的内容，将数形结合思想贯穿于解决问题的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数学学习。从梳理的国外文献来看，其研究主要是从“数”和“形”两者之间的关系上论述的，且研究以初高中居多，小学的研究甚少。目前研究者主要对数形结合思想的内涵以及具体的表现形式进行研究，他们普遍认为数形结合思想就是通过转换数量和图形关系来简化数学问题，从而解决数学问题的一种数学思想，其表现形式有“以形助数”、“以数解形”两种类型。

综上，学界对数形结合的认识未达成统一，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但是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学界普遍认为数形结合“数”与“形”是密切联系的，是不同状态下的表征形式，二者的优势结合了起来，有助于问题的表述和解决，是形象与抽象的有机结合。

## 2.2 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形结合思想方法的研究

在明晰何为数学结合思想后，研究者进一步阐述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形结合思想方法的研究。陈敏、张晶晶（2018）表示数形结合有助于增强数学记忆，而且图形语言在表达抽象数学思维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郑毓信（1995）重点关注数学知识与数学方法之间的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认为数形结合可以将知识讲懂、讲深。数形结合是功能性的互补。“形”让人产生更为直观的直觉思维，为研究提供辅助思考的工具，“数”是让研究走向抽象的方法，将研究走向深入。Lvetal（2013）在研究小学教材的演变进程中，发现对数形结合思想的运用的比重明显增加，这充分说明通过数形结合思想能有效的提升小学数学教学的效果。Yan（2019）认为数形结合的数学思想是数学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助于学生掌握数学难点知识，以及提升解题的效率。Mo（2019）认为在互联网环境下，数形结合思想在教学中可以得到更好的运用，特别是借助互联网实现数向形的转化能极大的提升教学的效果。

综上所述，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形结合思想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数形结合能够促进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发展；数形结合有助于教师对数学知识的讲解。在小学数学中，数形结合表现为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的结合，将抽象的“数”与直观形象的“形”结合起来，“形”便起着一个辅助的作用帮助小学生理解抽象晦涩的概念，同时数形相互联系的整体观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数形结合的功能性互补也应了华罗庚先生的“数无形时少直觉，形少数时难入微”。

## 2.3 小学生解题能力的影响因素

关于小学生数学解题水平的研究一直被认为是数学问题解决及其障碍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学界已形成三种主要论调，

第一，从视空间能力方面、Fen-nema(1985)和Tartre(1985)的研究表明,高、低空间能力的被试只在问题解决方式上存在差异。而Lean(1981)和Clements(1981)的研究发现,数学形象与空间能力、数学操作之间呈负相关:在数学和空间能力的测验上,语词化者要优于形象化者。之所以存在这种结论上的差异,其原因在于这些学者并未考虑问题表征的性质及其与视觉空间认知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小学生数学应用题解决的影响。在提升学生解题能力的研究中，冯敏（2019）认为影响学生解题能力的因素不仅有学生因素，同时还有教师和家庭因素，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学生和教师是最主要的因素，所以改进学生的学习策略、转变学生的学习态度，丰富并优化教师的教学方法是提升学生解题能力的关键举措。

第二，问题表征方式的方式。问题表征是指根据问题所提供的信息和自身已有的知识经验,发现问题的结构,构建自己的问题空间过程。也就是把外部的物理刺激转变为内部心理符号的过程,是主体对问题呈现的内化董妍（2003）。Bowen（1990）指出,问题表征对问题解决有很大影响,问题表征是问题解决者在解决问题时的状态结构。张姝（2021）指出数学是一门

具有很强逻辑性和严谨性的学科，数学知识的抽象性导致一些数学知识很难理解。教师可以采取画图的方式来帮助学生解决问题。纪桂萍(1996)等人将表征方式分为心理表征和形象表征,他们发现图形表征是小学生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表征系统。

第三、场认知方式是指个体在识别客体空间关系特征,对非结构情境的组织以及在认知上重建问题的能力。Witkin (1975) 在研究中发现,场独立性的人能较快地从复杂图形中找到指定的简单图形,这说明他们的认知改组能力强,而场依存性者则不易完成这一操作。Kush (1996) 认为,场独立性者比场依存性者更能从习惯的解题模式中摆脱出来,从而采用新的解题方法。这或许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场独立性的个体具有成熟的元认知技能,学者游旭群,于立身(2000)认为这些在元认知技能方面表现出来的优势特征有助于客体利用自身良好的内部认知参照体系来解决问题。

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发现,对于数形结合与数学问题解决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探索空间能力与几何问题解决的关系上,且缺乏从不同空间能力学生的表征策略方面去探究影响应用题解决的根源。另外在已有研究中,多数研究局限于对小学较高年级儿童的考察,仅有部分研究小学低年级儿童对数形结合的运用及其与数学问题解决的关系。此外,现有研究较少考虑视空间能力与场认知方式对数学问题解决的交互作用。

### 3. 研究述评

通过对文献的整理与分析,笔者发现各国学者在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形结合思想进行了研究,涌现了许多相关的研究成果,不少一线数学教师也从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一些经验,较好的完善了研究的理论知识,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但也存在如下不足。

首先,受数学学科的抽象性特点,小学生和初高中生认知发展水平和思维发展差异影响,我国对小学阶段数形结合思想的研究与初高中阶段渗透数形结合思想的大量研究相比,起步较晚,研究数量较少。多数研究局限于对小学较高年级儿童的考察,仅有部分研究小学低年级儿童对数形结合的运用及其与数学问题解决的关系。因此需要小学数学教师据小学生特点仔细研读教材挖掘出来,小学低年级阶段正是学生打好数学知识基础的重要时期,数形结合思想方法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对学生以后的数学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再者,现有的对数形结合思想方法的教学研究理论性、系统性不足,大多是一线数学教师结合实践经验或教学案例,对某一些教学案例的逐个展示与经验总结,没有从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层次,部分教师仍然注重知识与技能的教学,对教材中蕴含的数形结合思想认识不够、认识浅层次,在教学中的渗透力度不够,并没有发挥数形结合的真正作用。对于分阶段、分年级、分单册教材的具体研究较少,对于“数形结合”领域的研究也很浅表化,大多还是从自身经验谈起,缺少实际调查与反思以及理论提升。



因此，本研究基于运用数形结合思想进行解题的小学生为研究对象，从数形结合的视角出发，切入小学阶段学生解题能力现状，探索小学生运用数形结合思维中所存在的解题问题并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找出提升小学生运用数形结合进行解题的改进策略，为更科学更有效的小学生数学教育提供更有价值和参考的建议。

## 研究方法

在本章中主要阐述研究方法与设计。本章节共分为三小节，第一节为研究方法，第二节为研究思路，第三节为研究架构。各小节分述如下。

### 1. 文献法

通过知网数据库和各高校电子图书查阅，研读国内外论文及专著，掌握和学习本选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通过SPRINGER等渠道获取相关研究文献和实际数据，开拓思路、细心研究，为开展论文研究提供理论保障。

### 2. 测试调查法

本研究基于5位优秀教师的一线经验并参照部分硕士论文编制问卷调查进行研究，针对实际教学情况，参考兴趣调查量表，设计出《小学三年级学生数学解题能力测试题》。以N小学三年级三个班的共150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并实施问卷调查。小学三年级学生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可以进行简单的抽象逻辑思维，但依然需要借助具体事物的支持。

### 3. 个案研究法

通过问卷调查，选取六名在数形结合的运用中具有差异的学生。在针对六名学生运用数形结合思想解题的现状后，对比六名学生的解题思路和学习方式进行个案研究。做到辅优补差，制定针对性的学习计划并结合典型例题探索提升策略。随后选取三名较差学生进行试验，探究其运用数形结合思想解题的能力改变，检验提升策略是否行之有效。

### 4. 访谈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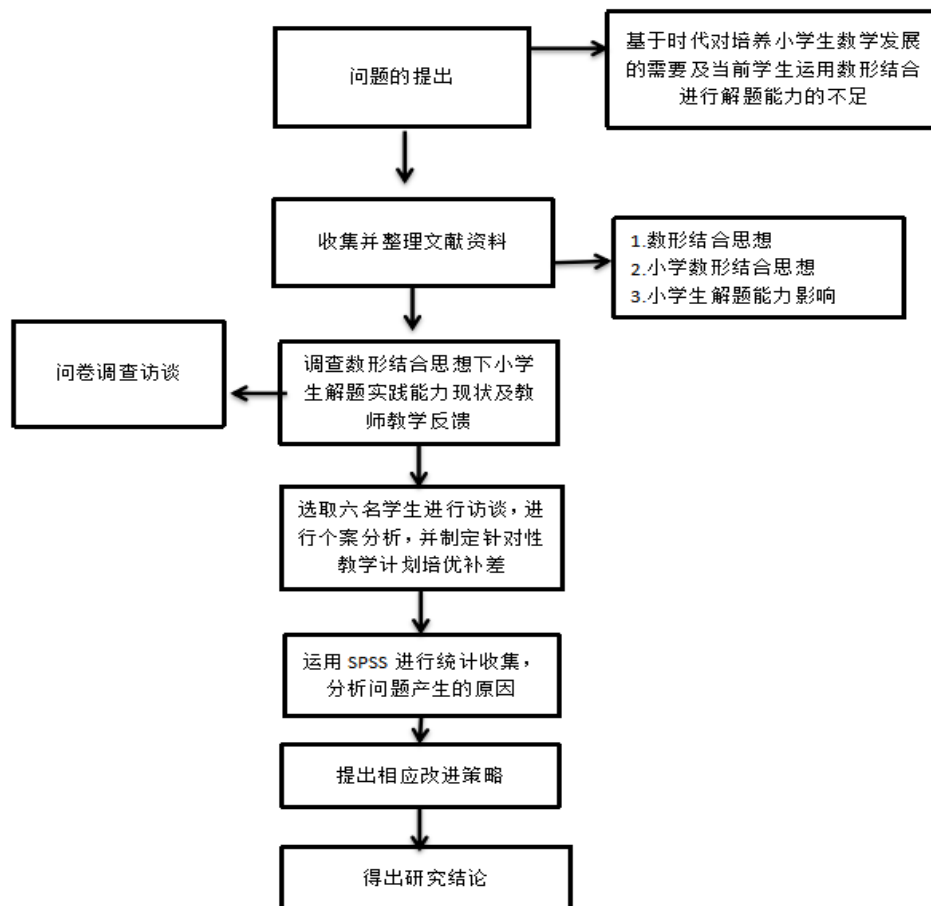
访谈法。杨光伟（2006）在研究学生的元认知行为时采用了类似贝拉尔迪和科莱塔等人的实验的访谈方式，指出某些适当的言语活动能推动人的注意力发生转移，例如提问“你为什么这样做？”激活学生对数形结合的认知能力。本研究也将采用类似的方式向学生提问。以六名具有解题差异的小学生及其授课教师作为访谈对象。当学生描述自己的运用数形结合进行解题行为时，可以了解学生在解题过程对“做什么”进行了选择和计划，了解学生的解题感受，找出小学生在解题时所遭遇的瓶颈，了解小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兴趣与训练效果。

## 研究思路

本文拟以N市 N 小学为例，以N市N小学三年级3个班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如何



将数形结合思想渗透到日常教学中，从而提升学生的解题能力。本文首先通过文献研究法对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在充分了解相关研究领域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从而奠定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通过问卷了解小学生通过数形结合思想解题的能力，分别选取三名数形结合运用能力较好的学生以及数形结合运用能力较差的学生进行访谈，并对其授课教师进行访谈，记录教师反馈。再者对选取的六名学生做出个案分析，制定针对性计划进行培优补差，对比分析培优辅差前后学生解题能力的差异、经过培优辅差的学生和采用传统教学方法学生的解题能力的差异，培优辅差（数形结合思想实践），以此研究数形结合思想是否可以提升学生的解题能力。最后基于SPSS20.0对小学三年级学生运用数形结合思想提进行解题情况进行录入与统计，探索存在的问题和分析导致问题的原因。针对分析的结果给出针对性的建议措施。研究导图如下



### 研究架构

本研究通过调查小学生运用数形结合思想解题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剖析，结合存在问题及产生原因进行讨论分析，提出优化小学生数形结合的解题思维能力的有效策略。小学阶段对学生需要掌握的有关数形结合思想的具体内容，新的课程标准已经做出了明确的界定。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学生还是存在很多涉及学习数形结合思想理解方面和应用数

形结合思想解题方面的问题。基于这种情况，本文提出了采用了测验调查的方法，把一些在学生理解数形结合思想和解决涉及数形结合思想的数学问题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失误的地方找出来，并分析出如何通过改变教师解题教学的课堂形式和授课流程来引领学生突破这些难点，以求达到帮助学生突破难点顺利解决数学问题的研究目的。

## 研究结果

本章主要对小学生运用数形结合思想解题现状问卷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首先对研究数据进行描述分析，接着对各个背景变量进行差异分析、各变量间两两相关分析、中介效应验证等，以此对小学生运用数形结合思想解题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实证检验。

### 1. 研究数据描述分析

本次调查的实施，分别委托了三年级（1）班、三年级（2）班、三年级（3）班的数学老师协助发放。共发放了152份问卷。本次问卷共九道题，我将分为3个维度，第一，学生听课效率（教师概念提及，学生关注教师课堂演示情况，学生关注教师课堂操作情况，教师指导学生操作情况）第二，学生操作能力（学生对习题关键信息标注情况，学生绘图操作情况）第三，影响学生数形结合判断的因素（学生自身对数形结合的判断与理解，教师期待）本问卷的结果通过 Cronbach 信度分析，得到标准化 Cronbach  $\alpha$ 系数为 0.874。说明此份问卷信度高；本问卷的 KMO 值为，大于0.6，说明数据具有效度。

表1：问卷的信度检验

Cronbach 信度分析		
项数	样本量	Cronbach 系数
9	152	0.874

来源：本研究整理

表2：问卷的效度检验

KMO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取样適切性量数	0.6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756.33
	自由度	553
	显著性	0.000

来源：本研究整理

### 2. 数据差异性分析

从表3可知，利用单样本  $t$  检验的方法来探究了男女性别对于各变量的影响。其中，性

别对于组织支持感影响有着明显的差异 ( $P < 0.05$ )。具体来看, 性别对于教师概念提及, 学生对数形结合的理解有着明显影响。其中, 女生的所感知到对于数形结合的理解与操作能力虽普遍低于男生。如学生对数形结合的理解: 男 $2.04 >$ 女 $1.86$ , Sig.  $0.65$ ; 以及学生关注教师动手操作方面 (男 $1.93 >$ 女 $1.87$ , Sig.  $0.03$ ) 都略强于女生。但由于小学低年级学生数学学习有着具体性、直观性、趣味性和模仿性等特点, 他们的记忆模式多为形象记忆和直接记忆, 学习动机也多以兴趣为主导, 而且注意力集中时间不长, 因此他们的认知发展就体现出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的特点。这就形成了他们在运算思维、演算思维、图形思维、空间思维及测量思维方面天然的优势。所以, 小学三年级学段的男生自我评价数形结合的能力虽略高于女生, 但差异显著性并不强。同时, 对于数形结合题目的判断的差别却不是很明显。具体来看, 女性的数形结合判断能力 (女:  $1.50 >$ 男:  $1.46$ , Sig.  $0.727$ ) 以及希望 (女 $3.91 >$ 男:  $3.68$ , Sig.  $0.01$ ) 维度比男性要更加强烈。这也许与两性间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的。此外, 敬业度也有着明显的显著作用 ( $P < 0.05$ )。

**表3:** 各维度在性别上的差异性检测表

维度	男 (M±SD)	女 (M±SD)	t值	P值
教师概念提及	2.17±1.028	1.8±0.861	0.325	0.745
学生关注教师课堂演示	2.01±0.975	1.67±0.928	2.386	0.18
学生关注教师动手操作	1.93±1.04	1.87±0.867	2.196	0.03
学生标注情况	2.04±0.936	1.79±0.866	0.353	0.724
学生动手操作	2.05±0.955	1.77±0.873	1.705	0.09
学生对数形结合的理解	2.04±0.909	2.17±1.028	1.859	0.65
学生期待	1.93±1.063	2.17±1.028	1.236	0.187
数形题目	1.46±0.652	2.17±1.028	-0.350	0.727

来源: 本研究整理

### 3. 研究数据相关分析

如表所示, 从学生听课效率, 对数形结合的理解能力, 对数形结合的操作能力三个维度出发, 学生的听课效率与学生对数形结合的操作能力, 学生的理解能力也与学生数形结合的操作能力, 学生对数形结合的理解能力中听课效率与教师期待影响着学生对数形结合的判断与学生做题热情呈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

因此, 从学生运用数形结合进行解题的现状来看, 学生在课堂上对数形结合知识的掌握程度, 影响着学生理解并运用数形结合进行画图操作解题的效果。此外, 教师是在学生掌握和理解数形结合进行解题的过程中桥梁, 存在不可忽视的作用。

**表4:** 各维度相关性检验表

		学生听课效率	学生操作能力	学生理解能力
学生听课效率	皮尔逊相关性	1		
	Sig.(双尾)			
	个案数			
学生操作能力	皮尔逊相关性	0.894**	1	
	Sig.(双尾)	0.000*		
	个案数	152	152	
学生理解能力	皮尔逊相关性	0.729**	0.704**	1
	Sig.(双尾)	0.01	0.01	
	个案数	152	152	

来源: 本研究整理

#### 4. 研究数据中介效应检验

如表所示, 首先, 当作为自变量学生正确的解题并期待得到老师表扬能够显著影响学生在做题时的操作画图能力这一因变量。其次, 教师在课堂操作中的这一中介变量, 也显著影响着因变量学生在解题时进行操作绘图的喜爱。因此, 教师在课堂上引导与支持学生进行画图解题能够作为中介变量中介学生获得积极解题反馈与学生喜欢运用绘图等数形结合的方式进行解题的影响, 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

**表5:** 教师引导学生进行解题的中介作用检验表

维度	做数学题时, 喜欢画图或者动手操作吗?	老师经常在数学课堂上让你画图或者动手操作吗?	做数学题时, 喜欢画图或者动手操作吗?
你是否期待得到老师的表扬?	0.749** (5.662)	0.523** (3.984)	0.516** (4.012)
老师经常在数学课堂上让你画图或者动手操作吗?	0.646** (10.283)	0.741** (11.895)	0.315** (3.561)
样本量	100	100	100
R <sup>2</sup>	0.519	0.591	0.613
调整R <sup>2</sup>	0.514	0.587	0.605
F 值	F(1, 98)=105.735, p=0.000	F(1, 98)=141.482, p=0.000	F(2, 97)=76.900, p=0.000

来源: 本研究整理

如表所示, 首先, 当作为自变量学生正确的解题并期待得到老师表扬能够显著影响学生在做题时的操作画图能力这一因变量。其次, 教师在课堂操作中的这一中介变量, 也显著影响着因变量学生在解题时进行操作绘图的喜爱。因此, 教师在课堂上引导与支持学生进行画图

解题能够作为中介变量中介学生获得积极解题反馈与学生喜欢运用绘图等数形结合的方式进行解题的影响，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

再次，由表6可知,当学生对题目进行标注作为自变量时,研究教师指导、教师期待对学生对数形结合的运用能力的影响。学生对数形结合操作的喜爱，一部分是受教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动手操作进行的。这说明，教师的课堂引导与支持不仅对学生在解题时进行标注理解有直接效应，同时还产生间接效应促使学生喜欢通过画图 and 动手操作的数形结合的方式进行解题，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6:** 教师课堂指导对学生解读题目信息的中介作用

维度	做数学题时，喜欢画图或者动手操作吗？	老师经常在数学课堂上让你画图或者动手操作吗	做数学题时，喜欢画图或者动手操作吗？
当你进行读题时，是否会标注关键信息并思考？	0.580** (4.421)	0.494** (3.307)	0.389** (3.114)
老师经常在数学课堂上让你画图或者动手操作吗？	0.706** (11.635)	0.725** (10.485)	0.425** (5.334)
样本量	100	100	100
R <sup>2</sup>	0.580	0.529	0.662
调整R <sup>2</sup>	0.576	0.524	0.655
F 值	F(1, 98)=135.367, p=0.00	F (1, 98)=109.936, p=0.000	F(2, 97)=94.925, p=0.000

来源：本研究整理

## 总结与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小学生运用数形结合进行解题能力有待加强，小学生绘图准确度低，易遗漏题目中的关键信息，小学生数学课堂集中能力欠佳。

### 1. 研究建议

#### 1.1 丰富教师利用数形结合进行教学的经验

教师教学经验是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经验丰富的老师能在数学中很自然的渗透数形结合思想，潜移默化中提升学生的解题能力。教师了解数形结合思想的价值，也知道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渗透数形结合思想，但是在教学实践上，往往出现漫无目的的渗透，或是学生对渗透的方式接受程度较低。这就意味着教师缺乏数形结合思想的直接教学经验。此外，以往的老师对数形结合思想的研究不够深入，也缺乏有关数形结合思想的教学课件、案例等内容，因此教师缺乏间接经验的支持和指导，在教学中难以较好的渗透数形结合思想。



### 1.2 教学过程要挖掘教材趣味性

因为部分老师对教材理解不足，未能对教材进行深入挖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渗透数形结合思想的时机、方式产生困惑，也导致不能设置合理适宜的教学情境，进而导致教学偏离目标，数形结合思想渗透失败。访谈得知小学数学教材中渗透大量的数形结合思想，这些思想蕴藏在各个知识点中，这就需要教师根据教材进行深入的挖掘，但是因为自身经验、对数形结合思想认知不全、缺乏重视等原因，教师本身对教材挖掘不够，使得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数形结合思想的渗透不足，并最终偏离教学目标和结果。

### 1.3 教学过程有意识培养学生数形结合意识

有些教师在讲解概念或定理时，会利用图形辅助学生理解知识，但是学生在绘图的过程中比较随意，经常遗漏重要信息，而教师没有多加提醒。部分的老师偶尔训练学生的作图能力，学生的作图能力需要经常培养。总的来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缺乏培养学生数形结合的意识，使得小学生运用数形结合思想解题时出现问题，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在小学数学的学习过程中，会学到一些基本的数学思想，比如本文中用到的数形结合思想，它对数学思维活动的进行以及利用基本数学方法去解决问题至关重要。数学思想是问题解决的重要桥梁，教师要重视学生数学思想的培养，不是机械套用，而是对数学思想有着深入的理解，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处理自己遇到的相关数学问题。学生在课堂中学到的知识如何转化为他们自身的能力，教师的教学过程就是中介物质，将二者连接起来，有助于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与提高。

## 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2.1 问卷设计内容还不够丰富

由于我这次的研究对象是三年级的小学生，考虑到小学生的身心特点，我认为设计太过成人化的语言不能够让学生理解。因此，这次的问卷是由我参照兴趣测量量表，根据学生的理解程度自己设计的。既然不是标准量表，那么在设计的科学性方面就存在不足。例如从问卷的题目数量来看，问卷共9题选择题，题量小，不便于更准确地测量出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值。从内容来看，内容的叙述上比较贴近小学生的思维理解，叙述较为随意，不够规范，严谨性还不够，容易产生歧义，从而导致一些误差。

### 2.2 六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人数较少

因为考虑到这6名学生的不同学习特点的学习能力，认为有3名学生是班级中数形结合的解题自我评价较高的同学和3名自我评价较低的同学，因此只研究了这6名同学。但如果研究人数变多后，可能对结果会有影响。因此应该多考虑让更多的人作为被试进行研究，这样得出的数据可能更可靠，更有说服力。□

### 2.3 充分利用多种资源进行研究□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感到困难重重。一方面，对问卷的设计都是亲力亲为，□但却设计的不够合理，不够规范，如果能够得到专家的知道，设计出更加科学的兴趣量表，那么所得到的数据的可信性更强。另一方面，对6名学生进行访谈辅导的时候，我都感到整个过程十分疲惫，如果在研究之前能够调动其他教师参与进来，可能研究的时效性会更强些。□

### 2.4 研究展望

小学阶段是学生养成习惯的重要阶段。数学知识的学习也以良好的学习一点点还没有，在写论文，习惯为基础，有的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上课讲小话、玩东西，发呆等，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在数学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首先，由于数学的严谨性，在数学学习中，教师要规范自己的教学语言，还有板书。学生对数形结合思想的理解，很多时候是通过教师的示范习得的，如果教师在黑板上画图不规范，语言不严谨，势必会带来一些问题。其次，要发挥班级的榜样作用，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有一双会观察的眼睛，及时发现班上同学的闪光点，对于能够用画图解决问题的同学，要加大表扬力度，还要将同学的成果进行展出，让其他同学学习，从而学会使用数形结合思想解决数学问题。除此之外，教师还要寻求家长的支持和配合，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很深远，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家庭教育对小学生的学习习惯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学校教育。因此，教师在对小学生进行行为习惯培养的时候，要取得家长的配合。在家长和老师共同教育、督促、引导下，使得学生自然而然地形成良好的习惯。例如在辅导学生的时候，要给学生提出具体的要求，并采取一定的措施落实。

### 参考文献

- Bowen, C.W. (1990). Representational systems used by graduate students while problem solving in organic synthesi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27(4), 351-370.
- Fennema, E., & Tartre, L.A. (1985). The use of spatial visualization in mathematics by girls and boys.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16(3), 184-206.
- Kush, J.C. (1996). Field-dependence, cognitive abilit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Anglo American and Mexican American student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7(5), 561-575.
- Lean, G., & Clements, M.A. (1981). Spatial ability, visual imagery, and mathematical performance. *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 12(3), 267-299.
- Mo, Z., & Zhou, Y. (2019). Strategies for the Use of Mathematics Textbook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7(07), 197.
- Septriwanto, J.V., Retnowati, E., & Rampean, B.A.O. (2021, May). Adapting solution: mathematical

- thinking abilities that facilitate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in students. In *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 (Vol. 1882, No. 1, p. 012078). IOP Publishing.
- Witkin, H. A., & Berry, J. W. (1975). Psyc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in cross - cultural perspective. *ETS Research Bulletin Series*, 1975(1), i-100.
- Yan, J., & Zheng, J. (2019).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Number and Shape in the Process of Mathematics Lear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9(3), 38-39.
- 陈敏、张晶晶. (2018). 数形结合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教育教学论坛*, 07, 205-206.
- 董妍. (2003). *工作记忆、问题表征方式对小学生数学问题解决影响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
- 冯敏. (2019). *高中生解析几何解题能力水平现状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西北师范大学.
- 胡颖. (2019). *数形结合在小学第二学段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江苏学.
- 纪桂萍, 焦书兰 & 何海东. (1996). 小学生数学问题解决与心理表征. *心理发展与教育*, 01, 29-32.
- 金虎男. (2019). *朝鲜族5年级小学生“数形结合”思想方法的应用案例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延边大学.
- 金钟植. (2021). “数学通性通法”的研究综述及其现实意义. *数学通报*, 01, 32-38.
- 孔令伟. (2012). *数形结合思想方法在高中数学教学与解题中的应用*. 硕士学位论文, 辽宁师范大学.
- 李国敬. (2015). *数形结合在初中数学教学实践中运用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河南大学.
- 李文玲. (2002). “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西部素质教育*, 01-173.
- 刘庆民. (2007). *高中生数学解题教学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曲阜师范大学.
- 卢向敏. (2013). *数形结合方法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硕士学位论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
- 陆天林. (2013). 数学教学中的数形结合. *生物技术世界*, 04-120.
- 罗增儒. (1997). *数学解题学引论*.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马玉花. (2020). *基于数形结合思想的小学“数与代数”教学策略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 莫里斯. (2002). *古今数学思想 (第二册)*.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田丹妹. (2017). *数形结合思想方法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渤海大学.
- 王舒瑶. (2015). *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 王永春. (2017). *学数学思想方法解读及教学案例*.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肖真真. (2020). *小学“数与代数”教学中数形结合思想方法渗透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宁夏师范学院.
- 徐斌艳. (2003). *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 杨彦. (2008). 英国初中代数课程“数形结合”思想研究. *中学数学杂志*, 10, 21-23.
- 游旭群 & 于立身. (2000). 认知特征、场独立型与飞行空间定向关系的研究. *心理学报*, 02, 158- 163.

- 于珊珊. (2020). *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低段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 喻平. (2002). *数学问题解决认知模式及教学理论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
- 张启凤. (2016). “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数学教学的应用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四川师范大学.
- 张姝. (2021). 利用画图培养小学生数学解题能力的研究. *科学咨询 (教育科研)*, 03, 112-113.
- 张艳红. (2016). *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硕士学位论文, 山东师范大学.
- 郑毓信. (1995). *数学教育哲学*.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2)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周起煌 & 汤广全. (2020). 幼儿园教师的角色定位: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视角.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03, 47-51.
- 朱强. (2014). 把握时机, 循序渐进, 逐步提高——解析几何中数形结合思想的应用. *考试周刊*, 19, 47-48.
- 朱智贤. (1994). *儿童心理学*,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新形势下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研究****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EMPLOYMENT STATUS OF GRADUATES MAJOR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孙竹<sup>1\*</sup>Zhu Sun<sup>1\*</sup><sup>1</sup>南宁师范大学<sup>1</sup>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215323679@qq.com

**摘要:** 我国根据人口发展战略制定了“三孩”政策,使得社会对学前教育师资的需求量剧增,但是,我们还处在疫情刚刚结束的拐点,疫情所带来的影响短时间无法消除。在此新形势下,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他们同时也要应对疫情后遗症所带来的更高的挑战。文章对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存在新形势下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现状不容乐观、疫情对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现状存在影响、新形势下就业欲望低、升学成为影响就业现状的重要中介等问题。经调查,影响就业现状的因素涉及个人、学校、社会、国家四个方面,具体包括就业能力、就业观念、对专业的喜爱程度、学校提供的就业指导、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况等。对此,提出了以下优化路径:关注新形势下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提高问题;关注国家方面例如疫情对于就业率的影响;关注个人方面例如就业欲望低、升学等因素对于就业率的影响。希望能够通过此类路径解决新形势下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新形势, 地方院校, 学前教育专业, 毕业生就业。

**Abstract:** China has formulated the "three-child"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which has made the social demand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teachers dramatically. However, we are still at the inflection point where the epidemic has just ended, and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cannot be eliminated in a short time. In this new situation, graduate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ace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employment, but they also have to deal with higher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after-effects of the epidemic. The article conducted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employment status of fresh graduate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in



F school, and found that the employment status of graduate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not optimistic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on the employment status of graduate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low desire for employmen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nd the important intermediary that affects the employment statu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involve four aspects: individual, school, society and country, including employability, employment concept, love of the profession, employment guidance provided by the schoo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country or region. In this regard, the following optimization paths are put forward: pay attention to the employment rate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situation; Focus on national aspects such as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on employment rates; Pay attention to the personal aspects such as low desire for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other factors on the impact of employment rate. It is hoped tha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employ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graduat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can be solved through this kind of path.

**Keywords:** The New Situatio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e-School Education, Graduate Employment

## 引言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但结构性就业矛盾更为凸显，突出表现为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这一问题正在成为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张纪南，2021）。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直接关系民生福祉、经济发展和国家未来。为此，2022年5月13日，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22〕13号），明确提出“深入实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强化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离校前后信息衔接，持续跟进落实实名服务。”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平稳运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企业停工停产，缩减用人需求，高校毕业生面临着诸多就业危机和压力。经济方面，疫情对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侧都有冲击。在宏观经济的AD-AS模型中，引入疫情变量，它会对总供给和总需求都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在总需求方面，疫情改变了构成国民生产总值的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和净出口（NX）；在总供给方面，疫情影响了供给侧的相关要素，如劳动（L）、资本（K）、企业成本（C）、企业的产品与服务的供给（P）等（2020，刘安长）。疫情对就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各类经济体的影响传导所致。其传导机制主要是从供需两侧体现出来：在供给侧，疫情使得假期延长，各种生产性行为停滞，劳动力处于短暂性失业状态，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这部分影响相对短暂，其恢复和后续补救的弹性较大，一旦复工这种

负面影响将会消失；在需求侧，由于对疫情所采取的隔离措施，阻断了各种需求，从而使得相关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影响最大的主要是第三产业的部分行业，如旅游、交通运输、餐饮与住宿、批发零售以及娱乐业等。这部分的影响更大，它需要随着相关产业复苏后才能逐步恢复，这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在这种经济形势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失衡以及长时间的恢复期严重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如何解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成为我们重点关注的问题。

国家政策对大学生就业问题重点关注，经济形势的严峻也让我们不得不迫切地解决这类问题，教育是国民的根本，学前教育更是一个人得到良好启蒙的最佳时机。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办好学前教育、实现幼有所育，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党和政府为老百姓办实事的重大民生工程，关系亿万儿童健康成长，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党和国家事业未来（王紫，2020）。学前教育不断发展，学界对学前教育问题也愈发关注。“三孩”政策的提出为学前教育专业的发展带来契机，但新形势下也给学前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如何在经济缓慢回复的现今留下学前教育专业的一片领域，成了我们需要思考研究的问题。我们需要抓住快速发展的契机，对学前教育毕业生的就业现状进行调查，以期对学前教育专业的发展找寻到良好的相关发展策略。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总数达909万人，比2020年增加35万人（中央人民政府网，2021），人才供应数据庞大，但由于疫情原因，各企业却难以提供足够的岗位，需求较往常来说减少，供需矛盾激化。面对复杂严峻的就业环境，对在新形势下地方院校学前教育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进行调查，了解学前教育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基本情况、就业取向、就业途径、就业地区等，运用访谈法、文献法，调查、研究和归纳学前教育本科毕业生就业现状造成的影响并试图探究其产生的影响因素，为我们进一步地做出针对性的改进策略做准备。

## 研究目的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文献法就新形势下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探究，通过实证研究找出学前教育本科毕业生就业现状的影响因素，并以此为依据找出有效改善学前教育本科毕业生就业现状的策略和建议。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1）通过调查研究F学校学前教育本科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了解学前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基本情况、就业取向、就业途径、就业地区等。

（2）运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文献法，调查、研究和归纳学前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现状并试图探究其产生的影响因素。

（3）通过对学前教育本科应届毕业生就业现状的研究，探索其影响影响现状的因素，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有效的建议。

## 文献综述

### 1. 理论基础

#### 1.1 协同治理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习近平，）。”协同治理理论主要包括协同效应、伺服原理和自组织理论（Sorensen Eva, 2021）。同治理理论最初是运用于公共管理领域，目的是解决政府与市场双失灵的问题。1997年世界银行在《变革世界中的政府》报告中使用了“协同治理”一词，指出协同治理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应通过多方协作治理来应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带来的挑战（Scott Rodney James, 2021）。同治理即在解决公共问题时，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讨论，协同合作，最终形成解决方案，达到“善治”的效果（江怡悦，2021）。协同治理理论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提倡参与主体的多元；二是注重治理过程的协同；三是强调治理目标的一致。

协同治理理论与本文的适切性在于，对新形势下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试图破解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的困境，这是一个各方主体参与的过程，国家、学校、毕业生等主体皆参与到破解该问题的途中，应注意运用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对毕业生就业问题进行破解。另外，各主体在参与过程中的目的一致，都是为了解决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在试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各主体应保持协同的态度，共同面对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问题。

#### 1.2 马克思就业理论

马克思就业理论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资本主义社会就业的理论包括劳动者工资理论、劳动分工理论、相对人口过剩理论，二是对未来社会就业的设想，包括社会普遍就业理论、劳动力资源配置理论、职业选择理论（李敏敏，2021）。我国的历代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就业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就我国的就业问题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成果，对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李长玉，2015）。马克思就业理论为新形势下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状况同样给予了理论支撑。

马克思说，在进行职业选择的时候，经济生活条件是基础，只有当我们生活没有压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自由地选择让我们最有尊严的职业。他认为，人类对于职业的选择，应该选择适合自己、使自己和社会得到提高的职业，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才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982）。克思在职业的选择上有所建议，第一我们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可以听取父母的意见。他们的阅历比我们丰富，远能看见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现象与问题。第二，在选择职业时不可凭借一时的冲动进行选择。第三，职业选择与我们的社会关系相关联。第四，只有体质强健的身体才能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第五，要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职业。

马克思就业理论与本文的适切性在于，马克思的一些对于职业选择的的思想可以为毕业生做出参考，导致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其主体思想方面的问题，马克思就业理论所涉及的相关思想可以为解决这方面问题做出策略参考。

### 1.3 就业能力理论

就业能力也称“就业力”或“就业竞争力”，该概念是1909年由一位名叫贝弗里奇的英国经济学家提出的，他认为就业能力是个体获得工作和保持工作的能力（汤迪娟，2020）。可将学历层次、专业知识、学生干部经历、学习成绩、综合素质、实践经历等归入大学生就业能力。这些方面越具有优势的大学生，其就业能力就越强（王雪，2020）。“就业能力”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随后在北美及欧洲的西方国家传播和普及。Beveridge（1909）是英国20世纪中叶研究失业问题的专家，他在研究制定战后社会保障计划的同时，提出了“就业能力”的概念。到20世纪末，英国职业研究所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Studies) 的研究者Hillage和Pollard（1998）给英国国家教育就业部提供的一份报告中，认为就业能力是“个体获得并维持职业，在组织中适应不同角色，并在工作过程中获得具有安全感和满意度的工作的能力（康廷虎，2014）。

就业能力由个体人格品质、专业知识掌握与运用能力、职业获取和发展能力构成。个体人格品质包括个体内在修养、情绪控制能力、宜人亲和能力、个体生活态度、个体精神风貌、积极进取态度；专业知识掌握与运用能力包括知识获取能力、知识领悟能力、知识应用能力、知识思维能力、知识反思能力、知识开拓能力；职业获取与发展能力包括礼仪谈吐风度、沟通交流能力、独立工作能力、主动合作能力、适应环境能力、自我舒压能力（杨艳，2012）。

对于就业能力的架构，有学者提出了就业能力员工素质模型。例如美国学者Lyle·M·Spencer, Signe·M·Spencer在1993年，提出了著名的“素质冰山模型”。美国研究者R·博亚特兹在2011年提出了“素质洋葱模型”，层次性地展示了素质构成的核心要素。“素质冰山模型”以“山”为形象架构，“山”的下半部分是“深层特征”，“山”的上部分是“基础特征”，“深层特征”包括角色定位、自我认知、价值观、品质、动机，“基础特征”包括知识与技能。“素质洋葱模型”与冰山模型本质内容差别不是很多，但是洋葱模型对就业能力的表述更突出其层次性，在这个模型中最表层的是知识和技能，从表层按顺序深入到里层，越来越深入，最里层、最核心的是动机和个性，是个体最深层次的特征（杨勇，2016）。

就业能力理论与本文的适切性在于，就业能力理论给予我们对就业能力具体内容有所标准，在探究如何提升新形势下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提供分析框架。

## 2. 文献梳理

### 2.1 不同视域下大学生就业的相关研究

通过中国知网查阅“大学生就业”、“视域”关键词结果得知，学术期刊有350篇，学位论文



文有44篇，会议由9篇，报纸有1篇。其中，包含有“双创”视域、“三全育人”视域、“大思政”视域、产教融合视域、乡村振兴视域、增值评价视域、创新培育视域、大数据视域、协同视域、思想政治教育视域、“实践育人”视域、互联网视域、教育供给侧改革视域、人力资本理论视域、高校辅导员视域、深度访谈视域、“一带一路”视域、社会心理学视域、“校企合作”视域、马克思就业理论视域、“互联网+”视域、新媒体视域、精准扶贫视域、社团参与视域、工匠精神视域、性别平等视域、协同育人视域等从不同学科、不同理论的角度对大学生就业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研究。

周振（2023）开展了“双创”视域下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的研究。“双创”具体指两方面，分别为“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sup>[10]</sup>简而言之，“双创”就是创业与创新，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就业促进创业。在“双创”视域下，周振认为，推进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的重要意义有四点，第一推动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二提升高校大学生自身价值；第三助力产业结构的变革；第四缓解当前严峻的就业压力。当前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过程中的问题存在三点，第一“双创”理念未深入人心、落到实处；第二学生自身因素的阻碍；第三配套服务机制不成熟。对此，提出了解决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问题的具体策略，第一点是提升高校教师的专业素养；第二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第三优化与提升配套服务机制。

赵纯（2022）提出了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路径。作者认为，在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学习环境和就业环境出现了较大变化，就业挑战和机遇两者并存。高校作为输出人才的场所，需要积极优化创新大学生就业指导体系，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解决大学生社会就业矛盾问题。新媒体为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迎来机遇，表现为就业指导形式更丰富、就业指导内容更多元、就业指导路径更多维这三个方面。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也存在着几方面的问题，即就业指导教师新媒体素养不高、就业指导形式单一、就业指导内容狭隘、就业指导路径过少。对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第一，组建一支“专新合一”的就业导师队伍；第二，利用融媒体平台丰富就业指导形式；第三，研发就业指导APP，构建“双维多元”课程体系；第四，构建线上线下“双轨制”就业指导体系。

从已有研究来看，学者们对大学生就业的问题从不同视域下提出了相关解决策略，研究结果较为丰富，从不同方面对大学生就业问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为新形势下解决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就业问题提供了思路。

## 2.2 新形势下大学生就业的相关研究

聚焦新形势下大学生就业的相关研究，检索“新形势”“大学生就业”，共找到1911条文献，归纳研究结果可知，对新形势下大学生就业问题从不同方面展开了研究，包括大学生就业的现象原因与对策、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与对策、精准帮扶与指导、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就业



指导、就业指导水平提升、树立正确就业观、大学生就业创新实践、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与就业质量、大学生就业信心指数分析、农业院校大学生就业、工科大学生就业、促进大学生就业创新体制机制、大学生就业价值观教育路径、共青团服务大学生就业等研究。

新形势下，我国高校数量不断增加，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加，客观上存在了一定程度上的就业压力，因为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一客观现状问题，很多高校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服务工作（宫千千，2022）。

田洪伟（2023）开展了新形势下大学生“慢就业”现象原因与对策研究。他指出，“慢就业”，是指大学生毕业以后，既不打算就业，也不打算深造，而是打算在家中做一些与职业无关的事情，或者等待适合自己职业的一种现象。近年来，有一些大学生毕业后准备“慢就业”，且“慢就业”大学毕业生占比有年年攀升的趋势。作者首先从“慢就业”发展的趋势、表现形式、选择的原因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再指出了新形势下“慢就业”原因及影响，即“慢就业”与内外外部环境、就业能力密切相关，且产生了不良影响包括耗费了宝贵的青春时光、逐渐消沉了心志、浪费国家和家庭的资源。最后，提出了新形势下“慢就业”的应对策略，即明晰大学生就业规划、给予大学生心理疏导、培养大学生核心竞争力。

魏冲等（2022）对新形势下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与就业质量展开了研究。作者指出，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与就业质量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也是高校与企业发展的关键，新形势下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与就业质量十分必要。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与就业质量是劳动者自由发展的前提，是劳动者幸福之源。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和就业质量的困境在于，市场调节作用和政府的调控力有限，且部分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因此，在政府方面，应做好“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学校方面应加强就业、创业指导与搭建实践平台；企业方面加强多方合作与提高人才能力；大学毕业生要调节好就业观；教师方面应创新教学模式。

从已有研究来看，对于新形势下大学生就业的相关研究，学者们大多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原因、应对策略方面进行研究，也有较丰富的新形势下毕业生就业现状的实证研究，但针对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实证研究较少。

### 2.3 地方院校大学生就业的相关研究

在中国知网中检索“地方院校”“大学生就业”，共找到229条结果，其中对于地方院校大学生就业有学者从不同视域下对其进行探究，但数量相对较少，大多是提升地方院校大学生就业能力等相关的研究。相较于前文所提到的对“视域”“大学生就业”进行检索的结果，聚焦地方院校其结果从某某视域下的研究数量就相对而言较少，其内容也多是原因分析与对策建议，或者是对现状与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有学者更聚焦于具体的专业，对该专业下的毕业生就业问题进行现状、原因、影响因素、对策等相关研究。

李顺江（2014）以曲靖师范学院为例对地方院校大学生的就业现状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导致大学生就业现状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国家、地区经济状况；第二，学校的培养方式和软硬件水平；第三，少数学生的就业能力不足和就业观念陈旧。并对改进毕业生就业现状提出对策和建议，第一，政府多角度多层次地为大学毕业生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学校要努力培养出迎合市场需求的优质大学毕业生；大学生要努力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适应社会需求。

莫吉红等（2020）以衡阳师范学院为例对地方师范院校女大学生就业现状与对策进行分析。作业对现状进行总结，近些年来，地方师范院校女毕业生的择业多追求稳定、实惠以及发展，反而缺乏一定的吃苦耐劳精神，导致选择国家基层项目锻炼的人数降低。最后提出地方师范院校女大学生就业难的对策，首先，应建立健全的招生政策和就业制度；其次，要优化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再次，应提高女大学生的自身能力。解决地方师范院校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需要社会、学校以及个人的共同努力，政府通过为女大学生提供就业保障，学校要加强落实女大学生的就业工作指导，而女大学生则要不断提升自身能力，才能进一步提高地方师范院校女大学生就业率。王有斌（2018）等也把研究对象聚焦于师范院校中的女大学生，对地方师范院校女大学生就业现状与对策进行了研究。

从已有研究来看，大学生就业的研究聚焦于“地方院校”也多是对问题、原因、影响因素以及对策进行研究，对现状的调查研究也较为丰富，但具体对地方院校中的学前教育专业的实证研究较少，学者们针对不同的研究主体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 2.4 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的相关研究

在中国知网中检索“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共找到102条结果。毛永贤（2020）对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意向及影响因素展开了分析研究。分别从就业认知、就业期望、就业能力、自我认知与职业认知四个方面阐述。其中，就业认知方面包括毕业后的打算、是否有就业规划、对就业前景的认识、创新意识不浓厚、创业动力不足；就业期望方面包括对期望就业区域的意向、对期望用人单位的意向、期望薪酬、就业价值观；就业能力包括求职信息需求、就业途径多样；自我认知与职业认知方面包括优势认知、劣势认知、他人的意见对自己就业选择的影响、对招聘单位意向的认知、期望从事第一份工作的时间。

常慧（2020）就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展开相关研究。指出，就业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一下几点，第一，缺乏健全的就业促进制度体系；第二，培养与就业之间统筹机制不完善；第三，幼教观念与学前教育发展不一致；第四，幼儿园发展滞后于社会发展。并且针对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对策，作者认为，我们可以建立健全就业促进制度体系，强化学前教育毕业生职业技能训练，学校与幼儿园需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政府应提高重视程度与关注

度，进行规范管理。

部分学者直接对优化大学生就业提出建议，Vinson（2011）建议增加大学生就业服务机构的独立性，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为大学生就业提供职业咨询、职业评价、就业准备、校园招聘等多样化的服务，帮助他们寻找合适的就业机会，对于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提升也非常有好处，可以匹配用人单位的需求和大学生就业的技能。Dennis和Ruth（2020）从三所澳大利亚大学的毕业生那里收集了相关数据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通过参加技能培训、建立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参与创造就业机会的活动，对于提升学生就业能力的效果比扩大关系网和改善职业成果所获得的效果更明显。Roger（2015）指出，政府加大对就业公共服务的政策支持或者财政扶持力度，能够提升大学生就业技能与就业市场需求的匹配度，并且可以有效降低失业人员为了找工作付出的成本以及承受的压力。

已有研究显示，从研究对象来看，对高校、高职院校、应用型本科中的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研究较多，主要是根据学历层次的不同分别对学前教育专业的毕业生展开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从现状的调查、就业意向的调查、就业质量、就业竞争力、就业心理、对策方面等来展开研究。

### 3. 研究述评

综上，在现有研究中，“新形势下”、“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就业现状”这些关键词汇与“毕业生就业”两两组合在一起的相关研究较多，但是将研究主题更加聚焦则相关文献较少，特别是对于新形势下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现状的实证研究更少。总体来说，相关实证研究的数量较多，但是聚焦于“新形势下”或者说“地方院校”则文献数量就大大减少。所以，在新形势下将现在国家与社会都非常关注的“毕业生就业”问题聚焦于“地方院校”与“学前教育专业”，运用实证研究的方式最终能够有针对性地对毕业生就业问题提出思考。

## 研究方法

### 1. 研究假设

#### 1.1 就业现状

岳昌君（2019）认为就业状况包括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两个方面。劳动者的就业状况可以从就业数量、就业质量、工作稳定性，劳动强度、就业满意度等几个方面来反映。毕业生所找工作的起薪、福利待遇、就业地区、就业行业、单位性质、职业类型等就业状况均会显著影响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邹昕（2022）认为就业质量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包含工作性质、聘用条件、工作稳定性、职工培训、工作环境等一些基本因素。肖羨君（2013）认为就业质量方面涉及五个方面，第一，就业效果，包括就业率、专业对口率、就业稳定性；第二，工资福利待遇，包括工资收入、福利待遇；第三，工作环境，包括工作时间、工作压力、工作强度、幼

儿园工作设施；第四，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住房公积金；第五，毕业生职业发展，包括职后教育情况、职业竞升情况。

据此，结合调查对象的实际情况，对于就业现状的衡量标准可以假设包含基本信息、就业率、就业信息、就业效果、工作环境、工资福利待遇这六方面因素，其中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和学历，就业信息包含所在工作单位、就业地区、就业途径，就业效果包括专业对口率、就业稳定性，工作环境包括工作设施、工作时间、工作压力、工作强度，工资福利待遇包括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

## 1.2 影响因素

李顺江（2014）认为导致大学生就业现状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国家、地区经济状况；第二，学校的培养方式和软硬件水平；第三，少数学生的就业能力不足和就业观念陈旧。根据这种分析思路，对于导致就业现状的原因我们可从国家、学校、个人这三个层面出发来进行假设。魏冲等（2022）认为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和就业质量的困境在于，市场调节作用和政府的调控力有限，且部分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存在不合理的现象。

据此，可假设是从个人、学校、社会、国家这四个方面来影响其毕业现状。从个人层面来说，假设影响因素包含大学生就业能力、就业观念、对专业的喜爱程度；从学校层面来说，假设影响因素包含学校提供的就业指导；从国家层面来说，假设影响因素包含国家、地区经济状况；从社会层面来讲，假设影响因素包含社会大众对专业的看法等。综上，我们可以假设影响新形势下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现状的因素包含个人、学校、社会、国家这四个方面，具体指的是就业能力、就业观念、对专业的喜爱程度、学校提供的就业指导、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况等。

## 2. 研究方法

### 2.1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探究新形势下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了解影响毕业生就业的相关因素，以便进一步提出解决目前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存在问题的对策。

在实际调研中，主要采用问卷星的形式进行网络调查和数据收集，从而获得第一手数据，据此分析就业情况，包含基本信息、就业率、就业信息、就业效果、工作环境、工资福利待遇等，在就业现状的影响因素方面也得到了有关个人、学校、社会、国家层面的相关数据，为接下来提出如何改善新形势下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提供更为客观和可操作的数据支持。

通过前期对地方院校就业办负责人、部分系主任和部分毕业生的访谈结果，有针对性



地设计了该学校毕业生就业现状的调查问卷。问卷采用匿名方式，尽可能体现被调查者的真实想法，保证调研数据的准确和真实。问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单选题；第二部分为多选题；第三部分为主观题。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主要是对基本信息、就业率、就业信息、就业效果、工作环境、工资福利待遇以及从个人、学校、社会、国家方面出发有关影响就业现状的因素等进行调查，第三部分则是征询改善地方院校毕业生就业现状的想法。

## 2.2 访谈法

为准确分析新形势下地方院校学前教育本科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通过访谈方式对F学校就业办负责人、部分系主任以及部分毕业生等相关人员进行访谈。访谈是通过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方式，清楚直观地了解受访者关于此类问题的看法。根据访谈对象、内容等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访谈形式。

对就业办负责人可以了解政府对学院毕业生就业的政策与保障、学院就业服务现状、学生对就业形势的认知情况、校企合作的发展现状、学生家长对就业的想法等；对系主任可以了解政府对该地方院校的评估标准、系部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状况、学风建设情况、专业设置对学生就业的影响、与学生家长关于学生就业的交流心得、与学生实习单位的交流反馈等；考虑到刚毕业的大学生对就业形势感触更深，加上前几届毕业生的联系较为困难，研究可以以部分应届毕业生为访谈对象，受系部学工负责人的协助，通过对应届毕业生代表采取电话访谈的形式，了解毕业生的就业态度、在就业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就业政策知晓度以及对学院就业指导工作的评价等（凌辰，2022）。

基于本研究的目的及拟要解决的问题，并参考以上相关理论，从以下方面设计本研究的访问提纲：通过对该地方院校就业办负责人采取个别访谈的形式，了解政府对学院毕业生就业的政策与保障、学院就业服务现状、校企合作的发展现状、疫情期间就业现状、新形势下就业策略；对系主任采取个人访谈的形式，了解政府对该地方院校的评估标准、系部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状况、学风建设情况、专业设置对学生就业的影响、与学生家长关于学生就业的交流心得、与学生实习单位的交流反馈等；对应届毕业生代表采取电话访谈的形式，了解毕业生的就业态度、对待专业的态度、在就业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对学院就业指导工作的评价。

## 2.3 文献法

通过知网数据库和各高校电子图书查阅，研读国内外论文及专著，掌握和学习本选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通过广西统计网、广西教育厅网站和系统等渠道获取相关研究文献和实际数据，开拓思路、细心研究，为开展论文研究提供了理论保障。

本文中的文献研究主要围绕“新形势下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状况”这一主题，查阅并收集整理各国论文、期刊、专著等的相关文献资料，从而及时、准确地把握该领



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为保证文献资料收集的科学与连贯性，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了文献研究：

一是资料收集方面。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作为文献资料收集的主要来源，在研究初期针对本研究相关主题内容进行资料的搜寻与整理。在中文文献收集的过程中，对“新形势下”、“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及“毕业生就业”以及它们互相组合在一起的相关研究进行基础资料的收集，外文文献主要从文献资料中学习借鉴和引用。

二是文献资料鉴别方面。对前一阶段收集的文献资料进行大量阅读，对收集到的资料按研究的相关度进行分类，对研究内容不完整、研究观点不明确、研究内容不相符的资料进行剔除，将与本研究结合度较高的文献进行分类存储，有助于下个阶段的文献借鉴引用。

三是观点加工和文献补充方面。在这一阶段，主要对已分类的文献资料进行二次研读，对各学者的研究观点进行交叉比对和分析引用。同时，结合当下研究继续补充完善文献资料。

本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法，理清了“新形势下”、“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及“毕业生就业”的定义和相关的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因素，加深了对研究主题的认识，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 研究结论

### 1. 新形势下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现状不容乐观

根据《学前教育本科应届毕业生就业现状的调查问卷》的内容来看，就业现状包括基本信息、就业率、就业信息、就业效果、工作环境、工资福利待遇。其中，就业率、就业效果、工作环境、工资福利待遇这四个维度更能反应就业现状。

是否处于待业状态代表就业率。据调查，从是否处于待业状态分布上，大部分样本为“否”，比例是68.00%。另外“是”样本的比例是32.00%。结果表明，占调查总人数的32.00%都处于待业状态。

就业效果包括专业对口率、就业稳定性。专业对口率体现在“工作和你所学的专业是否对口”，就业稳定性体现在“目前是否想更换工作”、“更换工作单位的次数情况”。从工作和你所学专业是否对口来看，样本中只有38.00%会选择“完全对口”。从目前是否想更换工作来看，样本中有超过3成的样本为“目前待业”。

工作环境包括工作设施、工作时间、工作压力、工作强度这四个维度。从工作设施来看，仅有25.00%表示很好。从工作时间分布上，大部分样本为“10小时/天以上”，比例是33.00%。从工作压力分布上，仍有21.00%表示压力很大。从工作强度来看，仅有21.00%表示强度小，有16.00%表示强度大。

工资福利待遇包括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两个维度。工资收入体现在“工资待遇”，福利

待遇体现在“是否有奖金”、“是否有补贴”、“是否有带薪休假”、“是否办理社会保险”。从是否有奖金分布来看，样本大部分为“有”占比为37.00%，但是“没有”也占据了31.00%的比例。对于是否有补贴来讲，“有”占比最高为36.00%，“没有”也占据了不小的比例32.00%。从是否有带薪休假来看，“有”的比例为61.00%。从是否办理社会保险来看，样本中有43.00%为“全部办理”。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现状不容乐观。具体表现为“目前待业”的人员较多，虽然比不上已就业人数，但也占了不小的比例，在专业对口率中“有关联”跟“完全不对口”也占比不少，专业是否对口的现状呈现一般。工作时间大部分样本为“10小时/天以上”，工作时间较长，总体而言呈现出“不乐观”的就业现状，并且问题集中体现在就业率上，“目前待业”的人数较多。

### 2. 疫情对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现状存在影响

在疫情对就业现状的影响（国家层面）与就业率的相关分析中，利用卡方检验去研究是否处于待业状态分别和疫情对就业现状的影响共1项之间的相关关系，疫情对就业现状的影响对于是否处于待业状态呈现出0.05水平显著性( $\chi^2=8.728, p=0.013<0.05$ )，总结可知：疫情对就业现状的影响大小判断对于不同的待业状态全部均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从而得出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

结果表明，疫情对于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现状存在影响，在处于疫情拐点的新形势背景下，明确疫情给予就业现状是积极还是消极影响在新形势的背景下是一件十分重要的问题。

### 3. 新形势下就业欲望低、升学成为影响就业现状的重要中介

在个人层面就业现状影响因素——就业欲望低的中介效应检验中，检验结果为部分中介，表明就业欲望低对就业现状有着一定的影响。在个人层面就业现状影响因素——升学的中介效应检验中，检验结果为完全中介，表明升学是影响就业现状的重要因素，与就业现状息息相关。

基于前文对于新形势的界定，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疫情的拐点时刻，处于疫情的拐点，部分毕业生“就业欲望低”，“升学”欲望强烈，显著影响着就业率的大小。自此，应更加关注个人方面例如就业欲望低、升学等因素对于就业率的影响。

## 研究建议

### 1. 关注新形势下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提高问题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新形势下地方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不容乐观，本研究旨在对就业现状做出调查，并为之后的研究做出铺垫，自此，关注新形势下地方院校学

前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生生的就业率提高问题是本次研究发现的第一大研究问题。

首先，引导学生做好职业规划，推进就业指导工作。职业规划是学生根据自身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确定自己的职业发展目标，确定实现这一目标的职业，并且据此制定相应的能力提升计划，包括各种教育培训、社会实践等采取必要的行动，在一定时间内实现职业生涯目标的过程。其次，加强校企合作，实现共赢。应该加大与企业的合作力度，充分倾听企业“声音”，在对企业人才需求进行调研分析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设置专业和课程体系，确定人才培养的方向，真正将企业对人才职业能力和素质的需求与教学计划、知识传授相融合，落实在学校的实践和理论教学当中。最后，借助信息技术，提升毕业生就业率。当今是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地方院校需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培养更多符合现代社会需要、面向新生行业的实用技术型人才。

### **2. 关注国家方面例如疫情对于就业率的影响**

数据显示，疫情显著影响着就业率，关注国家方面例如疫情对于就业率的影响是本次研究发现的第二大研究问题。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迅速席卷全球，对世界多国的经济发展都造成深刻影响，在这次抗击疫情的斗争中，中国表现出色，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虽然现在全国各地早已复工复产，但在疫情爆发初期，很多企业面临生存困境，一批小微企业直接倒闭关门，受疫情重创的地区和一些受重创的行业仍需要长时间的恢复。为了缓解生产经营的压力，很多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纷纷减少招聘计划，甚至大批量裁员来降低人力成本，维持企业基本运行。企业招聘需求的减少，增加了地方院校毕业生的求职压力。因为企业裁员，增加了社会上失业人员总量，这些有工作经验的人重新进入求职市场，也增加了毕业生就业的压力。

疫情发生后，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开发、共享了一批线上就业创业讲座和就业创业精品课程，汇总发布就业创业政策汇编和公布就业创业网站，积极推动网上面试、网上签约，我们应不断提升自己运用新技术的能力，放下“观望”心理，提高主动求职的积极性。

### **3. 关注个人方面例如就业欲望低、升学等因素对于就业率的影响**

调查数据表明，个人方面的因素对于就业率的有影响，其中升学是影响就业率的主要因素，对于就业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关注个人方面例如就业欲望低、升学等因素对于就业率的影响是本次研究发现的第三大研究问题。

我们应关注学生个人因素方面对于就业率的影响，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缓解就业焦虑

。随着疫情爆发，一些抗风险能力弱的企业倒闭关门，维持稳定运营成为大部分企业在特殊时期的保守选择，很多企业通过裁员或者缩减人才招聘计划来降低成本，抗击风险。新形势下处于疫情的拐点，但疫情带来的影响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消失殆尽。地方院校要密切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增加对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投入力度，不断提升心理健康教师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通过课堂讲解、集体讲座、私下心理咨询等方式来缓解学生的就业焦虑感。在升学方面，“考研热”更是新形势下关注的热点问题，求学固然值得提倡，但是随之而来的心理问题需要专家、学者们重点解决。

### 参考文献

- Fougère, D., Pradel, J., & Roger, M. (2009). Does the 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 affect search effort and outcom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53(7), 846-869.
- Jackson, D., & Bridgstock, R. (2021). What actually works to enhance graduate employability? The relative value of curricular, co-curricular, and extra-curricular learning and paid work. *Higher Education*, 81(4), 723-739.
- Scott, R.J., & Merton, E.R. (2021).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 the goal-committed get going: overcoming 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inter-agenc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3(11), 1640-1663.
- Sørensen, E., & Torfing, J. (2021). Radical and disruptive answers to downstream problems i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3(11), 1590-1611.
- Vinson, B.M., Reardon, R.C., & Bertoch, S.C. (2011). Current Status of Career Services 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chnical Report*, No. 52.
- 段文章. (2020). 学前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选择调查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河北大学.
- 何亦淑. (2020). 幼儿园学前教育专业发展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eds.) *2020全国教育教学创新与发展高端论坛会议论文集(卷三)*, pp.156-158.
- 黄蓉. (2020). 新时期学前教育发展的路径探索. (eds.) *2020年“教育教学创新研究”高峰论坛论文集*, pp.474-475.
-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8).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上)*.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康廷虎. (2014). *大学生就业能力论*.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李理. (2020). *中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就业力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 刘安长. (2020). “新冠”疫情对我国的经济冲击及财政的对冲政策——“非典”疫情下的对比分析. *兰州学刊*(04), 59-70.
- 刘素华. (2005). 就业质量: 概念、内容及其对就业数量的影响. *人口与计划生育*(07), 29-31.

- 陆春艳. (2022).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发展. (eds.) *课程教育探索学术论坛论文集 (一)*, pp.11-13.
- 庞芳琪. (2021). “双创”人才培养视域下大学生创业就业对策探究.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06)*, 83-85.
- 肖羨君. (2013). *中等职业学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湖南师范大.
- 尹莹莹. (2017). *中等职业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就业取向调查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四川师范大学.
- 岳昌君, 夏洁 & 邱文琪. (2020). 201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实证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04)*, 1-17.
- 张成军, 曹玉萍 & 董娜. (2023). 我国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文献综述研究 (eds.). *第六届生活教育学术论坛论文集*, pp. 353-355.
- 张智慧. (2021). 顶岗实习发展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实践的全过程管控模式. (eds.) *华南教育信息化研究经验交流会2021 论文汇编 (三)*, pp. 2014-2020 .
- 郑伟群. (2018). *应用型高等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就业与职业生涯规划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福建师范大.



##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NURSES' OCCUPATIONAL IDENTITY ON JOB ENGAGEMENT IN INCLUSIVE PRIVATE PARKS**

**Suping Yang <sup>1\*</sup>**

<sup>1</sup>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Nan Ning Normal University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2238093468@qq.com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ain implementers of nursery and education work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their recognition of their own profession and the state of work commitment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ir occupational development, and even directly affect the effect of kindergarten childcare and education. This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240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 childcare worker from 18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in N City, Guangxi, China,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e occupational identity of childcare workers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in N City has reached the upper-middle level; 2) The work engagement of childcare worker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in N city reaches the upper middle level; 3) The occupational identity of the childcare worker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in N city and its six dimensions and overall work engagement; 4) Occupational ident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work engagement. The six dimensions of occupational concept, occupational emotion, occupational value, occupational will, occupational expectation and occupational skills are related to work engagement and its various Dimensions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Keywords:**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Childcare Worker, Occupational Identity, Work Commitment

### **Introduction**

Childcare workers are in indispensable key positions in the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industry. Their occupational quality not only plays a key role in promoting the occup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care worker, but also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quality of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kindergartens. The key to promoting the occup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ldcare worker is to improve their occupational identity. Only when childcare worker fully recognizes their profession and believe that their work has value and significance will they form an internal driving force and constantly urge themselves to strengthen their childcare occupat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 learning (Wang and Yang, 2014). In addition, improving the level of work engagement of childcare worker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in promoting their occupational development. A good working condition can bring childcare worker a comfortable working experience, strengthen their love for their profession,

and then feedback their willingness to pursue self-occupational improvement , to promote their continued growth in the field of preschool education.

However, in reality, kindergarten childcare workers generally have low wages and cumbersome work tasks, making them skeptical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profession (Li and Yang, 2007). In higher-level public kindergartens, childcare worker can still get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regular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occupational exchange meetings held by the kindergarten,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participate in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helping childcare worker strengthen a sense of identity with one's own profession. However,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with weak capital investment and resource support, the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work engagement status of childcare worker deserves attention and care, and their career development should also be valued by all parties (Cui, 2022).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try to understand the degree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work engagement of childcare worker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discover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explore ways to improve the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work engagement of childcare worker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A level approach and method to promote childcare worker to obtain further occupational development.

### **Research Objectives**

The research had the following three objectives: 1) Investigate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work engagement of childcare worker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2)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work engagement of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 childcare worker; 3) explore the influence level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on the work engagement of childcare worker in private kindergartens.

### **Literature Review**

Childcare worker occupational identity: referring to Wei's (2008) view on teachers'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Chen's (2010) definition of childcare worker's occupational identity, the childcare worker's occupational identity is defined as the kindergarten childcare worker's work in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and In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the subjective 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of six aspects of one's own occupation in terms of concept, emotion, value, will, expectation and skill.

Work engagement: This concept was first proposed by Kahn in 1990. He believed that work engagement is a construct of an individual's positive traits, a trait that enables individuals to control themselves and integrate themselves with work (Kahn, 1992). In his research, Kahn found that individuals who are engaged in work will have obvious performance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hysiology, cognition and emotion. After that, Schaufeli et al. (2002) first proposed that work engagement and job burnout should be regarded as two independent concepts. They believed that work

engagement should be a more complex concept than the opposite of job burnout, and defined it as a combination of energy, dedication and focus. One of the three representational factors is related to work, and the emotions and cognition are in a positive and complete st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work engagement: Mou (2019) conducted a survey of rural preschool teachers in three areas of Gansu Province, and foun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occupational identity of rural preschool teachers and their work engagement. The higher the teachers' sense of identity with their own profession, the higher their level of work engagement. It is not an isolated case that the level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of preschool teachers can positively affect the level of their work engagement. Qiu and Wang (2020) took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chool teachers'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work engagement. Occupational identity can highly positively predict their work engage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Zhu and Zhang (2023) also show that a high level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ca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 the work engagement of preschool teachers, further explaining that the external motivation brought about by occupational identity can promote preschool teachers to work as internal motivation. Put into conversion. In summary, many studies have proved that preschool teachers' occupational identity can have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work engagement, and occupational ident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work engagement, bu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relevant research on childcare worker.

## **Methodology**

The research mainly used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the questionnaires and samples are as follows.

### ***Research Instruments***

The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Work Engagement Questionnaire for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 Childcare worker" used in this research consists of two parts: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work engagement. The occupational identity part is adapted from the "Shanghai Childcare Worker Occupational Identity Questionnaire" compiled by Chen. The work engagement part refers to the work engagement scale compiled by Schaufeli et al. This part of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of vitality, dedication and focus, with a total of 13 choices. The purpose of this question is to understand the work commitment of childcare worker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The overall Cronbach Alpha coefficient of the occupational identity part of the questionnaire is 0.957, and that of the work engagement part is 0.970. The overall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the two parts of the questionnaire is greater than 0.9, indicating that the modified questionnaire in this study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can be put into use. .

### ***Sample***

18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in N city were selected to carry out relevant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A total of 240 female childcare worker in these 18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of this study, and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them. The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recovered were 232 copies. Among them, 152 people are under 40 years old, accounting for 65.51%; 80 people are over 40 years old, accounting for 34.49%; 112 people are college graduates, accounting for 48.28%, and 22 people are undergraduates and above, accounting for 9.48%; the working years are all under 10 years.

## Results

### *The overall level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of childcare worker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in N City*

Table 1 reported in the questionnaire with a full score of 130 points, the overall average score of the occupational identity of the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 childcare worker in N City is 99.72 points. Divided by the number of questions, the average score is 3.84, which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questionnaire mid-level value. From this, it can be shown that the occupational identity of the childcare worker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in N City is at the upper-middle level ( $M/I=3.84$ ), and the occupational identity is good.

**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Overall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Various Factors of Childcare Worker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in N City (N=232)

	Overall Identity	Factors (Occupational)					
		Concept	Emotion	Value	Will	Expectation	Skill
Items (I)	26	5	4	4	4	5	4
Minimum Value (Min)	52	13	6	6	5	6	8
Maximum Value (Max)	130	25	20	20	20	25	20
Mean (M)	3.84	4.29	3.81	3.67	3.88	3.37	4.00
Standard Deviation (SD)	0.83	0.65	1.03	0.91	1.03	0.97	0.84

Table 2 showed in the questionnaire with a full score of 56 points, the overall average score of the work engagement of the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 childcare workers in N City is 48.48 points. Divided by the number of questions, the average score is 3.74, which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middle level value of the questionnaire. It can be seen from this that the work engagement of childcare workers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in N City is above the middle level ( $M/I=3.74$ ), and their Occupational identity is good. The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included in work engagement from high to low are: dedication, focus, and vitality. The average value of dedication is 3.87, which is the highest score among all dimensions, and the average value of vitality dimension is 3.63, which is the lowest among all dimensions. . Although the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are different, the average value of each dimension is greater than 3, which belongs to the upper middle level. In short, the overall work engagement and all dimensions of childcare workers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in N City are at the upper-middle

level, so it can be seen that their work engagement is in a good state., and focus

**Table 2:**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Overall Work Engagement and Factors of Childcare Workers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in N City (N=232)

		Items (I)	Minimum Value (Min)	Maximum Value (Max)	Mean (M)	Standard Deviation (SD)
Overall	Work Engagement	13	21	65	3.74	0.91
Factors	Vitality	5	7	25	3.63	0.97
	Dedication	4	6	20	3.87	0.96
	Focus	4	6	20	3.71	0.9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work engagement of childcare workers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As shown in Table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occupational identity level and the level of work engagement of childcare worker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in N city ( $r=0.91$ ,  $p<0.01$ ). The overall Occupational identity level of childcare workers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dimensions of vitality, dedication and concentration ( $r=0.89$ ,  $p<0.01$ ;  $r=0.87$ ,  $p<0.01$ ;  $r=0.84$ ,  $p<0.01$  ). Among them, occupational identity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vitality dimension of childcare workers' work engagement. When childcare workers have a high degree of identification with their own work, they will devote themselves to work with more energy and will also show goo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encounters at work. to the problem.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Work Engagement of Childcare Workers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in N City

Dimension	Vitality	Dedication	Focus	Work Engagement
Occupational Concept	0.66**	0.68**	0.70**	0.71**
Occupational Emotion	0.83**	0.82**	0.79**	0.85**
Occupational Value	0.86**	0.85**	0.80**	0.88**
Occupational Will	0.84**	0.88**	0.82**	0.89**
Occupational Expectation	0.77**	0.70**	0.68**	0.75**
Occupational Skill	0.86**	0.81**	0.82**	0.87**
Occupational Identity	0.89**	0.87**	0.84**	0.91**

\*\* $p<0.01$

***Regression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Work Engagement of Nursing Workers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with occupational identity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work engagement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squared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was 0.829, and the significance was 0.000, which was less than 0.01, indicating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has a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work engagement. Explained 82.9% of its total variation, see Table 4 for details.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Work Engagement of Childcare Workers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in N City

Dimension	R	R-Squared	Adjust R-Squared	F	Beta	Significant
Occupational Identity	0.910	0.829	0.827	552.351	0.910	0.000

From the data of the above regression analysi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of nurses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has a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work engagement, so whether the dimensions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also have a predictive effect on work engagement needs to be included in the occupational identity Furthe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ach dimension and work engagement. It can be seen from Table 5 that among the six dimensions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only three have a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work engagement, namely Occupational will, Occupational value and Occupational skills.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areer expectations have no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job engagement.

**Table 5:** Th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of Each Dimension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Work Engagement

Model	R	R-Squared	Adjust R-Squared	Standard Estimated Error	F	Significant	Durbin Watson
1	0.889a	0.791	0.789	0.41750	431.446	0.000	
2	0.912b	0.832	0.829	0.37558	280.501	0.000	
3	0.917c	0.840	0.836	0.36853	196.003	0.000	1.860

Note: a. Predictor variable: (constant), Occupational will  
 b. Predictor variables: (constant), Occupational will, Occupational value  
 c. Predictor variables: (constant), Occupational will, Occupational value, Occupational skills

Then use the T test to verif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As shown in Table 6, the order of the three variables that have a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work engagement is: Occupational will > occupational value > occupational skills, indicating that work engagement is most important. The dimension of the predictive effect is Occupational will, and the coefficients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are greater than 0, indicating that these three independent variable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work engagement; the significance level of the T-test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is less than 0.05, indicating that the three dimension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work engagement. From this result, it can be deduced that the standardized regression equation is: work engagement = 0.388\*Occupational will + 0.354\*Occupational value + 0.214\*Occupational skills.

**Table 6:**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Each Dimension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of Work Engagement

Model	Unnormalized Coefficient	Coefficient	T	Significant
-------	--------------------------	-------------	---	-------------

	B	Standard Error	Beta		
(Constant)	0.206	0.172		1.198	0.233
Occupational Will	0.341	0.086	0.388	3.981	0.000
Occupational Value	0.352	0.082	0.354	4.274	0.000
Occupational Skill	0.230	0.099	0.214	2.315	0.022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ain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the various dimensions of the inclusive childcare workers' occupational identity on the various dimensions of work engagement, this study takes the occupational concept, occupational emotion, occupational value, occupational will, occupational expectation and occupational skills included in occupational identity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respectively. Taki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vitality, dedication, and concentration included in work engagement as dependent variables, a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results are shown in Table 7.

**Table 7:**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ous Dimensions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Work Engagement of Childcare Workers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in N City

Dependent Variable	Independent Variable	R	R-Squared	Adjust R-Squared	F	Beta	T	Significant
Vitality	Occupational Skill	0.857	0.734	0.732	314.389	0.464	5.497	0.000
	Occupational Value	0.856	0.732	0.730	311.929	0.457	5.422	0.000
Dedication	Occupational Will	0.884	0.782	0.780	408.355	0.592	6.976	0.000
	Occupational Value	0.852	0.725	0.723	301.251	0.334	3.939	0.000
Focus	Occupational Will	0.819	0.671	0.669	232.930	0.413	3.861	0.000
	Occupational Concept	0.704	0.495	0.491	111.802	0.215	3.028	0.003
	Occupational Value	0.800	0.640	0.637	202.719	0.292	2.801	0.006

## Discuss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re are different degrees of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its various dimensions of the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 childcare workers in N city, and the work engagement and its various dimensions, namely: the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ccupational identity level of nursery school nurses will further increase their work engagement. This resul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of Mou's (2019)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preschool teachers'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work engagement. Mou'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rural teachers'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work engagement. Occupational identity can directly affect work engagement. Zhu and Zhang (2022) also showe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reschool teachers'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work engagement. Although the research objects of each study are different, the results of the studies all show that Occupational identity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work engagement, indicating that the degree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can directly affect the level of work engagement. It can be seen from this that the Occupational

identity of childcare workers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work engagement.

The occupational identity of childcare workers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can positively affect work engagement and has a predictive effect on work engagement. This resul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Qiu and Wang (2020)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chool teachers'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work engagement. Qiu et al.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preschool teachers' Occupational ident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ir work engagement.

Furthe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occupational identity can explain 82.9% of the total variation in work engagement, which shows that occupational ident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level on work engagement, that is,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work engagement. This result is similar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Qiu (2020) and Cheng (2021), which also means that Occupational identity is a key factor in promoting work engagement of childcare workers, that is,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work engagement.

## **Conclusion**

To summarize, this study mainly focused on the influence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of childcare workers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on work engagement.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occupational identity of childcare workers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and their overall level of work engagement in N city, and there is also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occupational identity of childcare workers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and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work engagement. Specifically, the occupational concept, occupational emotion, occupational value, occupational will, occupational expectation, and occupational skills of the childcare workers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overall level of work engagement and its three dimensions.

Occupational identity has a high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work engagement. Specifically, the dimension of occupational value has a strong predictive effect on all dimensions of work investment, which shows that if the childcare workers in inclusive private kindergartens have a high level of work commitment, their Occupational value level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childcare workers can be promoted in Realize self-worth in the position; Occupational will has a higher predictive power on the dedication and concentration of work, which shows that the more positive the mental state of the childcare workers at work, the more stable the will to stick to the post, and the stronger the sense of dedication on the job; the vocational skills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vitality dimension of work engagement, indicating that having higher Occupat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can make the childcare workers more energetic in their work; the effect of Occupational concept on work engagement The focus dimension has a certain predictive power, indicating that the more positive the childcare workers

have in their views and attitudes towards their occupation, the more focused they will be on the job.

## References

- Chen, L.L. (2010).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Childcare Workers in Shanghai.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01), 10-16.
- Cheng, L., & Chen, S.Y. (2021)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Rural Kindergarten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on Work Engagement. *Journal of Huanggang Teachers College*, 41(04), 83-87+133.
- Kahn, W.A. (1992). To be fully tiller: Psychological presence at work. *Human Relations*, (04), 23-34.
- Li, S.Z., & Yang, W.J. (2007). A case study on the quality and work status of childcare workers. *Preschool Education Research*, (05), 40-42.
- Mou, S.D. (201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Occupational Happiness and Work Engagement. *Journal of Longdong University*, 30(01), 128-130.
- Qiu, R.C., & Wang, X.P. (2020).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Work Engagement of Preschool Teachers.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7(56): 99-102.
- Schaufeli, W.B., Salanova, M., & Gonzalez-Roma, V. (2002). The measurement of engagement and burnout: A two sampl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tical approach.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3(1), 71-92.
- Wang, W., & Yang, D. (2014).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of childcare workers in Sichuan Province.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4(02),181-182+186.
- Wei, S.H. (2008). Research 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03), 12-16.
- Zhu, P., & Zhang, Q. (2023). The chain mediation effect of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on job engag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31(01), 65-70.

## **NEW PRACTICE OF HIGHER EDUCATION LEADERS IN THE ERA OF DISTANCE EDUCATION DEVELOPMENT**

**Huining Yang <sup>1\*</sup>**

<sup>1</sup> Stamford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2203090009@students.stamford.edu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distance education is a part that cannot be ignored. The goal of higher education is to enable learning to get higher quality, extensive knowledge, and broad vision. Distance education has been widely used, and driven by technology, the population has become more popular. In the process of such development, distance education also has some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education.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ystem,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needs to be updated, which seriously hinde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eaching qualit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i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nalyze and study the determination, adjust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system, to establish a perfect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The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ay get scientific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provide a goo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 system for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provide good conditions for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qua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distance education and proposes the management practice of college education leaders under the new education model.

**Keywords:** Distance Education,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Management

### **Introduction**

The term informatization first appeared in Japanese academic literature in the 1960s, which was mainly expounded and def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By 1993,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propos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plan, mainly to promote the wid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various areas of society. Subsequently,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was put forward, especially taking the application of IT in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lement education reform for the 21st century. This move of the United States caused a positive reaction from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 governments of many countries have formulated plans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IT in education. In the late 1990s, China also began to develop social informatiz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various government documents also



began to use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and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it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C, 2018).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refers to the effectiv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 for educational managemen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cultivating useful talents for society. Teaching informatization is the core, which refers to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eaching methods, the informatization of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requires the use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like computers, multimedi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education process to promote educational reform and conform to the rules of the modern information society. Its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are digitalization, networking, intelligence, and multimedia.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are open, shared, interactive, and collaborativ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C, 2018).

The information network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but also the material basis and prerequisit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China has issued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informatization of education, covering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 "school to school" project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 development outline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technology standards, and other aspects. In terms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planning, in the first 2000s, the overall plan of Chinese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will be promoted from three levels: the first level is the univers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 second level is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etworks to make full use of online resources, and the third level is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C, 2018).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hird level: distance education.

Distance education, also known as network education, is a new concept produced after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applied to education. It refers to the teaching mode of using TV and the Internet and other communication media. It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 of space and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of school accommodation.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refers to the transmission of courses to off-campus education through audio, video (live or video),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including real-time and non-real-time. This is a kind of teaching activity relative to face-to-face education, the separatio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non-face-to-face organization.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separating students from teachers; adopting specific transmission systems and communication media for teaching; various mode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flexible places and forms of learning. Compared with face-to-face education, long-distance education is that it can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provide mor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expand the scale of teaching,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reduce the cost of teaching (Pan, 2022).

Distance education has high requirements for students because its characteristics determine that

distance learning is mainly self-study, for example, students without a classroom atmosphere will make them encounter some difficulties or some unaccustomed to it. Firstly, distance learning requires learners to have sufficient motivation to learn. Learners have the motivation to learn to spontaneously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learning activities, which is also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learning. Secondly, learners need to have the spirit of active exploration. They need to specify the length of time they devote to their study and make their study plan.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student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explore, think actively, and try to understand what they have learned, rather than rote learning and passive acceptance.

###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of Distance Education***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has more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learners are realized through network informatization technology.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school education, the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 1. Openness

The most basic feature of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is openness, because the various resources in distance education are disclosed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the educational resources can be shared (Yang, 2019). For individual learners, they can access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rough the Internet, rather than only acquiring knowledge in closed campuses and classrooms.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is aimed at a wide range of groups, not only full-time students but also willing-to-study workers.

#### 2. Flexibility

The most critical feature of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is flexibility. It should be more flexible in curriculum setting, class hour arrangement, student status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management, which can change according to the learning plans of different learners (Lin, 2021). For example, if a teacher asks for leave temporarily, he can adjust the time with the students and then open the online teaching channel. However, like the traditional offline teaching model, if the teacher adjusts the class time, the teaching staff needs to rearrange the classroom, which is indeed one more process than online teaching.

#### 3. High national recognition

Unlike everyone, distance education has been recognized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document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run distance education have the right to run schools independently, and they can make plans, recruit students and set questions for entrance examinations independently (Lin, 2021). At the same time, what kind of diploma is also decided by the university independently, and all the majors can be awarded degrees. These diplomas and degrees are officially recognized, and the national recognition of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 ***Problems in Teaching Manag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stance Education***

As a product of the new era,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ducation. It has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es and significance of education. People will measure and view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by the standards and requirements of higher education.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has been popularized in every school and every university in China. With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distance education, it has universal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 1.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The subjective open consciousness of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is not stro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has formed a fixed model and impression for twenty years, which limits people's thinking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distance education, and thus will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distance education (Lin, 2021). From the teacher's point of view, the teacher believes that online teaching is to preach according to the materials, without student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such a fixed thinking mode, teachers may spend very little time studying the teaching form and cont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eaching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teachers will think that the management of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is not strict enough. Because in the process of offline teaching,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department needs to arrange the class time and class place, check the teacher's teaching situation, and check the teaching calendar. However, when transforming from offline teaching to distance teaching,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departments only need to ensur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online courses and rarely check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teaching. Therefore,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personnel will not think about how to formulate strict and advanced management methods,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school management and the efficiency of students' learning.

#### 2. Teaching management process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distance education is relatively old, and the teaching methods are relatively backward (Lin, 2021). Due to the openness of distance education and the wide range of groups, the learning materials and courseware made by teachers are all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he teacher does not understand the foundation and situation of all the students, so the course has not been targeted explanation, and cannot be taught by their aptitude. Generally, the recorded courses will be repeated and used for a long time, and it is difficult to get timely updates. Therefore, the courses cannot keep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cannot achieve the desired results. However, full-time teaching in school can be updated with courseware and handouts in time. In terms of learning feedback, teachers do not know the problems and effects on students after learning, so they can not follow up and explain in time.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lack of the above teaching process that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eaching resources is not high. Teachers do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teaching resources, and the resources produced are not uniquely targeted and innovative.

In addition, the teaching process also includes an important part—the school inspector, which mainly includes urging the learning progress and answering students' questions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However,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stance education, it is unlikely to do the part of supervision. When the teacher explains a knowledge point, the students may do some examples to consolidate the knowledge. In the offline classroom, the teacher can observe the process of students doing the questions and grasp th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book content. However, in online teaching, teachers cannot observe the students from the screen. Even if the students turn on the camera to show their appearance and homework to the teacher,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this is completely true. Therefore, distance teaching cannot achieve the effect of face-to-face supervision of learning (Liu, 2022).

### 3. Teaching process supervision

First of all, the supervision of teaching quality is very important. This task is responsible for the teaching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However,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department is not professional, for the teaching quality cannot be well controlled, will not act because they do not understand. For example, in a math course, the teacher teaches from his own experience. When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department personnel audit, they may not give any opinions because they do not understand, and even question the professionals. Or when the class teacher impassioned lecture,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department staff is rendered by the atmosphere and determined that the teacher is very responsible and professional.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fessionals, they may think that the teacher only stays on the surface of knowledge and does not lead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it deeply. Therefore, if the supervision of teaching quality is only transferred to non-professionals in the teaching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it may lead to more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Secondly, the supervision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is the most easily overlooked part of the managers. In October 2022, a news story on Sina microblog said that a teacher in Henan was attacked by a stranger during an online class and causing her death. When the teacher took the online class, a large number of unknown students entered the studio. They abused the teacher in the chat bar and sent some violent and pornographic words and pictures to disturb and affect the teacher's class process. This is due to th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for the order of the network classroom negligence caused by.

#### ***Management Practice of Leaders under Distance Education***

The situ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s of distance education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they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eachers 'teaching and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uch a new situation, the leaders need to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policies and practices to ensur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school work and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efficiency.

#### 1. Leadership style and decision-making of the leaders

Nowadays, the leadership styl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mostly inclined towards the democratic leadership style, that is the leaders will collect the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opinions from middle-level cadres or teachers, and then discuss and decide on the final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plan.

However, in the era of online education, leaders should be more decision-making, or add some of their views and opinions. Because distance education is forced and uncontrolled under the COVID-19 pandemic,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more dependent on school departments and leaders for guidance and supervision. The average people are lazy, and when they work from home and take classes, they are more casual than in offline classes. At this time, the leadership and regulatory departments need to supervise and manage the teaching personnel and students, otherwise, the teaching procedures and order may not be carried out normally.

#### 2. Leaders' self-requirements and learning

The promotion and use of distance education require people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use of network technology and operations. If leaders know nothing about online devices and software operations, they cannot know the possible problems in online education. In addition to network education, other leaders also include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arts. Leaders may not be professionals or technicians, but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some and learn some simple operations as much as possible.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using them, they can know the possible problems and solve them accurately. Besides, it can also constantly update the equipment and software to make network education more conducive to teaching.

#### 3.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regulations and systems

The system is the guarantee of work progress and mechanism operation. There are specific teaching management manuals and systems in the full-time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of the school.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disadvantages of distance education, distance education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school education. Therefore, distance education also needs to have special, specific rules and regulations (Nsiah, 2013). For example, confirm that in each management department in distance education,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department is responsible for daily teaching work to ensur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The student work departmen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ttendance and organization of students; the technical supervision departmen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normal use of software and network. In additio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the teaching process are also needed.

#### 4. Control of teaching quality and learning effec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ect of distance education cannot be controlled. Teachers' teaching content and materials can be innovative and rich, and students' attendance rates and grades can be very high and perfect. But the real teaching effect cannot be measured. Face-to-face teaching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transfer knowledge but also carry out richer learning activities, which must be helpful to students' growth and learning. For example, the teacher can observe the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 and can specifically answer the students' questions and make the corresponding learning plans, which is helpful to the teacher's teaching. In addition, students have full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students, learning atmosphere,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can not only improve



academic performance but also improve students' character. However, the network education in people's traditional concept, even in the modern real situation is a simple teacher speak, students listen to the mode. Therefore, schools need the supervision of teaching quality and the guarantee of learning effect. Curriculum professional teachers should do a good job in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courseware, teaching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other work, and carry out the work of distance education comprehensively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Yang, 2019). Each course professional teacher and the management leader should carefully guide the students to design their learning plans, carry out multimedia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mobilize th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network learning or group learning plans.

### **Conclusions**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brings information literacy into the educational goal and cultivates talen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Distance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anifestations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In the nearly 20 years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distance education is the third level of China's education information planning, and also a part of the deepening of education refor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VID-19 in 2019, distance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 has developed rapidly. Network education websites, software, and systems emerge in an endless stream. Universities, middle schools, and even primary schools encourage students to conduct online education and learning. Distance education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 of space, allowing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to receive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e 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

Distance educ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which has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Distance education can be disclosed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are widely shared. It is not restricted by region, and one can hear lectures from expert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countries. It is not limited by levels, people can choose the level of courses they want to listen to, such as high school students can learn to college in advance. Moreover, distance education is flexible and is mainly manifested by location and time. People can choose to take classes at home or in the library, or the morning or evening. Finally, distance education is highly recognized by the state. All kinds of software and systems are normally circulating and used on the market, and paid courses are also allowed. Adult education mainly uses distance education, and its diplomas and degrees are recognized and recognized by the state.

With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distance education, it also has some universal problems. College administrators and teachers lack awareness of the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of network education. They are used to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ignore the particularity of distance education, so they use inherent thinking to treat distance education,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management and affects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In addition,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distance education is outdated, and the teaching method is backward. Handouts and courseware have not been

updated in time, let alone untargeted and innovative. Teachers lack the conditions of supervision of students' learning, and cannot master the real learning effect of students. Finally,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the teaching process lack supervision.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eachers is unable to be guaranteed, and the network supervision is also very weak.

Giv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network education,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university leaders should be prepared and formulate rules and regulations. First of all, the style of leaders needs to change, not only with democratic leadership but also with decision-making and decisiveness. At the same time, leaders need to keep learning and innovating. Social chang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require them to underst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use methods so that they can solve problems and develop innovatively. Leaders also need to develop corresponding rules and regulations, such as the special func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of various departments under distance education. The supervision of teaching quality and process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earning effect should not be ignored.

To sum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stance education is widely used. School management, teachers' teaching, and students' performance will all be affected to a certain extent. College education leaders should not only use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leadership mode under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 They need to make changes to ensur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school work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learning quality. The whole process of management can make technology better serve education and achieve better talent training goals. Finally,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can better serv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y the role of education, and serve the whole people learning and lifelong learning.

## References

- Lin, P. (2021). *Construction of the Whole-Process Quality System of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Teaching*. Master's dissertation, Northea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ina.
- Liu, X.L. (2022). Modern management system and distance education service innov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14), 152-155.
- Nsiah, G. (2013). Best Practices in Distance Education: A Review. *Creative Education*, 4, 762-766.
- Pan, Q., Li, Q., Hong, K.M., Li, Y.S., Luo, X.Q., & Wu, K. (2022).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Institutionalized Management Mode. *Chinese Journal of Multimedia and Network Teaching*, (08), 138-144.
-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C. (2018).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2.0 Action Plan*.  
[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808779/35b5tz8cQukhz2csrDDtz5jhnartuyjQ8Gg1qm8n2JXHAMpk6UzQqY8SR0fO9n9QHx0Ih6IV5nXSTqqjPjq\\_PmXBKESvkYBBdP5HkvNuIBd0VKBTUskfs2jfoIBv7hwRQ](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808779/35b5tz8cQukhz2csrDDtz5jhnartuyjQ8Gg1qm8n2JXHAMpk6UzQqY8SR0fO9n9QHx0Ih6IV5nXSTqqjPjq_PmXBKESvkYBBdP5HkvNuIBd0VKBTUskfs2jfoIBv7hwRQ).
- Yang, R.X. (2019).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Teaching Management



The 7th STI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23, August, Thailand

Mode. *The Think Tank Era*, (52), 210-211.

## **POST-TRAUMATIC GROWTH? WORKPLACE MINDFULNESS, RESILI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O COLLEGE STUDENTS WITH SDT**

**Ping Wang**<sup>1,2</sup>, **Yuna Yao**<sup>3,2</sup>, **Jigang Ma**<sup>4,2</sup>, **Zhidong Liang**<sup>5,2</sup>, **Bo Tian**<sup>6,2</sup>, **Pingyang Zhang**<sup>7,2</sup>,  
**Yingji Li**<sup>\*</sup>

<sup>1</sup> Zheng Zhou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Henan, China,

<sup>2</sup> Stamford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Bangkok, Thailand

<sup>3</sup> Shandong Ying Cai University, Shandong, China.

<sup>4</sup>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Zhengzhou, China.

<sup>5</sup>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Zhengzhou, China.

<sup>6</sup>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Zhengzhou, China.

<sup>7</sup> Tianli High School, Xinxiang City, Henan, China, 453004.

<sup>\*</sup>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lyj.123@163.com

**Abstract:** Since 2019, mos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been impacted to varying degrees by the pandemic, result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asures to combat the spread of COVID-19 and reduce mobility. Over the course of three years, the pandemic has brought significant challenges and inconvenience to the learning and daily lif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causing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nd experiences, as well as a decline in their sense of well-being. After experiencing the pandemic, will university students be able to persist with their studies and complete their university courses? Can they maintain mindfulness in their learning environmen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Will they be able to maintain their resilience and adjust to external changes to ultimately achieve post-traumatic growth? This study surveyed 500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in Henan, China, and used SPSS27 and Smart-PLS3.0 as statistical analysis softwar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Workplace Mindfuln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that basic happines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positive,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sic happin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workplace mindfulness and resilience can promote Furthermore, post-traumatic growth through subjective well-being.

**Keywords:** Workplace Mindfulness, Post-traumatic Growth, Well-being, Resilience

## 1. Introduction

People everywhere have suffered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 that began in 2019, which has greatly affected their daily lives and production (Pokhrel & Chhetri, 2021). Similarly, the pandemic has created an unprecedented global situation that quickly exposed and amplified the medical vulnerabilities of countries worldwide. Meanwhile, experts began to realize that combating the virus was only a part of the treatment, as it also led to long-lasting psychological issues such as subjective well-being decline, psychological trauma, and decreased adaptability (Campbell et al., 2021). During the three years of continuous outbreaks of the pandemic in various provinces of China, many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forced to stay at home or school, unable to go out normally or even attend their classes properly, which undoubtedly dealt a significant blow to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se students, who have not yet fully matured. The prolonged isolation that prevented students from going out easily put them in a state of anxiety, with some students exhibiting varying degrees of anxiety or even depression, while others developed severe social phobia. In 2023, as China continued to adjust it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it marked the start of the post-pandemic era (Tang et al., 2022). As a result of the pandemic, university students have faced considerable challenges and inconveniences 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in their learning,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nd experiences as well as a decline in their sense of well-being. Henan, with one of the largest populations in China and one of the provinces with the highest number of students, has also been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pandemic's impact on university students.

An individual's capacity for resilience is his or her ability to adapt positively to adverse circumstances or to maintain appropriate functioning even in the midst of a disastrous situation (Morse et al., 2021). Recent epidemics have provided a research background to suggest that resilience can promote one's sense of well-being - the ability to quickly restore happiness through resilience, Post-Traumatic Growth (PTG), and adaptability strategies after experiencing a terrifying event (Hartmann et al., 2020). According to Tedeschi and Calhoun, the greater the adversity experienced in PTG, the more it can stimulate one's ability to resist traumatic environments, and thereby improve or accelerate his or her post-traumatic growth experience (Tedeschi & Calhoun, 2004). However, past research has focused mo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lience and PTG (Morse et al., 2021), while studies on whether an individual's worldview, future expectations, Workplace Mindfuln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can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post-traumatic growth are almost non-existent.

However, research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indicates that not all individuals who experience adversity will suffer from psychological or emotional health issues. It is known that some individuals are experiencing positive emotions and growth. This is known as positive mental health (Brooks et al., 2020). These changes include Post-Traumatic Growth (PTG) and resilience (Finstad et al., 2021), particularl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ho were significantly impacted by the epidemic, such as the shift



from face-to-face to online instruction, restricted lifestyles, reduced summer vacation time, postponement of exams, and increased difficulty finding employment (Yao et al., 2022). However, some students have also overcome the adversity caused by the epidemic, learned to view life and study challenges correctly, and understood the reason behind the change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Morse et al., 2021). As Yıldız has pointed out, the epidemic crisis not only affects the physic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but also inevitably affects their emotions. Most college students experience stressful emotions such as loneliness, anxiety, depression, and fear, among others. In the face of the same problem, some college students are not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epidemic, maintaining a positive mindset towards their studies, actively adjusting themselves, and exhibiting resilience. Therefor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college students affected by the three-year epidemic is a topic worthy of in-depth discussion, as it can lead to a better development of the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Yıldız, 2021).

Consequently,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mindfulness, resilience,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their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main research quest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After experiencing a three-year epidemic, college students faced many inconveniences 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studies, including significant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issues. Can they persist with their normal studies? Can they maintain mindfulness in their learning environment during the epidemic? Can they maintain resilience and adapt to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ultimately achieving post-traumatic growth? This study will be conducted by surveying 500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universities in Henan Province, with data collected and analyzed using Smart-PLS3.0 software. Specificall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explore mindfulness, happiness, adaptability, resilience,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ffected by the recent epidemic.

## **2. Literature Review**

### ***2.1. Overview of 5 core variable concepts***

#### **1.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Throughout history, philosophers have regarded happy human beings as the highest good and the ultimate motive for human action (Diener, 2008). Diener proposes that subjective well-being refers to a cognitive evaluation of high levels of positive emotions and satisfaction with one's life (Diener et al., 1999). Self-perceived standards of quality of life determine an individual's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ulting in an overall evaluation of their current life status. Faced with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different individuals experience different perceptual experienc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not only a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overall life satisfaction at a cognitive level (Diener et al., 1985). This study focuses on how college students positively assess their lives, learning, and cogni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epidemic.

#### **2. Resilience**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resilience, it is "the ability or outcome to adapt successfully to challenging or threatening circumstances." (Masten et al., 1990). Resilience also reflects an individual's ability to maintain stability and balance in the face of a series of difficulties brought about by the epidemic, and individuals with resilience have the ability to experience positive experiences and emotions. Resilience is characterized by positive behavior and attitudes in adversity, the courage and perseverance to face difficulties in life, possessing a positive attitude even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as well as enjoying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extending one's social circle (Masten, 2013). Key components of resilience include resilience, self-enhancement, and particularly positive attitudes maintained during the epidemic (Feldman, 2020). Influencing the environment and determining event outcomes, as well as learning from negative and positive experiences and pursuing the meaningful life goals. Oshio et al. propose resilience as novelty seeking,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positive future orienta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college resilience from these perspectives (Oshio et al., 2003).

### 3. Workplace Mindfulness

Originally originating in eastern Buddhism, mindfulness refers to being aware of one's surroundings, living in the present, and non-judgmental of others (Kabat-Zinn, 2005). Research in the fields of Human attention, cognition, emotions,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are positively affected by mindfulness, according to psychology, neuroscience, and medicine (Good et al., 2016). Zheng et al. proposed that Workplace Mindfulness refers to an individual's acceptance and attention to current inner experiences and external work environments. Their team also proposed that there are three dimensions of mindfulness in the workplace: awareness, attention, and acceptance. Their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Workplace Mindfulness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employees'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states, work attitudes, and work behaviors (Zheng et al., 2022). For college students, Workplace Mindfulness refers to awareness, attention, and acceptance in experiences related to study and life. Faced with the spread of the epidemic, online classes, exam delays, and even lockdowns, college students may experience anxiety, hypochondria, and even panic. If college students can use Workplace Mindfulness, they can first acknowledge the presence of negative emotions and focus their attention on the present experience, and take positive steps to improve their emotional regulation ability (Yuan, 2021).

### 3. Post-Traumatic Growth

The term "post-traumatic growth" (PTG) indicates a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hange that is experienced by some individuals after they have experienced highly challenging experiences in life, which changes, interpersonal experiences, as well as life values are primarily impacted by these changes (Tedeschi & Calhoun, 1996). Although PTG arises from traumatic experiences, the key factor for promoting growth is not the epidemic itself but the process of coping with it – attempting to resist the epidemic and eventually making progress – which determines to what extent college students can achieve growth. PTG involve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hanges that occur in highly demanding and stressful life situations, initially involving three domains. In subsequent years, the domains of strength,

relationships, life appreciation, acceptance of new opportunities, and spiritual changes were included (Maitlis, 2020). The two main factors in PTG are the degree of challenge to an individual's basic beliefs about the world and the level of cognitive processing triggered by this challenge (Liu et al., 2020). In the PTG process, cognitive reflection and introspection are essential, and the occurrence of the epidemic event brings both suffering and an opportunity for change, allowing individuals to rediscover themselves, others, and the world and achieve personal growth (Tedeschi & Calhoun, 2004).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post-traumatic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epidemic using a five-item scale created by Garnefski et al. (2008) (Garnefski et al., 2008).

## ***2.2.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 indicates that individuals have three types of motives when engaging in activities: intrinsic motivation, extrinsic motivation (Ryan & Deci, 2000). SDT is an empirical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in social contexts that distinguishes motivation as either autonomous or controlled. SDT explains the influence of the self-determined social environment on intrinsic motiv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autonomous external motivations and self-regulation through internalization and assimilatio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generalized motivation orientation, the operation of basic universal psychological needs critical for growth, integrity, and well-being, and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goal contents on happiness and performance. SDT argues that individuals have an inherent tendency to internalize, assimilate, and integrate socially endorsed behaviors, values, and norms (Deci & Ryan, 2013).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interna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result in individuals displaying different types of extrinsic motivation when engaging in non-inherently motivating behaviors, namely external regulation, identified regulation, and integrated regulation (Kim & Kim, 2021). The COVID-19 epidemic has exposed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self-regulation in regulating student behavior.

The three-year-long COVID-19 epidemic has not only claimed many lives but also brought a significant economic loss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However, any crisis event comprises both danger and opportunity. This sudden and significant public health event has also promoted personal growth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In China, college students have been facing the possibility of school closures, city lockdowns, and even nationwide lockdowns for three years, leading to uncertainties 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studies. Therefore, the choices made by college students in response to this situation a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he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 ***2.3 Workplace Mindfulnes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Some scholars suggest that the concept of mindfulness redefines the way in which social workers interact with others. An increase in mindfulness can improve attention, reduce stress and negative personality traits, and ultimately enhance individual well-being (Walsh et al., 2019). Literature has linked mindfulness with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and demonstrated that mindfulness can improve perceived quality of life. Studies have shown a decline in happiness among the global population since

the COVID-19 pandemic (Bonomi Bezzo et al., 2021; Cervera-Torres et al., 2021a). Specifically, Workplace Mindfulness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r of COVID-19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Low levels of mindfulness are associated with lower subjective well-being, while high levels of mindfulness can help people positively perceive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mitigate negative effects of COVID-19 (Kramer et al., 2020), making it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mental health (Jue & Ha, 2022). Empirical research has also shown that mindfulness training during the pandemic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happiness and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burdens (Accoto et al., 2021).

Drawing from this literature, the following hypothesis is proposed:

H1.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place Mindfuln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H2.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place Mindfulness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H3.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 ***2.4 Resilience,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Previou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resilienc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Doyle et al., 2016; Liu et al., 2013). Over the years, scholars have defined resilience in various ways. For example, resilience refers to the dynamic process that allows individuals to respond or adapt in adverse situations (Thornton & Sanchez, 2010). Some scholars consider resilience to be a personal trait that enables individuals to thrive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Resilient individuals demonstrate greater perseverance when faced with adversity, are better equipped to withstand threatening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effectively manage stress and difficulties, and possess greater capacity to cope with stress in daily life (Smith, 2006). Resilience also includes positive adaptive patterns that are developed over time in response to adversity (Cartwright et al., 2018). Over time, individuals with high resilience are able to recover effectively from daily stresso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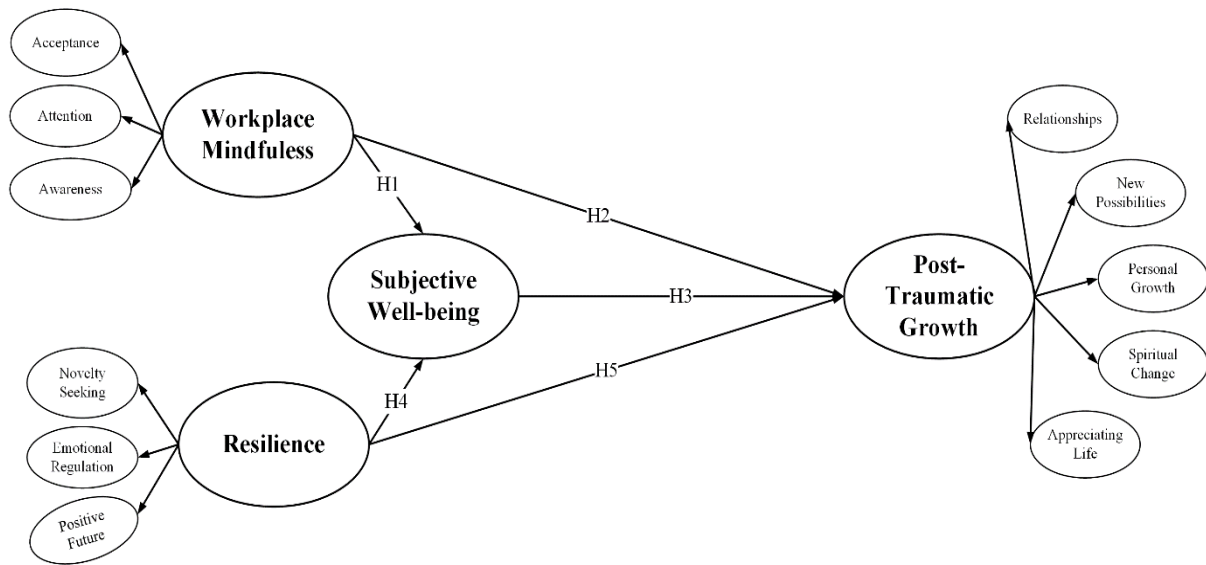
H4.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li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H5.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lience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H6. Workplace Mindfulnes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ost-Traumatic Growth through Subjective Well-being.

H7. Resilienc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ost-Traumatic Growth through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summary,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by Liu et al. (2021) and Zheng et al. (2022), and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learning and life, Workplace Mindfulness and Resilience are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an illustration of the variable relationships shown in Picture 1 show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as post-traumatic growth .



**Pict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 3. Method

#### 3.1 Data Collecti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collect the sample. The research took place in early 2023, just after the end of the epidemic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en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at home during internet classes and holidays, and was therefore completed through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Hundred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eight universities in Henan province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 which experienced a severe epidemic for three years from early 2020 to 2023. The Henan university student population is therefo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tate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living and studying under the epidemic. for this study was derived from a correlation structure developed from previous literature reviews.

All items in this questionnaire were developed from these reviews as well. A strict validat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was performed by statistical experts. This confirmed that the questionnaire was valid. Duplicate samples were screened using IP addresses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devices, and unused questionnaires were removed that This increased the power and robustness of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by excluding questions that were not completed for a long time or had duplicate values. We used a sample of 500 responses to improve power and robustness.

Two parts comprise the questionnaire. First, the Likert scale ranges from 1 (strongly disagree) to 7 (strongly agree). The second part consists of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which is basic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including gender, major, hometown, monthly family income, and post-graduation plans. Table 1 displays the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to illustrate the structure.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from January 1st to January 5th in 2023. Data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500 questionnaires collected. Among the respondents, 62.09% were female and 37.91%



were male. As for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48.51% of students studied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nd 43.89% wer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48.23%) had a monthly family income between 3000 and 5999 RMB. As for future plans, 61.96% of students planned to take the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 after graduation. Details are shown in Table 1.

### ***3.2 Research Instruments***

The scales used in this study are mature scales that have been previously utilized by other researchers with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e Workplace Mindfulness Scale was based on the study by Zeng et al. (2022) and consists of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Awareness, Attention, and Acceptance, with a Cronbach's  $\alpha$  of 0.928, rho-A of 0.931, Composite Reliability of 0.940, and AVE of 0.635. The Resilience scale was based on the well-validated scale developed by Masten et al. (1990) and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Novelty Seeking,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Positive Future, with a Cronbach's  $\alpha$  of 0.926, rho-A of 0.930, Composite Reliability of 0.965, and AVE of 0.822.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was based on the scales developed by Diener (1984) and Diener & Lucas (2015), with a Cronbach's  $\alpha$  of 0.956, rho-A of 0.957, Composite Reliability of 0.937, and AVE of 0.534. The Post-Traumatic Growth scale was based on the research by Tedeschi & Calhoun (1996) and Geng et al. (2011), and consists of five dimensions, namely Relationships, New Possibilities, Personal Growth, Spiritual Change, and Appreciating, with a Cronbach's  $\alpha$  of 0.970, rho-A of 0.972, Composite Reliability of 0.973, and AVE of 0.644.

### ***3.3 Data Analysis***

In this study,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A causal model is developed by combin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with multiple regressions in PLS-SEM. It is generally suitable for research involving exploratory theory development, predictive analysis, and complex structural modeling (Hair et al., 2019). This powerful tool can explore causal relationships across model structures and measure items. Additionally, with its ability to handle complex model structures, it is suitable for analyzing variables in datasets that do not have normal distributions (Hair et al., 2019). Thus, Smart-PLS 3.0 and SPSS 27.0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to analyze data

For all data analysis, Smart-PLS 3.0 software was used. A two-stage PLS-SEM analysis and estimation was performed. In the first stage, the questionnaire's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were investigated, and in the second stage, the path coefficients were calculated and validated and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structural model (Anderson & Gerbing, 1988; Hulland, 1999). The study explored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among Workplace Mindfulness, Resilience, Basic Hope,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Each construct contained several measurement indicators from previous literatur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ere performed using SPSS 27.0, and the results are presented as follows:

**Table 1:** Basic Sample Data

Sample	Category	Number	Percentage (%)
Gender	Female	185	37.91%
	Male	315	62.09%
Major	Literature and History	242	48.51%
	Science	219	43.89%
	Art	19	3.67%
	Other	20	3.94%
Place of Origin	Countryside	364	72.96%
	Urban	73	14.4%
	Urban-Rural	63	12.64%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 2999RMB	108	21.47%
	3000~5999 RMB	241	48.23%
	6000~8999 RMB	101	20.24%
	9000~11999 RMB	32	6.39%
	≥ 12000 RMB	18	3.67%
Future Plans	Postgraduate	309	61.96%
	Civil Service Exam	37	7.34%
	Get A Job	89	18.09%
	No Idea Now	65	12.91%
Total		500	100%

### 3.4 Outer Model and Scale Validation

The external model generally evaluates items based on their reliability as well as their internal consistency, convergent validity,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The reliability of each item is validated by loading it onto relevant questions. Several questions can measure a construct, with a threshold of 0.6 for individual reliability (Black & Babin, 2019; Hair, 2009). The composite reliability is shown in Table 2.

**Table 2:** Reliability and AVE of The Outer Model

Construct	Cronbach's alpha	rho-A	Composite Reliability	AVE
Workplace Mindfulness	0.950	0.951	0.956	0.628
Resilience	0.905	0.908	0.921	0.515
Subjective Well-being	0.949	0.950	0.959	0.798
Post-Traumatic Growth	0.966	0.968	0.969	0.623

According to Chin's (1998) research, the comprehensive reliability (CR) value for all constructs is generally greater than 0.7, indicating good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the constructs (Chin, 1998). The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for each construct is taken into account in determining convergent validity as an indicator of the evalu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reliability for each measurement factor loading. If the AVE>0.5, it indicates good convergent validity for the construct (Fornell & Larcker, 1981).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 values for the variables in Table 2 range from 0.515 to 0.969, indicating good convergent validity in this study. At the same time, compared with the coefficient correlation approach,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square root of the AVE for each construct be greater

tha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that construct. Some of the results in Table 3 do not currently meet the criteria, but are acceptable.

**Table 3:** Results of Discriminant Validity

Construct	Post-Traumatic Growth	Resilience	Workplace Mindfulness	Subjective Well-being
Post-Traumatic Growth	<i>0.789</i>			
Resilience	0.844	<i>0.718</i>		
Workplace Mindfulness	0.851	0.790	<i>0.792</i>	
Subjective Well-being	0.709	0.691	0.683	<i>0.893</i>

Note: The bold numbers on the diagonal represent the square roots of the AVE for each construct, while the other numbers represent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mong constructs.

The results in Table 4 (see on the next page) further confirm the presence of discriminant validity.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constructs exhibit acceptable discriminant validity when the factor loadings. A preventive measure (CMV) has been taken by the researchers to avoid common methods. Based on the single respondent cognitive information and the self-reported scale, CMV may be reduced. An anonymous survey was used in this study, where item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and the meaning of each item was attempted to be hidden. Obviously, the results of Tables 3 and 4 indicate that construct validity is considerable. With this regard, they also show that CMV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results. CMV severity was also measured by Harman's One-Factor Test in this study (Podsakoff & Organ, 1986). A factor analysis of 54 items in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first factor, which belongs to the non-integrated factor, explains 16.95% of the variance. As a result, CMV did not seem to impact this study's outcomes.

### 3.5 Inner Model and Hypotheses Tes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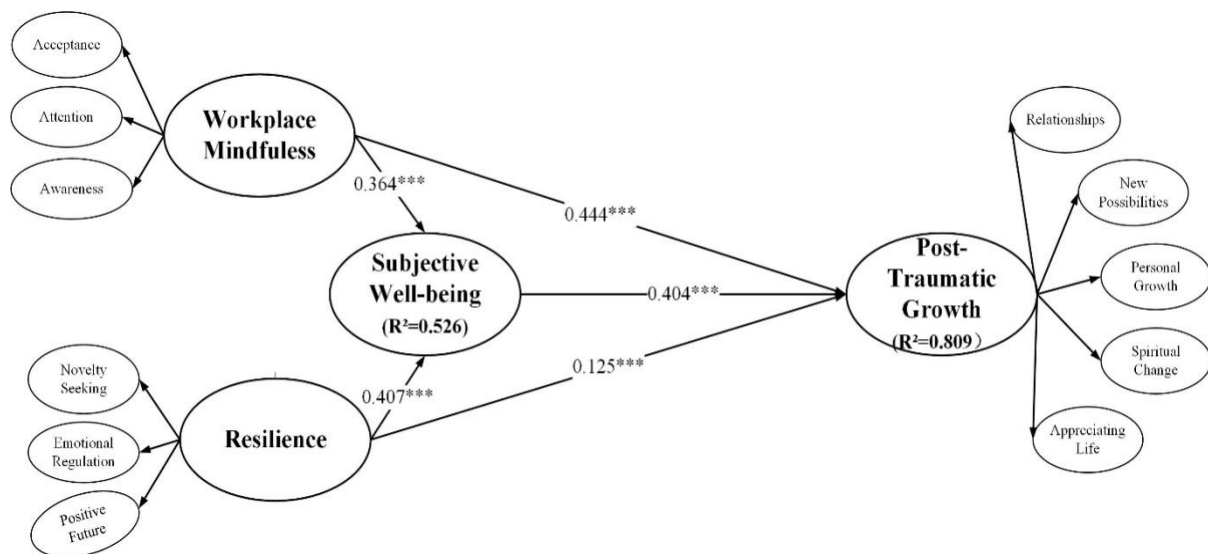
**Table 5:** Summary of Inner Model Results

Hypo.	Relationship	Path Coefficient	t Values	P Values	Results (Yes/No)
H1	Workplace Mindfulness -> Subjective Well-being	0.364***	6.633	0.000	Yes
H2	Workplace Mindfulness-> Post-Traumatic Growth	0.444***	11.745	0.000	Yes
H3	Resilience -> Subjective Well-being	0.404***	7.765	0.000	Yes
H4	Resilience -> Post-Traumatic Growth	0.407***	10.990	0.000	Yes
H5	Subjective Well-being -> Post-Traumatic Growth	0.125***	4.210	0.000	Yes
H6	Workplace Mindfulness-> Subjective Well-being -> Post-Traumatic Growth	0.045***	3.643	0.000	Yes
H7	Resilience -> Subjective Well-being -> Post-Traumatic Growth	0.050***	3.535	0.000	Yes

Note1: \*p-value <0.05, \*\*p-value < 0.01, \*\*\*p-value < 0.001. Note2: Number of bootstrap samples = 10,000.

In this study, as a validation method for validating the path coefficients and R2, PLS was performed on the internal model to evaluate the hypotheses. The researcher employed path coefficients to describe the strength and direction of the variable relationships, which show causal relationships, whereas R2 refers to the percentage of variance explained i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demonstrating the predictive ability of the model.

A resampling of data was performed as the values tested were found to be more accurate than commonly used approximate limits (Purvis et al., 2001).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variables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his strategy was employed in the present study.



**Picture 2:**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s and Statistical Data and Significance of Inner Model

Table 5 and Picture 2 demonstrate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s between Workplace Mindfulness, Resilience,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There is evidence that Workplace Mindfulness positively impact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promoting H1 and H2 (Workplace Mindfulness -> Subjective Well-being:  $\beta = 0.444$ ,  $t\text{-value} = 11.745$ ; Workplace Mindfulness -> Post-Traumatic Growth:  $\beta = 0.364$ ,  $t\text{-value} = 6.633$ ). So, Workplace Mindfulness has positive relationship on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H3, H4, H5 (Resilience -> Subjective Well-being:  $\beta = 0.404$ ,  $t\text{-value} = 7.765$ ; Resilience -> Post-Traumatic Growth:  $\beta = 0.407$ ,  $t\text{-value} = 10.990$ ; Subjective Well-being -> Post-Traumatic Growth:  $\beta = 0.125$ ,  $t\text{-value} = 4.210$ ). As a result, these coefficients indicate that the two variable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H6, H7 (Workplace Mindfulness -> Subjective Well-being -> Post-Traumatic Growth:  $\beta = 0.045$ ,  $t\text{-value} = 3.643$ , Resilience -> Subjective Well-being -> Post-Traumatic Growth:  $\beta = 0.050$ ,  $t\text{-value} = 3.535$ ), meaning that the two groups of coefficients show that there is an obvious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variables.

**Table 4:** Standardized Factor Loading and Cross Loading of The Outer Model

Second-order Variables	Workplace Mindfulness	Resilience	Subjective Well-being	Post-Traumatic Growth
Acceptance1	0.887	0.459	0.606	0.707
Acceptance2	0.896	0.446	0.589	0.750
Acceptance3	0.893	0.415	0.619	0.731
Acceptance4	0.841	0.449	0.531	0.677
Attention1	0.866	0.419	0.553	0.740
Attention 2	0.917	0.448	0.545	0.652
Attention 3	0.922	0.436	0.525	0.657
Attention 4	0.901	0.468	0.542	0.684
Awareness1	0.840	0.507	0.540	0.653
Awareness2	0.869	0.400	0.486	0.604
Awareness3	0.872	0.406	0.493	0.603
Awareness4	0.822	0.450	0.469	0.614
Awareness5	0.856	0.452	0.519	0.680
Novelty Seeking1	0.542	0.908	0.440	0.506
Novelty Seeking2	0.468	0.902	0.402	0.502
Emotional Regulation1	0.701	0.876	0.531	0.689
Emotional Regulation2	0.748	0.910	0.574	0.744
Emotional Regulation3	0.729	0.899	0.569	0.723
Emotional Regulation4	0.733	0.895	0.546	0.733
Positive Future Orientation1	0.394	0.884	0.458	0.522
Positive Future Orientation2	0.394	0.897	0.475	0.513
Positive Future Orientation3	0.431	0.900	0.489	0.549
Positive Future Orientation4	0.481	0.822	0.462	0.544
Positive Future Orientation5	0.519	0.808	0.473	0.568
Subjective Well-being1	0.612	0.447	0.851	0.499
Subjective Well-being2	0.578	0.367	0.872	0.502
Subjective Well-being3	0.598	0.409	0.921	0.494
Subjective Well-being4	0.609	0.411	0.889	0.516
Subjective Well-being5	0.641	0.438	0.911	0.515
Subjective Well-being6	0.616	0.418	0.913	0.508
Relationships1	0.616	0.393	0.531	0.882
Relationships2	0.614	0.379	0.504	0.890
Relationships3	0.582	0.333	0.479	0.903
New Possibilities1	0.690	0.473	0.542	0.918
New Possibilities2	0.689	0.489	0.538	0.932
New Possibilities3	0.716	0.450	0.601	0.925
New Possibilities4	0.712	0.490	0.572	0.931
Personal Growth1	0.753	0.447	0.508	0.913
Personal Growth2	0.782	0.490	0.561	0.928
Personal Growth3	0.732	0.464	0.541	0.886
Personal Growth4	0.719	0.483	0.572	0.871
Spiritual Change1	0.746	0.454	0.621	0.909
Spiritual Change2	0.722	0.430	0.629	0.956
Spiritual Change3	0.745	0.470	0.637	0.951
Spiritual Change4	0.692	0.392	0.571	0.914
Appreciating Life1	0.544	0.422	0.506	0.832
Appreciating Life2	0.521	0.430	0.555	0.878
Appreciating Life3	0.569	0.414	0.587	0.924
Appreciating Life4	0.557	0.437	0.568	0.923

Note: Each construct's factor loadings are represented by yellow cells assigned to each latent structure are greater than those assigned to any other structure (Hair Jr et al., 2021).



## 4. Conclusion

### 4.1 Discuss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Workplace Mindfulness, Resilience, Basic Hope,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500 college students who experienced three years of pandemic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data analys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orkplace Mindfulness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findings of Mabey et al. (2021), Walsh et al. (2019), and Yun et al. (2020), while emphasizing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on college students. Furthermor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was found betwee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indicating that individuals who experienced a higher leve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were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post-traumatic growth, which aligned with the findings of Mabey et al. (2021). Similarly, Resilience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line with the previously reported results by Finstad et al. (2021) and Ying et al. (2016). Moreover,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s among Workplace Mindfulness, Resilience, Basic Hope,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were more pronounced in college students from higher-income families than those from families with a monthly income lower than 2999 yuan, as revealed by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Finally, Workplace Mindfulness, Resilience, and Basic Hope were found to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Post-Traumatic Growth through Subjective Well-being, consistent with the previous research by Cramer et al. (2020), Gonda & Tarazi (2022), and Jayawickreme et al. (2021).

In the path analysis, Workplace Mindfulness was found to have the strongest impact on Post-Traumatic Growth ( $\beta = 0.444$ ), followed b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place Mindfuln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 $\beta = 0.404$ ). Among the seven hypothesized paths, Resilience had the weakest effect on Post-Traumatic Growth through Subjective Well-being ( $\beta = 0.050$ ).

Regarding the four variables, the maximum R<sup>2</sup> value was found for Accept (R<sup>2</sup> = 0.861), followed by New Possibilities (R<sup>2</sup> = 0.849), while the minimum value was found for Novelty Seeking (R<sup>2</sup> = 0.590).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Accept dimension of Workplace Mindfulness and the New Possibilities dimension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contributed more significantly to the model.

### 4.2 Contributions and Suggestions

During the three-year epidemic period from after 2019 to the end of 2022, although strict regulations were imposed, causing inconvenience to university students' lives and studi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schools did their best to ease the students, and most of them were able to maintain a positive psychological state despite the inconvenient scenario of living and studying, indicating that the guidance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was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a positive mindset. Especially from the beginning of 2023, when China has implemented a full open policy o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ducation departments and universities will also hav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tate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sense of students as always, especially the sense of future exploration needs attention.

As one of the provinces with the most students in China, over 70% of the students in Henan are from rural areas, with half of them having a family income of between 3000 and 6999 yuan per month. Given their economic status, families may find it challenging to support their children's living expenses and have limited disposable income. In this situation, both the students themselves and their parents have high expectations for academic improvement and demand positive actions to overcome current difficulties, acquire knowledge required by the university and eventually achieve better personal development after graduatio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families and students focus on enhancing their experienc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resilience, which can facilitate faster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help them to return to normal life and study with a positive mindset.

Having a clear career plan can encourage students to focus more on future prospects instead of being affected too much by current living and studying conditions. According to survey data, over 60% of students plan to attend postgraduate exams after graduation, and approximately 20% hope to find a job afterwards, indicating that they have clear academic goals. Taking action to carry out future plans, overcoming current difficulties, and enhancing resilience can improve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facilitate post-traumatic growth, consistent with the findings of Cui et al. (2021) and Pino et al. (2022). As hopes of the nation and their families, college students who increase their motivation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maintain a forward-looking attitude towards the future will face challenges in life and study with a more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outlook, ultimately cultivating the courage and strength to overcome any obstacles.

## **5. Future Research**

It was difficult for the researchers to establish a rigorous research process, research methods, and a research organization. The data collection procedures identified some limitations, which need to be addressed in future studies.

Firstly, when collecting data using online questionnaires, data collection bias may exist in a completely autonomous environment, as some participants may subjectively answer questions, thereby affecting the external validity of the results. Secondly, this study only investiga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nan provinc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and did not cover other provinces in China. Therefore,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can only illustrate the tendencies of Workplace Mindfulness, resilience, basic hope,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Henan Province. Since different provinces have varying levels of implement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policies, the effects generated in different universities may vary accordingly. Moreov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guidance provided by different types of universities, which may also cause data variation among different variables. If future studies are able to collect samples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types of universities in various provinces, it may help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place Mindfulness, resilience, basic hope,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objectively.

Lastly, given that China's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ffect varies from other countries, further exploration is needed to verify whether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be replicated in other countries or regions.

## References

- Accoto, A., Chiarella, S.G., Raffone, A., Montano, A., de Marco, A., Mainiero, F., Rubbino, R., Valzania, A., & Conversi, D. (2021). Beneficial effects of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training on the well-being of a female sample during the first total lockdown due to COVID-19 pandemic in Ita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8*(11), 5512.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8115512>.
- Anderson, J.C., & Gerbing, D.W. (1988).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practice: A review and recommended two-step approa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3*(3), 411.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03.3.411>.
- Black, W., & Babin, B.J. (2019).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Its approach, evolution, and impact. *The great facilitator* (pp. 121-130).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06031-2\\_16](https://doi.org/10.1007/978-3-030-06031-2_16).
- Bonomi Bezzo, F., Silva, L., & Van Ham, M. (2021). The combined effect of Covid-19 and neighborhood deprivation on two dimension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England. *PloS one*, *16*(7), e0255156.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55156>.
- Brooks, S., Amlot, R., Rubin, G.J., & Greenberg, N. (2020).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disaster-exposed organisations: overview of the literature. *BMJ Mil Health*, *166*(1), 52-56. <https://doi.org/10.1136/jramc-2017-000876>.
- Campbell, F., Archer, B., Laurenson-Schafer, H., Jinnai, Y., Konings, F., Batra, N., Pavlin, B., Vandemaele, K., Van Kerkhove, M.D., & Jombart, T. (2021). Increased transmissibility and global spread of SARS-CoV-2 variants of concern as at June 2021. *Euro surveillance*, *26*(24), 2100509.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2807/1560-7917.ES.2021.26.24.2100509>.
- Cartwright, B.D., White, M.P., & Clitherow, T.J. (2018). Nearby nature 'buffers' the effect of low social connectedness on adult subjective well-being over the last 7 day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5*(6), 1238.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5061238>.
- Cervera-Torres, S., Ruiz-Fernández, S., Godbersen, H., Massó, L., Martínez-Rubio, D., Pintado-Cucarella, S., & Baños, R.M. (2021a). Influence of resilience and optimism on distress and intention to self-isolate: contrasting lower and higher COVID-19 illness risk samples from an extended health belief model.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662395.

- Cervera-Torres, S., Ruiz-Fernández, S., Godbersen, H., Massó, L., Martínez-Rubio, D., Pintado-Cucarella, S., & Baños, R.M. (2021b). Influence of resilience and optimism on distress and intention to self-isolate: Contrasting lower and higher COVID-19 illness risk samples from an extended health belief model.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1846.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1.662395>.
- Cheavens, J.S., Heiy, J.E., Feldman, D.B., Benitez, C., & Rand, K.L. (2019). Hope, goals, and pathways: Further validating the hope scale with observer ratings.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4*(4), 452-462. <https://doi.org/10.1080/17439760.2018.1484937>.
- Chin, W.W. (1998).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approach t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odern methods for business research, 295*(2), 295-336.
- Deci, E.L., & Ryan, R.M. (2013).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human behavior*.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 Diener, E. (2008).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well-being*, 11-58.  
<https://doi.org/10.1080/17439760701756946>.
- Diener, E., Emmons, R.A., Larsen, R.J., & Griffin, S. (1985).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49*(1), 71-75. <https://doi.org/10.1207/s15327752jpa490113>.
- Diener, E., Suh, E.M., Lucas, R.E., & Smith, H.L. (1999).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5*(2), 276.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25.2.276>.
- Doyle, N., MacLachlan, M., Fraser, A., Stilz, R., Lismont, K., Cox, H., & McVeigh, J. (2016). Resilience and well-being amongst seafarers: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crew across 51 ships. *International Archives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89*(2), 199-209.  
<https://doi.org/10.1007/s00420-015-1063-9>.
- Feldman, R. (2020). What is resilience: an affiliative neuroscience approach. *World Psychiatry, 19*(2), 132-150. <https://doi.org/10.1002/wps.20729>.
- Finstad, G.L., Giorgi, G., Lulli, L.G., Pandolfi, C., Foti, G., León-Perez, J.M., Cantero-Sánchez, F.J., & Mucci, N. (2021). Resilience, coping strategies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the workplace following COVID-19: A narrative review on the positive aspects of traum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8*(18), 9453.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8189453>.
- Fornell, C., & Larcker, D.F. (1981).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8*(1), 39-50.  
<https://doi.org/10.1177/002224378101800104>.
- Garnefski, N., Kraaij, V., Schroevers, M., & Somsen, G. (2008). Post-traumatic growth after a myocardial infarction: a matter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ical health, or cognitive coping?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in Medical Settings, 15*(4), 270-277.  
<https://doi.org/10.1007/s10880-008-9136-5>.

- Gonda, X., & Tarazi, F.I. (2022). Well-being, resilience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the era of Covid-19 pandemic. *Europea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54, 65.  
<https://doi.org/10.1016/j.euroneuro.2021.08.266>.
- Gonzalez-Mendez, R., & Díaz, M. (2021). Volunteers' compassion fatigue, compassion satisfaction,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during the SARS-CoV-2 lockdown in Spain: Self-compass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as predictors. *PLoS ONE*, 16.
- Good, D.J., Lyddy, C.J., Glomb, T.M., Bono, J.E., Brown, K.W., Duffy, M.K., Baer, R.A., Brewer, J.A., & Lazar, S.W. (2016). Contemplating mindfulness at work: An integrative review. *Journal of management*, 42(1), 114-142. <https://doi.org/10.1177/014920631561700>.
- Hair Jr, J.F., Hult, G.T.M., Ringle, C.M., & Sarstedt, M. (2021). *A primer on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 Sage publications.
- Hair, J.F. (2009).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 Hair, J.F., Risher, J.J., Sarstedt, M., & Ringle, C.M. (2019). When to use and how to report the results of PLS-SEM. *European business review*, 31(1), 2-24. <https://doi.org/10.1108/EBR-11-2018-0203>.
- Hartmann, S., Weiss, M., Newman, A., & Hoegl, M. (2020). Resilience in the workplace: A multilevel review and synthesis. *Applied Psychology*, 69(3), 913-959.  
<https://doi.org/10.1111/apps.12191>.
- Horesh, D., & Brown, A.D. (2020). Traumatic stress in the age of COVID-19: A call to close critical gaps and adapt to new realities. *Psychological trauma :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12(4), 331-335.
- Hulland, J. (1999). Use of 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A review of four recent stud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2), 195-204.  
[https://doi.org/10.1002/\(SICI\)1097-0266\(199902\)20:2<195:AID-SMJ13>3.0.CO;2-7](https://doi.org/10.1002/(SICI)1097-0266(199902)20:2<195:AID-SMJ13>3.0.CO;2-7).
- Jayawickreme, E., Blackie, L.E., Forgeard, M., Roepke, A.M., & Tsukayama, E. (2022). Examining associations between major negative life events, changes in weekly reports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global reports of eudaimonia well-being.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3(4), 827-838. <https://doi.org/10.1177/19485506211043381>.
- Jue, J., & Ha, J.H. (2022). Art therapists' fear of COVID-19,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mindfulness. *The Arts in Psychotherapy*, 77, 101881. <https://doi.org/10.1016/j.aip.2022.101881>.
- Kabat-Zinn, J. (2005). *Coming to our senses: Healing ourselves and the world through mindfulness*. Hachette UK.
- Kim, M., & Kim, J. (2021).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mployee engagement, well-being and the task performance of frontline employees. *Management Decision*, 59(8), 2040-2056.  
<https://doi.org/10.1108/md-03-2020-0268>.
- Kramer, C.M., Barkhausen, J., Bucciarelli-Ducci, C., Flamm, S.D., Kim, R.J., & Nagel, E. (2020).



- Standardized cardiovascula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CMR) protocols: 2020 update. *Journal of Cardiovascular Magnetic Resonance*, 22(1), 1-18. <https://doi.org/10.1186/s12968-020-00607-1>.
- Liu, X., Ju, X., & Liu, X. (202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lience and intent to stay among Chinese nurses to support Wuhan in managing COVID-19: The serial mediation effect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perceived professional benefits. *Nursing Open*, 8, 2866 - 2876.
- Liu, Y., Jiang, T.T., & Shi, T.Y. (2020). The relationship among rumination, coping strategi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 cross-sectional study. *Asian Nursing Research*, 14(4), 206-211. <https://doi.org/10.1016/j.anr.2020.07.005>.
- Liu, Y., Wang, Z., & Lü, W. (2013). Resilience and affect balance as mediators between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life satisfac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4(7), 850-855.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2.12.010>.
- Mabey, P.T., Li, W., Sundufu, A.J., & Lashari, A.H. (2021). The Potential of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to Improve Urban Planning in Sierra Leo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8(18), 9454.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8189454>.
- Maitlis, S. (2020). post-traumatic growth at work.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7, 395-419.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20020-6\\_4](https://doi.org/10.1007/978-3-030-20020-6_4).
- Masten, A.S. (2013). Global perspectives on resilience in children and youth. *Child development*, 85(1), 6-20. <https://doi.org/10.1111/cdev.12205>.
- Masten, A.S., Best, K.M., & Garmezy, N. (1990). Resilience and development: Contributions from the study of children who overcome adversity.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4), 425-444. <https://doi.org/10.1017/S0954579400005812>.
- Morse, J.M., Kent-Marvick, J., Barry, L.A., Harvey, J., Okang, E.N., Rudd, E.A., Wang, C.Y., & Williams, M.R. (2021). Developing the resilience framework for nursing and healthcare. *Global Qualitative Nursing Research*, 8, 23333936211005475. <https://doi.org/10.1177/23333936211005475>.
- Oshio, A., Kaneko, H., Nagamine, S., & Nakaya, M. (2003).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adolescent resilience scale. *Psychological reports*, 93(3\_suppl), 1217-1222. <https://doi.org/10.2466/pr0.2003.93.3f.1217>.
- Paul, H., Bamel, U., Ashta, A., & Stokes, P. (2019). Examining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resilience,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commitment as predictors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u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5, 1274-1297. <https://doi.org/10.1108/IJOA-08-2018-1514>
- Pino, O., Cunegatti, F., & D'Angelo, M. (2022). The Role of Life Meaning i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Italian First-Aid Volunteers During the COVID-19

- Outbreak. *Trends in Psychology*, 1-23. <https://doi.org/10.1007/s43076-022-00182-7>
- Podsakoff, P.M., & Organ, D.W. (1986). Self-reports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Problem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management*, 12(4), 531-544.  
<https://doi.org/10.1177/014920638601200408>.
- Pokhrel, S., & Chhetri, R. (2021). A literature review on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Future*, 8(1), 133-141.  
<https://doi.org/10.1177/2347631120983481>.
- Ryan, R.M., & Deci, E.L. (2000).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1), 68.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5.1.68>.
- Sari, S.P., Aryansah, J.E., & Sari, K. (2020). Resiliensi mahasiswa dalam menghadapi pandemi covid 19 dan implikasinya terhadap proses pembelajaran. *Indonesian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Theory and Application*, 9(1), 17-22. <https://doi.org/10.15294/ijgc.v9i1.38674>.
- Schwartz, R., Sinsky, J.L., Anand, U., & Margolis, R.D. (2020). Addressing post pandemic clinician mental health: a narrative review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173(12), 981-988.
- Smith, T.W. (2006). Personality as risk and resilience in physical health.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5), 227-231. <https://doi.org/10.1111/j.1467-8721.2006.00441.x>.
- Tang, S., Chen, H., Wang, L., Lu, T., & Yan, J. (202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Exercise and Negative Emotions in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19), 12166.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3390/ijerph191912166>.
- Tedeschi, R.G., & Calhoun, L.G. (1996). The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Measuring the positive legacy of trauma.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9(3), 455-471.  
<https://doi.org/10.1007/BF02103658>.
- Tedeschi, R.G., & Calhoun, L.G. (2004). post-traumatic growth: 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Psychological inquiry*, 15(1), 1-18.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65pli1501\\_01](https://doi.org/10.1207/s15327965pli1501_01).
- Thornton, B., & Sanchez, J.E. (2010). Promoting Resiliency among Native American Students to Prevent Dropouts. *Education*, 131(2). <https://doi.org/00131172&AN=5934798>.
- Vinkers, C.H., van Amelsvoort, T., Bisson, J.I., Branchi, I., Cryan, J.F., Domschke, K., Howes, O.D., Manchia, M., Pinto, L., & de Quervain, D. (2020). Stress resilience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Europea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35, 12-16.  
<https://doi.org/10.1016/j.euroneuro.2020.05.003>.
- Walsh, K.M., Saab, B.J., & Farb, N.A. (2019). Effects of a mindfulness meditation app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and experience sampling study. *JMIR mental*

- health*, 6(1), e10844. <https://doi.org/2019/1/e10844>.
- Yao, Y., Wang, P., Jiang, Y., Li, Q., & Li, Y. (2022). Innovative online learning strategies for the successful construction of student self-awarenes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Merging TAM with TPB.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 7(4), 100252. <https://doi.org/10.1016/j.jik.2022.100252>.
- Yıldız, E. (2021).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positive determinants in nursing students after COVID-19 alarm status: A descriptive cross-sectional study. *Perspectives in Psychiatric Care*, 57(4), 1876-1887. <https://doi.org/10.1111/ppc.12761>.
- Yuan, Y. (2021). Mindfulness training on the resilience of adolescents under the COVID-19 epidemic: A latent growth curve analysi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72, 110560.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20.110560>
- Yun, M.R., Lim, E.J., Yu, B., & Choi, S. (2020). Effects of academic motivation on clinical practice-related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nursing students in South Korea: mediating effect of resili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7(13), 4901.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7134901>.
- Zheng, X., Ni, D., Liu, X., & Liang, L.H. (2022). Workplace Mindfulness: Multidimensional Model,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1-25. <https://doi.org/10.1007/s10869-022-09814-2>.